

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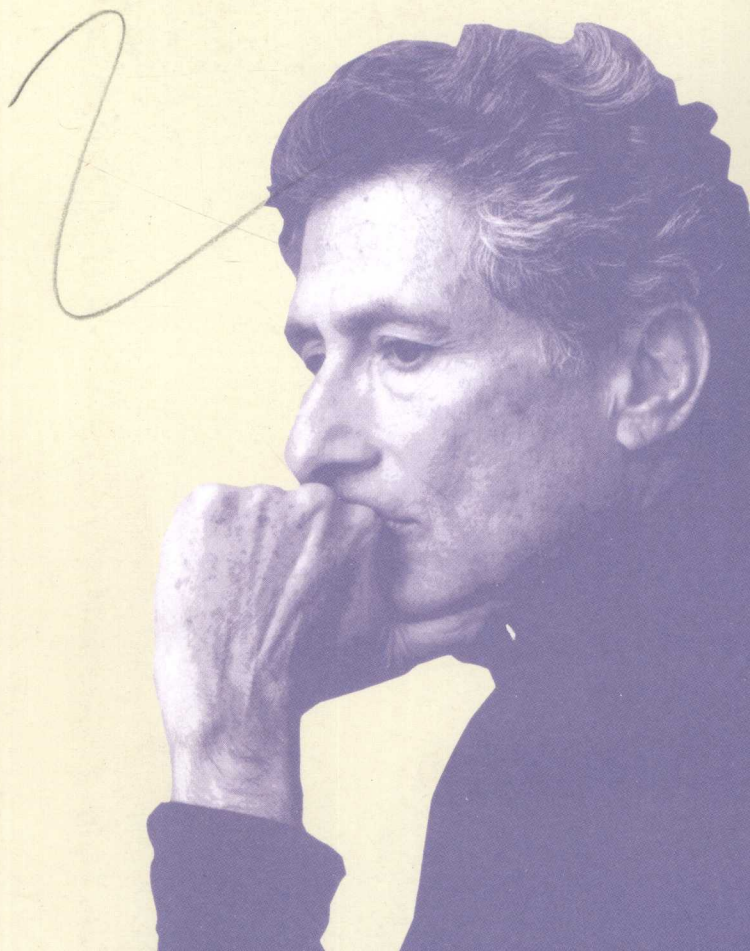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从奥斯陆到伊拉克 及路线图

Edward W. Said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唐建军 译 涂险峰 校

From Oslo to Iraq and  
the Roadmap



萨义德作品系列 (11种)

第一辑

东方学

文化与帝国主义

知识分子论

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

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

第二辑

起始：意图与方法（即出）

世界·文本·批评家

音乐之阐发（即出）

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

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

论晚期风格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刊行

ISBN 978-7-108-03228-7



9 787108 032287 >

定价：30.00 元

萨义德作品系列

000107710

Edward W. Said

From Oslo

to Iraq and the Roadmap

从奥斯陆到伊拉克  
及路线图

[美] 爱德华·W. 萨义德 著 唐建军 译 涂险峰 校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 / (美) 萨义德 (Said, E. W.) 著; 唐建军译, 涂险峰校.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9  
(萨义德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3228-7

I. 从… II. ①萨…②唐…③涂… III. 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5430 号

责任编辑 樊燕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5-539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 230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 数 282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 前 言

经过同白血病的十年抗争，爱德华·萨义德于2003年9月与世长辞。此时，他可能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颇有争议地描述了近代欧洲思想和文学中对于东方的擅取妄用。这部著作现已凭借其自身实力，繁衍出一个学科分支：在首次出版25年后的今天（《东方学》初版于1978年。——编者注），它仍在持续不断地激起人们的愤怒、敬仰和效法。即使它的作者再无其他作为，而仅将自身局限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书生涯——从1963年直到去世他一直受聘于该校——他仍会是20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然而，他却并没有这样限制自己。从1967年开始，随着岁月推移，中东局势愈益紧迫，民众情绪愈益高涨，而爱德华·萨义德也成为中东危机问题上的一位雄辩滔滔、无处不在的评论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事业的倡导者。而这种道德和政治上的积极入世行为，并未真正取代萨义德的知识旨趣——他对于西方无法理解巴勒斯坦人所受屈辱的批评，毕竟颇为真切地回荡着他在《东方学》以及后来的著作 [特别是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中解读19世纪学术和小说的声音。但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还是因此变成了一位非常公众化的知识分子，受到数百万读者的热烈崇拜或同样强烈的憎恶。

对于一位与他的崇拜者和仇视者信心十足地指派给他的任何模式都不大相合的人来说，这是个颇具讽刺的命运。爱德华·萨义德毕生都同那些被与他关联起来的各种事业有所偏离。这位巴勒斯坦绝大多数阿拉伯穆斯林的不自觉的“代言者”，却是圣公会的一名基督徒，1935年出生于一个来自拿撒勒的浸信会教徒家庭。这位帝国优越感的毫不妥协的批评者，却曾就读于在当地培养欧洲帝国精英的最后一批殖民学校中的某一所；多年来他感到在英法居住比在阿拉伯更加自在，并且成为他永远都不会完全认同的西方教育的一个杰出样板。

爱德华·萨义德是从伯克利到孟买的大学里一代文化相对主义者心中的英雄偶像。对他们而言，“东方主义”包揽一切，从“后殖民”蒙昧主义（“书写他者”）的职业训练，到学术课程里对“西方文化”的谴责，概莫能外。但萨义德本人却没有时间理会这些无稽之谈。激进的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学效果的观念，让他觉得既肤浅又“轻率”：正如他不止一次的评述之所言，人权“并非文化或者语法之物，而且，它们一旦遭到侵犯，就同我们的任何现实遭遇一样真实”<sup>[1]</sup>。

至于对萨义德思想的普遍描述，即认为萨义德把（西方）作家解读成不过是殖民特权之副产品的说法，他则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不相信作家会机械地受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史决定。”的确，说到阅读和写作，萨义德是一位毫无愧色的传统人文主义者，“尽管那些老练的后现代批评家们对这一词汇嗤之以鼻”<sup>[2]</sup>。如果说有什么事让

---

[1] 参见爱德华·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判》[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 136.]

[2] 参见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xxii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第25周年版本序言”[ *Orientalism*, “Preface to the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xxiii.]

他对年轻一代文学学者们感到灰心的话，那就是他们过分熟悉“理论”，并为此丧失了文本细读的技能。此外，他欣赏知识界的不同意见，认为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容忍分歧乃至争论，是学术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我本人对《东方学》的核心论点表示怀疑，但这绝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这种态度使他的许多远距离崇拜者感到困惑不解，对他们而言，学术自由最多不过是有条件的偶然价值。

同样一种发自肺腑的人道主义冲动，使爱德华·萨义德与那些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偶尔表现出的另一个习性，即对于暴力的热烈支持——通常是隔着安全距离而支持暴力，并总是让别人付出代价——显得格格不入。他的敌人们习惯于把他刻画为“恐怖教授”，而事实上，他一贯批评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不像让-保罗·萨特这位在前辈中的影响与之不相上下的知识分子，萨义德有一些现实暴力的切身体验——他在大学的办公室曾遭到破坏和洗劫，他和家人都曾受到死亡恐吓。但是，萨特毫不犹豫地将对政治谋杀作为既有效又具有净化作用的行动而予以鼓吹，萨义德却从不认同恐怖主义，无论他多么同情驱使它的动机和情绪。他曾写道，弱者应该采取使他们的压迫者感到不痛快的手段——某种令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平民的暴行永远望尘莫及的手段。<sup>[1]</sup>

这并不是由于爱德华·萨义德本性温和，或者是个不抵抗主义者，更不能说他是缺乏强烈责任感之人。虽然他在职业上取得了成

---

[1] 在1961年为法农（Frantz Fanon）的《大地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法文版所做的序言中，萨特把反殖民主义革命的暴力描述为“人重新创造自身……击毙一个欧洲人是一石双鸟，同时摧毁了一个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幸存者第一次感受到脚下的民族土壤。”让-保罗·萨特：法农的《大地的不幸者》序言〔（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pp. 21—22〕。对照之下，萨义德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提供的模式是甘地的印度、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和纳尔逊·曼德拉（参见本书第2章“悲剧加深”）。

功，他对音乐充满了激情 [ 他是个技艺高超的钢琴家，是丹尼尔·巴伦勃伊姆 ( Daniel Barenboim ) 的挚友，有时还相互合作 ]，而且具有交友的天赋，但他在某些方面却是个时常义愤填膺之人——正如本书中的随笔频频显示的那样。然而，尽管萨义德认同巴勒斯坦事业，竭尽全力地促进和诠释它，却缺乏那种与某一国家发生毋庸置疑的隶属关系或者使得这位活动家或理论家不顾一切地奔向某个单一目标的理念。

相反，在我看来，他总是有点偏离他的亲近物。在这个流离失所的时代里，他甚至称不上是典型的流亡者，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被迫去国离乡的男男女女，都有一个可以追忆（或期盼）的地方：一个记忆中的——更常见的是误忆中的——故土，一个如果不能在空间上便是在时间上让这些流放的个体或社群藉以停泊栖身之所。巴勒斯坦人甚至连这个也没有。从未有过一个正式建立起来的巴勒斯坦国，因此，巴勒斯坦身份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来自往昔的参照。

结果，正如萨义德就在辞世前几个月曾铿锵有力地评论的那样，“我仍然未能理解爱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当然，这就是无根的四海为家者的典型状况。没有一个国家去爱并不是十分惬意或安全的，你将因此招致强烈的敌意，敌视者认为这样的无根状态代表了一种具有侵蚀性的精神独立。但它的确是一种解放：你瞭望的世界也许并不像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们欣赏的景象那样令人慰藉，但是你却看得更加深远。如萨义德 1993 年所写，“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立场，即认为‘我们’应该仅仅或主要地对属于‘我们’的东西给予关切。”<sup>[1]</sup>

这就是这位独立批评家的真实声音，面对权力说真话……发冲

---

[1] 参见本书第 35 章“以色列、伊拉克与美国”（《金字塔报》，2002 年 10 月 10—16 日）；另参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p. xxv ]。



撞权威之异声：如萨义德在 2001 年 5 月的《金字塔报》( *Al-Ahram* ) 上所说，“以色列知识分子是否有辱使命，不由我们决定。我们关心的是阿拉伯世界里的言论与分析之鄙陋。”这同样是这位特立独行的“纽约知识分子”，一个现在快要灭绝的物种发出的声音——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中东冲突，它让如此众多的人决定支持并认同“我们”和“我们的”。<sup>[1]</sup> 这些随笔的读者将会发现，爱德华·萨义德绝非传统意义上代表冲突中某一方立场的“发言人”。

慕尼黑的日报《南德意志报》( *Süddeutscher Zeitung* ) 刊登了萨义德的讣告：“不痛快的人。”但恰恰相反，他的不朽成就，是要使别人不痛快。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爱德华·萨义德是一位不足以感激的、经常令人恼火的卡桑德拉 ( *Cassandra* )。他责骂他们的领导人无能——甚至比无能更糟。对于他的批评者而言，萨义德是一支避雷针，吸引着恐惧和谩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既机智又有教养的人竟被冠以恶魔形象：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来说，他是所有威胁的肉体化身——无论这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凭空想象的。对于充满了受难象征的美国犹太社会来说，他挑衅性地成为以色列本身所造成的受难者的毫不含糊的提醒者。而仅仅通过他在纽约这个地方的存在，爱德华·萨义德就成了一个讽刺性的、世界主义的、来自阿拉伯的提示者，提示他的批评者之狭隘。

本书收录的随笔覆盖从 2000 年 12 月到 2003 年 7 月这一时段。因此，它们引领我们依次走过从奥斯陆谈判的那个十年之末、第二次群众暴动的爆发及“和平进程”的最终破裂，到以色列对西岸和加

---

[1] 哥伦比亚大学赢得持久声望的表现是，它挡住了来自内部和公众的要求责难甚至开除萨义德的压力，这些责难源于他为了巴勒斯坦利益而进行的公开干预。

沙地区的再次占领、2001年的“9·11”大屠杀、美国对阿富汗的报复，以及美国对攻打伊拉克的长期酝酿——显然是汹涌狂暴、杀气腾腾的32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爱德华·萨义德连篇累牍而又迫不及待地评论中东地区的危险局势，至少每月拿出一篇文章，经常是多篇，尽管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对此，他在2002年8月以前的文章中只字未提，此后也仅仅是不经意地一笔带过）。

除一篇文章外，这里收集的所有随笔都投稿于一家阿拉伯语报纸，即开罗的《金字塔报》，因此这些作品给爱德华·萨义德的西方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之了解到他对阿拉伯听众不得不说的话。这些作品表明，萨义德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持之以恒地追寻三个主题：迫切需要告诉世人（首先是美国人）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真相；同样迫切的是，要让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认识到并接受以色列的现实，以及与以色列人、尤其是以色列反对派接洽；责无旁贷地公开谈论阿拉伯领导层的过失。

无疑，萨义德首先关注的是对他的阿拉伯同胞发表言论，并将他们批评得体无完肤。这里遭到最猛烈批评的是阿拉伯国家的当权政府，尤其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贪婪、腐败、恶毒、猜疑。这或许显得几乎有失公正，毕竟，具有实际影响力的是美国；毕竟，是以色列过去曾经并且目前仍在涂炭着爱德华·萨义德的巴勒斯坦同胞——但萨义德似乎觉得，至关重要的是将真相告诉他自己的人民，以关于他们自身的真相如实相告，而非冒险沉溺于“为了一己得失趋炎附势、有辱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历史形象”的行为（2000年12月）。

在这些随笔中，萨义德历数以色列行暴施虐的种种罪状（参见2000年12月的《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2002年8月的《缓慢死亡：细致入微的惩罚》或2003年2月的《伪善纪念碑》等文），严

酷无情且令人沮丧地提醒我们，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政府是如何对被封锁隔离的巴勒斯坦社会敲骨吸髓的：虐待平民，这种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也被视为犯罪的行为，如今却被一个貌似和平的政府所认可。但是在萨义德看来，这些暴虐行为并不是某个好战的、一心收复领土的将军重新执政的偶然的、不幸的副产品，而是由巴勒斯坦人投身无足惋惜的近期“和平进程”所导致的可预见的——并且就萨义德而言，是已经预见了的——结果。

对于我们中间这些欢迎奥斯陆和平进程，并且随着它在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而满怀希望地期待守望的人来说，萨义德那不抱幻想的批评着实令人沮丧。但是，回想起来，不得不承认他是正确的，而我们是错误的。按照以色列和平派所设想的，以及其他许多人——包括巴勒斯坦人——所欢迎的情形，奥斯陆和平进程应该使双方建立信心，产生相互信任。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耶路撒冷的管辖、巴勒斯坦难民重返的权利、犹太定居点等问题——会放在“后来的”、“谈判的最后阶段”进行讨论。同时，巴解组织将在自治的巴勒斯坦领土的施政过程中取得经验和可信度，而以色列人将和平安宁地生活。最后，两个国家——一个犹太人的和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将牢固稳定地比邻而居，他们的安全则由国际社会予以保障。

这是 1993 年 9 月在白宫草坪上签署的《原则声明》（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背后的前提。但是整件事却存在着巨大缺陷。正如萨义德提醒我们的，参加谈判的没有双“边”：有的只是以色列，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拥有令人生畏的军事装备（据估计，是当今世界第四强）的现代国家，正在占领着在 30 年前的战争中所攫取的土地，侵略着这里的人民。而那里的巴勒斯坦人，一个被驱散的、背井离乡的、被剥夺了祖先遗产的社群，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属于自己的领

土。这个地方存在着一个侵占者和一些被侵占者。在萨义德看来，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优势就在于他们恼人的真实性：他们就在那儿，不会离去，而且不会让以色列人忘记对他们的所作所为。

由于没有什么可放弃，巴勒斯坦人也就没有什么可商议。与占领者“做交易”终究意味着投降——或通敌。这就是为什么萨义德把1993年的《声明》描写成“一个巴勒斯坦的凡尔赛”<sup>[1]</sup>，以及为什么他预先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中辞职的原因。萨义德推理说：如果以色列需要从巴勒斯坦人那里得到些什么，那么巴勒斯坦人想要的那些东西——完整的主权、恢复到1967年的边界、“重返的权利”、共同拥有耶路撒冷——一开始就应该摆到桌面上来，而不是放在尚未确定的最后阶段去解决，然后才有以色列的“诚意”问题。

1993年，当最初的《声明》签署的时候，在西岸和加沙地区只有32750户犹太定居者住宅单元。截至2001年10月，已有53121户，增加了62%，且未来还会继续增多。从1992至1996年，在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和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领导的工党执政之下，西岸定居人口增加了48%，加沙地区人口增加了61%。退一步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和资源的这一稳步接管很难符合《奥斯陆宣言》精神。该宣言第31条（第7款）明确规定：“在关于永久状态的谈判结果出台之前，双方都不得发起或采取任何将会改变西岸和加沙地带状况的行动。”

同时，甚至就在巴解组织被授权管理剩余的巴勒斯坦行政区之时，以色列却在兴建“犹太”道路网，穿插交错于那些地区，为定

---

[1] 爱德华·萨义德：《流离失所的政治：1969—1994年间争取巴勒斯坦自主的奋斗》[*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 xxxiv]。

居者及其他以色列人提供专用通道，方便其前往受到永久性军事设施保护的遥远的住宅区（和稀缺的蓄水层）。<sup>[1]</sup> 整个行为的动力，部分来自以色列时间错乱地将土地与安全混为一谈；部分源于1967年以后出现的热衷收复领土的末世论（即援引《旧约》作为与一个宗派的上帝签订的某种真实的不动产契约）；部分则出自将领土扩张作为自身目标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持久狂热。从巴勒斯坦立场来看，其结果就是使得奥斯陆和平进程变成缓慢执行的痛苦绞刑，尤其是把加沙实质上变成一座由巴勒斯坦人看守的监狱，而以色列军队则据守在周边围墙之外。

接着，在2000年，经过长期延宕的“永久状态谈判”姗姗而来：首先在戴维营，然后希望渺茫地来到西奈（Sinai）半岛的塔巴（Taba）。爱德华·萨义德当然无暇理睬传统的美国见解，即认为克林顿总统和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总理实质上已做出让步，而尽管如此，忘恩负义的巴解组织及其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却拒绝了馈赠。这并不是因为萨义德同情阿拉法特，而是因为戴维营的最初提议——正如坦妮娅·赖因哈特（Tanya Reinhart）在2000年7月8日的以色列日报《新消息报》（*Yediot Aharonot*）上所述——显然是个“欺骗”。巴勒斯坦人将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的50%，一些被切割得七零八落的、通常是不连贯的行政区；以色列将吞并这块土地的10%；剩下的40%是“未定的”——但处于以色列的模糊管辖之下。

五个月之后，在塔巴，巴勒斯坦人被提供一个改善过的领土协议，这确实是他们可能希望从以色列政府那里得到的最佳条件。但最

---

[1] 双方在经济上变得比以往更加互相依赖（以色列人依赖巴勒斯坦的廉价劳动力，而巴勒斯坦人则依赖以色列提供就业机会和进入市场的渠道），甚至在这种情况下隔离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便会造成这种悖谬的结果。

终形成的巴勒斯坦国将依旧完全依赖以色列，并且很容易因为以色列的反复无常而受到伤害；对于巴勒斯坦难民的苦痛从未充分对待；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主权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的立场不会动摇。的确，就连以色列在最后一刻的让步，也依旧受到被萨义德绝妙地称为“条件、资格和继承权限的强大阻碍（正如简·奥斯汀一部小说里的那份不断延期、客观上根本无法获得的不动产一样）……”

与此同时，巴拉克继续在定居点内扩张人口，而连他自己的谈判代表都将这些定居点视为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即使巴解组织领导人曾经打算将塔巴协议出卖给他们的委托人，他们也很难做到：在沙龙精心选择时机地造访圣殿山（Temple Mount）之后爆发的第二次群众暴动虽是巴勒斯坦人的一场灾难，但它却是由多年来——即奥斯陆谈判的这些年——的挫败和屈辱孕育出来的。正因如此，也基于他自身的原因，阿拉法特指示巴勒斯坦方不要签署协议。

塔巴谈判，尤其是戴维营谈判，是奥斯陆谈判种下的苦果，而且在爱德华·萨义德看来，巴解组织在参与和平进程中所犯的首要错误，充分地体现在它不可避免地拒绝其结果，又回顾性地怀疑整个谈判战略的行为。在2002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萨义德对巴解组织铁杆分子及其领导人毫不姑息，批评他们凭借手中权力，在以色列的宽厚监护之下，出色地担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傀儡式”地方长官。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残忍、独裁和不可思议的腐败的代名词”（《巴勒斯坦目前的选举》，《金字塔报》2002年6月13—19日）。

在为这家报纸撰写的其他文章中，萨义德写道，阿拉法特和他的圈子“已使我们的局势越来越糟”。“巴勒斯坦人（以及扩展到其他阿拉伯人）已被他们的领导人出卖并且无望地被误导了，”这些领导人既无崇高原则也无切实有效的策略。“阿拉法特已经多年

不曾代表他的人民、他们的苦难和事业。与阿拉伯其他类似领袖一样，他像个熟透的水果一样紧悬枝头不放，而没有真正的目的和立场”（《阿拉伯的分裂与派系斗争》，《金字塔报》2002年8月15—21日）。

那么，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如果巴勒斯坦领导层腐败无能；如果以色列政府甚至连自己做出的承诺都不兑现，更不用说会实现其对话者的愿望；如果各方都存在太多的恐惧和憎恶，那么，“两国方案”该如何实现，既然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社会——甚至美国人——最终都在原则上接受了它？在此，爱德华·萨义德又一次几乎与任何人的意见都格格不入。

1980年，当萨义德首次公开提出一项“两国方案”时，他遭到四面八方的攻击和谩骂，其中来自阿拉法特本人的法塔赫运动组织的一点也不少。然后，在1988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迟迟地承认，可能的最佳结果确实就是将巴勒斯坦地区分成两个国家——一个属于以色列人，一个属于巴勒斯坦人。这一见识回响着萨义德所坚持的主张，即对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来说，除了互利互惠的领土自主，别无选择。<sup>[1]</sup>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随着一半的被占领土遭到剥夺；随着巴勒斯坦社会变成一片废墟，公认的巴勒斯坦版图变成由孤立隔绝的土地、被铲平的橄榄树林和被毁的房屋构成的满目疮痍的风景，在那里，受到羞辱的成年人在情绪愤怒、态度疏远的青少年那里迅速丧失主动权，萨义德得出了令人越来越无法抗拒的结论。

以色列永远不会放弃西岸，至少不会让它处于完整统一的、可治理的状态。西岸和加沙地区可能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除了一个

---

[1] 举例参见爱德华·萨义德：《谁为巴勒斯坦人辩护》（*Who Would Speak for Palestinians*），*New York Times*，May 24，1985。

罪恶的黑手党，有谁会想要承担“治理”它的任务？巴解组织设想的“巴勒斯坦”是个白日梦——而且是个毫无吸引力的白日梦。不论是好是歹，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地区将会只有一个真实的国家：以色列。这不是乌托邦；它不过是抛开幻想的实用的实用主义。真正务实的办法在于接受这一事实并认真思考如何充分利用它。“比拥有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它是个什么类型的国家。”<sup>[1]</sup>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爱德华·萨义德一直坚持不懈地提倡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构建一个单一的、世俗的国家。

爱德华·萨义德坚持“一国方案”的信念，坚持用一个非排他性的、世俗的、民主的选择来取代目前的僵局，其理由何在？首先，目前的现状十分恶劣，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糟：两个民族，都依靠关于自己是唯一受害者的叙事来自我维持，为了同一块弹丸之地，跨过自己孩子的尸体，无休无止地争斗。他们中的一方是武装国家，另一方是没有国家的人民，但此外他们又令人懊恼地彼此相似：归根结底，巴勒斯坦的民族叙事，如果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面具有谴责意义的镜子，不是一个驱逐、离散、再生和回返的故事，那又是什么？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将这块有争议的“故国”分开而实现互惠双赢。这样的两个小国，彼此互相仇视，而其中每个国家里都有一群颇具影响力的选民致力于毁灭和吞并它的邻居，这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局。

其次，巴勒斯坦状况已发生某种根本变化。四十年来，数百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以色列、被占领土、横贯阿拉伯世界的难民营以及流放各地的巴勒斯坦人——几乎都不为人所察。他们的存在本身长期以来遭到以色列政客们的否认；关于他们被驱逐的遭遇

---

[1] 萨义德：《流离失所的政治》，xliii 页。



的记忆，在官方档案中受到删除，在历史书中也被省略，只字不提；关于他们家园、村庄和国土的记载，都已从这块土壤上清除。正如萨义德指出的，这就是他不断讲述这同一故事的原因：“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将它维系；除非你不停地讲述它，否则，它就会越来越弱，直至消失。”然而，“要想长达 50 年地拥护一个不断失落的目标，是相当困难的。”似乎除非有人实施恐怖主义暴行，否则巴勒斯坦人就仿佛根本不存在似的——暴行发生时，仿佛那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的来源无法确定，他们的暴力无法说明。<sup>[1]</sup>

这就是为什么“回返权”问题在巴勒斯坦的所有要求中地位如此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有任何严肃认真之人认为以色列会“接回”数百万难民及其后代，而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对于得到承认的需要：要承认早先的驱逐确曾发生，承认初始错误确实犯有。这就是奥斯陆协议让萨义德十分恼火的原因：它似乎打算原谅或宽恕以色列的占领及其他每件事情。但是“在进一步遭受如此之多的苦难之后，不能就这样原谅以色列，不能连让它在言辞上对所作所为进行谢罪的要求都不提一下，就允许它离开谈判桌”（《奥斯陆代价几何？》《金字塔报》，2002 年 3 月 14—20 日。加点字部分是我的强调）。对此必须予以关注。

但是，人们目前确实正在关注。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世界舆论对巴勒斯坦悲剧的看法与巴勒斯坦人自己的看法基本相同。他们是以色列土生土长的居民，一个在自己的故土被革去国籍的本土社群：他

---

[1] 萨义德：《流离失所的政治》，xviii 页，118 页。若要了解以色列考古学家和官僚在以色列清除涉及巴勒斯坦往昔的所有证据时是多么明显地穷尽一切，可参见梅隆·本维尼斯提（Meron Benvenisti）的《神圣的风景：自 1948 年以来关于圣地的被埋葬的历史》[*Sacred Landscape: The Buried History of the Holy Land since 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们被剥夺财产，被放逐驱赶，地产被非法征用，被限制在“班图斯坦”，被拒绝给予许多基本权利，并且每天每日遭受不公和暴力。今天，深谙内情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有哪怕微乎其微的借口，来说明阿拉伯人在1948年是自愿或是在外国暴君的强制之下离开的，就像我们曾被灌输的那样。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是以色列在该领域的一位领衔学者，他最近在以色列日报《国土报》上提醒读者说，在1948至1949年的一次早期的、不彻底的种族清洗尝试中，以色列士兵不只是驱逐了巴勒斯坦人，而且还犯下了战争罪，其中包括强奸和谋杀妇女儿童。<sup>[1]</sup>

当然，莫里斯声名狼藉地对这一历史记录中的过错视而不见——他视之为建国兴邦历程中的附带伤害。<sup>[2]</sup>但是，这就让我们有了第三个理由认为萨义德关于单一国家之契机的观点有可能是正确的。正当巴勒斯坦事业已开始得到公众舆论支持，并在道德领域逐渐占据上风之时，以色列的国际声望也在急剧瓦解。多年来，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无法克服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是被法国殖民者或荷裔南非人，而是——用萨义德的话来说——被“以色列的犹太公民，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些背负着种族灭绝与迫害之悲惨历史的人们”驱逐、殖民、占领和普遍虐待。

由受害者造成的受害者，正处在一个无法忍受的局面之中——而且，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由于阿拉伯人试图以淡化或否认的方式将它从大屠杀的阴影中挤出来的倾向，而变得更为糟糕。<sup>[3]</sup>但是，

---

[1] 本尼·莫里斯，2004年1月8日接受《国土报》的采访。

[2] “我认为1948年的驱逐不是战争犯罪。不打破鸡蛋，就不能做蛋糕。”《国土报》，2004年1月8日。

[3] 参见萨义德：《流离失所的政治》，xviii页及《巴伦博伊姆和瓦格纳禁忌》（*Barenboim and the Wagner Taboo*），《金字塔报》，2001年8月16—22日。

在涉及虐待他人的行为时，即使是受害者也不能永远握着一张自由通行证。对波兰人在“二战”之前、之中和之后经常迫害犹太人的指控，不能再因援引希特勒手下的 300 万波兰受害者而称心如意地得到回避转移。做过必要修改之后，这也同样适用于以色列。直到 1967 年的军事胜利为止，甚至在此后的数年里，以色列在国际上的主导形象是由其左翼犹太复国主义立国者及其在欧洲等地的众多崇拜者所体现的：一个勇敢的小国，四周布满敌人，在此地，沙漠变成了繁华的绿洲，而本土族群则从这幅画面中抹去。

继入侵黎巴嫩之后，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首次爆发的群众暴动日益加剧，以色列在公众眼里的印象每况愈下。今天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个骇人形象：那是一个手持 M16 式卡宾枪、面带鄙视表情的 18 岁青年嘲弄无助老人的地方（“安全措施”）；一个推土机经常将整个公寓区夷为平地的地方（“集体惩罚”）；一个直升飞机向住宅街道发射火箭炮的地方（“定点暗杀”）；一个享受津贴的定居者在四周铺着小草的游泳池中嬉戏，对近在咫尺的、这个星球上最糟糕的平民窟里全身化脓溃烂的阿拉伯孩子熟视无睹的地方；一个退役将军和内阁大臣们公开谈论要把巴勒斯坦人“像瓶子里被麻醉的蟑螂”[拉斐尔·埃坦（Rafael Eytan）]一样控制起来，并将这个阿拉伯毒瘤从这片土地上清除出去的地方。<sup>[1]</sup>

以色列完全依靠美国在金钱、武器和外交方面的支持。有一两

---

[1] 早在 1975 年，以色列内政部住房机构主任就曾向伊扎克·拉宾报告说，以色列“自己的”阿拉伯人是“犹太肌体内的一个肿瘤，必须加以控制和抑制”。参见依兰·帕佩（Ilan Pappé）：《巴勒斯坦现代史：一方土地，两个民族》[*A History of Modern Palestine: One Land, Two Peopl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7.]。30 年过去，只有隐喻发生了改变：“必须为他们（巴勒斯坦人）建造某个类似笼子之物。我们别无选择——那里有一只野兽，必须把它锁起来。”本尼·莫里斯，《国土报》2004 年 1 月 8 日。

个国家与以色列具有共同的敌人：少数几个国家购买它的武器；其他几个国家则实际上是它无视国际条约而秘密生产核武器的真正同谋。但是，除华盛顿之外，以色列没有朋友——在联合国，它甚至不能指望美国的铁杆盟友给予支持。尽管巴解组织在政治和外交上十分无能（这一点萨义德在他的作品中做过充分评述）；尽管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缺点一目了然——即“徘徊在人类主流发展进程之外”；<sup>[1]</sup> 尽管以色列老谋深算、不遗余力地自我宣扬，今天这个犹太国家仍被普遍视为一个——那个——给世界和平带来头号威胁的国家。在长达 37 年的军事占领之后，以色列在安全方面一无所获；它在国内斯文扫地，在国际上尊严无存，并且永久丧失了道德优势。

新近出现的对巴勒斯坦主张的承认，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越来越名誉扫地的趋势（尤其是在许多深感忧虑的以色列人当中），似乎使人更难而不是更易设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单一国家里和睦相处这一情景。就像少数巴勒斯坦人会永远憎恨他们的犹太邻居一样，很可能有些以色列人，可以说，永远不会因为以色列人曾经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而放过巴勒斯坦人。但是萨义德认为，巴勒斯坦人愤愤不平的被忽略感和以色列对自身道德公正性的坚持强调，是解决共同难题的双重障碍。可以说，双方都未能“看见”对方。正如奥威尔（Orwell）在他的《民族主义札记》（*Notes on Nationalism*）一书中所论：“如果一个人在其思想的任何地方怀有民族主义般的忠诚或仇恨，那么，有些事实，即使在一定意义上明知是真实的，也会不予接受。”

今天，尽管有这一切障碍，事实上，双方中都有一些人对于另一方——在颇为真实的意义上——来自何处，持有更高的见识。我

---

[1] 萨义德：《流离失所的政治》，371 页。

想，这源于一种正在增长的意识，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占据着同样的空间，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会继续如此。他们的命运被纠缠在一起，无望摆脱。无论有没有围墙，这块现今由以色列统治的领土，唯有通过国际社会不可能给予支持的武力行动，才能“清除”掉它的阿拉伯（或犹太）居民。如萨义德所述，“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如今是个失败的目标——但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历史上的以色列”也不例外。无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一个能够适应并尊重两个社会的单一的制度化的实体将会出现，虽然对于它在何时出现、以何种形式出现，我们目前尚不清楚。

在萨义德看来，中东新思维的真正障碍不是阿拉法特，不是沙龙，甚至也不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或定居点的过激分子。真正的障碍，过去曾是——现在还是——美国。以色列的官方宣传取得了极大成功的地方，以及巴勒斯坦的宣传彻底失败的地方，就是美国。美国犹太人（颇似阿拉伯政客）在一个“沉溺于幻想和神话之中的那种极度自我封闭”（《美国犹太人的危机》，2002年5月）状态下生活。许多以色列人非常清楚占领西岸地区对他们自己的社会造成了什么影响（如果说对于它给其他社会造成的影响不那么敏感的话）：“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腐蚀并且歪曲了以色列的品质，撕裂了这个国家，也毁坏了社会”[哈伊姆·古里（Haim Guri）]。<sup>[1]</sup>但多数美国人，实质上包括每名政客在内，对此没有任何意识。

这就是为什么爱德华·萨义德在这些随笔中坚持主张巴勒斯坦人需要将他们的情况诉诸美国公众，而不只是如他所述的恳求美国总统“给予”他们一个国家。美国的公众意见十分重要，而且萨义德

---

[1] 引自汤姆·塞格夫（Tom Segev）的《艾维斯在耶路撒冷》[*Elvis in Jerusalem*（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2），p.125]。

对阿拉伯知识分子和学生们愚昧的反美主义感到绝望：“坐在贝鲁特或开罗的会议大厅里谴责美帝国主义（或犹太复国殖民主义）而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是复杂的社会、并非真的永远由其政府愚蠢或残忍的政策来代表，这样做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他首先对于他“自己的”国家在政治上缺乏远见而感到沮丧：只有美国能打破中东地区的血腥僵局，但是，“美国拒绝认清的事情，很难指望会得到纠正弥补。”<sup>[1]</sup>

美国是否会幡然醒悟并认识到它的责任和机会，仍是个未知数。但从布什总统于2004年4月在保留西岸被占领土、无视国际法规和边境线等方面为阿里埃勒·沙龙大开绿灯这一点来看，形势不容乐观。无论如何，我们这些身在美国的人必须就巴以问题展开辩论，而这一问题是许多人宁愿回避的，甚至不惜为此将美国——和以色列——同世界其他国家孤立隔绝开来。为了达到效果，这场辩论必须在美国本土进行，而且必须由美国人来实施。这就是爱德华·萨义德为何如此独具重要意义的原因。三十多年来，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对话。这样一来，他冒着巨大的个人危险从事了一项不可估量的公益事业。他的死给美国公众生活留下一片茫然空白。他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托尼·贾特 (Tony Judt)

2004年3月

---

[1] 爱德华·萨义德：《自杀式的无知》，《金字塔报》2001年11月15—21日，见本书第21章；以及《盲目的帝国主义傲慢》[“Blind Imperial Arrogance”，*Los Angeles Times*, July 20, 2003]。

# 目 录

## 1 前言 (托尼·贾特)

### 第一部分 第二轮群众暴动之始与克林顿的失败

- 3 1. 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
- 31 2. 悲剧在加深
- 37 3. 美国选举：体制还是闹剧？
- 43 4. 屡次尝试
- 48 5. 以色列向何处去？
- 54 6. 唯一的其他选择
- 59 7. 弗洛伊德、犹太复国主义与维也纳
- 66 8. 转向另一战线的时机
- 72 9. 现实种种
- 77 10. 对以色列的思考
- 83 11. 反抗、尊严与教条统治
- 90 12. 国家公敌
- 98 13. 磨利刀斧
- 102 14. 戴维营的代价
- 107 15. 占领即暴行
- 114 16. 宣传与战争

### 第二部分 “9·11”事件、恐怖战争、西岸及加沙的再次入侵

- 123 17. 群情激愤

- 130 18. 反弹与回撤
- 137 19. 在相似性中随波逐流
- 145 20. 振奋精神的见识
- 152 21. 自杀式的无知
- 159 22. 以色列的穷途末路
- 167 23. 巴勒斯坦正在出现的其他选择
- 173 24. 螺旋再次转动
- 179 25. 关于美国的思考
- 187 26. 奥斯陆代价几何？
- 194 27. 思考未来
- 199 28. 以色列干了些什么？
- 205 29. 美国犹太人的危机
- 210 30. 巴勒斯坦目前的选举
- 217 31. 单行线
- 224 32. 缓慢死亡：细致入微的惩罚
- 232 33. 阿拉伯的分裂与派系斗争
- 238 34. 无力的极点

### 第三部分 以色列、伊拉克与美国

- 245 35. 以色列、伊拉克与美国
- 262 36. 欧美对峙
- 266 37. 关于伊拉克的虚假信息
- 273 38. 当务之急
- 281 39. 难以接受的软弱无助
- 287 40. 伪善纪念碑
- 293 41. 谁在当政？
- 298 42. 一场愚蠢的战争



306	43. 美国正在发生什么?
313	44. 阿拉伯状况
320	45. 路线图考古
331	46. 尊严与团结
342	后记 (瓦迪厄·E. 萨义德)

# 第一部分 第二轮群众暴动之始与 克林顿的失败



## 1. 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

2000年9月29日，在大约一千名以色列警察及/或士兵保护之下，阿里埃勒·沙龙造访了位于耶路撒冷的哈兰·阿—夏利（Haram al-Sharif）（至尊圣地），刻意以一种明确姿态，公开宣示他作为一名以色列人造访穆斯林圣地的权利。从那天起，战火便在这块土地上点燃，直到我撰文的11月中旬，战争还在继续。沙龙本人毫无悔意，指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蓄意煽动”巴勒斯坦人反对“高度民主”的以色列、企图改变其犹太性和民主性。他说，他到那里“是为了检查并确认任何人都拥有信仰自由，都可以自由进入圣殿山”，但是，他却只字不提身边前呼后拥的大群卫兵，也毫不提及在他到来前后和到来之际这里曾遭到封锁，因而几乎无法保证自由出入的情形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2000年10月4日]。他对29日以色列军队枪杀8名巴勒斯坦人的事实未置一词，也闭口不谈1967年6月以色列单方面吞并东耶路撒冷并把它变成军事占领区之事——依照国际法，该地区人民有权通过任何可能的途径来抵抗这一军事占领：正是这一事实引发了新一轮的群众暴动。此外，考古学家认为，圣殿山一千五百年前应该位于世界上两座最古老、最宏伟的穆斯林神殿之下，是宗教传统主题的汇聚之地，而这位在萨布拉（Sabra）、沙提拉（Shatila）、凯比亚（Qibya）和加沙（Gaza）的大屠杀以及自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其他大屠杀之中双手沾满了巴勒斯坦人民鲜血的野蛮的右翼以色列将军，要凭借对此地不止一次的铁蹄践踏，将圣殿山辨别出来。

“巴勒斯坦医疗救济委员会联盟”（The Union of Palestinian Medical Relief Committees）说，到 11 月 7 日为止，已有 170 人被杀，6000 人受伤，其中不包括以色列的 14 名死亡者（有 8 名是士兵）和数目稍多一点的受伤者（几天后死亡人数上升至两百多）。较早的数据来自以色列人权组织“形象”（B'tselem）。该组织说，巴勒斯坦死者中包括至少 22 名年龄在 15 岁以下的男孩和 13 名巴勒斯坦裔以色列公民，他们是在以色列境内举行的游行示威中被以色列警察杀死的。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公布了报告，严厉谴责以色列对平民滥用武力。据菲尔·里夫斯（Phil Reeves）在《独立报》（*Independent*，2000 年 11 月 12 日）中所述，大赦国际已公布另一份报告，谴责以色列对于本国境内及耶路撒冷地区的阿拉伯儿童进行骚扰袭击、刑讯逼供和非法拘捕。吉登·列维（Gideon Levy）在《国土报》（11 月 12 日）中警告说，以色列国会成员中为数不多的阿拉伯人大都因强烈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政策而受到惩罚；一些人已被解除委员会职务，另一些人面临审判，还有一些人正遭受警察讯问。他总结道：所有这一切，是在以色列境内及被占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妖魔化和非法化进程”的一部分。

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正常生活（这一短语不免有点矛盾修辞的意味）已荡然无存。就连那些凭借和平进程确立其贵宾地位并享有特权的三百名左右的巴勒斯坦人，也不再尊贵，而是同其他三百万左右承受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以色列占领政权施加的双重生活负担——更不用说还要忍受数千名以色列定居者的野蛮暴

行，他们中有些人已变成狂暴的治安维持会员，对巴勒斯坦村庄以及像希伯伦这样的大城镇进行恐怖统治——的巴勒斯坦人民一样，遭到封锁、包围，被设置路障，禁止通行。亚西尔·阿拉法特本人也没能逃过这样的侮辱。他必须经过许可才能出入西岸或加沙。在那里，他的机场被以色列人随时开放或关闭，他的总部被以色列武装直升飞机发射的导弹惩罚性地轰炸。至于那些出入此地的货物流通，更不用说工人、普通旅客、观光者、学生和老弱病残，则已被固定在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已被监禁起来。根据联合国驻被占领土特别协调员办事处（UN Special Coordinator's Office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的报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79.8%；与约旦之间的贸易次之，占2.39%，这一颇低的数字直接源于以色列对整个巴勒斯坦—约旦边境（当然也包括巴勒斯坦与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接壤的边境）的控制。因此，由于以色列的封锁，巴勒斯坦的经济损失已达到2000年上半年得到的援助资金总量的三倍；其损失每天平均高达1950万美元[《生活报》（*Al-Hayat*），2000年11月9日]。对于一个依赖以色列经济——这种关系源于巴解组织在奥斯陆协定中签署的经济协议——的贫困殖民地人口来说，这是个极为严酷的困境。

而以色列修建定居点的速度却丝毫没有放慢。根据权威的《关于被占领土上以色列定居点的报告》（RISOT），在被视做支持和平的埃胡德·巴拉克政权领导下，这些定居点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96%。报告中还说，自巴拉克1999年7月就职以来，“已开辟了1924个定居点”，这一数字还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规模庞大的道路建设项目、该项目所必需的对土地的持续征用、系统的森林采伐，以及军队和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农田的掠夺和毁坏。位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权委员会（the Gaza-based Palestinian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详细地提供了关于以色列军队（或者，正如它更倾向于让人们得知的，是“以色列国防军”）“清除”诸如拉法（Rafah）边界和古什卡蒂夫（Gush Katif）定居区两侧的橄榄树林和蔬菜农场的资料。这一带是加沙至今仍被数千非法定居者占据的 20% 领土的一部分；在此，定居者可以浇灌自家草坪，给游泳池蓄水，而加沙地区的百万巴勒斯坦居民（他们中 80% 是前巴勒斯坦难民）却住在酷热的无水区。事实上，以色列控制着被占领土的所有供水系统，其中 80% 的水归犹太公民个人支配使用，剩余部分才供应巴勒斯坦人口；在奥斯陆和平进程期间，从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认真的商谈。

被过分吹嘘的和平进程本身又如何呢？它的成就何在？如果它的确是一个和平进程的话，那么为什么巴勒斯坦生活所遭受的损失和悲惨状况比 1993 年 9 月签订奥斯陆协定之前还要糟糕？为什么如《纽约时报》记者小威廉·奥莫（William Orme Jr）于 11 月 5 日所言，“现在巴勒斯坦的风景，到处点缀着当初那些和平统一计划的废墟”？如果依然存在着如此之多的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那么大谈和平意味着什么？再则，根据《关于被占领土上以色列定居点的报告》，在奥斯陆协定之前，住在加沙和西岸地区非法定居点的犹太人有 11 万；这个数字在 2000 年已上升到 19.5 万人，其中还不包括超过 15 万作为居民加入到被（同样非法）吞并的阿拉伯东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世人被愚弄了吗？还是，过分渲染的“和平”修辞其实一直是个大骗局？

这些问题的答案一直都摆在那里，尽管它们要么被埋葬于双方在美国主持之下签署的成堆文件之中，因此除了参与谈判的少数人以外基本上无人看过；要么被媒体和政府完全忽视。这些媒体和政府当前的任务似乎就是追逐灾难新闻、加紧投资和厉行政策，根本不管这块土地上有多么恐怖的事情正在发生。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尝试着

将巴勒斯坦从最初的奥斯陆投降直至目前所发生之事如实写进编年史，但较之主流媒体及政府——更不必说那些资金雄厚的机构，如世界银行、欧盟和许多私人基金会，其中尤以福特为最，因为该公司已经参与了骗局——我们的声音除了很不幸地预言目前正在发生之事而外，能起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如此规模的共谋与残忍，只有斯威夫特的天赋方能将其分析透彻。

无论如何，过去几个星期的骚乱不仅局限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从未像今天一样，被表达反美、反以情绪的游行示威搅得不得安宁。在开罗、大马士革、卡萨布兰卡、突尼斯、贝鲁特、巴格达和科威特，每天都有愤怒的街道游行发生；确切地说，数百万人民表达了他们对阿克萨暴动（Al-Aqsa Intifada）——人们如此称呼它——的支持，也表达了对自身政府的畏缩屈从之愤慨。2000年10月，在开罗召开的阿拉伯峰会与往常一样出现对以色列的大声谴责，并为阿拉法特的权力机构又赢得了几个美元的资助，但是，却连最低限度的外交表示——召回大使——都未获通过。峰会之后的第二天，受过美国教育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Abdullah）——据说他的阿拉伯语已大抵进步到了中学水平——飞抵华盛顿，与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美国签署了一份贸易协议。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由于过分依赖美国给予他的每年20亿美元的援助而怯于对美国政策提出异议。与其他人一样，他太需要美国的保护来对付本国国民，故而不敢反对克林顿以及由前以色列游说官员组成的调停小组。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愤怒、耻辱和挫折感不断加剧，无论是由于政府的不民主和不受欢迎，还是由于所有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工作、收入、营养、健康、教育、基本设施、运输、环境——已恶化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以至于只能求助于伊斯兰教和更为笼统的表达愤怒的方式，而不再诉诸公民意识和参政



议政式的民主形式。这预示着未来的不幸，既是阿拉伯人的不幸，也是以色列人的不幸。

上世纪后 25 年期间，决策层和外交圈中的大多数人普遍认为：作为一项事业的巴勒斯坦国其实已不复存在，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乃是海市蜃楼，而少数最无信誉且不受欢迎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已经领悟到这一点，并接纳以色列和美国为伴，在放弃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过程中，被迫接受一个具有现代化、实用主义、解除控制以及私有化特征的全球化趋势。这一趋势的早期预言者是安瓦尔·萨达特（Anwar al-Sadat），而《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中东问题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也一直是位颇具影响力的全球化鼓吹者。当这位重量级评论员在 10 月底碰巧发现自己被困在拉马拉（Ramallah），并遭到以色列军队的包围和轰炸时，他在撰写专栏称赞奥斯陆和平进程的七年多时间里第一次突然醒悟过来，认识到这一事实，即“以色列关于西岸巴勒斯坦人已大部分自治的宣传简直是痴人说梦。的确，巴勒斯坦人掌管着自己的城镇，但是以色列人却控制着所有连接这些城镇的道路，从而控制着巴勒斯坦人的所有行动。以色列人征用巴勒斯坦的土地以便建立更多的定居点，这一行为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奥斯陆协定的签署已有七年”。他总结道，只有“在加沙和西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才能带来和平，但是，他当然没有说那将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也没有提到要结束军事占领，而奥斯陆文件也明摆着没有提及此事（《纽约时报》，2000 年 10 月 31 日）。他之所以在 1993 年 9 月以来所撰写的数百篇专栏文章中从不讨论这一问题，而且甚至直到现在，也未谈及奥斯陆的累积逻辑（cumulative logic）导致了今天的血腥后果，这一切虽然有悖常理，却反映了相关言论所具有的典型的种族主义及虚伪特性。

与此同时，那些曾自告奋勇地断定巴勒斯坦的不幸不会再重演的过分乐观精神，似乎已消失到九霄云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基于自己的狭隘利益而竭力巩固的“和平”亦已灰飞烟灭。而且，由于阿拉伯领导层已经老龄化，又物色不到得力的继承人，历经冷战而存活下来的旧框架已慢慢解体。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甚至拒绝任命一位副总统，阿拉法特也没有明确的继承人。而无论在伊拉克或叙利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党共和国（“democratic socialist” Ba’ath republic），还是约旦王国，其情形都是：这些统治者的儿子们已经或即将凭着他们聊以遮羞的合法性，来接管各自的独裁王朝。

然而，形势已抵达一个转折点，而巴勒斯坦的群众暴动便是其重要标志。因为它不仅像在塞堤夫（Setif）、沙佩维尔（Sharpeville）、索韦托（Sowetto）和其他地方周期性爆发的反抗那样，是反抗殖民的暴动，而且，它还体现了人民对引发西雅图事件与布拉格事件的那种新经济秩序的普遍不满。对于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来说，它那代价昂贵的平民牺牲，跟萨拉热窝、摩加迪沙、受到美国为首的制裁的巴格达以及在车臣的情形如出一辙。包括比尔·克林顿和埃胡德·巴拉克在内的每一个统治者都必须明白，由以色列—美国—阿拉伯本土政权的统治所保障的稳定时期，如今真正地受到数量不定、方向不明、前景模糊不清的大规模民众力量之威胁。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加大了公民与某种操控势力——在人们心目中，这种操控势力要么是外来者，要么是企图增加一小群人财富的少数人——这两者之间距离的日常贸易已被停止。一只凶猛的野兽——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正在拼命挣扎着，以一种人们无法准确预知的形状诞生。但极有可能，它将属于那些被剥夺权利者、被迫沉默者和备受轻视者所拥有的并且已经遭到拖延或被埋没数十年的非官方文化；

而似乎同样极有可能的是，它自身之内也将携带着过去官方政策的长期歪曲。

讽刺意味十足的是，正是和平进程的真实地图最为戏剧性地显现了种种歪曲。在措辞慎重的和平论调及双边谈判系统地掩盖事实的过程中，这些歪曲已逐步壮大。尽管同样具有讽刺的是，确切地说，自目前危机爆发以来，在数十条新闻报道和电视采访中，没有一条展示过地图，藉以表明这些冲突以其现有方式展开的地点和原因。我认为如下说法是准确的，即：当大多数人听到诸如“双方正在谈判”、“让我们回到谈判桌上”以及“你是我的和平伙伴”这样的短语时，就认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势均力敌，认为由于参与奥斯陆秘密谈判的双方勇士们的功绩，两国正在最终解决他们之间的“划分”问题，仿佛双方各置一边，各有一块土地，一块可以彼此对峙的土地。这是一幅严重误导的、其实害人匪浅的思想图景。无论是出于无心还是反复持久的宣传，它都是为了掩饰双方之间那种怪异的比例失调。

这一歪曲画面，被当做人类努力的成果而保留下来。关于这一点，不妨看看下文：《国土报》10月25日刊登的文章，引用了反诽谤同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对美国主流刊物上发表的社论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说，存在着“一种支持以色列的模式，即对以色列之困境表示同情”，有19家报纸发表了67篇社论支持以色列，17家进行了“均衡分析”，只有9家“对以色列领导人（特别是阿里埃勒·沙龙）发出批评之声，指控他们对冲突爆发负有责任”。“媒体公正准确报道”组织（Fairness and Accuracy in Media）（FAIR）于11月3日指出：三家主要网络播报了99条关于9月28日至11月2日之间爆发的暴动事件，然而其中只有4条提及“被占领土”。同一篇报告说：一些语句贯穿评论始终，例如，“以色列……再一次感受

到被隔离与围攻”，“以色列士兵天天受到袭击”。在一处描述士兵被迫撤退时用了“以色列人屈从巴勒斯坦暴力、放弃了领土”和“以色列不断爆发范围越来越广的暴力事件”等语句，这些描述掩盖了占领和军事力量不对等的事实。（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使用坦克、美一英提供的“眼镜蛇”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导弹、迫击炮和重型机关枪，这些武器巴勒斯坦人一样也没有。）

此外，美国权威报刊《纽约时报》在一连串从根本上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立场的社论中，只在专栏版上刊登过一篇由一名巴勒斯坦或阿拉伯独立作家撰写的文章（而他碰巧是一位奥斯陆的支持者），《华尔街日报》甚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华盛顿邮报》也不例外。11月12日，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60分钟”（60 Minutes）里播放的一个片段，有效地进行了如下设计：让以色列军队前来“见证”12岁的被害少年穆罕默德·阿尔—杜拉（Muhammad al-Durrah）——他成为这次暴动期间巴勒斯坦受难者的象征——惨遭杀戮的一幕是由巴勒斯坦当局戏剧性地安排的；这种安排包括将少年的父亲置于以色列人枪口面前，甚至还包括安插那个拍摄40分钟电视片来记录这一恐怖事件的法国电视摄制组，以此证明某个意识形态观点。

即使承认美国媒体，或范围再扩大些，美国的大众舆论，是个不同选择彼此交火的战场；即使承认欧洲媒体显示出一幅更加均衡稳健的图景——即便如此，我仍相信，目前发生的血腥事件，其真实的地理要素，在这场最具地理特征的较量中，已被故意弄得含混不清。不能指望任何人接受，更重要的是，保持对这些纯属卡夫卡式的荒诞条款的渐趋准确的描绘。这些条款是由以色列与阿拉法特率领的无组织的、前现代的、悲剧般无能的巴勒斯坦小组通过极其隐秘的谈判而制定的。在《和平及其不满》（*Peace and Its Discontents*）

(1996) 与《和平进程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 ) (2000) 这两本书中, 我详细地梳理了这一切, 但是, 在此用地图来加以概括可能会颇有助益——应该补充一句, 那些地图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唾手可得的, 然而据我所知, 它们却从未与世界传媒里不断繁衍的新闻报道和电视画面同时出现。由于以色列、特别是美国所实施的边缘化, 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条和第 338 条相关决议遭到遗忘。该决议毫不含糊地规定, 以色列通过 1967 年的那场战争所获得的土地必须归还巴勒斯坦, 以此作为和平的条件。奥斯陆和平进程, 则是以彻底践踏那些决议为起点的, 它几乎将决议扔进了垃圾箱。

去年 7 月召开的戴维营峰会失败后的那段时间里, 公认的国际协定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篡改。从此以后, 人们普遍认为, 正如克林顿和巴拉克不辞辛苦却又不符实际地宣称的, 难辞其咎的是巴勒斯坦人, 而非立场鲜明地拒绝归还 1967 年所占领土的以色列人。例如, 美国新闻媒体一直不厌其烦地谈论以色列的“慷慨”提议, 以及巴拉克愿意把东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以及任何一处多达 90% 到 94% 的西岸领土让给巴勒斯坦人。但是, 美国和欧洲甚至没有任何一家评论设法去确定一下要“给予”的具体是什么, 以及他打算给予的 90% 的西岸是哪部分领土。事实上, 这一切都是空洞的废话, 正如坦妮娅·赖因哈特 7 月 13 日在以色列最大的日报《新消息报》上发表题为《戴维营欺诈》( *The Camp David Fraud* ) 的文章中所述: 给巴勒斯坦人的是 50% 的彼此分散的行政区, 10% 即将被以色列并吞, 还有不下 40% 将被当做“有争议”之地, 这是继续被以色列人控制的委婉说法。因为如果你并吞 20% 的土地, (如其实际所为地) 拒绝拆除或停建定居点, 并一再拒绝回到 1967 年的边界线及归还东耶路撒冷, 然后决定保留整个约旦河流域从而将巴勒斯坦领土彻底包围起

来，让他们除了以色列以外与任何国家都不接壤，并且保留臭名昭著的“过境”道路及毗连地区，那么，这 90% 的领土很快就减少到 50% 或 60% 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计划在非常遥远的将来归还的，因为即使是在 1998 年的怀伊河种植园会议（Wye River Plantation meetings）上同意的了，而且在 1999 年的沙姆沙伊赫会议（Sharm el Sheikh）上被再次确认了的以色列作最后一次重新调整的方案，至今仍未实施。（有必要重申，以色列仍是全球唯一的没有正式宣布国界的国家。）而且，当我们弄清那 50% 到 60% 的领土当中有多少是巴勒斯坦人在 1948 年被赶走之前所拥有、而今属于以色列的前巴勒斯坦领土时，我们就会突然意识到，真正被“让出”的地区并不是 90% 而是 12% 左右。甚至“让出”一词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是当初被占领的土地并且只是极少部分被归还，这与“让出”完全是两码事。

首先，让我们来回忆一些事实。1948 年，以色列接管了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或受托管的巴勒斯坦（Mandatory Palestine）（在此期间破坏并消灭了 531 所阿拉伯村庄。三分之二的人口被驱逐：他们即是今天的 400 万难民），只有西岸和加沙地区除外，它们分别归由约旦和埃及管辖。这两处后来也于 1967 年落入以色列之手，至今仍被以色列控制。只有少数地区是受到高度限定和制约的巴勒斯坦自治，实际上成为在经济上依赖以色列的殖民地区。根据奥斯陆和平进程，在临时协议期间，该区域的大小和边界线都由以色列单方面决定。很少有人注意到，即使按照奥斯陆和平进程，拥有自治或自我管理的巴勒斯坦地区也没有主权，这一问题直到最后一轮谈判结束才解决。总之，以色列 1948 年占领了巴勒斯坦的 78% 的领土，1967 年又占领了剩余的 22%。现在正在讨论的只有这 22% 的领土，甚至还不包括西耶路撒冷 [ 在它的 19325 德南（dunam）的土地上，犹太人拥有 4830

德南，阿拉伯人拥有 11190 德南，政府土地为 3305 德南。这些数据源于萨里姆·塔马里（Salim Tamari）编写的一本不可或缺的书，名为《耶路撒冷 1948：阿拉伯周边地区及其在战争中的命运》（*Jerusalem 1948: The Arab Neighborhoods and Their Fate in the War*），1999 年由耶路撒冷研究院（Institute Jerusalem Studies）和巴蒂尔资源中心（Badil Resource Center）出版于耶路撒冷，整个西耶路撒冷已于先前的戴维营峰会由阿拉法特出让给以色列。

但是，迄今为止，以色列真正退还了什么土地？我们或许可以用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来描述，因为它不可能被刻意描绘出来的。这就是奥斯陆邪恶本质的一部分，甚至以色列的“让步”也受到诸如条件、资格和继承权限等的强大阻碍（正如简·奥斯汀一部小说里描写的那份不断延期、客观上根本无法得到的不动产），以至于巴勒斯坦人无法以任何类似自主的方式来享有它们；另一方面，它们又可能被描述为一种让步，于是，每个人（包括巴勒斯坦领导人）都有可能说，真正的领土（大体上）处于巴勒斯坦控制之下。这一设计本身，意在完全按照以色列的想法将已经分开的巴勒斯坦领土重新分割，并更细致地划分成 A、B、C 三个区域，因为如我几年前已经指出的，巴勒斯坦直到最近也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地图，在谈判小组中也无人对真实地理足够熟悉，足以对做出的决定提出异议或提供其他备选计划。后一情形的结果之一是一项古怪安排，即：在 1994 年 2 月 9 日巴鲁·格斯汀（Baruch Goldstein）医生对易卜拉希米清真寺（Ibrahimi mosque）的 29 名巴勒斯坦人进行大屠杀之后，再细致划分希伯伦。此处图一显示了这座阿拉伯城市的中心地带（120000）（事实上是它的 20% 区域）是如何被大约四百名犹太定居者所控制，而他们只相当于受以军保护总人数的 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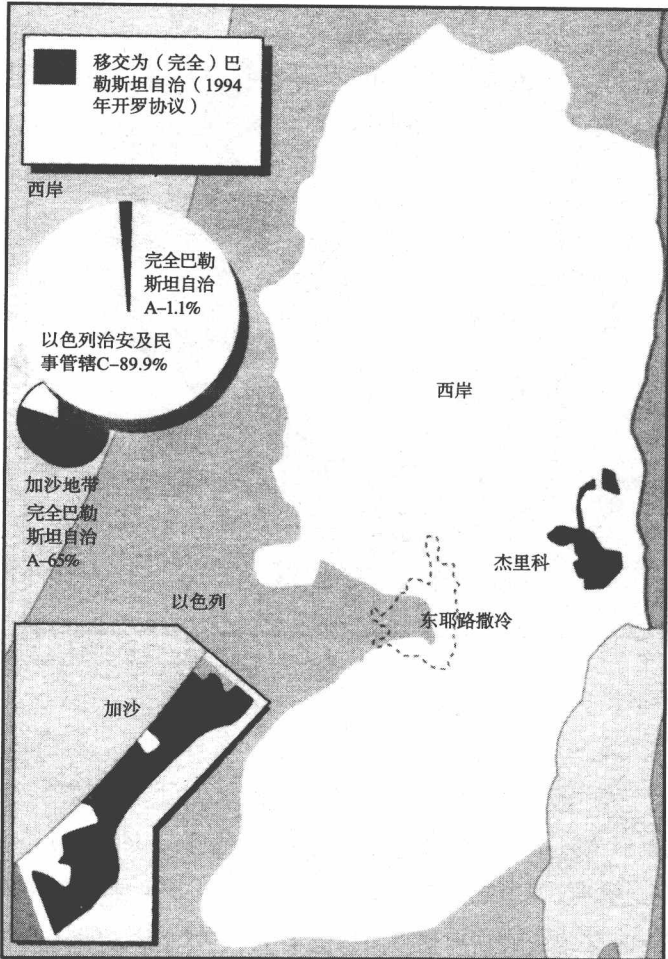
中东和平基金会

图一

图二显示的是拟将成为一连串到处被分割开来、彼此互不接壤的以色列撤离区中的第一个。加沙地区与杰里科 (Jericho) 之间由以色列所占据的数英里接着数英里的土地分开，但两者都属于 A 区。在西岸，A 区曾被限制到整个面积的 1.1%，连弹丸之地都称不上。A 区在加沙地区则占有大得多的比例，主要是因为加沙地区土地贫瘠、人口过多，而且拥有大批造反群众，一直被以色列占领军当做



纯粹负担。他们很乐意摆脱掉它——除了在加沙中心地带选择并保留至今的一块农用地，即古什卡蒂夫定居点，以及海湾、边界和出入口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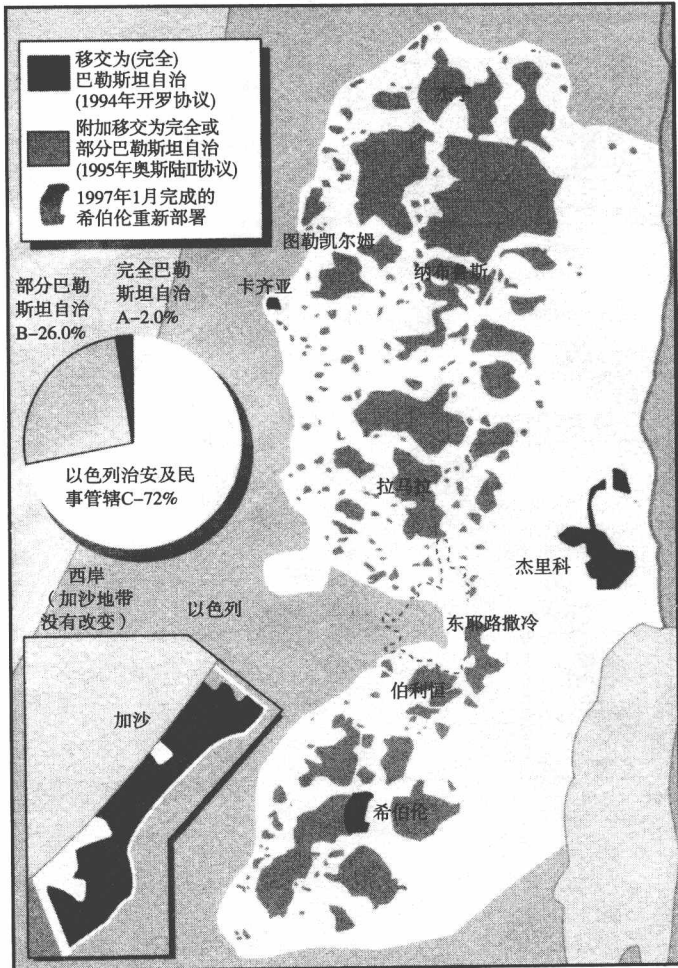


1994年开罗协议

伊安·德·伊翁制图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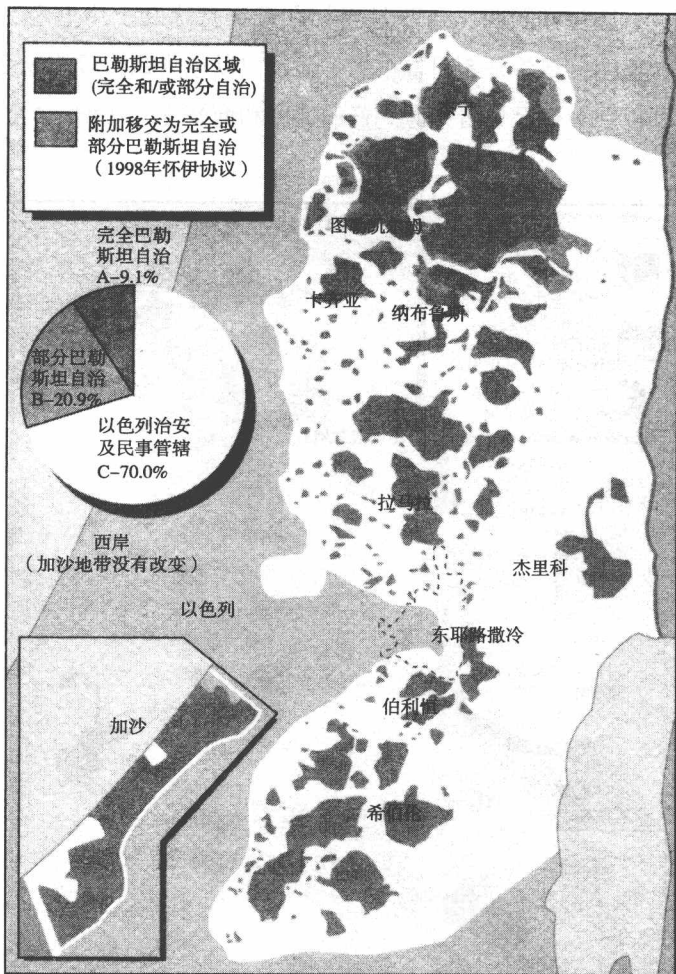
图二、图三和图四（这些是当初在戴维营峰会上由以色列提交的  
的最佳撤退图，尽管是5月宣布的）显示出以色列蜗牛般的速度和吝  
啬程度。以色列便是凭着如此之低的速度和慷慨度，让倒霉的巴勒斯



1995年“塔巴”协议

伊安·德·伊翁制图

图三



1998年“怀伊”协议

伊安·德·伊翁制图

图四

坦当局接管那些居住有大量人口的中心地带（A区），同时让在B区的政府帮助维持主要村庄的治安，而这些村庄附近一直在修建定居点。但即使在那时，以色列仍将真正的安全尽行掌控在自己手

里（尽管巴以官员之间有联合巡逻）。而在 C 区，它为自己保留了大约 60% 的领土，用于建造更多定居点，开通更多道路，并建立军事区。所有这些做法——用杰夫·哈尔波（Jeff Halper）的话来说——就是想要建立一个控制矩阵，让巴勒斯坦人永远无法摆脱。【杰夫·哈尔波借助荷兰地理学家伊安·德·伊翁（Jan de Jong）的作品，撰写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讨论以色列在奥斯陆和平进程期间的领土计划。当然，这些著述都登载于发行量很小的期刊上，例如，他的关于跨以色列公路干线的论文《通向种族隔离之路》（*The Road to Apartheid*）[《内部新闻》（*News From Within*），2000 年 4 月] 及《94% 的解决方案：一个控制矩阵》（*The 94 Percent Solution: A Matrix of Control*）[《中东报告》（*Middle East Report*）216 号，2000 年秋]]。

但是，只要看一眼其中任何一张地图就能发现，对这些不同地区来说，关键在于，A 区的各个部分不仅彼此隔离分开，而且被 B 区，更重要的是，被 C 区包围着。换言之，使得巴勒斯坦在地图上变成一个个围困之地的封锁、包围行动（那就是巴拉克的种族主义的“条块分割”政策的核心）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而且，最糟糕的是，它是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同谋配合之下才促成的。自 1994 年以来，巴方签署了所有相关文件。让事态更加恶化的是，正如巴勒斯坦领土上一位勇敢的《国土报》记者阿米拉·哈斯（Amira Hass）——他一直单枪匹马地按照本来面目（而非依据以色列宣传机构企图让事情显得貌似的样子）对事件进行如实报道——于 10 月 18 日撰文所述：

双边（1993 年）同意在五年期间完成新的部署和一项最终协议的谈判。在哈马斯恐怖袭击和以色列选举的阴影中，巴勒斯坦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同意将试行期延长。领导人采用

的“和平战略”与渐进主义战术最初受到大多数巴勒斯坦公众支持，他们渴望恢复常态（我本以为，还包括真正结束占领。在此重申一遍，这一点在奥斯陆的任何文件中都没有提及）。法塔赫（巴解组织的主要派别）是支持循序渐进地摆脱军事占领束缚的中坚力量。它的成员对巴勒斯坦反对派的动向了如指掌，逮捕被以色列指名的嫌疑犯（他们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国家安全法庭秘密从速审判，他们曾因拥护“和平”而受到阿尔·戈尔副总统和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热情支持），关押那些签署声明、宣称以色列根本没打算放弃统治巴勒斯坦的人。这些法塔赫成员（在我前面提到的贵宾通行证制度之中）得到的个人好处，不足以解释他们对和平进程的支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确实真的相信这是一条通往独立之路。

但是，她接着说，即使这些人也曾是“巴勒斯坦民族”的成员，他们也有妻儿兄弟姐妹饱受以色列占领之苦、并且有权提问是否支持和平进程并不意味着支持占领。她总结道：

七年多过去了，而以色列安全机构仍对 61.2% 的西岸地区和大约 20% 的加沙地带（C 区）拥有行政控制权，同时对西岸 26.8% 的其他区域（B 区）进行安全防卫控制。

正是这种控制，使得以色列有能力在 10 年内将定居人数翻倍，扩充定居点，继续实施对 300 万巴勒斯坦人减少用水配额的歧视政策（别忘了，为以色列提供自来水的主要蓄水层位于西岸）、阻止西岸大部分巴勒斯坦地区发展，并且把整个民族（扣除 400 万或 450 万巴勒斯坦难民，他们在无论何处的犹太人都拥有绝对的、无限制的“回返”权利的时候，却被无条件地剥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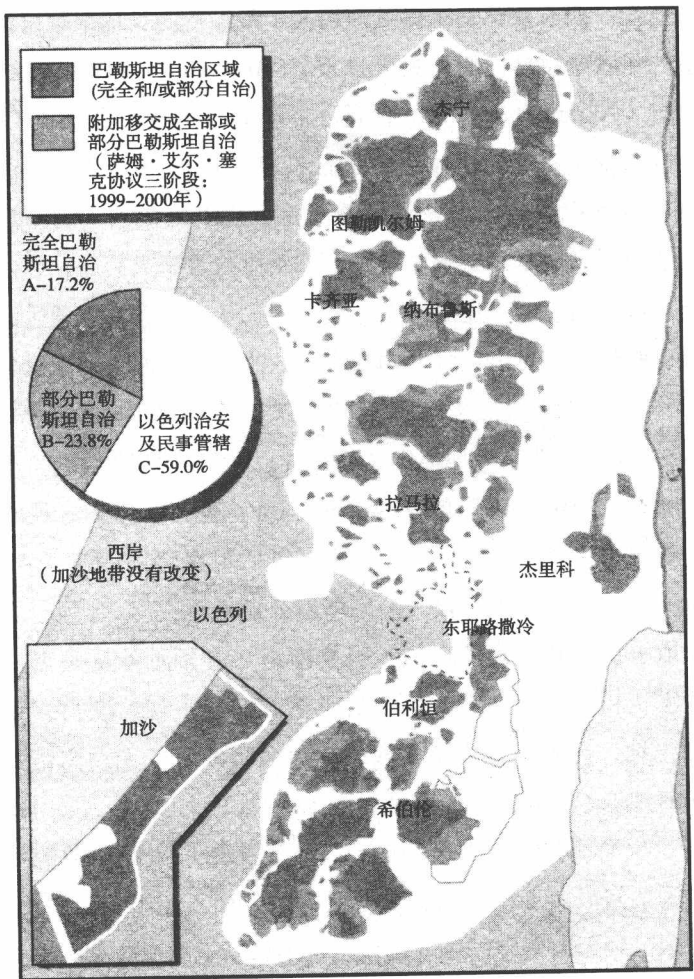
返家权)封锁在限定区域,囚禁在专为犹太人而设的迂回缠绕的道路网中。在对西岸境内(以及进出加沙)的迁徙旅行实行严格限制的日子里,你可以看到每条道路规划得多么处心积虑:既要使20万(外加在耶路撒冷的15万)犹太人拥有行动自由,同时还要把300万左右的巴勒斯坦人封锁在他们的班图斯坦(Bantustans)之内(译注:班图斯坦是南非白人统治时期为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而划定的黑人居住地),直到他们屈服于以色列的要求。

还有更多细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让自己深陷由摩萨德(Mossad)(译注:摩萨德是以色列情报机构,负责情报搜集、政治行动和反恐等活动)、中央情报局和巴勒斯坦安全部门共同组成的安全委员会做出的这个聪明绝顶的、而从长远角度看又是完全愚蠢的安排之中。安全委员会至少有15个(也有人说是19个)组成部分。通过经济补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高层人员在建材、烟草、石油等方面进行盈利垄断,所得利润存到以色列的银行。巴勒斯坦人不仅深受以色列军队侵扰,而且还要看着自己的同胞与可恨的外国机构一起践踏他们的权利。这些大体身份隐秘的安全委员会还获得授权,来审查书籍、媒体、公开声明以及巴方总体言论,裁定哪些内容构成反以“煽动”,然后予以删除或者限制。巴勒斯坦人当然没有同样的权利来反对美国或以色列的煽动行为。这一正在展开的进程,其速度之缓慢,则颇似卡夫卡或博尔赫斯作品中的一部巨大而又复杂的装置,无情地消磨掉个人的耐性。对于这一点,美国和以色列提供的论据是:以色列的安全正在得到保障;我却从未听到有人谈及巴勒斯坦的安全。于是,我们显然会得出结论说:正如犹太复国主义言论一直断定的那样,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本身,无论怎样圈定范围、遭受限制或被剥夺权利,都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种族和宗教上的威胁。格外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的危机高潮中出现的如此惊人的一致意见之间，却有一位以色列人类学家丹尼·罗宾诺维兹勇敢地谈及以色列1948年摧毁巴勒斯坦时所犯下的“原罪”，而对于这些罪行，以色列人大都选择矢口否认或彻底遗忘（《国土报》，10月15日）。

如果说西岸的地理已经向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生改变的话，那么耶路撒冷发生如此彻底的变化便不足为奇。当东耶路撒冷于1967年被并吞时，它的70平方公里土地被纳入以色列版图；另有54平方公里西岸土地被窃取，并入长期以来一直由泰迪·可奈克（Teddy Kollek）市长统治的都市区域。这位西方的自由主义宠儿曾与助理米隆·班文尼斯特（Meron Benvenisti）一起亲自负责摧毁哈利特·阿尔—马戈哈利巴（Haret al-Maghariba）区域的数百户巴勒斯坦住宅，将这个�地方清理出来用做“哭墙”前的大广场。与通常对可奈克黄金时代的颂扬相比，一个更发人深省的描述出现在埃米尔·S.柴辛（Amir S. Cheshin）、比尔·哈特曼（Bill Hutman）和阿维·梅拉姆德（Avi Melamed）合著的《分离与不平等：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统治之内幕》（*Separate and Unequal: The Inside Story of Israeli Rule in East Jerusalem*）（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之中。无论如何，自1967之后，东耶路撒冷已被系统地犹太化，它的边界在膨胀，大量的筑房项目在确立，新的大路小道在修建。如此一来，便使这块土地明白无误地成为根本不可复原之地，而且，对于栖居此城的那些数量不断减少、备受歧视和侵扰的阿拉伯人来说，它成了一个无法居住的地方。如副市长艾瓦拉汉·凯黑拉（Avraham Kehila）于1993年7月所说：“我想让巴勒斯坦人睁开眼睛认清现实，明白将耶路撒冷统一于以色列主权之下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见图五。关于这种政策在人性范围内是多么愚蠢，有一个小小的注脚：最近一小股武力从位于新耶路撒冷定居点吉洛（Gilo）附近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加

拉 (Beit Jala) 向定居点开火，这件事在所有媒体上都有报道，但无一提及吉洛定居点是建立在从贝德加拉没收来的土地上的。即使是巴勒斯坦人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忘记他们的过去。]



1999年“萨姆·艾尔·塞克”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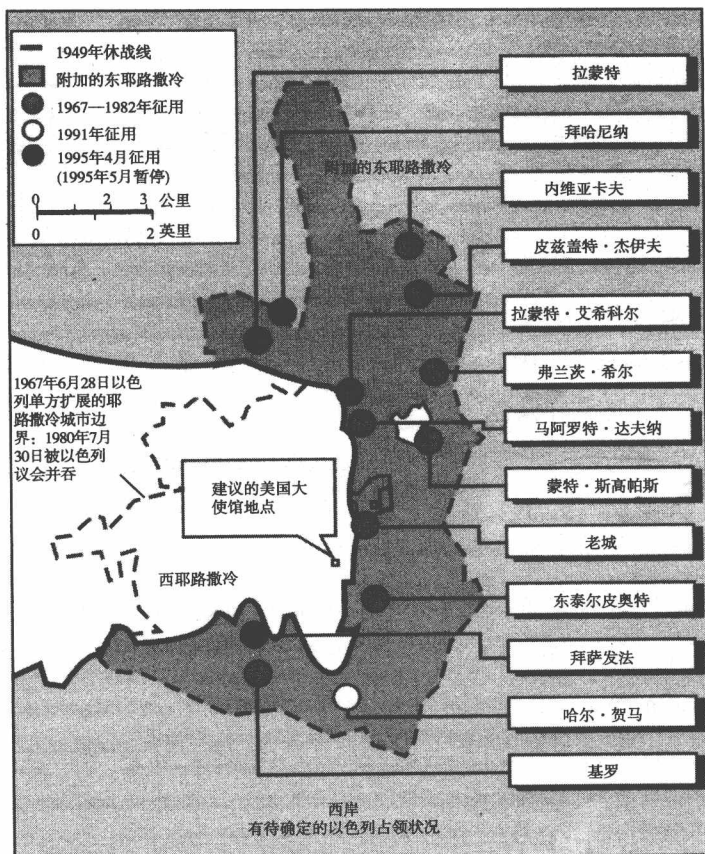
伊安·德·伊翁制图

图五



七月举行的戴维营峰会其实是个失败，因为以色列与美国提出了我这里一直在讨论的所有安排，只是稍加修改后作为最终解决巴以冲突的基础。赔款基本上遭到以色列拒绝，而且这只是1967以来的多年占领之后的赔偿，更不必说对1948的那场大灾难及其造成的后果进行赔偿。西方媒体均未提及一篇关于戴维营的长篇跟踪报道。这篇报道的作者是拉马拉的《天天日报》(Al-Ayyam)编辑阿克拉姆·哈尼耶赫(Akram Haniyeh)。他是法塔赫的忠实拥护者，自1987年被以色列人驱逐后便与阿拉法特过从甚密。这篇报道毫无保留地阐明：从巴勒斯坦立场来看，克林顿只是强化了以色列人的立场，而巴拉克想要得到的是尽快解决难民、耶路撒冷等重大问题，以及让阿拉法特对最终结束冲突发表一个正式声明，从而挽救其总理生涯。哈尼耶赫以精妙文笔对事件所做的扣人心弦的报道，很快被译成英文，登载于华盛顿办的刊物《巴勒斯坦研究杂志》(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该文不遗余力地指出，甚至连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被大肆吹嘘的“前所未有”的立场，也是为了迎合以色列右翼的强硬路线——亦即以色列将保留对于甚至包括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在内的决定性主权。哈尼耶赫公正地说：“以色列立场，就是要获取一切，并且代价低廉：巴勒斯坦‘金灿灿的’签名、一个最终的承认和‘结束冲突’的宝贵承诺。而这一切的获得，无须归还全部土地，无须承认完整主权，而最危险的是，无须为难民问题付出任何代价。”(87页)

正如哈尼耶赫报告中阐明的，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目前的可怕境地，美国负有很大责任，几乎与以色列的责任不相上下。自1967年以来，美国已经无条件向以色列支付了两千亿以上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再加上一揽子的政治支持，使以色列得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英国，在外交政策上稚气十足地盲目跟随美国，



东耶路撒冷：1967—1995年期间土地征用

中东和平的基础

图六

对以色列的血腥作风热情不减。它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的军火被直接运送到西岸及加沙的占领军手里，便于他们大开杀戒。在外援史上，没有任何国家像以色列这样得到如此之多的援助，也没有任何国家（除了美国自身）在如此之多的方面如此长久地公然藐视国际社会。甚至连操纵政党活动的美国政客中最微不足道的分子，也认为有必要向以色列公开表示尊敬。而且，以色列游说团对政治言论的钳制

变得如此令人生畏，以至于站在种族、人权、全球化和美帝国主义等问题前沿的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几个敢斗胆对以色列恐怖的人权政策提出只言片语的批评。蹂躏巴勒斯坦人的暴行在美国电视播出的数星期里，没有任何知识分子或政治团体提出过抗议，尽管连黄口小儿都知道，其实是美国在为那些不受惩罚地杀死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的直升飞机、导弹和坦克付账埋单。至于那些负责“和平进程”的唯命是从的政客们——他们中的每个人，如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和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以前都是以色列游说团的雇员——即使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国家恐怖主义逐步升级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迫使巴勒斯坦人做出更多的让步、给予更大的灵活性并结束“暴力”。假如阿尔·戈尔成为总统，这个政策，只要它可能出台，就会变得更加亲以色列。此人过分受制于以色列，并且同美国以色列裔抵制派（pro-rejectionist）及反阿拉伯的种族主义领袖，即《新共和报》（*The New Republic*）老板马丁·佩雷茨（Martin Peretz），交往甚密。

在与以色列签署了七年之久的和平进程协议的轨迹同即将签署的显然可能是最后一个协议的前景之间，亚西尔·阿拉法特进退维谷，裹足不前，这是因为他或许对自己过去签署协议放弃无数权益的巨大罪行有所醒悟（我想说，他的噩梦恐怕是由C区那些延绵不绝、迂回盘绕的岔道编织而成的），也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多少名望。且不说腐败、专制、螺旋上升已达25%的失业率以及大多数民众一贫如洗的事实：对于他这个穆斯林来说，最终意识到由于在以色列和美国控制下存活，他将在没有一块圣地、没有一个真正的国家、甚至没有一个能够维持下去的国家地位的前景之下，被抛还给他的人民，这已经足够了。以色列从一开始就是那样设计的，在此情况下，以色列的“立即和平”（Peace Now）组织和利库德集团（Likud）都不会为

这一设计感到不自在。那些向以色列的“梅卡瓦”坦克和“眼镜蛇”直升机投石块和射弹弓的年轻巴勒斯坦人显然已忍无可忍，不顾阿拉法特企图控制他们的徒劳努力，而勇敢地自发走上街头。

现在，应该就相对而言较有希望的两点加以总结。一是尽管媒体在美国以及（程度稍轻地在）欧洲受到钳制，尽管阿拉伯世界受到严密审查，但是，因特网上仍有数量惊人的其他信息选项。网络活跃分子和电脑黑客们已开辟一个巨大的新型资料库，任何一个具有起码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过去以色列所仰赖的一切——要么是记者们的无知或懒惰，要么是与隐瞒、歪曲事实的错误报道同流合污——很轻易地被一些报道反驳，这些报道不仅有来自英国新闻界的记者罗勃特·菲斯克（Robert Fisk）、大卫·赫斯特（David Hirst）、约翰·佩格（John Pilger）和菲尔·里夫斯（美国权威媒体中却没有可与之媲美的记者），也有来自以色列和欧洲的阿拉伯媒体发布的辑要、独立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有从档案文件、国际组织、联合国组织以及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欧洲、澳洲和北美的一些非政府组织活动家那里收集的信息资料。在或此或彼的诸多事例中，真实可靠的数据乃是欺压蹂躏和暗藏的非正义之头号敌人。如此之多的陈腔滥调和神话均失去效力，这的确很令人鼓舞，然而，可惜它永远无法替代目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急需的政治领袖。

我的后一个观点是，努力寻求一种方式，来解决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惊人冲突。这一冲突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国主流观点之间近乎势不两立的对峙。1948年我们被剥夺所有、逐出家园，他们则认为自己是正当合理地赢得独立。我们都记得，我们被驱离的土地和我们正在努力从军事占领中解放出来的领土，全都属于本民族祖传之地；而他们则根据圣经的认可以及流散四方的犹太人的从属关系，认定那是他们的领土。今天，按照任何可以设想的标准

来看，我们都是暴力的受害人；而他们却认为他们才是。毫无达成一致的共同基础，没有共同的叙事，没有可能导致真正和解的空间。我们的主张互相排斥。就连在同一小块土地上共享普通生活（很不情愿，但这是事实）这样的概念，也是不可想象的。两个民族都在考虑分离，也许甚至要把对方孤立隔绝开来，并且诉诸遗忘。

以色列人的压力更大。他们的军事行动和不明智的和平战略，源于他们这一方强大的力量优势及其对目前行为后果（即年复一年地积聚每个穆斯林和阿拉伯人感到具有正当理由的仇恨）的盲目无知。在未来十年后的历史上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数量将不相上下：然后呢？坦克、路障、房屋破坏，这些还能一如既往吗？那么，假如有一群广受世人尊敬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其中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各占一半，举行一系列会议，试图找出这一冲突的真相究竟存在何处，看看已知的原始资料能否引导双方就大部分事实——谁从谁那里拿了什么，谁对谁做过什么，等等——达成共识，以此或许更加公正地揭示出一个解决目前僵局的办法，其结果又将如何？也许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还为时尚早，但成立一个“历史真相与政治公平委员会”（**Historical Truth and Political Justice Committee**）会更加适合。

我想，当地人人人皆知，曾经造成如此巨大伤害的旧奥斯陆框架，现在根本不再发挥作用 [最近在巴尔扎伊特（**Bir Zeit**）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巴勒斯坦只有3%的人想要回到旧的谈判]，而且，由阿拉法特率领的巴勒斯坦谈判小组不再能控制中心，更不用说控制全国。我想，每个人都觉得受够了：占领已持续太久，和谈毫无进展地苟延着；奋斗目标，如果曾经是寻求独立的话，现在也已不再明确（这一失败，得归因于拉宾、佩雷斯和他们在巴勒斯坦一方的

对应人物)。而平民百姓所遭受的苦难，不管是源于以色列人的一贯行径还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赤裸裸的无能、贪婪与残忍，已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所以，上街投掷石块似乎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然而，这又是一条给自己带来悲剧性灾难的徒劳之路。唯一的希望，就是要继续努力依靠理性和两国人民在同一方土地上共存的理念。但是，就目前而言，巴勒斯坦人迫切需要保护和引导，而这正是美国——这个一贯奉行偏袒支持和军事援助那些对暴行负有责任的一方（如印尼、土耳其、以色列、哥伦比亚等）的骇人原则的国家——与以色列一道反对的。国际社会必须组织起来采取行动，但在目前看来，那似乎是个遥远的前景。

因此，这个任务事实上要靠广大公民以及那些切实奉行真理与正义原则的知识分子，而非那些为了一己得失趋炎附势、有辱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历史形象之徒来完成。否则，随着巴拉克通过对平民实施越来越猛的轰炸、越来越紧的围困封锁等手段来图谋惩罚、限制和扼杀巴勒斯坦，未来将是灾难性的；而且正如他和他的美国顾问所推测的那样，也不可能让巴勒斯坦人俯首就范。以色列人何时才能够——像一些已经做到的人那样——意识到如下事实呢？即：在中东这样一个有3亿阿拉伯人和12亿穆斯林包围着以色列的地方，以色列对阿拉伯人不断实施野蛮的种族主义暴行，既不会给这个犹太国家带来正常状态，也不会给它带来安全。

特别提示，我愿对下列人士的工作和支持表示感谢：

希夫拉·斯特恩（Shifra Stern）、阿里·阿班尼迈（Ali Abunimah）、安德鲁·鲁宾（Andrew Rubin）、穆斯塔法·巴尔古提（Mustafa Barghuti）、易卜拉欣·阿布—卢格霍德（Ibrahim Abu-Lughod）、琳达·巴特勒（Linda Butler）、莎拉·罗伊（Sara

Roy)、拉吉·索兰尼 (Raji Sourani)、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杰夫瑞·阿隆森 (Jeffrey Aronson)。

《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00年12月14日

## 2. 悲剧在加深

无人确知阿克萨暴动的暂时平息是因为亚西尔·阿拉法特于2000年11月17日公开表示不赞成暴动，还是因为这不过是一场源于疲惫或是寻求重新定位的短暂平静。然而，尽管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和财产均已付出巨大代价，实质性的问题却依然存在，以色列人通过镇压、经济封锁和一刻不停地轰炸城镇等手段，继续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盲目的、终归是愚蠢的袭击。

现在应该要求在1999年欢迎巴拉克当选的每位阿拉伯领导人重复其声明，藉此一遍又一遍地表明它们的空洞。我穷尽大半生试图依照理性和基本常识的规律去解读阿拉伯的官方态度，却发现这些态度实质上是不可理喻的。他们当真相信巴拉克是和平进程的救星吗？若果真如此，难道他们就不明白拯救和平进程并不亚于延长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吗？他们认为他跟那位毕生都在致力于杀戮阿拉伯人的伟大的“战争英雄”有什么不同吗？如果他的确有所不同，那么他们为什么花费这么长的时间才发现这一点？难道对美国的恭敬就要如此低三下四、进行如此之多的杂耍表演、要有如此复杂的扭曲和转变、如此一躬到地的顶礼膜拜？到底会有多久，并且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要固守一个压抑的、从根本上拒绝行动的现状，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发动战争或者和平相处，而仅仅只想取悦一个地处遥远、态度傲慢的



超级大国？这个超级大国展现给他们及其人民的，是如此这般的蔑视、非人道以及彻头彻尾的难以形容的残忍。

当以色列用武装直升飞机残杀巴勒斯坦平民、毁坏他们家园之时，当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一份 10 年来最大的进攻性直升机订单而以色列又增加了 5 亿美元的殖民预算之时，他们难道就不能做些比当前所作所为更加重要的事情吗？对于给我们民族带来如此巨大灾难的美国政策，官方没有提出只言片语的抗议。正是这种懦弱，使得美国的决策者们说阿拉伯人信赖美国及其政策，依然是美国的亲密朋友与结盟伙伴。无人惋惜的丹尼斯·罗斯不过是这些决策者之一员——这个平庸之辈单凭自己的力量给以色列谋得的福利比任何人都多。当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民被美国纳税人支付的武器残杀时，就该毫不隐瞒地揭露那种无与伦比的伪善和残忍，而不是托帽在手，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但是，悲剧的核心在于这些受害者本人——即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里——人们一定要理智地言说和思考，不要让片刻心绪与激情过分干扰思想。我的总体印象是，所到之处巴勒斯坦人都感到缺乏真正的领导层，缺乏一个这样的声音或者权威：他能够高瞻远瞩地描述现在与将来，能够明白无误地表达统一连贯的、富有涵盖性的目标，而非重复以往那些显然企图拖延决定的陈词滥调与花言巧语。毫无疑问，巴勒斯坦人民正在奋力抵抗军事占领，他们已经抗争了长达 33 年之久。但是还有 400 万难民正在与被驱逐的命运抗争，此外，还有 100 万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公民，正生活于长久以来一直被“以色列民主政治”的可笑标签所掩藏的种族、宗教歧视制度之下。奥斯陆协定存在的诸多问题之一是，巴勒斯坦谈判人员只侧重于占领问题，却忽视了另外两个方面。但最终应该清楚一点，在所有三种情形中，我们要对抗的是犹太复国主义，

而且，直到出现一个能在三条战线上制定出统一策略的领导层，我们才算有了领袖。悲剧在于，随着群众暴动的继续，在一个加深巴勒斯坦人之间分歧而不是促使他们精诚团结的政治背景或框架下，每天都有生命在悲剧性地丧失。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见解、新的声音、新的真相。

现在不是很清楚了吗？像“一个巴勒斯坦国”和“耶路撒冷，我们的首都”这样的陈旧口号已使我们陷入这一僵局。难道我们不该期盼一位能诚实无畏地对所有巴勒斯坦人说话，而无须在美国和以色列面前两面三刀、挤眉弄眼的领袖？一位详细制定前进路线，把对于占领、驱逐及种族歧视的反抗连成一体领袖？为什么要继续用那个空洞的希望来蛊惑人心，即认为“斗争”——这个词似乎意味着别人就该死去——将会让整个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得偿夙愿？令人十分震惊的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暴风骤雨，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经历了军事化或废除民主政治、取缔阿拉伯世界最基本的公民权要求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正面对着同样的敌人、同样的失败、同样的战术转移和同样的伪善面孔——他们嘴里念叨着同样一大堆乏味透顶的威胁、承诺、标语口号和陈词滥调。所有这一切已经或多或少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并且导致了从1967年到安曼，到1973年10月，再到贝鲁特直至奥斯陆一次又一次同样的失败。

不可否认，对于过去两百年来几乎所有的殖民问题来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个例外：它虽为例外，却不在历史之外。人类历史中充满了即使与之不完全相同，却也颇为类似的情形。对于居住在远离中东而又在诸方面靠它很近的我来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有多么与世隔绝。然而，我相信，从美国、非洲、亚洲甚至欧洲等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历史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拒绝将自己与其他人，比如说，南非黑人、美国印第安人或越南人进行比较？我所说

的比较，不是指机械的或者奴隶般的比较，而是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比较。

已故的伊克巴·艾哈迈德（Eqbal Ahmad）——他无疑是我所知道的两三个最有才气的当代历史与政治分析家之一——一直引导世人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成功的解放运动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它们运用了创造性的、新颖独到的和充满想象力的思想；而不太成功的运动（不幸的是，正如我们的运动）则明显具有套用公式、缺乏创意地重复过去的口号和行为模式的趋势。就武装斗争这一思想而言，数十年来我们的头脑里一直依赖于枪炮和杀戮。从20世纪30年代起直至今天，这种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殉难者。然而，无论是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还是对于我们的下一步打算都没有实际效果。就我们而言，这场战斗是由为数不多的、与无望的结局奋力抗争的勇敢民众来完成的：用石头对抗武装直升机、“梅卡瓦”主战坦克和导弹。然而，看一下其他运动——例如，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南非解放运动、美国人权运动——首先就会告诉我们，只有一场运用战术、策略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大众这一要素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才能对占领者及/或压迫者产生影响。其次，只有一场被政治化了的、充满着直接参与创造自身未来的卓识的大众运动，才具有将自身从压迫与军事占领之下解放出来的历史机遇。未来，就像过去一样，是人类创造的。正是他们，而非身在远方的某个调停者或救星，在发挥着革故鼎新的作用。

我很清楚，比方说，巴勒斯坦当前的任务是运用富有想象力的斗争方式，树立起使自己摆脱占领的目标。那将必须让大批巴勒斯坦人直接干预定居进程，阻断道路，阻止建筑材料进入——换言之，要孤立定居点，而不是像今天这样让他们这些数量少得多的人来隔离并包围巴勒斯坦人。还有一点事实，例如，每天为以色列建造定居

点的劳工其实都是巴勒斯坦人：这很容易表明，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被误导得有多深，多么轻而易举地被调动，多么不具备政治性。在替以色列修建了33年定居点之后，当局应该马上为这些巴勒斯坦工人提供其他工作。难道就不能从用于毫无价值的安全措施和收效甚微的官僚机构的数百万美元中省出几块钱来吗？这当然是领导层的失败，但最终也是那些更具智识的个体——专业人士、知识分子、教师、博士等人——的失败。他们有表达能力、有采取行动的途径，却没有给领导层施加足够压力让它对形势做出反应。

而且马上就会发生最大的悲剧：一个民族正在慷慨激昂地奉献自己，他们在勇敢地对抗施虐成性、不共戴天的残酷敌人的过程中，失去了青春年华和全部精力，而这些敌人对室死巴勒斯坦人却毫无悔意。与此同时，阿拉法特先生却依然保持沉默。自从危机爆发以来，他从未真心实意地对本国人民发言，甚至没有发表一个哪怕十分钟的广播讲话来鼓舞人民的士气，解释他的政策，告诉人民我们的处境究竟如何、何以至此，以及在经历所有这些流血和苦难之后，我们将走向何方。甚至当他游历世界各地，从法国到中国，会见各国总统和总理却全然无效时，他都没有花一分钟时间将实情告诉自己的人民。他是铁石心肠吗？他的良心完全被麻痹了吗？我发现这不可理喻到了惊人的地步，在30年来领导我们从一场灾难走向另一场灾难，从一次愚蠢的冒险走向另一次愚蠢的冒险之后，他却没有任何放慢脚步，甚至没有低语一句“感谢你们长期以来忍受我以及我犯下的可怕而拙劣到极点的错误、失算！”作为其中一员，我已受够了他那对待人民的轻蔑态度，他那无情与专制的冷漠，他那不能认真倾听或接受别人意见的表现，他那无休止的含糊、掩饰、盲目而不理智地从一个保护者跌跌撞撞地倒向另一个支持者却始终让他的长期受苦的人民自谋生路。去领导你的人民吧，阿拉法特先生！如果你不能或不愿领

导，请照实说出来。但自从奥斯陆谈判开始以来，你一直在做的却是误导、躲避、作私下交易，让你周围众多腐败政客中的一些受益匪浅，却使我们的大局每况愈下，糟糕透顶。

阿克萨暴动是反抗奥斯陆协定的暴动，是反抗那些制定协议者的暴动。这些人不只是丹尼斯·罗斯和埃胡德·巴拉克，还有巴勒斯坦官员中少数不负责任的人。这些人现在应该站在他们的人民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如果他们有一个计划，就要呼吁广大民众的支持（如果他们懂得这一点）。如果没有一个计划（如我所料），那么他们至少应该有基本的教养来坦承这一点。只有这样做，最终才不会仅有悲剧发生。巴勒斯坦官员签署了分割希伯伦的协定，他们还在事先不能确定定居点会被终止（至少不会增加）以及所有军事占领标志会被清除的情况下，签署了许多其他协议。现在他们必须公开解释自己当时在想些什么，为何如此行事。然后，他们必须让我们对其行为及其未来畅抒己见。他们必须破例倾听，并努力将大众利益摆在自身利益之前，尽管他们已将数百万美元浪费或储存在巴黎的公寓、用于购买价值连城的不动产，以及花在同以色列进行的利润丰厚的交易之中。凡事须适可而止！

《金字塔报》，2000年12月7—13日

《生活报》，2000年12月12日

### 3. 美国选举：体制还是闹剧？

一个多月以来，整个世界都被悬而未决的 2000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壮观场面惊呆了。乔治·W. 布什和阿尔·戈尔雇用大批律师，在佛罗里达州和美国最高法院为这场势均力敌的选举进行拼杀。从这场竞争的喧哗与骚动（最终由极端右翼的最高法院判布什获胜）之中首先暴露出来的是，美国与其说是个法制的社会，不如说是个律师的社会。这是世上最喜好诉讼的国家；在这里如果你有足够的金钱和权力，几乎就无所不能，甚至可在显然已经输掉的情况下赢得选举。这次竞选活动的开支超过三十亿美元，足够在美国一个中等城镇重建并推行一整套教育体系。而正如拉尔夫·纳德尔在他最终令人失望的运动中指出的，利害攸关的是政治分赃与赞助体制。由于这两个候选人中，一个是前总统的儿子，另一个是前参议员的儿子，所以谁有望登上总统宝座主要取决于谁的力量更为强大。这一力量可以切实保证几千甚或几百万受委派者、雇员和说客的荣华富贵，同时使得另外数百万身处企业、军队、官僚机构以及大学里的人们，在一种情形下将全部受益，而在另一情形下则相对受损。因此，随着共和党入主华盛顿，由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率领的里根与布什的旧部又重返华盛顿，仿佛在比尔·克林顿执掌大权期间他们不过是一边玩高尔夫球一边等待时机一样。这种

纯粹的财富与声望的转移是不应低估的。

但回过头来再说说法律与律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多年来假定美国在引领世界民主进程并因此派遣美国观察家监督第三世界选举之后，刚果总统洛朗·卡比拉（Laurent Kabila）和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都没有提出派人到美国视察并帮助操控我们这里的选举。从佛罗里达州接连不断传来的广播新闻中可以得知，美国的选举是集各种骇人听闻的陈腐、不公、有违民主的规章制度于一身的大杂烩。这些规章制度被专门设计出来，用于将数量最多的穷人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淘汰出局。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体制——这一体制曾濒临彻底崩溃的边缘——再一次扭转败局。一旦涉及最终将会赢得的权力和金钱，它便粉饰一番，然后全然不再理会这种纯属原始的全线拼杀背后的深层现实。

佛罗里达州的不公仅限于佛罗里达。若是启动爱荷华、新墨西哥、威斯康辛和马里兰各州的重新计票，那么整个大厦就有可能真的坍塌。而最终分析表明，这是一座为了防止人民过于深刻或批判性地思考而设计出来的摇摇欲坠的纸质城堡。因此，一位候选人已经赢得了大多数选票，另一位却依照由九名成员组成的最高法院的决定最终赢得了选举，而这九名成员中的五名右翼共和党人投票支持他们的党派，另外四名成员却展开对于原则和公正的毫无生气的捍卫，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当然不能被称为民主。所有这一切也都不能视为民主。我以前从来不曾具体了解的是，不存在任何保证每个公民拥有同等权利和同样投票设备的联邦统一选举法规。例如，佛罗里达州规定，曾被指控犯有重罪的人不许投票。这就意味着大约五十万人，大多数是穷人和黑人，被剥夺了总统选举权。此外，该州的每个县有自己规定的投票机和投票方式：从复杂精密的机器到原始的、手工操作的纸片，应有尽有。因此各种投票方式之间的差异在所难免。

此外还有一点，尤其是南部各州。在那里，联邦的公民权和投票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有许多关于白人警察阻止黑人（家庭或个人）投票的报道。他们捏造各种指控来对付黑人：从无照驾驶到未经注册。由于民主党对那些认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进步的穷人及（或）少数民族选民的选票具有吸引力，这就意味着戈尔在对抗布什时丢失大量的预期选民。此外在佛罗里达州还有五万人把选票投给拉尔夫·纳德尔。

似乎这还不足以清楚地表明，倘若不是由于在一个如此落后的佛罗里达州——它的州长是杰布·布什，即乔治的弟弟——所执行的选举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乖戾反常，乔治·W. 布什绝对不可能真正成为总统。而且，还存在着非民主性质的选举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 system），这是寡头政治和奴隶制的遗产。它何以历时如此之久却依然存在，实在令人费解。这个制度最初设计于18世纪，目的是保护财产和种族，使得大众选举仅仅是在有一小群被指定的选举人前来重新核准（或不核准）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而这些人被看成是在确认（或不确认）选举结果。正是这一小群人让布什从中获利，尽管多数选票（一人一票）是反对他的。

这种状况不同寻常吗？是，却也不是。的确，在美国历史上，只有另一届选举才有可能使得某人失去多数选票而让别人成为总统，但是，整个体制的运转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控制体系，而不是作为民主参与体系来进行的，这也是事实。曾有多少滥权行为在过去发生，对此我们永远不得而知。2%的美国人口拥有80%的财富，而且这种不均衡的比例还在继续维持。要么将大多数人置于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要么将其排斥在体制之外，最好是两者兼施。有资格的公民中只有不超过35%到40%的人投了票，因为他们正确地意识到，他们手中的选票不具备其应有的意义。重要的是，富有的候选人能操纵投



票机制及（或）媒体（最好是两者皆在掌控之中）并保证一种恒定不变状态，使得美国成为一个由追寻或者相信可以追寻美国“梦”的中产阶级所支撑的富人之国。而且正是由于这个梦想的存在，及其背后的、需要永久维护这个体制的信念，使这个国家与其他的工业民主国家相比，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于是，难怪美国有效地去除了福利国家的大部分属性（缺乏健康保险、不断遭受打击的工会和社会保障体系、资金严重不足的教育体系，甚至还有在国防预算超过3500亿美元的时候——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数字——对用于福利的“政府开支”的无休止抱怨，以及极具惩罚性的监狱和警察体制）。市场规则支配着一切，根本不顾及每个公民应得的公正与安全。

我不想被人误解为声称每个美国人都已遭到洗脑。远非如此。我真正想要指出的是：一、这个体制青睐富人和权贵（布什获胜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花的钱比任何人都多），并通过多种途径，包括选举团和意识形态系统，来力求有效地保护他们的权势。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充满关于美国民主与自由的花言巧语，其中多数是误导人心的宣传；二、事实上，在美国存在着持续的斗争，那些包括妇女、少数民族以及像教师和护士这样报酬过低的工作者在内的社会底层，设法发动对抗这一体制的运动，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然而在目前，作为这个为了最大雇主利益而瓦解劳方的“自由”市场运作的结果，这种斗争通常是令人沮丧的。那些雇主凭借有利的税收法、支付社会保障方面的漏洞以及不公平的工作惯例，而受到政府的纵容。

在我看来，意识形态体制的情形最为有趣。我直到完成中学的大部分学业时，才来到这个国家。使我最初感到震惊，而后不断地为之着迷的是：这个社会中的暴力、冲突的强有力的存在，是如何

时常被更加势不可当的花言巧语和川流不息的抚慰思想予以粉饰和掩盖。这种粉饰性的思想话语强调国家和谐统一，强调其中的民主实践与民主理论的完美，强调宪法的鼓舞人心并且总是有益无害的影响（虽然那只是一份反映富有的、白种的、蓄奴的和亲英的起草者之思想利益的世俗文件，却获得了无论何处的原教旨主义信徒给予神圣经典那样的尊崇），强调公众理想的彻底实现，还强调有关美国的一切之尽善尽美，以及美国永远是世界上出类拔萃的国家。我猜想所有这些思想已被深深植入学童们的头脑，这样，到十二三岁的时候——除非有个体批判意识诞生——大部分走向成熟的美国人全都趋于相信这一切，或者至少罕有机会在公开领域发表不同感想。

当然，在主流媒体中，言论受到严格控制，这绝对是事实：标新立异的、激进的或持异议的意见要么被彻底关在门外，要么被置于边缘位置，根本不可能得到赞同。在过去一个月的选举期间，情况就是如此。最高法院一经做出那个可耻的决定，评论员们就抛出美国的民主已经恢复、国家团结得以确立等令人作呕的解释。好像这个体制的缺点是个可以被忘记的意外事件，因此不值得过分关注。

这就引出了我最后的论述要点，即在每一个体表述所构成的意识形态性的齐声合唱背后，潜藏着对于历史和理性认知的蔑视。一个微妙的问题便是，心甘情愿的认同与强迫实行的审查制度相比，孰好孰坏。意识形态上的认同要求对于现实予以净化提炼，而支撑这一净化提炼的则是如下观念：那些关于历史的知识，那些能够清晰表明美国政治的整个真相和暴力的批判史学，由于会从根本上扰乱米歇尔·福柯等学者所说的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而应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反对。此刻，为数众多的人所挑战的不只是这个体制之中诸如总统选举这样的某一方面，而是挑战整个体制。做出真正决定的美国董事会的会议室里亮起了一盏红灯。

不要忘记，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时代华纳（Time Warner）、迪斯尼（Disney）、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其他新闻机构是同一意识形态体系的组成部分，为同一客户服务，而且由同样的极少数人所拥有，这少数人的兴趣就是要让事物维持现状。记忆是个禁忌，是对他们的霸权的潜在威胁，正如一位批评家不停地把最高法院和宪法这样的所谓非政治机制与卑劣的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危险一样。如下事实绝非巧合：最高法院的安东宁·斯卡利亚法官（Antonin Scalia）是位众所周知的右翼共和党成员，是支持乔治·W. 布什的大多数意见的中心人物（因此反对全面重新计票），他的两个儿子在代表布什的同一家诉讼公司担任律师职务。还有克拉伦斯·托马斯法官（Clarence Thomas），也是法院中支持布什的多数保守派的一员，他的妻子为一个右翼的华盛顿智囊团工作，对那些将被考虑为布什内阁的人员进行审查。首席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也是布什的支持者，曾是位选举官员，在1964年亚利桑那州选举期间因阻遏可能的对手投票而著称。人们立刻就会明白，不管任务有多难，也不管受到多大的阻力，这个体制将要不断地运转下去。只有将这些常数放在心上，才能回答戈尔是否会成为比布什更好的总统这个问题。那些投票给纳德的人认为，只有这个体制的局外人，一位谈及要使真正的民主成为议题的候选人，才确实可能有所不同。

《金字塔报》，2000年12月21—27日

《生活报》，2000年12月

## 4. 屡次尝试

美国为了让亚西尔·阿拉法特放弃本民族主权所做的孤注一掷的努力，不仅带有在美国的以色列游说团的浓厚特征，而且也颇具比尔·克林顿本人的政治作风。将克林顿的那些“搭桥建议”（人们这样委婉地称呼它们）说成某种快餐和平，乃是忽略、甚至低估了其邪恶的草率性。与这些建议的通用伎俩、其颠倒历史、恃强凌弱以及自我本位的急迫方式最为相似的，便是坐在桌前的克林顿形象，一手拿着电话接听，另一只手里却攥着一片比萨饼大嚼，即使当他的各类职员、投资人、中介人、亲信和高尔夫球伙伴围在他的周围，向他提供（并得到）支持、信贷、赠款、交易、抵押和流言飞语时，他也是如此。

因此，对于一场历时一个多世纪、牺牲数十万生命和无数宝藏的斗争来说，这根本不是结束的合适时机。克林顿用一种集盛气凌人的愚蠢与含糊其辞的表述于一身的语言（仿佛一位讲授如何使用及滥用语言的教书先生那样）提出建议，该建议其实是把以色列拟在可预见的将来永久性地控制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与土地的意图重新回锅，再次加热。其基本前提是，以色列需要巴勒斯坦人的保护，而不是相反。整件事情中存在一个漏洞，即以色列不仅不因它 33 年的占领、对整个巴勒斯坦民族长达 52 年的压迫与剥削以及对巴勒斯坦个人

或集体进行的数不尽的充满兽性与灭绝人性的行为而受到惩罚，却反而得到诸多好处，例如并吞西岸土地、长期（无疑是廉价地）租借约旦河流域以及永久并吞东耶路撒冷大部分地区，外加先前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警戒驻扎、对巴勒斯坦所有边境的控制（让这些边境只与以色列相连而不与他国接壤）、对所有道路及水源的控制，以及除非以色列认可否则就取消所有难民返家权利及赔偿等等。至于说到由以色列慷慨大度地放弃一小块内盖夫沙漠（Negev Desert），以此换取西岸地区几块最佳土地的那个著名的土地交换方案，克林顿忽略了一个事实：以色列所指定出让的那块内盖夫地区，恰好是以色列一直在倾倒有毒废物的垃圾场！此外，鉴于将东耶路撒冷之地——无论如何，这全部都是被非法并吞的土地——切成几块的这一罕见的分割方法，以及以色列有条件地放弃的西岸领土将被分成三个（而不是四个）行政区的事实，故而一直被描述为美国的突破性建议的这一切方案就涣然瓦解了。留给巴勒斯坦人的，是使得以色列的“让步”看上去如同儿戏的实质性的牺牲。

克林顿所要求的这些牺牲，当然是取消难民返回巴勒斯坦的权利，并且最好还有巴勒斯坦宣布结束与以色列的冲突。首先，难民回返的权利（在一个由自己选择的地方安全生活的权利）不仅受到联合国决议的保证，而且还是受到《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保护。克林顿避开这个细小问题的方式，暴露出他的处世之道：“我相信，我们在回返权利这个问题上需要一种表述来阐明：虽然没有返回以色列本身的特定权利，但不否认巴勒斯坦人有返回这个地区的渴望。”回到哪一地区？比方说，伊拉克、约旦和叙利亚共和国可以轻易地被描述为属于“这个地区”。克林顿以为他在糊弄谁？如果他真正的意思并非给难民返回故国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还要刻意而又明显地试图混淆巴勒斯坦和“这一地区”的概念？

正如克林顿所熟知的（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律师），提到人权时根本不可能有商榷的余地；依照美国在轰炸诸如苏丹或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之类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时装模作样地支持的那个法律，任何人都无权对主要的人权法则做任何修改或否定。而且，也不可能如此行事：例如，在某些情况下鼓吹反对歧视的权利或工作权，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不然。基本人权并非菜单上的菜，可以任意选择或者拒绝：它们必须具有普遍接受的恒定性，尤其应得到联合国宪章缔约国的认可。即使承认权利的落实一直是个大问题，它也与如下事实无关，即作为权利，无论是否被落实，它们都是存在的，因而不能被废除、修正，或像克林顿似乎认为的那样，被重新表述。

难民选择自身居住地的权利也与此相似：也是不能被剥夺、没有商量余地的。阿拉法特也好，克林顿也罢，当然还有巴拉克，他们根本无权篡改权利，也无权凭借拙劣的欺骗企图，以一种适合以色列的方式“重新表述”，或以任何方式加以否认。为什么以色列总是例外？为什么总是要求巴勒斯坦人接受以前从未有人被要求接受的条件？在我看来，克林顿为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获得重返家园的权利而发动战争，拽上所有的北约成员国，摧毁塞尔维亚共和国，接着却又要求巴勒斯坦人放弃重返家园的权利，这种做法是很不正当的。

此处的第二个要点，是回想一下以色列这个长期以来一直顽固不悔地拒绝对驱逐巴勒斯坦负责的国家替无论何处的犹太人维护一个不受挑战的“回归法（Law of Return）”的行为。它怎能一边继续这么做，一边却极其野蛮地拒绝甚至就类似的巴勒斯坦权利问题进行讨论，这种行为已是在挑战正常逻辑，更不用说违反基本公平了。还有赔偿问题，不仅是对1948年造成的巨大损失的赔偿，还有对33年来伴随长期军事占领的强取豪夺与开采榨取的赔偿。比尔·克林顿想

把这一切都踢开，仿佛若对赔款一事只字不提，整个问题就会消失似的；仿佛告知巴勒斯坦人一声，说以色列会嘟囔几句表示理解甚至承认其苦难的言辞然后对其责任只字不提就一走了之，这种告知还显得像是俯就屈尊似的。谁是那个 20 世纪 50 年代样式的典型宣传公式所要安抚的对象？是以色列，还是这个犹太人的代理？

但阿拉法特确实应克林顿之召来到了华盛顿，而且，由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阿拉法特或许不会痛快地拒绝或接受。他会闲扯一通、运用权谋、来往过招，会有条件地接受，而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将无谓地丧失生命以及与之几乎同等重要的生计。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我已尝试各种可行的方式要求阿拉法特在他支配巴勒斯坦事务的漫长生涯中仅此一次向他的人民真诚坦率、直截了当地发表讲话。但他却坚持沉默不言。而他的顾问和同事们也坐立不安，无力影响他或想出任何其他办法。但是，我想再次重申，我们需要一个新型领导层，一个能动员和激励整个巴勒斯坦民族的领导层；我们有过太多的往返于开罗、拉巴特（Rabat）和华盛顿的飞行访问，太多的谎言与误导性的修辞，太多的腐败与极度的无能，太多以牺牲人民为代价而维系的行为，太多的对美国人的卑躬屈膝，太多的愚蠢决定，太多的罪恶的无能与游移不定。很清楚，无论现在发生什么，巴勒斯坦人都将受到谴责。像《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这样不知羞耻的犹太复国主义鼓吹者，从不批评以色列的残忍，而是不断要求阿拉伯人承认作为一名犹太人的他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有机”联系，却丝毫不承认那个权利是在以色列占领以及大批巴勒斯坦人被驱逐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会谴责巴勒斯坦人破坏和平，并继续在美国媒体中播放他那半截子真理，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心机。不管他和他的同伴是否愿意，只有首先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已被侵害，只有用道歉和懊悔代替现在的傲慢态度和大放厥

词，以色列才能得到和平。

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可能迅速地结束奥斯陆这一章节，并重新回到我们的主要任务上来，它将为我们自己提供一个目标清晰、步骤明确的解放策略。为此我们必须在某些方面与志同道合的以色列人以及那些明白不可能既占领并且驱逐又与巴勒斯坦人和平相处这个道理的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合作。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被击败正是因为黑人和白人都反对它。巴解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可以与以色列和平相处并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以色列的占领，这是它在战略上与战术上的众多错误之一。现在新一代正在出现，他们不再崇尚古老的禁忌，也不会容忍可悲的“灵活性”，这个灵活性已经给巴勒斯坦的解放道路打上—个问号，而未提供—座希望的灯塔。

有两个彼此矛盾对立的现实会让克林顿的讲话遭受重创。其一，武装暴动所释放的能量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任何可能的方式都难以遏制的：巴勒斯坦人对奥斯陆结果的抗议，乃是对目前现状的全面抗议。其二，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历史中的巴勒斯坦如今处在一个遭受种族隔离政策摧残的双民族并存的现实之中。这一状态必须结束，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自由时代必须尽快到来。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是现在就要努力为一个新时代提供路标。否则便不难预见，未来数年里进行的，将是更多毫无结果、代价昂贵的斗争。

《金字塔报》，2001年1月11—17日

《生活报》，2001年1月11日



## 5. 以色列向何处去？

有一个关于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故事：19世纪中期，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建成后不久，莫泊桑就游走于这座城市，不停抱怨他有多么讨厌这座宏伟建筑。然而，他却每天不厌其烦地到塔内餐馆吃午餐。当人们提醒他注意其行为的自相矛盾时，莫泊桑却沉着应答：“我之所以造访此处，是因为只有塔内才是巴黎唯一不必对它非看不可、甚至非看见不可的地方。”

我的总体印象是，对于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国家是看不见的。身在其中，就意味着具有盲目性，或无法了解其本来面目以及在它身上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不愿了解它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意味着什么。待到我的这些话语发表之时，以色列将已完成大选，也许正如几星期以来人们所料，阿里埃勒·沙龙将会成为总理。就像在埃胡德·巴拉克当选前几个月和当选之后马上发生的情况一样，大量美国媒体都聚焦沙龙，使出浑身解数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合理的或者至少不太古怪、不太暴虐的候选人。我认为，除了以色列以外无人真正被说服，但令人惊异的是，当埃胡德·巴拉克在其任期之内的四个月里造成巴勒斯坦人的无谓牺牲，对居住在西岸、加沙和以色列的数百万阿拉伯居民实行集体惩罚，而结果却毫无成效之后，大多数以色列人竟会考虑转而支持沙龙这个屠杀巴勒斯坦

人民的顽固不化的老刽子手。根据民意调查，以色列人已经选择了一个将会带给他们更多而不是更少暴力的人，必须马上指出，这将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阿拉伯国家以及穆斯林世界之间的未来关系更不可能趋于和平，更不可能摆脱困境。问题在于人们怎会打算做出一个显然事与愿违的选择呢？除非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对他们即将开始的行动有什么看法，不知道这样的破坏行为与残忍行径将给他们带来进一步的疏远与憎恶，因而也带来更多的不安全感。

因此，以色列当前对沙龙暗送秋波，表明该国正在变得更加内向自闭，在拥护名誉扫地的主张重创阿拉伯人的旧政策的同时，拒不考虑外界声音，而这一政策已使以色列成为越来越孤立、越来越不信任的国家。当然，那里的生活同其他地方一样仍在继续着，而且无论从哪方面讲，显然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是正常人，希望过正常生活，养家糊口，安身立命，不必遭受灾难或战争的惊吓。然而作为一个民族，他们的集体历史已经成为现代阿拉伯历史中极不受欢迎的一个部分，尤其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几乎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世界任何地方再无这种既对等又对立的关系。事实上，在我遇见的每一名巴勒斯坦人看来，即使是以色列这一存在的最温和的一面，对于巴勒斯坦及巴勒斯坦人也无不同时具有非常实在的负面意义。例如，一个人很难放眼于一片以色列风景，同时却看不到由它所取代的被毁掉的巴勒斯坦农场或村庄；很难在听到有人从罗马尼亚或俄国移民到以色列时，不会同时感受到一名流亡的巴勒斯坦人被禁止返家的痛苦。

于是，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一个社会的生活就意味着另一个社会的挫折与苦难，他们彼此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冷酷无情。任何巴勒斯坦人无须提醒就知道，以色列人的每个胜利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失败。

即使在 1967 年以后，当时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被匆匆拼凑在一起，人数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然而，尽管彼此完全靠近，两个世界间的距离和差异却在加深、增大。军事占领从来就不利于理解，因此后奥斯陆时代没有为改善相互关系做好准备，只有极少数享有特权的安全人员和谈判代表除外。但是，让我感到最为不解的是，如此之多的以色列人对阿克萨暴动的失望与愤怒达到这般程度，仿佛在双方规定的和谈期间不断升级的定居点构筑、频繁的封锁、土地征用和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数以千计的羞辱、惩罚、肆意造成的困境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仿佛以色列“准许”巴勒斯坦在少量土地上自治这一宽宏大量之举就足以把债务一笔勾销，就该让巴勒斯坦整个民族对以色列的让步感恩戴德。许多以色列人并没有尝试将以色列的军事占领政策与这场武装暴动作为因果关系联系起来，他们现在似乎想要沙龙来接管，并且正如其中一人对记者所说，来“对付阿拉伯人”，好像“阿拉伯人”是数不清的苍蝇或令人讨厌的蜂群。

即使以色列的反战分子也未曾想到的事情是，以色列在各处出让领土时令人难以置信的缓慢与令人难以忍受的进度；加上数千项附加条件，以及就以色列每采取一小步措施（比如把一些军队从西岸的一边移到另一边）所附带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复杂条件进行谈判所耗费的大量时间；再加上新定居点的持续构筑，以及将加沙与西岸切割得越来越碎的新的再分土地和新修道路；还有频繁的封锁关闭、持续不断的刑讯逼供、在希伯伦等地频繁发生的定居者暴力事件，以及巴拉克执政期间根本没有放弃过一寸领土的事实。仿佛所有这一切——使得事态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的这一切——都是以色列和平阵营过去一直不曾关注和理解的。尽管如此，必须说明，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是历史上所有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所采取的行动：造反以示抗议。这件事难道就那么令人困惑不解吗？为什么像以色列这样聪明的

民族却拒绝理解人类行为最基本的方面？

但是，不妨考虑一下，如果有人会在某一片刻承认，对巴勒斯坦人所干的一切，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本意是让事情变得更好——是的，更好——那么，这个人必定具有一种最奇怪的自我意识和最乖戾反常的心理。这种因果颠倒暴露出此公的何种本质？如果有人相信惩罚与虐待真的会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将说明什么？阿米拉·哈斯最近在《国土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1年1月28日）以令人痛心的细节描述了对于当今巴勒斯坦人民来说使用道路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于无论长幼男女的每个人来说，这种经历是何等悲惨、可怕，让人产生出何等的切齿仇恨，而这都是因为以色列决定用那种方式来对待这整个民族。这种行为纯属惩罚性的虐待：它绝不是服务于安全或长远目标，而只是为了让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变成地狱。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本属正常生活的路径上，忍受着无休止的耽搁、绕行、搜查、屈辱和盘问，而且，大多数时候，仅仅因为以色列人的恣意无常，他们就不能到达目的地。这怎么可能对任何人有所帮助？除非是无可救药地脱离现实之人，否则有谁会相信？

我能轻而易举地想象：那些支持这些程序的以色列人，在谈及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时，与其他人并无太大差异。只有在无论何时何地涉及阿拉伯人时，据说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例如，据我所知，以色列领导人从来没有哪怕一次停下来，我们委屈了这些人，我们将他们逐出家园，我们破坏了他们的社会，强占了他们的财产，至少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并努力使当前事态让他们感到更轻松舒缓一些。在和平进程漫长而曲折的谈判会议期间，甚至从来没有人向新闻媒体透露有哪位以色列官员曾雅量地说过或暗示过他以为以色列的名义对整个民族的所作所为感到良心的折磨。我们满耳听到的都是：诉诸讨论的让给巴勒斯坦人的每寸土地都带着上千个附加条件；为了使巴勒

斯坦人无法踏足，已经分割的巴勒斯坦被再次切割三四次甚至更多次，这样巴勒斯坦人就会有更多障碍需要跨越，还要再等待更多岁月才能实现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自治国家的目标。同时，数百名政治犯仍被关在监狱里，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市民仍被限制在贫困村、条件极差的学校和自治区内，由于宗教及种族原因他们不能购买或出租土地，目的在于让以色列以一副主子气派来维持一个犹太人居多的局面，让以色列犹太人得以威胁与压迫另一个民族，而不必虑及他们，甚至不必经常见到他们。

你无须亚里士多德或戴高乐的天赋就能了解到，以色列官方的盲目政策绝不会带来胜利，如同沙龙在黎巴嫩的政策绝非成功、巴拉克的“和平”政策绝不会导致和平或结束阿克萨暴动一样。与埃菲尔铁塔餐馆里的莫泊桑相似，一个鹰派将军引导下的以色列正越来越深地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以色列没有真正撤回境内，恰恰相反，它正在确定要通过它的军队、定居者、征服者以及慷慨激昂的理论家，以最糟糕的方式与阿拉伯世界连接起来，然而它的公民、艺术家和普通百姓却都被有关流散逃亡和清白历史的幻象麻痹，而且他们现在绝不比过去更有可能认清真相。今天，在那些拥护沙龙的人们头脑中体现出的关于以色列强权的离奇观念，至多不过是推迟（而且是充满血腥的推迟）一个不可避免的认识，即：只有当两个民族都接受种族分隔的观念，并且接受强者硬加给弱者的劣等地位之时，种族隔离政策才会奏效。然而，既然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历史上从未发生过），那么，人们永远也不可能欣然接受他们的奴役地位。为什么以色列人全都自欺地认为这一切在巴勒斯坦这样一个地域如此之小而历史又如此厚重的地方就一定会行得通呢？

只要他们相信以色列可以从它的形势与环境分离出来的奇迹——这是沙龙竞选期间所鼓吹的怪诞观念——以色列犹太人就像

是参加神秘崇拜的宗教信徒，而不是现代世俗国家的公民。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事实，即以色列早期开国史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神秘崇拜的历史，维护这一历史的是那些大多生活在英雄般纯粹冒险幻想中的人们，他们没有多少精力去顾及周边环境。随着时光流逝，这种集体迷惑具有多大的破坏性，有多么可悲，就更加显而易见了，而且，让不足信赖的沙龙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家伙上台，又给这种集体迷惑增添了一个花里胡哨并且古怪反常的新注释。从中觉醒还须多久？还要再经历多少苦难，人们才能彻底睁开双眼？

《金字塔报》，2001年2月8—14日

《生活报》，2001年3月2日

## 6. 唯一的其他选择

初访南非是在 1991 年的 5 月：那是一个阴暗、潮湿、寒冷的季节，当时虽然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已被解禁，纳尔逊·曼德拉已获自由，但种族隔离政策仍在统治。10 年后我又回到这里，这次是夏天，这里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种族隔离政策已被废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执掌政权，一个充满活力和争议的公民社会正致力于完成给这个仍处于分裂状态的、经济困难的国家带来平等与社会正义的任务。但是，这场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并于 1994 年 4 月 27 日创立第一个民选政府的解放斗争，仍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伟大成就之一。尽管目前存在许多问题，南非仍然是一个激励人们去参与与思考的地方，其部分原因在于，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南非人民的奋斗、独创及百折不挠的毅力都值得学习。

我这次来是为了出席一个由教育部组织的关于教育价值方面的会议。南非教育部长卡迪尔·阿思慕（Qader Asmal）是一位令我敬佩的老朋友，在他多年前被流放到爱尔兰时我们就认识了。我将在下篇文章中更多地谈到他。但是作为一名内阁成员，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长期活跃分子，成功的律师及学者，他有能力说服（现年 83 岁、身体虚弱并已正式退出公众生活的）纳尔逊·曼德拉在第一天傍晚的会议上致辞。曼德拉后来说的那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

因为曼德拉的高大身材和感人至深的超凡魅力，同时也因为他的那番构思缜密的讲话。曼德拉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律师，尤其是一位雄辩家，尽管曾在数千次典礼和演讲中发言，但他似乎每次都能说出一番扣人心弦的话来。

这一次令我感到震撼的，是他在一个以教育为题的精彩演讲中所说的关于过去的两句短语，那是一场对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所处的沮丧愁苦的总现状直言不讳的演讲，“贫穷的物质条件与社会掠夺使他们日趋衰弱，”因此，他提醒听众，“我们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即使——这里是他的第一个短语——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运动是“吸引整个世界的想象（captured the world's imagination）”的“伟大的道德斗争之一”。第二个短语出现在对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描述中：反种族隔离运动不仅是一场结束种族差别的运动，而且也是“我们所有人维护共同人性”的途径。“我们所有人”的字里行间暗示着南非的所有种族，包括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在内，都被设想为参与到一场以共存、宽容和“实现人类价值”为最终目标的斗争之中。

第一个短语残酷地撞击着我的心灵：为什么巴勒斯坦的斗争（至今）没有吸引整个世界的想象？甚至再中肯一点地说，为什么它没有表现为一场伟大的道德斗争，如同曼德拉在谈及南非经验时所说，会得到“几乎所有政治团体和党派的……几乎普遍一致的支持”？

不错，我们已经得到了大量的、广泛的支持，而且，我们的斗争是一场史诗规模的道德斗争。不可否认，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冲突与反种族隔离的斗争相比要更为复杂，即使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民族已经付出，而另一个民族仍正在付出沉重代价，包括财产剥夺、种族清洗、军事占领及大量社会不公。犹太人是一



个拥有悲惨历史的民族，曾饱受迫害与种族灭绝之苦。受他们对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古老信仰的束缚，英帝国主义承诺给他们的“返回”家园，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理解（但尤其受到一个对过去的极度反犹主义负有责任的基督教西方世界的理解），作为对他们所经历苦难的英雄般的、正义的补偿。然而年复一年，几乎没有人关注犹太军队对巴勒斯坦的征服，也没有人关注那些已经生活在那里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曾付出高昂代价：它们的社会遭到毁灭、大部分人被驱逐、忍受可憎的法律体系——一套彻头彻尾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个体系在以色列和被占领土上仍在歧视他们。巴勒斯坦人成了极度非正义的无声受害者，被高奏凯歌、齐声赞叹以色列是多么神奇的声音迅速地清除出局。

继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真正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再次出现之后，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那些前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接受了巴勒斯坦的斗争，但总体而言，它们在策略的权衡上却是向着以色列的；美国已经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每年提供 50 亿美元的援助），而在西方，媒体、自由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政府也已站在以色列一边。由于一些清楚得无须在此探究的原因，阿拉伯的官方环境要么是明显敌对，要么在那些多半是口头上的和财政上的支持方面表现得不冷不热。

然而，由于巴解组织多变的战略目标总是被无益的恐怖行动所遮蔽，而且这些目标从来不曾被提出或者清楚有力地表达，同时，由于巴勒斯坦的决策者和知识分子对于文化言论在西方的优势地位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有所误解，因此我们从来未能有效地宣布我们所具有的道德优势。以色列提供的信息总是既可以诉诸（并利用）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又可以使人关注那些自发的、在政治上不合时宜的巴勒斯坦恐怖行为，从而抵消或遮蔽我们传达的信息，而事实的确如

此。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从来不曾专注于西方的文化斗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早就意识到这是削弱种族隔离政策的关键），而且我们完全没有以一种人道文雅、始终如一的方式强调以色列对我们的大举劫掠与严重歧视。今天，大多数的电视观众并不了解以色列的种族主义领土政策，也不了解仅仅因为巴勒斯坦人不是犹太人他们就要受到以色列人的掠夺、折磨和系统剥夺。正如一位南非黑人记者在访问加沙期间在当地一家地方报纸上所写的，种族隔离政策从来没有像犹太复国主义那般邪恶与残忍：种族清洗、日常羞辱、大规模的集体惩罚、土地占用，等等，等等。

但是即使更加了解这些事实，即使懂得把它们作为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这场价值战的一个武器，那也是不够的。我们不曾足够专心去做的事，是抵抗犹太复国的排外主义。我们必须提供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用曼德拉第二个短语中的话来说，一个能够维护我们作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人性的办法。我们大多数人还不能接受这样的想法，即以以色列犹太人会在这里继续驻留下去，他们离开的可能性并不比巴勒斯坦人离开的可能性更大。巴勒斯坦人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每天每日仍在失去家园、遭受迫害。但由于我们谈到的那个既不负责又欠考虑的提议——即他们将被强迫离开（就像驱逐十字军战士一样）——我们因此没有充分强调结束军事占领乃是道德指令，也没有强调提供一种在不取消我们的安全与民族自决的前提下保障他们的安全与民族自决的形式。这，而不是期盼一位反复无常的美国总统赐予我们一个国家的荒谬希望，本该成为一场遍布各地的大规模运动的基础。一块土地，两个民族。或者，众生平等。或者，一人一票。或者，在一个双民族的国家里维护共同人性。

我知道，我们是一场可怕征服的牺牲品，是一场邪恶军事占领

的牺牲品，是一个为了把我们变得要么不再是一个民族、要么成为恐怖分子而不断撒谎的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的牺牲品——但是，在我提出的建议中，什么才是真正的其他选择？一场军事战役？那是梦呓。更多的奥斯陆谈判？显然不是。让我们更多勇敢的年轻人失去生命——而他们的领袖既不提供帮助也不指明方向？很可惜，也不是。依靠那些现在甚至已经违背向我们提供紧急援助之诺言的阿拉伯国家？行了，别开玩笑。

以色列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都被锁在萨特的地狱（即“他人”）情境之中。无法逃脱。在这样一小块土地上，将彼此分离开来就如同种族隔离政策一样不起作用。以色列人的军事与经济力量让他们自我封闭，不能面对现实。这就是沙龙选举的含义，一个透过时代的雾霭召唤出来的老朽战犯意欲何为：震慑阿拉伯人，使之安分守己？绝无可能。因此，强权者与妄想狂所不能提供的答案，要由我们来提供。泛泛地谈论和平是不够的。一定要提供实现和平的具体根据，而这些根据只能从道德视角出发，而非着眼于“实用主义”或“实用性”。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要生存下去——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不仅要吸引本国人民的想象，还必须吸引我们的压迫者的想象，同时我们还要坚持人道的民主价值。

现在的巴勒斯坦领导层在倾听吗？鉴于导致目前种种恐怖事件的“和平进程”的糟糕记录，它能提出比这更好的建议吗？

《金字塔报》，2001年3月1—7日

《生活报》，2001年3月2日

## 7. 弗洛伊德、犹太复国主义与维也纳

这是一个值得在此一提的寓言，虽然它源于我本人相当奇特的个人经历，也曾引起媒体及公众异乎寻常的关注（虽然大可不必）。一般说来，我不拿自己举例，但我之所以允许自己这么做，是因为这件事一直被歪曲讹传，同时也因为它或许可以阐明发生这件事的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斗争背景。2000年6月底及7月初，我对黎巴嫩进行过一次私人家庭访问，也举行过两次公开演讲。像大多数阿拉伯人一样，我和家人很想到黎巴嫩南部去看看被以色列军事占领了22年、最近才弃守的“安全区”。正是从这里，这个犹太国家的军队被黎巴嫩抵抗力量毫不客气地赶了出去。我们于7月3日参观此地，在长达一天的行程里我们造访了声名狼藉的希亚姆（Khiam）监狱。这座监狱由以色列人建于1987年，8000人曾在这里受到可怕的非人折磨和拘禁羁押。此后，我们又驱车来到边界柱，这里也被以色列军队弃守，现在已成荒芜地带，只有大批黎巴嫩游客从残留着大量防御工事的边界向外扔石头以示庆祝。这里看不到以色列人，既无军队也无平民。

我们在那儿逗留了10分钟。此间，我被偷拍到同在场的一些年轻人比赛投掷小石块，当然看不出他们中任何人有什么特定的靶子。那个地区方圆几英里都是空空荡荡的。两天后，我的照片就在以色列

及所有西方报纸上出现。在任何一个曾经招致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机构敌视的人都很熟悉的众口诽谤与齐声撒谎之中，我被描述成一名投掷石块的恐怖分子，一个暴徒，诸如此类，等等，等等。

有两点讽刺便脱颖而出。其一，虽然我至少写了八本关于巴勒斯坦的书，而且我一贯提倡抵抗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但我向来只主张一旦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镇压与驱逐，我们就同以色列犹太人和平共处。我的著作至少用 35 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因此，我的立场几乎无人不知，我的思想一目了然。但是，当犹太复国运动发现无法驳倒我所呈现的事实及论据时，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发现不能阻挡我的著作接触越来越多的读者时，就采取越来越卑鄙的伎俩来试图阻止我。两年前，他们曾雇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以色列裔美国律师来“研究”我十岁前的生活，并“证明”即使我生于耶路撒冷，也从没在那里真正待过；他们指望用这表明我是个骗子、我曾诈称自己有回返权，尽管——这种论证之既愚蠢又不足道之处就在这里——令人反感的以色列回归法给予任何地方的任何犹太人到以色列来生活的“权利”，甚至毫不顾及他们以前是否到过以色列。

此外，这位律师的调查方法十分拙劣、有失准确，以致许多受访者都提出书面意见并反驳他的话；他接触过的所有刊物，除一家之外，都因其文之失真与歪曲而拒不接受。这场攻势的目的不仅意在败坏我个人名声（那家登载此文的杂志编辑公开说，他之所以发表这名雇用枪手制造的愚蠢垃圾，就是为了诋毁我个人的名声，因为我拥有众多读者），而且，令人惊诧的是，它想藉此表明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骗子，因而不能相信他们关于回返权的声明。

在这起被操纵的企图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投石事件。这就是第二个讽刺。尽管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进行了长达 22 年的破坏，摧毁

了它的全部村庄，杀死了数百平民，指使雇佣兵大肆掠夺和惩罚，在希亚姆监狱及其他地方用最残忍的方法刑讯逼供、关押监禁——尽管干下了这一切行径，但以色列的宣传机构在某个腐败的西方媒体的援助和煽动下，却选择把注意力放在我的一个无害行为之上，把它夸大到极其荒谬的程度，并暗示我是一个热衷于杀害犹太人的极端狂热分子。事情发生的背景和情境都被删除——我只不过丢了一颗小石子，现场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不可能给任何人造成人身伤害。更古怪的是，又发起了一整套编排好的攻势，企图将我从执教长达 38 年之久的大学开除出去。他们运用媒体文章、评论、辱骂信件和死亡威胁等多种手段恐吓我，或让我保持沉默，其中还有一些出自我的同事之手，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忠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然而，最可笑的是，这种试图将黎巴嫩南部发生的一件小事跟我的生活及著作联系起来的全然缺乏逻辑的做法，却未能奏效。同事们又重新站到我的一边，许多民众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我所在大学的行政部门为我发表意见与采取行动的权利进行了出色的辩护，并指出，对我发起的这场攻势根本不是针对我投掷石块这件事（它可被恰当地描述为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行为），而是针对我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与压迫政策的政治立场和行动而来的。

在犹太复国主义施加的所有这些压力中，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为可悲、最为可耻的。2000 年 7 月下旬，维也纳弗洛伊德协会及博物馆主任与我联系，问我是否愿意接受邀请，于 2001 年 5 月到那里做每年一度的弗洛伊德演讲。我给予了肯定答复，并于 8 月 21 日收到协会主任以董事会名义发出的正式邀请函。由于写过有关弗洛伊德的文章，而且多年来一直景仰他的工作与人生，我很快接受了邀请。（附带提一下，应该指出弗洛伊德早年是一位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在后来，当纳粹党人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使

得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似有可能成为解决传播广泛、具有致命危害的反犹太主义的一个办法时，他又改变了观点。但我认为，他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总是矛盾游移的。)

我建议的演讲题目是《弗洛伊德与欧洲以外的地区》。我想在演讲中指出，虽然弗洛伊德的著作既是为欧洲而写的，又是关于欧洲的，但他对埃及、巴勒斯坦、希腊及非洲等古老文明的兴趣，标志着他的开阔视野及其著作的人文眼界。同时，我认为，由于其反对狭隘地方主义的性质，他的思想值得赞赏，不太像他同时代的人，那些人把欧洲以外地区的文化贬低为次要或劣等文化。

结果，2001年2月8日，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我被协会主席，一位叫舒莱恩(Schulein)的维也纳社会学家告知，董事会已决定取消我的演讲，而据他所述，这是由于中东政治局势“及其后果”。此外未做任何其他解释。这是一种最有违职业规范的可悲姿态，是与弗洛伊德著作的精神和本义完全背道而驰的。在走遍世界进行演讲的三十余年里，这种事情从未在我身上发生过，于是我马上用一封只有一句话的信予以回复，要求舒莱恩解释一下在维也纳的一场关于弗洛伊德的演讲怎么会与“中东政治局势”相关。我当然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更为糟糕的是，《纽约时报》在3月10日刊登了一则有关此事的报道，连同放大到怪异程度的那张我去年7月在黎巴嫩南部被拍下的著名照片，这件事就发生在弗洛伊德协会的人8月底邀请我之前不久。当舒莱恩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他竟敢拿出那张照片，说出那番他永远没有勇气对我说的话：它（以及我对以色列占领的批评）就是取消演讲的原因。他还说，鉴于约尔格·海德尔(Jorg Haider)的出席，鉴于纳粹大屠杀和奥地利反犹太主义等历史背景，它有可能会触动维也纳犹太人的敏感神经。一位令人尊敬的学界人士会

说出这样荒唐的话来，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但是，就在以色列每天都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无情围攻和杀戮的时候，他竟然会这么做——那就是不正派了。

弗洛伊德协会的那帮胆小鬼不敢公开说出的是，如此不体面地取消我的演讲，其真正原因在于，这是他们对以色列和美国的捐赠人所付出的代价。这家协会已在维也纳和纽约筹办了一场弗洛伊德文献展；现在正希望能在以色列增加一场。那些潜在的资助人似乎曾说过，只有取消我的演讲他们才会支付在特拉维夫展览的费用。没有骨气的维也纳董事会屈服了，我的演讲相应被取消，不是因为我主张暴力和仇恨，而是因为没有那样主张！

我当时说，弗洛伊德被纳粹分子和大多数奥地利人赶出了维也纳。今天，同样是那些在胆量勇气与知识分子准则上的楷模们，却禁止一名巴勒斯坦人演讲。这块特别令人厌恶的犹太复国主义招牌已经变得如此抬不起头，以至于竟然不能通过公开辩论和真正对话来为自己辩护。它使用威胁与勒索这些见不得人的黑道伎俩，强迫他人保持沉默与服从。它如此不顾一切地寻求接纳，以致在以色列本土及其他地方通过其支持者的作用，都出现了赞成彻底抹掉巴勒斯坦声音的表现，无论是凭借封锁巴尔扎伊特那样的巴勒斯坦村庄，还是依靠在能够找到串通合谋者和懦夫胆小鬼的任何地方关闭讨论与批评的言路，来执行它那该受谴责的要求。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阿里埃勒·沙龙能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些凶暴的手段的最终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害怕，而且不是每种声音都能被禁绝。在经历了 50 年犹太复国主义的舆论审查与歪曲谬解之后，巴勒斯坦人还在继续斗争。而且尽管存在拙劣的媒体报道，尽管有像弗洛伊德协会这样的机构甘受贿赂，尽管懦弱的知识分子让他们的良心昏睡不醒，各地人民却为正



义与和平大声疾呼。就在维也纳取消对我的邀请之后，伦敦弗洛伊德博物馆立刻邀请我做本该在维也纳做的演讲。（在1938年被逐出维也纳之后，弗洛伊德在伦敦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两家奥地利协会，即人文科学协会（**Institute for the Human Sciences**）和奥地利文学协会（**Austrian Society for Literature**），也邀请我择日到维也纳演讲。一群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批评家〔包括穆斯塔法·萨福安（**Mustafa Safouan**）〕联名给弗洛伊德协会写信，抗议这次取消事件。许多其他人都对这种赤裸裸的欺侮感到震惊，并公开表达了这一感受。同时，巴勒斯坦的抵抗在各地继续进行着。

我仍然相信，作为一个带着正义寻求和平的民族，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提供另一种见识，迥异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抱持的见识，一个基于平等与包容，而非基于种族隔离及排他性的见识。如同我在这里描述的事情一样，每件事都增强了我的信念，即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除了共享一块双方都要求得到的土地之外，别无选择。我也相信，即使以色列的围攻、羞辱、饥馑和集体惩罚等应受谴责的占领政策必须在政治上与文化上予以积极抵制，阿克萨暴动也必须被引向这一目标。以色列军队日复一日地对巴勒斯坦人造成极大伤害：更多的无辜百姓被杀害，他们的土地被破坏或没收，他们的房屋被炸毁，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或被完全禁止。以色列的行径使数千平民找不到工作，无法上学，无从就医。对巴勒斯坦人的这种傲慢态度和自取灭亡的愤怒只会导致更多的苦难与更深的仇恨，这就是沙龙最终总是失败，并诉诸徒劳无益的谋杀与掠夺的原因。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超越于破产的犹太复国主义之上，继续公正地阐明我们自己的和平信息。如果说这一道路显得颇为艰难，却也不能放弃。一旦我们当中有谁被阻止，另外十个人就会递补上来。那是我

们斗争的真正特点，而且，无论是审查机构还是卑鄙的串通合谋，都无法阻止它走向成功。

《金字塔报》，2001年3月15—21日

《生活报》，2001年3月16日

## 8. 转向另一战线的时机

只有等到西方明白这次暴动是一场反殖民主义压迫的平民起义，巴勒斯坦人才可能获得平等与正义。

过去几星期里，以色列政府雄心勃勃地在两条战线上推行其政策，一个在当地，另一个在国外。第一个是老式的沙龙政策，或者，就此而言，是老式的以色列军事政策。其观念便是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打击巴勒斯坦人，使他们的生活变得不堪承受，让他们感到太受限制、太过窒息，以至于无法忍受继续驻留此地。正如巴勒斯坦学者努尔·马沙勒哈（Nur Masalha）在他的三部重要著作中所研究的那样，如此行事的根本原因在于犹太复国主义总是想要更多的土地和更少的阿拉伯人；从本—古里安（Ben-Gurion）到拉宾、贝京（Begin）、沙米尔（Shamir）、内塔尼亚胡（Netanyahu）、巴拉克直到现在的沙龙，存在着一个从未中断的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即在他们眼中，让巴勒斯坦人民化为乌有才是他们心向往之并为之奋斗的目标。

这一点是如此明显，同时，又是如此小心翼翼地躲过了国际（甚至是地方）公众的视线，以至于在这里只需给予一点附带评论即可。其核心观念是，如果犹太人对“以色列土地”享有所有权，那么，此地的任何非犹太人就无资格享有任何权利。这再简单

不过了，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是得到一致认同的。在 1948 年的种族清洗之后，没有哪个以色列领袖或党派将巴勒斯坦人看做一个国家，甚至没有看成一个国家里的少数民族。无论从文化、历史还是从人类的角度，犹太复国主义都将巴勒斯坦人视为次要或劣等的。就连似乎偶尔说出几句厚道话的西蒙·佩雷斯，也不曾认为巴勒斯坦人是值得平等相待的。犹太人一定要维持多数，必须拥有所有的土地，要由犹太人来给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定义法律，只保证犹太人移民和归国。虽然存在着种种不一致和矛盾（比如说，为什么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会存在一个民族享有民主，姑且称之为民主，而另一个民族却得不到民主的情形？），以色列却不顾一切地贯彻它的政策——种族中心、排斥外族及缺乏容忍的政策。世界上除了以色列以外，还没有哪个国家仅仅出于宗教与种族原因，就会维持一项反对一个本地民族的如此丑恶的歧视政策，一个禁止本地人民拥有或保留土地或免遭军事压迫的政策，而它自己却享有“自由的、值得景仰的先进国家”这类令人惊讶称奇的国际名声。

这使我想到以色列政策的第二战线，而它必须通过一个双透镜来予以审视。即使是在以色列使用战壕和彻底军事封锁之类的中世纪的技术来围攻巴勒斯坦城镇时，它也能制造出一种气氛，仿佛自己反而是被一场危险的、灭绝人性的暴力围攻的受害者。（被称做“国防军”的）以色列军人用武装直升飞机、先进的导弹和坦克排射来轰击巴勒斯坦住宅；以色列军人杀死 400 名平民，造成 12000 人伤亡，使巴勒斯坦人的经济生活下降到贫困人口达 50%、失业人数达 45% 的水平；以色列推土机摧毁了 44000 棵巴勒斯坦树木，破坏房屋，建造使人无法走动的防御工事；以色列谋划者们兴建了更多的定居点和定居道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边维持它作为一个可怜的、毫无防御能力并且受到严重威胁的民族形象的同时进行的。它是如何做

到的？是通过一个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展开的步调一致的公关战役来实现的。这种方法既颇具讽刺，又行之有效。

仅在上周（2001年3月），沙龙、佩雷斯及亚伯拉罕·伯格（Avraham Burg）（以色列议会议长）都来到美国，以巩固以色列与恐怖主义暴力作战的正直形象。他们三个轮流穿梭于一个又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公众平台，每时每刻都在获得人们对以色列政策的支持与同情。此外，媒体还宣布以色列政府已经雇用了两个公关公司，通过广告、协同游说以及联络华盛顿国会等手段继续推行其政策。有关巴勒斯坦暴动的新闻已逐渐从媒体消失。毕竟，一个似乎既不针对长久以来的不公（例如军事占领和集体惩罚）、也不针对某个特定政策（例如以色列顽固拒绝承认巴勒斯坦的要求有任何价值）的“暴力”，能令那些每次发表有悖于亲以的既定编辑方针的报道时都会受到处罚的记者们维持多久的兴趣呢？不仅记者们没有好的素材报道（比方说一篇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的即时叙述），而且以色列也从来没有因为长年累月地大规模践踏整个巴勒斯坦民族的人权而受到严格指控。

参议员乔治·米契尔（George Mitchell）的质询委员会与玛丽·鲁宾逊（Mary Robinson）带领的一系列类似的人权专家，包括连同普林斯顿大学的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在内的出色团体，无疑将会得出相似的结论。我已经读过罗宾逊的报告，该报告毫不含糊地谴责以色列的残酷及其对一场实为反殖民的平民暴动做出的不成比例的军事回应。但可以肯定，很少有人将会读到这些优秀报告或受其影响。以色列的公关机器，尤其是在美国，可以确保这一结果。

这样的宣传攻势在美国要比在其他国家（如英国）有效得多。罗伯特·菲斯克这位优秀的《独立报》驻中东记者，一直抱怨在英

国的以色列游说团对他本人及他的报告进行攻击，但他无所畏惧地继续写作。而当加拿大媒体大腕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试图阻止或审查他所拥有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与《观众》（*Spectator*）杂志上对以色列的批评时，他自己的撰稿作家与伊恩·吉尔摩（Ian Gilmour）等其他人士一起，却可以在他自己办的报纸上回敬他。

这种事情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美国，那些领衔的报纸和新闻记者多半根本不允许发表支持巴勒斯坦的社论文章。《纽约时报》只有两三篇这样的专栏文章，相形之下，却有数十篇“中立的”或亲以色列的评论。美国各家主要报纸的情形与此相似。于是普通读者被数十篇又数十篇的关于“暴力”的文章所湮没，就好像那场暴力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以色列用直升飞机、坦克和导弹进行的攻击，或比那更为严重。如果不幸言中，即在地面战线上一个以色列人的死亡似乎抵得上许多巴勒斯坦人之死的话，那么同样真实的是，尽管巴勒斯坦人确实遭受着痛苦与每日的羞辱，在媒体眼中，他们却并不比他们被比喻成的蟑螂和恐怖分子更接近人类。

简单的事实便是，只要巴勒斯坦暴动在西方不以一场解放斗争的形象出现，它就不会受到保护，也不会发挥作用。美国凭着每年50亿美元的资助而成为以色列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且以色列人一直明白宣传的直接价值。宣传无疑可以让他们为所欲为，并仍旧保持一个泰然担当道义、昂首维护权利的形象。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巴勒斯坦人必须效法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也就是说，在欧洲，尤其是美国，获得合法地位，从而让种族隔离统治变得不再合法。为了在巴勒斯坦实现民族自决方面取得进展，必须让以色列殖民主义的整个原则变得同样地声誉扫地。

这项任务不能再拖延。在 1982 年贝鲁特被沙龙军队围攻期间，一大群巴勒斯坦商人与知识分子云集伦敦，其目的是帮助减轻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同时也在美国发动一场信息战役：巴勒斯坦在当地的抵抗和巴勒斯坦形象，被视为两个同等重要的战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第二条战线上的努力却被完全放弃了，究其原因，我至今仍不能完全了解。你不必非得像亚里士多德那般智慧才能将下面两者联系在一起：其一是将巴勒斯坦人变成丑陋的、狂热的恐怖分子的宣传机构；其二是以色列如此轻而易举地完成如下任务，即每天每日实施可怕的战争罪行，却又能成功地维系自身作为反抗外来灭绝的勇敢小国的形象，还能继续得到美国那些不知情的纳税人全额支付的无条件援助。

这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局面，而且，只有当巴勒斯坦的斗争坚决地着眼于这样一场战斗，一场用勇敢反抗以色列殖民主义的叙事来表达自身的战斗，我们才有可能赢得作为一个民族的权利。因此，象征着支持平等与正义而投出去的每块石头，都必须做出这样的解释，而不是被歪曲成暴力或者对于和平的盲目拒绝。巴勒斯坦人的信息一定要改变这一框架，一定要对此负起责任，一定要马上采取行动。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集体目标。

在一个政治实质上就等于信息的全球化世界里，巴勒斯坦人再也不能推卸一项可悲的领导层完全无法理解的任务。要想停止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要想把解放而不是无休止地受到以色列奴役作为其真正目标，那么这项任务就必须完成。讽刺的是，虽然真理与正义都在巴勒斯坦人一边，但是只有当巴勒斯坦人自己把这件事清清楚楚地摆在众多世人面前，摆在他们自身面前，尤其是摆在以色列人和美国人面前时，真理与正义才有可能获胜。对于一个忍受了一个世纪之不公的民族，一个正当合理的信息政治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所需的是一

个重新定位、重新聚焦的求胜意志，以此来挫败军事占领和基于种族、宗教原因的驱逐流放。

《金字塔报》，2001年3月29日—4月4日

《生活报》，2001年4月4日



## 9. 现实种种

目前，武装暴动已经进入第七个月（2001年4月），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已到了最残酷、最令人窒息的阶段。以色列的领袖们显然决定继续我行我素，让这些不公平地遭受苦难的人们无法生活下去，而沙龙则为所欲为，毫无节制，其所作所为都是以美国承认的“原则”的名义，即只要“暴力”还在继续，就拒绝做任何改变。于是这似乎授权沙龙对整整300万人口实施围攻，即使在他与西蒙·佩雷斯——他当然是他们众人当中最不诚实、最伪善的家伙——满世界控诉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罪行之时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必浪费时间试图弄清他们如此卑鄙的手段是如何侥幸得逞的。事实是他们做了，而且在可预知的将来还会继续这么做。

然而，我们曾经说过并且承认，我们没有理由消极被动地接受这些后果。因此，不妨冷静地从战术和策略的角度考察一下目前的形势。我们有如下发现：

1. 曾经签字通过了奥斯陆协定和受到美国监护的灾难性原则，同时又做出了种种可悲让步（包括听任定居活动继续长驱直入）的巴勒斯坦领导层，根本没有能力采取任何行动来超越其目前的所作所为，即只在口头上攻击以色列，暗地里却表示愿意以或多或少完全相同的方式回到从前的（并且是无益的）谈判。除此之外，它没什么力

量，更缺乏可信度。阿拉法特纯粹的生存天赋已带他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使他十分清楚最终的结果，也不打算就此撒手。他顽固地坚持一个幻觉，即他就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他；无论会发生什么，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继续相信这一点。更进一步的困难在于，他的所有理论继承人都是些等而下之的人物，并且很可能让事态变得更糟。

2. 无论巴勒斯坦的处境有多糟，美国政策也不会受其影响。布什跟克林顿一样，是个亲以派，而且以色列在美国和欧洲的游说团一如既往地、无情地散布着谎言和错误信息，尽管阿拉伯国家多年来一直努力既接近美国政府同时又（令人十分惊讶地）接近以色列游说团。然而，尽管在美国和欧洲对巴勒斯坦事业存在巨大的潜在同情，但在那里却从来没有开展过任何巴勒斯坦运动来系统地赢得这一支持（在美国黑人、拉丁美洲人、不属于南方原教旨主义教会的大多数教会、学术共同体中间，以及甚至如同《纽约时报》一则付费广告上刊登的由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数百位拉比发出的一份了不起的声明所证实的那样，在美国犹太人中间，多数人和我们一样，对于沙龙和巴拉克的行径感到大为惊骇）。

3. 阿拉伯国家较之以前，更不大可能对巴勒斯坦人提供比边缘战术更多的帮助。他们全都存在将自己与美国政策绑在一起的直接利益；就像最近在安曼峰会上最终证明的那样，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成为巴勒斯坦的战略同盟国。另一方面，在阿拉伯世界中存在一个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划分开来的巨大鸿沟，这对巴勒斯坦事业来说是个足够充分的鼓舞，如果它的目标是为了解放及结束占领的话。

4. 以色列人不会停止他们的定居政策，也不会放弃对巴勒斯坦生活的总体围困。除了会咆哮威胁之外，沙龙是个不太聪明，甚至连称职也算不上的人。在其事业生涯中，他一直依赖武力与欺骗，大

多数时候与犯罪和恐怖活动授受不清，每当他认为可以侥幸得逞时，他就予以实施。我们从来没有对着以色列公众——特别是那些对注定将使以色列陷入无休止冲突之中的当前新局势感到不安的公民——发言，不幸的是，我们也不知道该对他们，比如那些在暴动发生期间拒绝服兵役的数百名预备役军人，说些什么。在以色列，有一批我们必须设法争取的支持者，正如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样，把吸纳白人参与到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作为一个政策加以实施。

5. 巴勒斯坦自身的局势是可以挽回的，因为是人类创造历史，而不是相反。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巴勒斯坦青年，还有足够多的年龄更大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被一个领导层彻底地激怒了，他们感到万分沮丧，无比伤心。这个领导层带领人民从一场灾难走向另一场灾难，却不曾做过任何解释，不曾讲过一句实话，不曾明确自己的目标和目的（除了让自己存活下去之外）。正如已故的伊克巴·艾哈迈德所言，巴解组织在历史上向来都是在战略上非常变通而在战术上却相当僵硬。实际上，这一箴言精确地反映于1993年以来的政策及实施之中。阿拉法特最初接受把联合国第242号及第338号决议案作为（战略上的）谈判的基础，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灵活地变成接受一个又一个的战略修正；原定要停止的定居点后来却增多了，而他竟也对此表示接受。耶路撒冷问题亦如此，此外还有归还所有领土的问题。但阿拉法特在战术上却从不动摇，即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停留在和平进程中，并且要仰赖美国人。战略上变通，而战术上僵硬。

6.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某种当前局势所要求而每个参与者却在抵制的东西：一份关于目标宗旨的真正声明。这些目标首先必须包括结束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和结束定居点。没有其他途径可以为巴勒斯坦人民或以色列人民带来和平与正义。根本没有所谓的“临时”和平（这是奥斯陆协定始终包含的内容，以致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巨大

损害)；也没有只供巴勒斯坦人而非他人享受的某些权利。那是一派胡言。一套法律与权利，一套宗旨和目标。在此基础上方可组织一场新的巴勒斯坦和平运动，其中必须包括以色列和非以色列的犹太人，尤其是那些英勇的个人以及像“拉比人权组织”(Rabbis for Human Rights)那样的群体，还有杰夫·哈尔波领导的阻止拆毁房屋运动。

7.那么，这场运动的目标是什么？首先，这场有组织的运动，其目标是寻求巴勒斯坦的解放与共存，在这场运动中，人人都是整体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等着另一位萨拉丁再世或者上级下命令的旁观者。同时，必须特别注意其他两个对巴勒斯坦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一个是美国社会。它向以色列提供支持，而没有它的支持，今天在巴勒斯坦的事件就不可能发生。别忘了，美国纳税人直接向以色列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外加持续不断的武器再供应(比如目前正在对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进行轰炸的直升机)，其总价值几乎达到50亿美元。必须停止这一援助，或对其进行根本修改。第二个是以色列社会。长期以来，它要么被动地认可对“劣等”的巴勒斯坦民族采取种族主义政策，要么通过在军队、摩萨德组织及辛贝特组织(Shin Bet, 译注：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名称)中服役，来积极支持并实施这一非人道、不道德的政策。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对此已经忍受得太久，而那些需要参与进来改变现状的以色列公民亦如此。

8.虽然当今世界的每一份人权宣言(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都赋予一个民族在受到军事占领时采取任何手段进行抵抗的权利，也赋予难民回返家园的权利，但是对特拉维夫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伦理上都是无济于事的，这也是事实，它们同样令人无法接受。在有组织的不服从或群众抗议，与径直炸死自己和几个无辜者之

间，有着天壤之别。必须把这种差异表述清楚，予以强调，而且必须永远将这种区别铭刻在巴勒斯坦的所有重大计划之中。

9. 其他各项原则非常简单。两个民族都获得自主。双方都得到平等权利。没有占领，没有歧视，没有定居点。每个人都被包括在内。任何谈判都必须基于这一点，一开始就必须表明这一点，不能像美国张罗的奥斯陆和平进程那样，对此不置一词或只是暗示。联合国必须成为谈判的框架。与此同时，要依靠我们这些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美国人和欧洲人来保护那些未受保护之人，来结束巴勒斯坦民族每天都在遭受着的诸如集体惩罚、轰炸和迫害之类的战争犯罪。

10. 这些就是当今的种种现实，其核心问题在于，巴以之间的力量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和极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凭借自己仍能支配的政治手段——凭借思考、计划、写作和组织的力量，刻不容缓地夺取道德制高点。对于居住在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来说，这就是事实。无人可以免除为我们解放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可悲的是，现任领导层似乎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点，因而肯定会袖手旁观，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必定会如此行事。

《金字塔报》，2001年4月19—25日

《生活报》，2001年4月17日

## 10. 对以色列的思考

在英国，特别是在美国，“以色列”一词颇为不同凡响。听到政客们重复着支持以色列以及使它保持强盛之类的熟悉口号就会意识到，正在被谈论着的，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邦国，而是远远超出世界上任何其他邦国地位的某种观念或者符篆。几星期前，参议员希拉里·罗得哈姆·克林顿公开宣布，她要向以色列定居者捐赠 1250 美元，让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防毒面具和头盔。她丝毫不带有与所涉情形相称的讽刺意味或者黑色幽默的痕迹地庄严宣称：所有这些，都是她为了让以色列保持强大、安全地位而做出的承诺的一部分。很自然——至少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就是如此——这件事被报道得像是一桩寻常事件，而非怪异荒谬之事。

《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这类报纸充斥着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和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这样的专栏作家。放在任何一个其他背景中，他们都会显得完全不可理喻。此二人对沙龙担任以色列政府首脑扬扬得意，并非因为沙龙已经显示出一种使用野蛮暴力以及大体上是愚蠢的毁灭行动的倾向，而是因为他们一本正经地认为沙龙是唯一能够向巴勒斯坦人展示出某种规训式的推理以纠正其行的人物。他大度地建议把西岸 42% 的地区让他们，或许还会再多一点，此外，为所有以色列人保留定居点，

用永久性的以色列围墙围住巴勒斯坦领土：这是解决武装暴动问题的合理妙方。他在与《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的一次访谈中说，毕竟，在以色列，“我们”有100万阿拉伯人；为什么“他们”（巴勒斯坦人）就不能容忍几十万以色列定居者？关于沙龙的那些美国拥护者，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令人颇感兴趣的是，作为美国人，他们如何能够妄自尊大声称有权告诉以色列应该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才能于己有利。

因此，以色列已作为每一位美国支持者私下里的个人幻想而被内化，或者表面看来似乎就是如此。然而，美国犹太人有一种特殊关系使他们有权或许更大程度地参与进来，告诉以色列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尤其是——这是我所讨论的问题中最令人惊讶的特点——在安全事务方面。没有人费心劳神地注意到以色列公民是那些正在从事战争和进行策划之人，而非远离故土、流散他乡的犹太人。这一切都是将以色列形象惯常化的组成部分，它使以色列远离历史，远离其行为之后果。当你冒险认为是以色列的狂妄滥炸和集体惩罚在每个阿拉伯人心中积聚起对它的憎恨和复仇欲望时，你就会被告知说你正在奉行反犹主义，仿佛其中毫无正义与智慧，而（就以色列的阿拉伯批评家而言）仅只表明对犹太人的冷漠无情、根深蒂固的仇恨似的。

因此，便有如下近乎奇迹般的现象出现：尽管以色列多年来进行军事占领，却从来没有被认定为殖民主义或殖民行径。在我看来，那是所有各方在批评以色列政府方针政策时的最大失败，既是巴勒斯坦在信息和言论方面的失败，甚至也是以色列持不同政见一方的失败。新近出版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1年5月17日出版)上有一篇由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阿维夏伊·玛格里特撰写的名为《沙龙将会走多远?》(*How Far Will Sharon Go?*)的

出色评论。该文对形势的分析完全不像美国人，因为（a）它直言不讳地描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集体处罚；（b）它并不试图用花里胡哨的语言来描述以色列的安全事宜并以此粉饰现实，而摆弄这种粉饰现实的花言巧语是那些为了显得郑重其事而感到自己有必要像将军一样说话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骇人习惯。我对玛格里特的唯一批评是，他没有直接站出来呼吁结束军事占领，呼吁以色列承认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的非正义行为。知识分子就应该那样大声疾呼，而不应继续从政治家的角度谈论政治。但尽管如此，玛格里特的这篇文章仍至关重要，因为它揭开了以色列的神秘光环。这个光环是多年来逐步形成和精心构筑的，目的在于将巴勒斯坦人从这幅画面上全部抹掉。

因此，我认为，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任何和平努力，首先必须完成的是把以色列和它的种种行为联系起来，把重心集中在终止那些行为之上，而不是设法与他们进行交易或找一个经纪人。奥斯陆谈判的最大缺陷之一在于巴解组织领导人（也就是阿拉法特）忽略了以色列作为占领军的所作所为，甚至忽略了占领的事实本身；你不能跟占领做交易，占领就好像是肿瘤，除非能够识别它、包围它，进而攻克它，否则它会继续扩展。以色列的历史便证明了这一点。对于那些认为以色列必须被接受的人来说，唯一明智的回答就是问那个以色列，因为该国从未在国际上宣布它的边界，而是继续不断地修补改动着自己的领土尺寸。“二战”以来从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处于这一情形，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让它那样继续不确定下去。和平只能建立在完全撤退与结束占领的基础上。这些是具体的事情，不是那些通常将我们这个寻求自主的民族注意力从目标上转移开来的泛泛之事。

虽然我能理解巴勒斯坦领导人渴望现在就有作为来结束一场显然耗费精力的持久战的心情，但我也认为，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



就恢复奥斯陆谈判，这种做法非常不道德而且极其愚蠢。1996年9月，以色列在哈兰·阿夏立圣地下面挑衅性地打开一个通道后，爆发了一次小型的武装暴动，但那最终造成许多巴勒斯坦人死亡，而且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谈判桌上都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在巴拉克执政期间，正如玛格里特准确指出的，定居点的建立伴随着巴勒斯坦的每个可以想象的困难一起增加。巴解组织继续让它的人民遭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其意义何在？就是为了让阿拉法特先生能被邀请重返白宫吗？这毫无意义，但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只管继续大讲恢复谈判，就好像那400人不曾死过，那13000人也不曾伤过似的，这一厚颜无耻的态度令我感到吃惊。这些领导人完全没有尊严吗？他们就不懂得礼义廉耻，甚或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吗？

由此可见，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民族的冷漠无情似乎已被内在化了。不仅被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可怕的阿里埃勒·沙龙及以色列的政治机构内在化，而且也被巴勒斯坦领导层内在化了。沙龙于2001年4月27日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不停地重复说武装暴动仅由“恐怖主义”构成，因此将巴勒斯坦人的所有行动都归结为恐怖主义并且只能是恐怖主义，唯有结束抵抗和重新逮捕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行动除外。就阿拉法特而言，若未将“恐怖主义”一词从他们的词汇里删除就与沙龙进行和谈，就等于接受了巴勒斯坦人反占领的斗争等同于恐怖主义的公式。然而据我所知，他没有做过任何努力，没有通过信息传递以及向以色列人和美国人发表讲话来恢复其言论的现实性。合乎逻辑的假定似乎便是，以色列 = 军事占领 = 巴勒斯坦抵抗。因此，对于阿拉伯人来说，目前努力的重点就是要打破甚至摧毁这个公式，而不仅仅是写几篇有关巴勒斯坦难民回返权的抽象的论辩文章。

沙龙重返政界，带着非常明显的企图，就是要把一切推回到

1948年的情景，试图要将巴以冲突当做一场捍卫以色列的生存本身的战争来重新上演。他在一些（但显然不是全部）以色列人中似乎不难找到对这一返祖式的、极其退化的观点的支持。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对“犹太人永远也不能免受迫害和敌视而生存”这个没有明言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这样的观念似乎既荒唐可笑又站不住脚。由于在许多方面显然已经成为强大的、成功的国家，以色列犹太人现在似乎应处于最佳时机来既充满自信又宽宏大量地对待那些曾被他们如此虐待的受害者们。可是现在他们却继续重新上演最初的那一幕，于其中他们首先驱逐了巴勒斯坦人，从而再次体验他们在别人那儿引起的对他们自身的敌意和惊恐，但是却感到受伤的是自己，而不是巴勒斯坦人。沙龙利用了这种可怕的综合征，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被弗洛伊德称为强迫式重复（the compulsion to repeat）的神经症的一个最具戏剧性的例子：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最初受创伤的场景，听凭自己停留在巨大的神经症恐惧的掌握之中，而毫不求助任何理智或现实的慰藉。

因此，以色列的政策必须以其本来面目示人，而不应以其宣传者们所希望的面孔呈现。为了这一点，我们需要把以色列持不同政见者及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努力与普通市民的努力结合起来。因为语言的败坏以及未经审视的历史不仅对和平进程有致命的影响，而且它们似乎已经渗透到领导人的思维之中，而这些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对他们所领导的人民负责，而不是为敌人或他们所谓的庇护国（这里指美国）着想。我们应该从克林·鲍威尔对以色列入侵加沙地区的评论中吸取适当的教训。他基本上是在谴责巴勒斯坦的抵抗，然后再指责以色列对此的回应比例失当；自然，这远非事实，而且他延续了一种受到歪曲的认识，这种认识破坏我们作为一个饱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而提出的论据。如果只把我们看成是以色列存在的破坏者——以色

列，这个被错误地描绘为一个被围攻、被迫害的国家，继续维持它的形象并以此来评判我们的抵抗——那么我们也只能期待一个残缺不全的解决办法，甚至是一个被歪曲得更加荒谬的和平进程。因此，在我看来，任何源自武装暴动的谈判，其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尽可能改正最初的错误，还原以色列作为一个成熟的殖民强国的本来面目：既违反战争法又违反和平法地对一个民族从整体上实施虐待。甚至必须在那个顽固不化且无可救药地无组织的巴勒斯坦领导层继续造成比以往更多伤害之前，劝说他们认清这一基本现实。

换言之，正如我上篇文章所说，我们一定要夺取道德制高点，从此地发起进攻，反抗不断延长的军事占领所造成的非正义。目前，仅仅达成一个临时安全协议，可谓既无用又不道德。此外，只要以色列定居点还在兴建，巴勒斯坦人还被关在集体监狱里，这样的协议就不可能维持下去。目前唯一有价值的谈判必须是关于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全部领土上撤离的谈判。任何其他的谈判都是在浪费我们民族的时间。

《金字塔报》，2001年5月3—9日

《生活报》，2001年5月14日

## 11. 反抗、尊严与教条统治

1998年，我在牛津大学做过一次演讲。在演讲之后的讨论过程中，一位年轻女士提出的问题让我吃惊不小。我后来得知她是一位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巴勒斯坦学生。我一直在谈论1948发生的事件，以及我如何认为似有必要不仅了解我们的历史与以色列历史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把以色列的历史作为与我们阿拉伯人相关的历史来学习，而不是像我们长期以来的一贯态度那样完全回避或者忽视它。这位年轻女士提出的问题，是质疑我关于有必要研究和了解以色列的观点。她说：“难道对于以色列的关注，不是对它让步的一种形式吗？”她在向我发问：是否无知的“非正常化（nonnormalization）”就不是一条更好的途径，用来对待一个多年来一直制定政策阻挠和否认巴勒斯坦自主、更不用说最初就曾导致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的国家。

我必须承认自己以前从未有过这个想法，即使是当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里变得不可想象而人们不得不用一个委婉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Zionist entity）”来称呼它的那些漫长岁月里，我也不曾这样想。我发现自己正在反问，毕竟，两个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已经与以色列达成正式和平，巴解组织已经承认它并正在与之寻求一个和平进程，而且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也与它有了商贸往来。阿拉伯知识分子

曾将不与以色列有任何来往、不去以色列、不见以色列人等行为当做一种荣耀，但是，每当下述事情发生时，例如，埃及同以色列签订大量出售天然气的合同，并且在以色列频繁镇压巴勒斯坦人期间依旧维持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时，即使这些知识分子也一直保持沉默。一个人怎能不尽可能去分析并了解一个在我们中间存在了五十多年，如此深刻地影响并决定阿拉伯世界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活的国家呢？

因此，在这位年轻女士看来，与让步相对立的行为应该是反抗，即挑战、抵抗以及拒绝向被视为不公正与不合理的强权意志低头的行为。按我的理解，那就是她建议我们应该对以色列采取的做法，而非我试图建议的，创造性地介入到一种文化与社会中，这种文化与社会在所有重要层面上一直故意实施（正如目前在对阿克萨暴动的残酷暴行中所表明的那样）并继续实施对整个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政策。在这一点上，恶名昭彰的阿里埃勒·沙龙，与巴拉克、拉宾及本·古里安简直没什么区别[姑且不算像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charansky）、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berman）和欧瓦迪亚·尤瑟夫（Rabbi Ovadia Yousef）拉比之类的沙龙盟友所持的真正邪恶的种族主义]。相反，我所说的，不只是一要理解他们，而且是要理解我们自己，因为如果不考虑以色列，不考虑以色列在我们的生活中代表着什么、它是如何做到曾经做过的一切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的历史就不完整。此外，作为一名教育家，我继续相信，知识——任何知识——总是胜过无知。从知性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正当理由采取无知政策，或将无知作为斗争武器。无知就是无知，不多不少不折不扣。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莫不如此。

我对自己的探讨性答案仍感到困惑与不满，于是没有回答这个

问题，并且一直拖到今日。但是它再次出乎意料地摆在了我的面前，向我提出挑战。让我解释一下。不久前，纽约新闻媒体透露，希拉里·罗得哈姆·克林顿迫于联邦法律压力，归还了亚西尔·阿拉法特送给她的价值 7000 美元的珠宝；根据同一个美国政府的官方信息来源，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即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时的国务卿，从同一个慷慨的捐赠者那里得到了价值 17000 美元的珠宝。突然之间，我能够洞悉阿拉伯世界里公开态度与私下态度之间的关系，我也可以理解如下两方面之间的关系，一个是那位年轻学生关于被她视为向以色列让步的行为的挑战性思想，另一个是巴勒斯坦领导层对美国政客们的卑鄙的、挥金如土的慷慨态度，而那些美国政客在某种程度上对降临到巴勒斯坦民族头上的灾难是负有直接责任的。甚至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被无限量地提供给以色列的美国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被（根据美国法律）非法地用来攻击、杀害和致残那些没有防卫能力的巴勒斯坦男人、女人与孩子们，毁坏他们的房子，夷平他们的难民营，使他们完全无法生活。然而多年来一直用尽各种可能的庸俗方式来争取美国领导人支持的这一毫无理由、丧失尊严的政策，却已然贯彻实行，仿佛用巴勒斯坦大众的资金换来希拉里或玛德琳的个人愉悦或满足是一种方针大计而非下流的贿赂行为似的。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怪诞的假定，即美国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乃是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镜像，在这些国家中，例如蒙博托（**Mobutu**）统治的扎伊尔，政策是依照统治者的一时兴致或为其家族发财致富而制定的。此处所缺失的是任何这样的理解，即：这是些复杂的、总体上民主的国家，它们的公民社会及其利益在其中各国的行为中都起着如果不是决定性的也是十分巨大的作用。但我们的领导人不是对这些公民社会发表言论，并努力改变公民社会的情绪和观念，而是对其视而不见，却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快速搞定的办

法：巴结、奉承或贿赂领导人。任何对以色列或美国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告诉你，这些把戏是完全无效的；他们或许能在白宫得到一次宴请，或者与已故的拉宾将军进行一次脸色难看的握手，但仅此而已。

我所说的这些，在自从奥斯陆协定签署后的日子里我们同美国和以色列灾难性的交往史中，得到了明显的确证。自从巴勒斯坦领导层首先以其所采取的方式跻身奥斯陆进程，并作为一个软弱无力的，而且不幸得很，还是一个过于心甘情愿的合伙人待在里面，藉此背叛人民对它的信赖，辜负人民做出的牺牲，同时，它又维持一种只能被描述成挑战式的公众姿态——必须马上追加一句说明，挑战一词主要是修辞性的，并且与巴勒斯坦官方的如下行为完全相矛盾，即巴勒斯坦政府（至少是）仍然维持着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令人费解的卑躬屈膝态度。主动向美国官员们提供昂贵珠宝就最能说明这一点。目前，靠几杆步枪和石头武装起来的巴勒斯坦人正在勇敢地抵抗以色列军队，而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领导层却还在充当一个恳求者，努力与美国和以色列重开谈判。同样，阿拉伯政府，甚至还包括其知识界也是如此。他们一面断然声称对以色列和美国怀有敌意，但事实上却要么跟他们在政治、经济上进行合作，要么大声谴责正常化（normalization）。可悲的是，这种矛盾普遍被认为并非矛盾，而是当今生活的一个必要成分。我本可以想到，更明智的做法，不是去彻头彻尾地谴责以色列，而是与这个国家中支持公民权及人权的那部分人合作，与那些反对定居政策的人合作，与那些准备对军事占领表明立场的人合作，与那些信奉共存与平等原则的人合作，与那些厌恶对巴勒斯坦民族实行官方镇压的人合作。鉴于所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在军事力量上的巨大悬殊，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有望改变以色列的政策。我还可以想到，更为正直的做法是与最近从大马士革发起的反犹

太人的粗鄙攻击之类行为划清界限：那些做法除了向世界展示宗派主义思想和邪恶的愚蠢心态之外，还有什么？

我完全了解，对以色列镇压巴勒斯坦民族所产生的情感宣泄是真实的，而且各国人民都厌恶沙龙政府的政策。但是，那些情绪足以作为完全放弃理性的藉口吗，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就可以毫无条理地乱打一气，而不是通过严肃的方式来寻求一种基于知识而非盲目无知的严肃的政治与道德立场吗？这种无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描述为一种政治立场。或者，以最近出现的抵制将阿拉伯语书籍译成希伯来文的运动为例（见《生活报》，2001年5月10日）。人们本来会认为，在以色列能接触到的阿拉伯文学越多，以色列人就越会把我们理解为一个民族，并停止像对待动物或劣等人那样对待我们。相反，我们见到的是令人遗憾的景象：有些严肃的阿拉伯作家竟然公开指责他们的同事“听任”自己与以色列搞“正常化”，而这一习语被用于指控同事通敌。正如朱利安·班达首先指出的，知识分子应该反对集体热情，而不是煽动性地利用热情做交易，难道事实不是如此吗？一部希伯来文翻译怎么竟成了通敌的行为？一部书被译成某种外文永远是作家的胜利。永远如此，而且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与那些即使当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陆军和空军像杀死苍蝇一样杀害的时候还在与敌人保持贸易和外交关系的各国的胆小如鼠的“正常化”行为相比，这难道不是聪明、有益得多的事情吗？难道把阿拉伯文学翻译成希伯来文不正是从文化上进入以色列生活，在以色列国内产生积极作用，把人们的思想从血腥的激情转为对以色列的阿拉伯他者的理性认识吗？尤其是在以色列出版家将出版译著当做对于以色列野蛮的阿拉伯政策进行文化抗议的象征之时，更是如此。

我所描述的所有这些混乱与矛盾是阿拉伯的更深疾患的征候。当我们把幼稚的挑衅行为误认为是真正的抵抗时，当我们把一窍不通



的无知当做是政治行动（而事实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时，当我们放弃所有尊严并且大声呼唤美国庇护与关心时，我们的自尊心与自重感必已彻底破产。回想起阿拉法特 1993 年在白宫草坪上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地重复他那三声谢谢，有谁没有因此而吓得畏缩不前？有谁没有感到当我们的领导人在不能决定美国究竟是我们的敌人还是唯一希望的时候缺乏自尊心？我们没有坚持基于正派的行为准则与行为规范的政策，而是沉溺在以愚蠢鲁莽的反以色列教条为基础的徒劳无益的挑衅行动之中，同时，却只向被围困的巴勒斯坦同胞提供口头上的帮助和爱国的套话。没有现成的范例可以帮助我们引导自己的行动。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是平庸和机会主义的胜利，但鉴于领导层在几乎每条战线上的失败，知识分子应该担当的角色就是要提供诚实的分析，指出什么是合理和正当的，而不是同那些用油腔滑调、从不间断的随声附和来装点王室、总统府和公司董事会的奉承者们一起拍手喝彩。

作为总结，我要以一个具体的例子对我的想法加以解释。我注意到，在所有关于正常化的喧嚣中令人吃惊地缺少一个内容，即居住在每个主要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的状况，他们在任何地方的状况——无一例外——都悲惨得令人无法接受。无论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世界的何处，那里都有规章制度禁止给他们完全的居民身份，禁止他们工作和旅行，要求他们每个月都要向警方登记注册，等等。不仅以色列在虐待巴勒斯坦人，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现在来看看阿拉伯的知识分子们是否展开一场持久的运动来反对巴勒斯坦难民遭受的这种地方性的不公待遇：你既不会看到也不会听到有这样一场运动。有什么藉口要设置这些可怕的难民营让那么多难民居住其中，甚至在加沙和西岸这样的地方也是如此？当地的秘密警察有什么权利屡次侵扰他们，令他们的生活总体上变得凄惨？为什么没有任何一场延长的媒体运动来结束这一骇人的事态？究其原因，是因为与生动有力

地表现阿拉伯世界里巴勒斯坦难民那令人无法接受的情况相比，抱怨正常化及希伯来文翻译要更加容易（或更无危险）。这些难民总是被告知：他们不能被“正常化”，是因为那将会实现以色列的计划。真是胡说八道！

我们必须回到基本价值与讨论的诚实上来。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困扰我们、同样也困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问题。这个事实说明半个多世纪以来军队无法完成的工作只能交给心灵和教育的力量来完成。以色列知识分子是否有辱使命，不由我们决定。我们关心的是阿拉伯世界里的言论与分析之鄙陋。为此，作为公民，我们必须担起责任，而且，首先要努力将我们自身从那些充塞于我们言语辞章之中的枯燥乏味的陈腔滥调和缺乏思考的公式套话之中解放出来。

《金字塔报》，2001年5月17—23日

《生活报》，2001年5月23日

## 12. 国家公敌

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恶行，大多数阿拉伯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已倾向于比平常更少地将批判矛头指向阿拉伯世界的总体局势。然而，毫不夸张地说，一旦我们开始放眼于阿拉伯世界的盛行之物，我们大部分人就会对我们似乎注定的平庸和急剧恶化的大局感到惊骇不已。谈到生活质量，我们在所有重要领域（或许烹饪是个例外）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我们已窘迫万分，不仅由于自身的无能与伪善（例如，面对武装暴动，阿拉伯国家几乎一无所为），而且还源于几乎无一例外地主宰着每个阿拉伯国家的糟糕透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文盲、贫穷、失业及生产力低下的趋势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蔓延。世界上其他国家似乎正朝着民主方向迈进，而阿拉伯世界却在背道而驰，甚至向着更大程度的专制、独裁与黑手党式的统治方向发展。结果，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该再继续对此保持沉默。可是人们却几乎不知从何处着手来改善这一状态，尽管诚实无蔽地对待我们已听任其发生的一切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少数几个例证比一连串的事实与数据更能雄辩地说明我的想法，顺便提一句，所有这些事实与数据都会支持我这里所说的论点。不久前，埃及裔美国知识分子，开罗美国大学（**American Uni-**

versity of Cairo) 的社会学教授，开罗的伊本·卡尔敦中心 (Ibn Khaldun Center) 主任萨阿德丁·易卜拉欣 (Saadedin Ibrahim)，被一个国家安全法庭判处七年徒刑和强制苦役。这一判决是在他被立即逮捕、单独监禁两个月，又接受为期数月的关于违反财政法规、玷污埃及形象、扰乱选举程序、煽动忏悔情绪或宗派情绪以及通敌告密等多项指控的审讯之后做出的。当然，这些仅仅是主要的指控，但似乎令人惊异的是，法庭在听证数月之后，仅用几小时就提交了判决。

这起案件引起人们极大关注，其原因很明显。一位著名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被弄得身败名裂，而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中心地位和规模几乎保证会有大量的评论报道，尤其是在自由的西方国家会有大量针对这个体制的否定判断，因为该体制似乎正由于一个人的独立见解而对这个人进行迫害，尽管他的见解并不总是家喻户晓。为数不多的为他辩护的阿拉伯人，都以几乎腔调一致的说辞开场，即觉得他的观点及方法是令人不快的：他以赞成同以色列正常化而闻名于世，他似乎凭借其企业活动而财运兴隆，他的思想在外部世界总体上比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得更为成功。然而，每个人都该清楚，他被当成了一个示众的范例；他因此受到不公正对待，尽管总体上讲他具有颇为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成功途径。

我想必属于从远距离关注这起案件、但早在大约 30 年前就认识易卜拉欣的寥寥几人之一，而且从此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或收到他的来信。在过去 20 年里我曾几度出访埃及和美国大学，但我们彼此的行踪步履从未相逢。我不记得读过他写的任何文章，但我的确知道他对公民社会的关注，知道他与埃及、约旦和其他地方的权力精英之间保持诚挚友好的关系，以及他对选举及少数民族的兴趣。所有这些，我都是通过二手或三手资料获得的，因此，对他的思想我没有

任何发言权。我也不认为它们真的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相关性。我假定他有一些思想，并且还假设他像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引起的敌意与获得的支持同样多。那不能证明什么，在我看来也完全正常。

然而，似乎无可争议地属于不正常的是，由于他的名望以及他对几项国家政策的批评，这个国家系统性地对他进行了惩罚。这件事的教训似乎在于，如果你鲁莽地说得太多，而且如果你得罪了权势，你就会被除之而后快。这个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受紧急状态法的制约。这样的制约无一例外都应予以反对和谴责。除非遇到绝对的自然灾害，否则没有理由单方面中止法治以及对于公平正义的保护。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即使罪大恶极的犯人也无权得到公正对待以及与其罪相称的判决。例如，在美国，许多对易卜拉欣案件的评论员都没有指出，说到不公正判决（通常是损害非白种人的判决）、死刑及世界上人均比例最大且最具惩罚性的可怕的监狱体系诸方面，美国（它是不受紧急法令制约的）是违规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换言之，必须从一个将所谓文明国家包括在内的角度来看待埃及的做法。这些文明国家的许多新闻记者都谴责对易卜拉欣的处理，却没有同时承认他的案例无论在中东还是在西方国家都不是独一无二的。数千名伊斯兰武装人员受到更糟的待遇，自由世界的记者们对此的抗议却微乎其微。这些自由主义记者们（如托马斯·弗里德曼）热情地捍卫易卜拉欣，而对于自己国家那些不顾法律、践踏人权的做法，以及那些在阿拉伯世界里比萨阿德丁·易卜拉欣更加默默无闻的、深受国家不公正之戕害的人们的命运，却不置一词。

要点当然在于，无论被起诉和虐待的是谁，正义就是正义，不公就是不公。在易卜拉欣案件中，对于正当法律程序的歪曲之所以是一种罪行，并不是因为他既富有又著名，而是因为无论受害人是谁，这都是严重的犯罪。而此案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我们设

想在阿拉伯世界里任何公民而不只是一位著名的学者都可能遭受强权歪曲的时候，此案便道出了我们当前的许多痼疾和畸形的优越意识。这起案件告诉我们，我们的统治者认为无人可以幸免于他们的盛怒淫威，同时，公民应该对权威维持永久的恐惧感与屈服感，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权威皆然。当这个国家的角色从民有民享转变成某个政权或某个统治者的财产，并投其所好地加以利用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作为独立自主的人民，我们已被击败，而且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恶化的阶段，要想修复或者逆转，则为时已晚。

如果这样无视法律与公正的事件是在全体人民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相对默许的情况下发生，那么宪法与选举程序就都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我指的不仅是我们尚未拥有民主，而且是在内心深处似已拒绝民主这个概念。八年前我就明显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我在伦敦做过一个演讲，在演讲中我批评了阿拉伯政府践踏人类自由，随后一位阿拉伯大使传唤我，要我为自己的评论道歉。当我甚至拒绝跟那个人说话时，一位朋友从中斡旋，安排我与这位被冒犯的大使在我朋友家一起用茶。当时发生的一切深含启迪性。当我重申自己的观点时，那位大使大发雷霆（他恰巧也是执政党的一员），并用非常肯定的口吻对我说道，在他和他的政权看来，民主跟艾滋病、色情以及骚乱没什么区别。“我们不需要它。”他几乎歇斯底里地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于是我理解到，独裁主义在我们中间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任何对它的挑战都会被视为近乎恶魔般的、因而无法接受的行为。难怪有这么多人因为走投无路和缺乏希望，已求助于某种极端形式的宗教。当阿拉伯国家刚刚独立时，由于似乎存在真正的安全忧患，民主权利首次被废除，那时候无人意识到“紧急状况”会持续半个世纪，而且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会出于个人自由的考虑将其废止。

恰恰相反，当安全状态已变得更不安全的时候，镇压就会升级。毕竟，在我们这个地区，有哪种状态能真正为公民提供他们有权获得的安全和自由，使他们免于恐惧、满足需求呢？没有任何人获得安全，没有任何人无忧无虑，没有任何价值受到法律保护。

个体地位已经降到如此低下的程度，以至于连个人公民权，个人不受国家威胁而生存的权利，几乎都不复存在。我接下来要描述的是作为一种恶化局势的第二个例子，即关于黎巴嫩新闻记者拉格海达·德尔加姆（Raghida Dergham）的事例。她是一位颇有能力的女性，多年担任《生活报》驻纽约记者。作为一名在美国享有绝佳声誉的出色记者和评论员，她多年来为她的职业和祖国赢得了荣誉。现在，她却被自己的祖国指控犯有叛国罪，因为她参加了华盛顿的一个公众集会，并与乌里·卢布拉尼（Uri Lubrani）进行了辩论。乌里·卢布拉尼是以色列摩萨德组织的一名间谍，是黎巴嫩南部占领政权的监督员（而且或许是头目）之一。（在此之前他曾负责以色列与伊朗国王之间的接洽。）德尔加姆的护照已被吊销，而且如果她回到祖国，将会被立即逮捕。[另外一名黎巴嫩新闻记者萨米·卡西尔（Sami Kassir）的公民身份被取消，因为他写的某些文章似乎已激怒当局。]

德尔加姆事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反常事件，它提醒人们“正常化”的“罪行”这类概念可以偏离本义走多远——这个概念，一旦被滥用，或者被用于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冷漠无情态度那里转移开来，或者被用来攻击其他阿拉伯人或者鼓励无知，那么它就变成了愚不可及的概念，正如我上篇文章所述。首先，德尔加姆和卢布拉尼的辩论是在美国公开进行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且它只不过是一场辩论而已，绝不是一场谈判。指望一个发挥正常作用的公民服从那些甚至禁止提及以色列名字的法规，这至

少是愚蠢无知的。此外，据我所知，每个阿拉伯政府都与以色列存在着或秘密或公开的交往。全世界人，尤其是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受害者，都知道以色列的存在，知道它的军队、代理人、警察及社会存在：假装它不存在到底有什么用？但是把德尔加姆的所作所为称为叛国罪，与其说是表示叛国这个概念已经被扩展到超出情理与正常行为的地步，不如说它表明这个政府是带着多么极端的敌意在对待自己的公民，尤其是那些凭借才能与良心来恪尽职守的公民。此外，在除我们之外的大多数国家里，公开辩论是让世人了解阿拉伯观点的方式之一。怎么能反对公开辩论呢？

但是，对于阿拉伯各国政府来说，似乎很可悲的是，一个开明的观点成了他们认为必须反对的观点，尤其是假如这个观点得罪了统治者的话。一个人可以理解甚至接受国家与公民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但目前的形势却成了如此深刻的对抗，在这种状态下个体公民可能会受到政府与统治者发出的近乎斩尽杀绝的威胁，以至于国家的各种利益之间的整体平衡已经完全失去意义。犯罪已不再是受一个公认的、形成法律条文公布的包括取证、审讯、惩罚及上诉在内的司法程序控制的客观行为；它已完全成为这个国家随心所欲地定义与惩罚的特权。

处于争论之中的是自由思想与自由表达的权利，其背后更为根本的是摆脱施加在个人自由之上的荒唐限制的权利。我所引述的两个事例都是针对众所周知的名人，他们拥有社会资源和关系，可以引起人们对其不公待遇的关注。然而在今天的阿拉伯社会，还存在着一个整体的、大多数是隐藏着的可能的受害者人群，而且，有可能并且已经对他们采取了类似的手段，或针对个人，或针对集体。对他们来说，像同性恋、无神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及原教旨主义这样的名词在大多数时候已在毫无顾忌、不加区别地滥用，



目的就是让那些批评统治集团的人们要么缄口不语要么被抓进监狱。呜呼，阿拉伯监狱里的严刑拷打已经像以色列监狱里一样，成了家常便饭。

我们大部分人生活在对这种命运的恐惧之中，这就是许多知识分子保持沉默或者庆幸萨阿德丁·易卜拉欣和拉格海达·德尔加姆的遭遇没有降临他们自身的原因。毫无疑问，这两个人是被单独挑出来的，用对他们的羞辱与惩罚来杀一儆百。然而，愚不可及的是，其他知识分子也希望，如果他们循规蹈矩，加入到谴责的合唱中来，处处小心翼翼，只说“正确”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遭遇类似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糟，是政府直接实施的审查制度，还是我们每个人为了过上不被伤害、不会在半夜被抓进监狱或者彻底消失的生活而小心翼翼进行的自我审查。前几天我遇见了一位刚从本国逃出来的伊拉克库尔德青年。他告诉我说，如果有人想要加害于你，他们可以向警方告发你，说你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很可能你和你的家人旋即消失无踪。今天，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多少国家是真实发生的，其中又有多少是阿拉伯国家？我实在羞于启齿。

当阿拉伯世界进入更无条理与令人蒙羞的状态时，需要依靠我们每个人站出来大声反对这些严重的权力滥用。没有人是安全的，除非每个公民都来抗议这样一种其实是向中世纪独裁统治倒退的行为。如果我们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那么我们必须愿意将完全相同的行为标准用于本国。这一标准对于美国、阿拉伯和以色列的知识分子来说都同样正确。他们必须站在普适性的角度批评践踏人权，而不是当践踏人权行为发生在官方指定的敌人身上时才加以批评。当我们采取能用于所有情形的普适立场，而无须调用“虽然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这样的说辞来减轻直言不讳的困难与责任的时候，我们的事业才会得以巩固壮大。事实上，作为阿拉伯人，我

们现在剩下的唯有直言不讳的力量，而除非我们行使这个权利，否则就无法停止走向最终的堕落。已经时不我待……

《金字塔报》，2001年6月21—27日

《生活报》，2001年6月28日

## 13. 磨利刀斧

由于阿里埃勒·沙龙已经完成往返美国之行，不祥的气氛正在笼罩中东。这与以色列 1982 年入侵黎巴嫩之前那段时期的情形惊人相似。任何一个记忆久远到足以回想起当时发生的一切的人，都会意识到这种相似。同样是沙龙这个战争罪犯（他应该很快得到与米洛舍维奇在海牙相同的命运），当年拜见了时任国务卿的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然后回来通知每个人，说美国为他开了绿灯。随后，他的军队便长驱入侵黎巴嫩。毋庸置疑的是，这次他与经验不足的科林·鲍威尔以及智力低下的乔治·W. 布什在一起干了同样的勾当。那两个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盘接受了以色列关于主要问题是“暴力”的谎言，这一谎言自动假定暴力就是巴勒斯坦人的行为，而克制则是以色列的贡献。因此，沙龙现在不得不做的，就是入侵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地区，然后声称这是为了维护以色列安全而采取的有节制的、得到美国同意的行动。也许科林·鲍威尔对巴勒斯坦的访问以及他提出的派国际观察员监督停战的提议会使问题变得稍微复杂化，但沙龙却一心只想着入侵并摧毁巴勒斯坦民族。

时至今日，情况变得一目了然，所有以色列政府官员说的无一例外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上星期，巴勒斯坦外交部长纳比勒·沙

特（Nabil Shaath）与以色列议会议长亚伯拉罕·伯格在美国进行的一场电视大辩论证实了这一可悲的事实，同时也再一次证实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其发言人似乎都不能理解正在发生之事。伯格坐在那里厚颜无耻地编造一个又一个谎言——他说，作为一位民主党人和热爱和平之人，他担心没有真正的巴勒斯坦和平营地；以色列正在尽一切努力保持冷静，而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受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鼓励）却甚至用野蛮的杀戮来威胁他的女儿；以色列一贯渴望和平；阿拉法特控制着全局；沙特和他（伯格）是完全相同的，除了一点不同，那就是他，伯格，能够影响有所节制的沙龙，而沙特却不能影响阿拉法特；以及诸如此类。所有这一切都采用经典的宣传方式（即谎言重复多遍就成了真理）来表明一个观点：以色列是巴勒斯坦人的受害者，它渴望和平，它正在等候着巴勒斯坦人跟上他们宽厚与克制的步伐。

对于这些花言巧语，沙特似乎无言以对，只是哀怨地说巴勒斯坦人也渴望和平，他们渴望实现米契尔计划（Mitchell plan）[仿佛这份由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制造的垃圾已变成圣经似的：亚西尔·阿比德·拉布（Yasir Abed Rabbo）、沙特、赛义卜·埃雷卡特（Saeb Ereka）以及巴勒斯坦的其他领导人难道都已忘记参议员乔治·米契尔与沃伦·拉德曼（Warren Rudman）是以色列高额聘用的游说团成员吗？他们几乎占据报告起草委员会人数的一半。]我很少见过巴勒斯坦人如此战战兢兢、低声下气地承认以色列如此集中的谎言，而这一切是在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正遭受最严重的集体惩罚时进行的。

当沙特这些人得到一个与伯格这样的罪犯打交道的宝贵机会时，他们一刻也不应让他忘记以色列正沉溺于可怕的战争犯罪，成百万人不能旅行、不能进食、得不到医疗护理，500人被杀害，2000幢

房屋被毁坏，50000 棵树木被连根拔起，数千英亩土地被没收，定居还在继续，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和平进程”期间发生的。就连加桑·哈提卜（Ghassan Khatib）这样一位通常极为出色且值得信赖的发言人也感染了谈论暴力和米契尔报告的病毒，完全没有提及占领、占领、占领、占领。难道我们这些令人敬畏的发言人就不能侧重于我们民族每天每日的现实以及遭受的苦难吗？难道他们就不能像人一样说一次话，而不是像三流演员那样模仿似乎已成为其榜样角色的亨利·基辛格和伊扎克·拉宾吗？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竟然不能具体谈论关于我们生存的核心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在每一个层面上，53 年来，我们一直被以色列压迫着，并将继续被以色列用封锁、围困、空中轰炸、导弹袭击以及直升机进攻所压迫，而且我们的难民没有得到一分钱赔偿，就连从至今一直在驱逐、惩罚他们的国家遣返回国的希望都没有。

令我不解的是，甚至在历时八年的欺骗与背叛之后，巴勒斯坦的官方思维也无法说出奥斯陆究竟是何种灾难，并且还想重回奥斯陆谈判。那就好像是在问刽子手，是否不介意在再次砍下去之前把刀斧磨得锋利一点。当然，无论在玩什么政治游戏，都不能置身局外，而且，他必须能够直接回应关于协议、停战等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我发现了如此令人沮丧的迹象，即我们的发言人如此远离巴勒斯坦百姓生活中每日遭受的恐怖，甚至到了根本不提此事的地步。

我想对他们说，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谈论什么问题，无论提问的是哪家报纸、电视台或电台的记者，每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必须从 1967 年以来历时 34 年的军事占领的一些基本点出发。这就是暴力的源头，这就是主要问题的源头，这就是以色列无法得到真正和平的原因。我们的整个政治立场必须基于结束这一占领，并且必须优先于其他任何事情考虑这一点。例如，当有人向埃雷卡特、沙特、哈南·

阿什里（Hanan Ashrawi）或卡迪布问及有关米契尔报告或鲍威尔的访问时，回答应该永远这样开头：“只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军事占领存在，就永远不可能存在和平。通过坦克、士兵、检查站及定居点这些方式进行的占领就是暴力，它比巴勒斯坦人通过抵抗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严重。”要像这样说才对。

这些值得尊敬的人必须记住，全世界的报纸读者或电视新闻观众（包括阿拉伯人）当中有 99% 已经完全忘记——如果他们曾经知道的话——以色列是非法的占领力量，并且已长达 34 年之久。因此我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提醒世界。重复、重复再重复。这不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尽管我相信它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再三向每个人提醒以色列的占领乃是必要的重复，要比愚蠢地使用不合逻辑和感情用事的以一美风格来谈论和平与暴力要强得多。我们能够学会吗？抑或我们注定要永远重复自己的错误？

《金字塔报》，2001 年 7 月 19—25 日

《生活报》，2001 年 7 月 6 日

## 14. 戴维营的代价

2000年7月，比尔·克林顿在戴维营的总统寓所召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层会议，以便最终签署他认为已经一切就绪的和平协议。我强调克林顿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因为这个巴勒斯坦人民曾一直寄厚望于其身的人，这个在拉马拉和加沙地区得到英雄般礼遇的人，这个在每一场合都受到尊崇的人，其特点就是，匆匆忙忙地将敌对双方凑到一处，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将他们纠缠在一起长达数十年之久，仅仅是为了出于私心地自夸他缔造了一项历史性的成就。

亚西尔·阿拉法特并不想去。埃胡德·巴拉克前往的主要目的是迫使巴勒斯坦人做出结束冲突的承诺，更重要的是，巴勒斯坦民族要做出保证，一旦奥斯陆进程达成协议，巴方放弃所有不利于以色列的权利（包括难民重返的权利）要求。克林顿始终是个机会主义者，其次是个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者，再次是个笨拙的政客。巴勒斯坦人是最软弱的一方；他们受到拙劣的领导，并且准备得极不充分。克林顿推测，因为他（和巴拉克）的任期即将结束，他可以在巴勒斯坦有条件投降的基础上促成一个和平仪式，一个将他的总统生涯一劳永逸地神圣化的仪式，并能以此抹掉人们对莫妮卡·莱温斯基与正在扩展的赦免马克·里奇（**Marc Rich**）丑闻的记忆。

当然，这个伟大计划彻底失败了。就连美国的一些消息来源最近也公开支持巴勒斯坦的观点，认为巴拉克的“慷慨馈赠”既不是馈赠也不慷慨。克林顿政府的一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马利（Robert Malley）曾发表过一份情况报告，该报告虽然批评了巴勒斯坦方在戴维营峰会期间的策略，但也表明，以色列根本无意提供巴勒斯坦的合法的民族渴望所要求的東西。但是，2001年7月，在戴维营峰会结束整整一年，并且以色列加足油的宣传机器发动之后，马里径直道出了当今异口同声的标准合唱，即认为阿拉法特胡闹般地拒绝了以色列提出的可以想象的最佳提议。这种众口一词是由克林顿一再重复的论断煽动起来的，那就是：尽管巴拉克很勇敢，阿拉法特却只令人失望。这一论点就此进入公众话语，给巴勒斯坦带来巨大损害。以色列的一名情报探子得出的一个观察结果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戴维营与塔巴会议之后，巴勒斯坦无人持之以恒地传播巴勒斯坦方面对于这场“溃败”的看法。这样一来，以色列就抢占了整个地盘，造成事实上无法估量的压榨和反扑。

我很清楚，以色列去年秋冬时节将自身描述成热爱和平但却遭到拒绝的国家，结果相应造成了对于巴方暴动的损害。我打电话给阿拉法特的随从人员，催促他们说服领袖相信以色列在怎样利用巴勒斯坦的沉默，这种沉默等于迅速在言辞上确立了关于巴勒斯坦暴力的印象。我得到的回话说，阿拉法特一意孤行，拒绝向本国人民、以色列或世界发言，无疑是指望命运或他本人缄默不语的神奇力量将会对以色列的假信息战役产生影响。无论如何，我的敦促完全不起作用。阿拉法特与他的众多马屁精们依旧是无能低效、缺乏领悟力，并且自然大体上都保持沉默。

首先，我们必须自责。无论是我们的领导层，还是知识分子，似乎都没有领会到，即使是一场勇敢的反殖民起义也不能光靠起义行



动本身来解释自身，同时，以色列可以将我们（和其他阿拉伯人）眼中的抵抗权利变得貌似最无道义的恐怖活动或暴力行为。与此同时，以色列已经说服世界，忘却它对于巴勒斯坦的暴力占领和恐怖主义的集体惩罚——更不用说它无休止的种族净化。

的确，我们由于听任阿拉法特这个无能之辈在暴力问题上随心所欲地往返来回，使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现有的每一份人权声明都赋予一个民族对军事占领、破坏家园与财产以及征用土地定居等行为进行抵抗的权利。阿拉法特和他的顾问们似乎尚未理解，当他们盲目地加入到以色列关于暴力与恐怖的——口头上的——单边逻辑论证之中时，他们就已根本放弃了抵抗的权利。由于没有表明任何放弃抵抗的决定都必须伴有以色列的撤退及/或对于占领的同样放弃，巴勒斯坦人民被他们的领导层弄得动辄被指控为恐怖和暴力。以色列人所做的每件事都成了复仇，而巴勒斯坦人所做的每件事不是暴力就是恐怖，或者（通常）两者皆是。结果，像沙龙这样的战争罪犯却公开指责巴勒斯坦人“暴力”，这样的场面十足令人厌恶。

巴勒斯坦方面的无能导致了另一结果，它放过了以色列的所谓和平积极分子，把这些随军流动的可悲群体变成了沙龙领导下的不幸的以色列政府的无声同盟者。一些勇敢的、有原则的以色列人，如有些新史学家（New Historian）——杰夫·哈尔波、米歇尔·瓦斯查夫斯基（Michel Warschavsky）及其团体——属于例外。我们不知已有多少次听到官方“和平分子”们慷慨陈词、大谈对于巴勒斯坦的“忘恩负义”与“暴力”感到“失望”？多么罕见有人会告诉他们，他们的作用是迫使其政府结束占领，而非（如他们的一贯表现那样）给一个被占领民族大讲他们的宽宏大量与落空的希望？难道只有1944年的最反动的法国人才会容忍德国关于“通情达理”地对待占领法国之举的请求吗？不，当然不是。然而我们容忍了以色列那些

虚张声势的“和平”拥护者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吹巴拉克是多么的“慷慨大度”，却没有提醒他们，从1948年至今，他们每一位领袖都是以杀害和压迫阿拉伯人而成名的。戴维·本—古里安是“大灾难（Nakbah）”的元凶；列维·埃什科尔要对1967的征服负责；梅纳赫姆·贝京要对戴尔·亚辛（Deir Yassin）与黎巴嫩的惨案负责；伊扎克·拉宾要对镇压第一次暴动负责，而在此之前，他要到1948年六万名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被赶出拉姆勒（Ramleh）及利达（Lydda）负责；佩雷斯要对喀纳（Qana）的毁灭负责；巴拉克则亲自参与了暗杀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行动；沙龙领导了凯比亚的大屠杀，而且对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大屠杀负有责任。以色列和平阵营的真正任务是做它从未认真做过的事，那就是承认所有这一切，并且阻止以色列陆军与空军对一个被驱逐的、没有国家的民族进一步实施暴行，而不是随随便便、满不在乎地对巴勒斯坦人提个建议，或者向这个被以色列压迫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表达希望和失望。

但是，巴勒斯坦领导层一旦放弃了它的原则，并且假装它是一个能够玩国家间游戏的强国，它就招致了一个弱国的命运降临其身，既没有主权，也没有巩固强化其姿态和策略的力量。阿拉法特先生如此迷醉于他所谓的总统身份，从巴黎到伦敦，又到北京，再到开罗，进行一个又一个漫无目的的国事访问，以致已经忘记：那些弱小的、没有国家的民族永远不能放弃的武器，便是他们的原则和人民。要占领并且不断守卫道德制高点；要继续一刻不停地说出真相，并且提醒世人记住完整的历史画面；要坚守抵抗和要求偿还的合法权利；要动员各地民众，而不要与雅克·希拉克与托尼·布莱尔这样的人一起公开亮相；既不靠媒体也不靠以色列人，而是靠自己来说出实情。上述这些都被巴勒斯坦领导人最初在奥斯陆、后来

在戴维营忘得一干二净。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何时才能为终究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担负起责任，而不再依赖那些已经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的领导人？

《金字塔报》，2001年7月19—25日

《生活报》，2001年7月23日

## 15. 占领即暴行

在美国这样一个设有以色列的主要政治根据地并且自 1967 年以来给以色列提供了 920 多亿美元资助的国家里，星期四耶路撒冷餐馆爆炸与星期日的海法灾难所付出的惨痛的人类代价，很快就被纳入一个为人熟知的阐释框架。阿拉法特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控制他的恐怖分子；自杀式伊斯兰极端分子会在任何地方出现，而他们纯粹是受到仇视人类的情绪驱使，来伤害“我们”以及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以色列必须捍卫自身安全。一个考虑周全的人可能还会添上几句：无论如何，这些人已经不知疲倦地战斗了数千年；必须停止暴力；双方已经遭受太多的痛苦，虽然巴勒斯坦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打仗的方式从另一方面表明以色列必须强行忍受的程度有多深。于是，以色列虽然被激怒但仍然克制着，用推土机和坦克侵入没有设防、没有抵抗能力的杰宁，摧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警察局大楼和其他一些设施，然后，派出宣传人员说它已经给亚西尔·阿拉法特发出信息，要他制止其恐怖分子。而此时，阿拉法特与他的同伙正在请求美国保护，他无疑忘记了以色列才是美国想要保护的對象，而他将第 6000 次得到的全部保护，不过是一个“停止暴力”的命令。

事实上，在美国，以色列已经非常成功地赢得了宣传战争。美国打算再为它投入数百万美元开展一个公关战役〔起用像祖宾·梅

塔（Zubin Mehta）、伊扎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和阿摩司·奥兹（Amos Oz）这样一些明星]来进一步改善它的形象。但试想一下，以色列对毫无防御能力、基本上手无寸铁、没有国家而只有拙劣领袖的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残酷的战争，它已经得到了什么。双方力量悬殊之大，会令你伤心落泪。拥有美国制造（并且免费提供）的最新式的空中战斗力量、武装直升机、不计其数的坦克和导弹，以及一支精良的海军和一个顶尖级的情报部门，以色列作为一个核大国，正在蹂躏一个没有任何装甲武器或大炮的民族，一个既没有空军（它在加沙地区的一个仅有的可怜机场已被以色列控制）也没有海军或陆军的民族，一个没有任何现代国家机构的民族。以色列在非法侵略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持续 34 年的军事占领（在近代史上历时之久排名第二）这一骇人历史，已从几乎各地的公众记忆中抹去，同样被抹去的，还有以色列 1948 年对巴勒斯坦社会的破坏以及对 68% 当地人口的驱逐，这些人中有 450 万至今仍是难民。在大量官方宣传背后，事实的整个轮廓隐约可见：以色列我行我素，几十年来日复一日地压迫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的主要罪过仅仅是他们碰巧生长在那里，并且这种压迫纯属非人道的虐待狂行为。以色列异常残忍地限制 130 万人的活动，使他们像沙丁鱼一样拥挤在加沙狭地，再加上西岸地区挤着近 200 万的巴勒斯坦居民，这样的禁锢在种族隔离或殖民主义历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F-16 式战斗机从来没有被用来轰炸南非国土，但它们却被用来轰炸巴勒斯坦的城镇村庄。领土的所有出入口岸都被以色列控制（加沙完全被带铁丝网的围栏包围），以色列还控制了整个供水系统。巴勒斯坦人被分成大约 63 个互不相连的行政区，完全受到以色列军队封锁包围，中间用 140 个定居点隔断分开（许多定居点是在埃胡德·巴拉克总理任职期间内建造的）。这些定居点拥有“非犹太人（指阿拉伯人）”禁止通行的道路网，他们还

被冠以难听的绰号，如小偷、蛇、蟑螂和蚂蚱等。在上述情况下，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的失业率现已高达 60%，贫困率已达 50%（加沙及西岸有一半人口每天靠不足两美元生活）；他们不能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必须忍受在以色列的检查站前排着长队久等之苦，而这些检查站长达数小时地扣留和羞辱老人、病人、学生及神职人员；他们的 15 万棵橄榄树和柑橘树被惩罚性地连根拔起，他们的 2000 所房屋被摧毁，还有数英亩的土地要么被毁坏，要么被没收为军事用地。

自去年 9 月底的阿克萨暴动至今，已有 609 名巴勒斯坦人被杀（超过以色列死亡人数的 4 倍），15000 人受伤，超过对方受伤人数的 12 倍。以色列军队的定期暗杀活动随意铲除所谓的恐怖分子，多数情况下是在像杀死苍蝇一样地滥杀无辜。上周，14 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用武装直升机和导弹公开谋杀；这样做据说是为了“防止”他们杀害以色列人，尽管至少有两个孩子和五名无辜者也被谋杀，更不必说还有许多受伤平民以及一些被毁坏的建筑，这些则被当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接受的附带损害。以色列每天杀死的巴勒斯坦人无名无姓、无相无貌、在美国新闻节目上不足挂齿，即便如此——基于我完全无法理解的原因——阿拉法特仍希望美国人会伸出援手，搭救他和他那即将崩溃的政权。

这绝非全部。以色列的计划不只是为了占有土地并在这些土地上住满可怕、凶残的武装定居者——这些定居者受到军队保护，对巴勒斯坦的果园、学童及住宅带来巨大浩劫；它的计划正如美国研究员莎拉·罗伊（Sara Roy）所说，是要使巴勒斯坦社会退化衰败，使他们因无法生活而离开此地，或以某种方式放弃生活，或做出像炸死自己这样的疯狂举动。自 1967 年以来，领袖们被以色列占领政权监禁和驱逐，小生意和农场由于被没收和彻底败坏而无法维持，学生不

让学习，大学遭到关闭。（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岸的那些巴勒斯坦大学被关闭了四年）。巴勒斯坦农民或买卖生意不能直接输出到任何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产品必须经由以色列。税收要付给以色列。即使在1993年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始之后，占领也只是被重新包装一番，只有18%的土地还给了亚西尔·阿拉法特那腐败的傀儡政府，而他的权限似乎仅仅是替以色列维持治安并向本国人民课税。在历时八年毫无结果而令人痛苦的奥斯陆谈判之后，在由马丁·英地克及丹尼斯·罗斯这样一些前以色列游说团成员组成的美国小组的策划下，以色列仍然掌控全局，占领得到更为有效的包装，“和平进程”这个短语被披上了神圣的光环，它允许更多的蹂躏、更多的定居点、更多的监禁和巴勒斯坦人更多的苦难继续延续，愈演愈烈。包括一个“犹太化”了的东耶路撒冷在内，伴随着“东方馆（Orient House）”被占领，其中的收藏被掠夺、运走（以色列将价值连城的档案、土地契约及地图洗劫一空，这种行径是它1982年从贝鲁特偷走巴解组织档案的故技重演），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土地上迁入了不下40万的定居者。若将他们称做义务治安联防队员兼强盗，一点也不过分。

值得回顾的是，阿里埃勒·沙龙率领巴拉克总理提供的1000名士兵和警卫，于2000年9月28日无缘无故且傲慢无礼地造访耶路撒冷的哈兰·阿夏利（至尊圣地），几星期后，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谴责以色列的这次行动。随后，连小孩都能预见，一场反殖民主义的起义爆发，八名被杀的巴勒斯坦人成为其中第一批受害人。沙龙旋即上台，其主要目的是“征服”巴勒斯坦人，给他们教训，将他们铲除。他杀害阿拉伯人的记录可以追溯到 he 率领的部队负责实施的1982年萨布拉和沙提拉大屠杀之前三十年，为此，他目前已受到比利时法院起诉。尽管如此，为了保住正在被沙龙系统地瓦解、破

坏、夷为平地的权力机构，阿拉法特还打算与之谈判，指望或许可与他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

但沙龙也不是傻瓜。随着巴勒斯坦每个抵抗行为的出现，他的武力压制也逐渐升级：进一步加紧围攻；占领更多土地；对巴勒斯坦的杰宁和拉马拉等城镇进行更频繁、更深入地入侵；切断更多供给；公开行刺巴勒斯坦领导人；使生活变得更加无法忍受。而且，他还重新界定了政府行为的措辞，即：在“捍卫”自己的同时它已做出“慷慨让步”；它“阻止”了恐怖主义；它“保护”了地区安全；它“重建”了管理体系等等。同时，他和他的宠臣们还攻击阿拉法特，使之显得毫无人性，甚至说他是“头号恐怖分子”（尽管事实上没有以色列的许可他根本就动弹不得），而“我们”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并没有发生战争。这对那个民族是多大的恩惠啊！有了这样的“限制”，为什么还要大规模地入侵，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散播要更加残忍恐怖地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消息？以色列知道，它可以随意重新占领他们的建筑物[发生在东耶路撒冷的“东方馆”、当地以及阿布迪斯（Abu Dis）的其他九幢大楼、办公室、图书馆和档案室的大量盗窃就是见证]，就像它几乎已消灭巴勒斯坦民族一样。

这就是以色列数月来凭借处心积虑的谨慎、带着邪恶动机来伪装“牺牲”的真实写照。语言已与现实脱节。不要怜悯那些无能的、笨拙的、可悲的阿拉伯政府，他们既不能也不愿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以色列；应该怜悯的是那些百姓，他们忍受着自身肉体 and 孩童们孱弱身体的伤痛，其中一些人认为以身殉难才是唯一出路。而陷入一场没有未来的战役中的以色列，则会残酷凶蛮地乱打一气？正如爱尔兰诗人、批评家詹姆斯·卡曾斯（James Cousins）于1925年所说，殖民者受制于“错误、自私的先入之见，对本民族才智天赋的自然进化视而不见，在为错误立场刻意进行人为辩护的过程中，将自身从



光明正大的道路上拖进充满欺骗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曲折歧途。”所有殖民者都走进了这条歧途，毫不吸取教训，一意孤行，直到最后，如同以色列从占领了 22 年的黎巴嫩逃走时一样，退出这块领土，留下一个筋疲力尽的瘫痪民族。如果这被当做是在实现犹太人的抱负，那么，为什么首先要让与犹太人的放逐和迫害毫无关系的另一个民族中如此众多的人成为新的受害者？

只要阿拉法特这伙人还在领导，就不会有任何希望。此人在干些什么——荒唐地出访梵蒂冈、拉各斯及其他诸多地方，毫无尊严、甚至毫无头脑地恳求想象中的观察员、阿拉伯援助以及国际支持，而不是与他的人民守候在一起，努力向他们提供医疗用品、鼓舞士气的措施和真正的领导？他必须下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立场坚定、高度统一的领导层，一个切实进行抵抗的领导层，一个与人民站在一起并且属于人民的领导层——而不是这些脑满肠肥、嚼着雪茄，一心只想保住他们的生意往来、更新他们的贵宾通行证，却丧失了所有的体面与诚信的官僚们。一个精诚团结的领导层各行其责，制订大量的行动计划，其目的不是要返回奥斯陆（你能相信那些愚蠢想法吗？），而是加强抵抗与解放，不再用谈判以及愚蠢的米契尔计划来迷惑大众。

阿拉法特已无可救药。我们为什么不承认如下事实呢？那就是他既不能领导也不能谋划，除了对于从本民族的苦难中获取物质利益的他本人及其奥斯陆伙伴之外，他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他是我们民族未来的主要障碍。所有民意调查都显示，他的存在阻挡着所有可能向前推进的运动。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领导层来决策，而不只是匍匐在教皇和低能的乔治·W. 布什面前，甚至正值以色列人不受惩罚地杀害他的英勇的人民之时也是如此。一位领袖必须领导抵抗，求真务实，对民众所需、所谋与所想做出回应，并且与每个人共同承受艰

难险阻。摆脱以色列占领的解放斗争就是眼前每个巴勒斯坦人都值得为之付出一切的斗争：绝不能像阿拉法特这伙人所期望的那样恢复或者重新包装奥斯陆谈判。对他们来说，一切已经结束。他们越早卷起铺盖离开，对每个人就越有好处。

《金字塔报》，2001年8月16—22日

《生活报》，2001年8月20日

## 16. 宣传与战争

媒体从未像在阿克萨暴动期间那样对决定战争进程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对于西方传媒来说，这次暴动实质上已经变成一场形象与观念之战。以色列已将数亿美金投入到被希伯来语称为“hasbara”或者被外部世界称做信息（因此，亦即宣传）的这一领域。其中包括全方面的努力：给颇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提供午餐和路费；为犹太大学生举办研讨会，让他们在幽僻的乡村别墅消停一星期，这些学生就能被调教得足以在校园里“捍卫”以色列；用邀请和访问来“轰炸”国会的男女议员；为选举活动提供宣传手册，最重要的是，提供金钱；引导（或者，如果情势需要，骚扰）报道当前暴动的摄影师和作家，让他们创作出某些特定形象而非其他；为以色列名流举办巡回演讲和音乐会；培训评论员频繁提及纳粹屠犹暴行和以色列目前的困境；在报纸上刊登许多攻击阿拉伯国家和称赞以色列的广告；以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由于媒体与出版界有太多权威人士是以色列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个任务变得轻而易举。

虽然这些不过是自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每个现代政府，不管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为了追求其目标——即得到新闻消费者的认同和赞许——而采取的策略，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和游说团像以色列那样如此有效、如此长久地在美国使用这些策略。

· 奥威尔把这种信息造假称为新语（newspeak）或双重思维（doublethink），即企图用表面上的正当性及理由来掩盖犯罪行为、尤其是非正义的杀戮行为。对以色列来说，它在掠夺巴勒斯坦土地的同时一直企图让巴勒斯坦人保持沉默或不被人注意，这实际上是在压制真相或大部分真相，同时也是在大规模地歪曲历史。过去几个月以来，以色列成功地企图向世人证明的是：它是巴勒斯坦暴力与恐怖的无辜受害者；阿拉伯和穆斯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除了出于对犹太人的不可化解的、丧失理智的仇恨之外，没有别的理由。只有这个原因。而使这场运动如此有效的原因，是西方人长期以来对反犹太主义怀有一种负罪感。有什么能比把这种内疚转嫁到另外一个民族，即阿拉伯人身上更为有效？这样做不仅让他们觉得正当合理，而且感到由于对一个饱受中伤与摧残的民族做了些善事而十分宽慰。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卫以色列——即使它军事占领了巴勒斯坦领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以 4 : 1 或 5 : 1 的比率杀死或杀伤巴勒斯坦人——是这一宣传的目标。有着上述表现，且继续我行我素、毫无收敛，尽管它一如既往地显得像个受害者。

然而，毫无疑问，这一无与伦比的、不道德的努力之所以取得惊人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要归因于对这场运动的精心策划与具体实施，还要归因于阿拉伯一方形同虚设的存在。我们的史学家只要回顾一下以色列建国最初 50 年的历史就会发现，阿拉伯领导们要为此承担巨大的历史责任，他们罪不可赦——不错，的确罪不可赦——地听任这种事态继续下去，甚至没有做出一星半点不经意的回应。相反，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争斗，或依赖于无可救药的利己谋私的理论，即通过努力讨好美国政府（甚至成为美国的客户）来确保自己长期执政，哪管这是否符合阿拉伯人的利益。这个念头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连巴勒斯坦领导人对此也颇为认同。结果，当暴动发生

时，美国百姓丝毫也没有意识到巴勒斯坦人遭受苦难和被驱逐的历史至少同以色列一样漫长。与此同时，阿拉伯领导人跑到华盛顿乞求美国保护，甚至根本不了解美国已有三代人在以色列的宣传中长大，相信阿拉伯人是正在撒谎的恐怖分子，连跟阿拉伯人做生意都是错误的，更不用说保护他们了。

自 1948 年以来，阿拉伯领导人从未费心劳神去对抗以色列在美国的宣传。阿拉伯投入到军费开支（先是购买苏联武器，然后是西方武器）的大量资金全都“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阿拉伯的努力既未得到信息宣传的庇护，也从未被耐心、系统地组织语言进行解释。结果，数十万阿拉伯人活生生的性命损失变得无谓，一钱不值。这个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公民已经受到引导，相信阿拉伯人之所为、之所是无一不体现出破坏性的、暴力的、狂热的和反犹太主义的特征。以色列是“我们的”唯一盟友。因此，自 1967 年以来，美国纳税人毫不迟疑地拿出 920 亿美元来援助这个犹太国家。如上所述，由于面对美国的政治与文化竞技场毫无计划、不做思考，很大程度上（但不是唯一地）导致了 1948 年以来数量惊人的土地和生命被（美国资助下的）以色列剥夺，这是一项严重的政治犯罪，我希望阿拉伯的领袖们有一天会对此负责。

我记得，在 1982 年贝鲁特被围攻期间，由非常成功的巴勒斯坦商人和著名知识分子组成的一大群在野人士云集伦敦，为在多个领域里帮助巴勒斯坦人举行募捐。由于巴解组织被困于贝鲁特，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人们感到这类动员可能有利于我们自我救助。我还记得，随着基金很快被筹集起来，经过多次讨论做出决定，至少一半资金将用于在西方的信息宣传；大家认为，既然——像往常一样——巴勒斯坦正在被以色列压迫而西方竟然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来支持受害人，那么，这些钱就务必应该用在广告、媒体播出时段、巡回宣传以及

类似方面，这样以色列就很难在没有引起抱怨或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杀害和变本加厉地压迫巴勒斯坦人了。我们感到，在美国，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那里，纳税人的钱正被用于资助以色列进行违法战争、建立定居点和征服他国。上述方针执行了大约两年之久，随后，出于我完全无法理解的原因，在美国境内帮助巴勒斯坦人的努力突然终止了。当我问其缘由，一位在海湾发了横财的巴勒斯坦绅士告诉我说，在美国“扔钱”是一种浪费。慈善活动至今仅限于在被占领土和黎巴嫩开展，在那里，这一协会做了不少好事，但却无法同欧盟以及美国许多基金会的赞助项目相提并论。

几星期前，美国—阿拉伯反种族歧视委员会（ADC）——这是目前在美国最大且最有影响的阿拉伯裔美国人组织——就目前美国人对巴以冲突的看法组织了一次公开民意调查。调查对象的取样范围相当广泛深入，其结果虽说不上令人沮丧，却也令人相当吃惊。尽管没有一位以色列领导人在民意调查中受到好评，以色列人仍然被认为是一个正在开创民主的民族。73%的美国人赞成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想法，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结果。统计数据分析表明，当一位常看电视并阅读精英报刊的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被问及他/她是否认同巴勒斯坦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时，答案大多数是肯定的。但是同一个人，如果被问及对巴勒斯坦人的看法时，答案几乎总是否定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巴勒斯坦人的形象似乎就是：他们顽固不化、寻衅好斗，而且是“异端”，也就是说，不像“我们”。甚至当问及投石的年轻人时——我们认为他们是与歌利亚作战的大卫——大多数美国人从中看到的却是侵犯攻击而非英雄主义。美国人仍然指责巴勒斯坦人阻碍和平进程，尤其是阻碍戴维营协议。自杀性爆炸被看做是“野蛮的”，并受到普遍谴责。

美国人对以色列人的看法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将其视做一

个民族时，则有更大的认同。最令人不安的是，被询问的美国人几乎无一了解巴勒斯坦的经历，既不了解 1948 年发生的事件，也不了解以色列长达 34 年的非法军事占领。支配美国人思想的主要叙述模式，似乎依旧是莱昂·乌里斯（Leon Uris）1950 年出版的小说《出埃及记》（*Exodus*）。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民意调查中最为负面的是美国人对阿拉法特本人的看法与评价，包括他的戎装（大可不必显示“战斗姿态”）、讲话以及他的存在。

那么，总的说来，结论便是：人们既不是根据巴勒斯坦人自身的经历，也不是根据人们很容易认同的人类形象来看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宣传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巴勒斯坦人似乎真的缺乏正面内涵，即使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他们几乎完全被剥夺了人性。

以色列在美国长达 50 年的畅通无阻的宣传已将我们推到这样的地步，由于我们未曾采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未曾通过我们自己提供的形象与信息对这些可怕的歪曲宣传进行抵制或对抗，我们此刻正在失去数千人的生命及数英亩的土地却没有任何人感到良心不安。今天（2001 年 8 月 27 日），《独立报》记者菲尔·里夫斯慷慨激昂地写道，巴勒斯坦人即将灭亡或被以色列征服，而全世界却在袖手旁观，沉默不语。

因此，要靠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来打破沉默，要用理性的、有组织的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不是靠开枪、悲泣或抱怨。我们天经地义有理由做上述一切，但现在需要头脑冷静、有条不紊。在美国人心中，不会将目前的状况跟南非解放斗争，或者最为有力地，跟美国土著居民的可怕命运进行类比。我们首先必须通过使自身人性化来促成这样的类比，从而扭转查尔斯·克劳萨默及乔治·威尔（George Will）之流的美国专栏作家推动的无所顾忌的丑恶进程：他们胆大妄为地呼吁对巴勒斯坦民族进行更多的杀戮与轰

炸，这是他们不敢对任何其他民族提出的建议。为什么我们就该消极地接受苍蝇蚊虫般的命运？难道只要沙龙这个随时受到美国支持的战犯决定再消灭我们几个，我们就会被任意宰杀？

我很高兴地从 ADC 主席齐亚德·阿萨利（Ziad Asali）那里得知，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的组织正着手在大众传媒中展开一场空前的公共信息运动来匡正补救，以促平衡，同时，将巴勒斯坦人作为人类呈现给大家——你难道不觉得这种需求颇具讽刺意味吗？——作为教师、医生和母亲的女性，作为在田间劳动或担任原子工程师的男性，作为遭受年复一年的军事占领却仍在抵抗的人民。（顺便提一下，民意调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便是，首先，问卷中只有不到 3% 或 4% 的人知道曾经有过以色列的占领。所以，就连巴勒斯坦生存的主要事实也已遭到以色列宣传掩盖。）在美国，以前从来不曾做过这样的努力：沉默已持续 50 年，现在它即将被打破。

ADC 宣布将要开展的运动虽然有限，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妨考虑一下，阿拉伯世界似乎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均处于麻痹状态，它的领袖们既受制于同以色列的联系，而更主要的是，还受制于同美国的联系，而他们的人民正处于焦虑压抑状态。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正在死去，就像当初他们自身及其勇敢的黎巴嫩伙伴在 1982 年的遭遇一样，那时有 19000 人被以色列军事力量杀害。这一切不仅因为以色列有不受惩罚地动武的力量，而且还因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们在西方的宣传与军事力量之间的积极联盟，在现代以来史无前例地让它得以用美国每年流向以色列的 50 亿美元税金，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持久不衰的集体惩罚。巴勒斯坦人被媒体呈现为既无历史又无人性，只是充满暴力、具有攻击性的投石砸人的民族，这使得虽然智力低下但在政治上却很精明的乔治·W. 布什可以指责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这个新的 ADC 运动着眼于让历史和人性回归巴勒斯坦人，表明



他们（一如既往地）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正在为获得自由生存的权利、抚养孩子的权利、安享天年后死去的权利而战斗。我希望，一旦这样的叙述哪怕只有些微渗透到美国人的意识之中，真理就将开始驱散以色列藉以掩盖真相的邪恶宣传的阴霾。既然媒体运动显而易见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希望就在于，阿拉伯裔美国人浑身充满力量地参与美国的政治斗争，努力打破、修正或者损耗这个将以色列与美国政策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纽带。于是我们便可以再燃希望。

《金字塔报》，2001年8月30日—9月5日

《生活报》，2001年9月9日

## **第二部分 “9·11”事件、恐怖战争、 西岸及加沙的再次入侵**



## 17. 群情激愤

袭击纽约（以及程度稍轻地袭击华盛顿）这一举世瞩目的恐怖事件已开辟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由那些无从见到或无从得知的攻击者、没有政治使命的恐怖任务以及愚蠢麻木的毁灭行为构成。对于这个受伤城市的居民来说，恐慌、畏惧以及挥之不去的愤怒与震惊一定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正如这一屠杀事件残酷地施加在许多人身上的巨大悲痛一样。纽约人已经十分幸运，因为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这位平时令人生厌、使人不快的好战者，这个甚至曾以恶毒的犹太复国主义观点闻名于世的倒行逆施者，已经迅速成为丘吉尔式的人物。他沉着冷静、情绪克制又极富同情心，指挥这个城市的警察、消防和应急系统，达到令人敬佩的效果。当然，令人遗憾的是，牺牲人数仍然庞大。朱利安尼是第一个警告要防止恐慌、防止对这个城市数量巨大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社群强行袭击的人，是第一个表达出痛苦的人之常情的人，是第一个激励每一市民在沉重打击之后努力重新开始生活的人。

但愿只有上述反应。国家电视报道自然已经毫不间断、坚持不懈但并不总是富有教益地把对于那些长翅膀的可怕运输工具的恐怖带进每个家庭。大多数评论都强调、但的确夸大了意料之中的多数美国人的感受：可怕的损失、恼怒、愤慨之情，被击中软肋的无助

感，复仇的渴望以及无限严惩凶手的冲动。所有主要电视频道都只是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所发生之事、恐怖分子是谁（虽然到目前为止毫无证据，但这并未阻止一小时接一小时的重复而形成的指控）、美国是怎样遭受袭击的，等等。除了表示悲痛与爱国的套话之外，每位政客及公认的饱学之士或专家都忠实地一再复述着我们将如何不会被击败、不会被吓倒、也不会止步不前，直到恐怖主义彻底灭亡。每个人都说这是一场反恐战争，但是在哪里进行，在什么战线作战，要达到什么具体目标？无人提供答案，只有一个含糊的主张，即中东与伊斯兰教是“我们”要对抗的，恐怖主义必须被摧毁。

然而，最令人沮丧的是，人们无暇去了解美国在全世界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它如何直接卷入东西海岸线之间的美国本土范围之外的复杂现实。长期以来，这两条海岸线使得美国以外的世界显得相当疏远、未能进入美国普通百姓的意识。你或许会认为“美国”是个沉睡的巨人，而不是一个在整片伊斯兰领土上几乎一刻不停地交战或者卷入某种冲突的超级大国。对于美国人来说，奥萨玛·本·拉登的名字和面孔已经变得令人麻木地习以为常，这样便可在他和他那些模糊不清的追随者们变成集体想象中可憎可厌的固定符号之前，有效地抹去他们可能具有的任何历史痕迹（例如，20年前他们曾是美国招募的、用来对抗驻阿富汗的苏联军队的得力圣战者）。于是，群体激情正不可避免地被导向求战冲动，酷似艾哈伯船长追捕白鲸莫比·迪克的冲动，而非导向正在发生的事实本身，即：一个头一回在自己家里受到伤害的强权帝国，置身于一个突然被重新部署了的、既无明确边界又无可见对手的冲突较量的地理格局之中，系统地追逐其利益。摩尼教的象征与末世天启般的脚本被到处散布，完全不顾给未来造成的后果和修辞上的限定。

当前需要的是对形势的理性认识，而非进一步的摇旗呐喊。乔

治·W. 布什与他的班子显然想要后者而不是前者。然而，对大多数穆斯林及阿拉伯世界的人们来说，美国官方是傲慢强权的同义词，主要以此闻名：伪善地装模作样，不仅慷慨地支持以色列，而且还极力支持那些镇压人民的阿拉伯政权，甚至很少考虑同世俗运动以及真正抱冤受屈的人们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下的反美主义，并不像托马斯·弗里德曼之类专家名流一再重复的那样，是出于对现代性的仇视或在技术上的嫉妒；而是基于那些具体的干涉、特定的掠夺以及——就伊拉克人民在美国制裁下遭受的痛苦和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巴勒斯坦领土进行的长达 34 年的占领而言——冷漠无情地执行残酷和非人道政策的事实。

现在，以色列正无所顾忌地利用美国的灾难来强化对巴勒斯坦的军事占领和镇压。自“9·11”事件以来，以色列军队已经入侵了杰宁和杰里科，并且反复轰炸加沙、拉马拉、贝特萨哈（Beit Sahour）和贝特加拉，造成平民的极大伤亡和财产的巨大损失。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美国武器支持下、在反恐谎言伪装下做出的无耻勾当。美国境内的以色列支持者们已在歇斯底里地叫喊“我们现在全都是以色列人”，认为世贸中心及五角大楼的爆炸与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攻击之间具有“世界恐怖主义”意义上的绝对联系，其中，本·拉登与阿拉法特是可以互换的实体。本该是美国人对造成这一事件的可能原因进行反思的时候，而且许多巴勒斯坦人、穆斯林和阿拉伯人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谴责，结果却成了沙龙宣传活动的巨大胜利；巴勒斯坦人毫无准备地抵御以色列最丑陋、最暴力的占领以及对他们民族解放斗争的恶意诽谤。

美国的政治修辞却不顾这些情况，大肆散布“恐怖主义”和“自由”之类字眼，当然，这样宏大的抽象概念大多掩藏着肮脏的物质利益、石油效益和军事防卫功用，而犹太复国运动说团正

在巩固加强对于整个中东的控制。而且，对“伊斯兰教”存在已久的宗教敌视（和无知）每天都在层出不穷地进行花样翻新。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发表电视评论、进行报道、举办论坛，或宣称对伊斯兰教与暴力、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恐怖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论题进行研究，聘请一些意料之中的专家 [如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和斯蒂文·爱默生（Steven Emerson）之流]，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真理化身的姿态，抛出一些脱离背景或远离历史真相的泛论概说。为什么没有人考虑过举办以“基督教（或犹太教）与暴力”为题的研讨会，其原因大概已一目了然，毋庸发问。

重要的是应当记住（尽管根本未被提及），中国在石油消费上很快就会赶上美国，因此，对美国来说，更加牢固地控制波斯湾和里海的石油供应就变得愈为紧迫：攻打阿富汗，包括借助前苏联的各个中亚共和国作为跳板，为美国将从波斯湾到北方油田之间的地区连成一个任何人都将难以突破的弧形战略防线。随着对巴基斯坦压力的日益增加，我们可以断定“9·11”之后将会出现大量的局部动荡与不安。

然而，知识分子的职责要求他们对现实更具批判意识。当然，的确存在着恐怖，而且几乎每个现代斗争运动都会在某一阶段依赖于恐怖活动。曼德拉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便是如此，其他所有运动，包括犹太复国运动，也概莫能外。可是，用F-16战斗机和武装直升飞机轰炸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这种行为与更为传统的民族主义恐怖活动具有同样的结构和效果。所有的恐怖活动，一旦与持续不停地背离历史、背离理智的宗教抽象与政治抽象以及简化主义神话联系在一起，就变得尤其邪恶。在这样的地方，世俗意识必须迈步向前，并努力使自身进入人们的感知范围，无论是在美国还是

在中东皆不例外。没有任何目标、任何神灵、任何抽象观念可以证明对无辜者的大屠杀是正当的，尤其是当只有一小部分人负责这样的行动，并且未经选举、未经真正的授权就感到自己代表着这项事业的时候。

此外，穆斯林对伊斯兰也同样是众说纷纭，并不存在单一的伊斯兰：存在的是多个伊斯兰，就像有南北美洲的存在一样。所有的传统、宗教和民族都具有这种多样性，尽管它们的一些信徒们徒劳无益地企图划清其边界，纯粹其教条。但是，人类历史远比政治煽动家们所描述的更为复杂、更为矛盾，而这些政治煽动家远远不及他们的追随者或对手所宣称的那样具有代表性。宗教或道德上的原教旨主义者的麻烦之处在于，今天，他们关于革命和抵抗的原始思想，包括杀戮与被杀的愿望，似乎过于轻易地与技术上的熟练以及貌似带来快意的、可怕的、具有象征性的野蛮行为连接在一起了。[约瑟夫·康拉德凭借其惊人的预见性，在1907年便已刻画出恐怖分子的原型，即他的小说《间谍》(The Secret Agent)中那个被简称为“教授”的人：他一心只想改善一支雷管，使它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有效爆炸，最终他手工制成了一枚炸弹，由一个被派去摧毁格林威治天文台以抗议“纯科学”的不知情的贫穷少年引爆。]纽约与华盛顿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似乎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之人，而非一贫如洗的难民。由于在实现大业的过程中缺乏重视教育、广泛动员并耐心组织的明智领导，贫穷与绝望的人们常常被诱入歧途，被灌注神秘思想以及由这些骇人范例所提供的、用宗教谎言包裹着的充满血腥的解决办法。这在中东，尤其在巴勒斯坦，乃是普遍的事实，但在美国这个无疑最具宗教性的国家里也不例外。这也是世俗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主要失败：他们没有加倍努力地提供分析与范例来减轻本国广大民众的切实痛苦。他们的人民被全球主义战略和顽固的军国主义政策弄得



惨不忍睹、贫穷不堪，因此，除了求助于盲目的暴力和关于未来拯救的含糊承诺之外，别无出路。

另一方面，美国拥有的强大军事、经济力量并不能成为智慧或道德见识的保证，尤其是当顽固不化被视为美德、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被看做国家定数的时候。在目前的危机中，即正值“美国”已做好在本土以外某个地方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并且一些不明就里、不知方向的盟国也被迫协同参与的局势下，已经无法听到怀疑与人道的声音。我们需要从所谓将人们彼此隔绝开来、使之陷入假定的文明冲突的那道臆造的门槛撤回脚步，重新审视这些符号标签，重新考虑可以得到的有限资源，并做出某种决定来共同担当命运，正如事实上各种文明通常所做的那样，而不去理会那些好战者的叫嚣和信条。

“伊斯兰”与“西方”作为盲目跟从的旗帜是完全不够的。有些人当然会追随这些旗帜，但是对于后世而言，沦入延绵不绝的战争与苦难，从不稍事停顿、诉诸批判反思，从不考虑一下彼此互相依赖的非正义的、铁腕镇压的历史，从不谋求共同解放和共同启蒙，这与其说是必要的，不如说是恣意的。任何体面的政治都不能基于将他者妖魔化的行为，目前，当不公与不幸作为恐怖行为的根源并非不可应对的时候，当恐怖分子本身不难被孤立、威慑或铲除的时候，更是如此。它需要耐性和教育，但是，与更高程度的大规模暴力和苦难相比，它更值得为之投入。美国的决策者们向选民保证无人将会试图发起一场反对其激昂爱国心和好战倾向的运动，藉此颇具讽刺地榨取、利用选民的忧惧和焦虑，这种行为延误了人们的反省、理解、甚至常识判断，为此，未来迫在眉睫的将是大规模的破坏和苦难。然而，我们之中这些有可能接触到愿意聆听的民众的人士——而且至少在美国、欧洲和中东，这种愿意聆听者可谓大有人在——

必须尽可能理性地、耐心地担当此任。

《金字塔报》，2001年9月20—26日

《生活报》，2001年9月23日

《世界报增刊》(*Le monde Supplement*)，2001年9月27日

《观察家报》，2001年9月16日

## 18. 反弹与回撤

对于 700 万身为穆斯林（其中只有 200 万是阿拉伯人）并经历了“9·11”浩劫及其强烈反弹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个令人痛心、尤其是令人厌恶的时刻。不仅有一些无辜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暴行中伤亡，而且还存在着多种形式的触手可及的针对整个群体的仇视氛围。乔治·W. 布什似乎立刻就让美国人与上帝彼此结盟，向“那些人等”——按他的说法，即那些现在不管是死是活都要被通缉的人——那些犯下骇人罪行的人们宣战。这就意味着，无须任何人提醒，奥萨玛·本·拉登，这个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代表着伊斯兰世界的、难以捉摸的穆斯林狂热分子，已成中心人物。电视与电台几乎从不间断地播放这个模糊不定的极端分子（从前是个花花公子，据他们说）的档案照片和摘要报道，正如他们播放捕捉到的巴勒斯坦妇女与儿童“庆祝”美国悲剧的镜头和报道一样。

专家和主持人一刻不停地谈论“我们”对伊斯兰的战争，而一些诸如“圣战”和“恐怖”的词汇加重了似乎已遍及全国的、可以理解的恐惧和愤怒。已有两人（其中一人是印度锡克教徒）被激怒的市民所杀，这些人似乎受到诸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人的言论鼓舞，真的考虑要“灭掉某些国家”以及用核武器打击敌人。数百名穆斯林和阿拉伯的店主、学

生、戴着伊斯兰头巾的妇女及普通市民都受到掷面而来的辱骂，同时，铺天盖地的海报与墙上涂鸦宣布他们死期将至。美国主要阿拉伯人组织的一位领导人今晨告诉我，他平均每小时收到 10 条信息，对他进行侮辱、威胁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言语攻击。昨天公布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49% 的美国人认为（也有 49% 的人不认为）阿拉伯人，包括那些成为美国公民的阿拉伯人，应该持有特殊身份证明；58% 的人要求（41% 的人不要求）阿拉伯人，包括那些美籍阿拉伯人，应该普遍接受特别的、更精确的安全检查。

后来，当乔治·W. 布什发现他的盟友不太像他那样毫无节制时，当他的一些顾问——其中核心人物是显得更加明智的科林·鲍威尔——（无疑）认为入侵阿富汗不会像派遣预备役军人到得克萨斯州那样简单时，尤其是当混乱不堪的现实迫使他和他的幕僚放弃他们一直在替民众维持的摩尼教式的善恶对立的简单意象时，官方的主战趋势逐渐消退了。尽管警察和联邦调查局骚扰阿拉伯人及穆斯林的报道继续蜂拥而至，但还是出现了冲突降级的明显趋势。布什拜访了华盛顿的一个清真寺；他呼吁社群领袖和美国国会平息充满仇恨敌意的讲话；他开始试图至少在修辞上把“我们的”阿拉伯及穆斯林朋友（通常指约旦、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同那些仍未暴露的恐怖分子区分开来。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的演说中确实说过，美国并没有与伊斯兰世界交战，但遗憾的是，他只字不提整个国家汹涌澎湃地攻击穆斯林、阿拉伯人以及与中东人相貌相似之人的事件和言辞。虽然鲍威尔四处表示对以色列及沙龙的不满，认为他们在利用这场危机进一步压迫巴勒斯坦人，但人们的总体印象是，美国政策仍在沿着原有轨道运行——只不过当前似乎有一场大战正在酝酿。

然而，在公众领域里却罕有关于阿拉伯人及伊斯兰教的正面认识来回击与平衡那些遍布四周的极度负面的刻板形象，即：充满贪

欲、复仇心强、嗜好暴力、非理性的狂热分子。在这里还没有唤起对于作为一项事业的巴勒斯坦的想象，尤其是在德班会议（Durban conference）之后。即使是我所在的大学，这所凭借其知识多样性和师生异质而闻名于世的学校，也很少开设可兰经课程。菲利普·希梯的《阿拉伯史》（*History of the Arabs*）一书，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最出色的现代一卷本英文著作，却已经绝版。能够买到的大部分书籍都布满了争论和矛盾：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不过是借机开展争议辩驳的话题，不像其他领域一样成为一门文化和宗教的学科。电影、电视里充满了令人厌恶反感的、满脑子残忍念头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天哪，在袭击世贸中心及五角大楼的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并将其用于散发着犯罪病态而非宗教气息的大屠杀之前，阿拉伯人就已经在行动了。

出版界似乎有一个小型运动，不断强调“我们现在都是以色列人”，并散布偶尔发生的巴勒斯坦式的自杀性爆炸或多或少与世贸中心及五角大楼的袭击恰好相同的论调。当然，在此过程中，巴勒斯坦民族遭到驱逐与镇压的历史被从记忆中彻底抹去，同时被抹去的，还有许多巴勒斯坦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对自杀性爆炸的谴责。这样做的总体结果在于，任何试图将“9·11”恐怖袭击与美国的行动及言论联系起来的尝试，要么受到攻击，要么被当做某种姑息迁就恐怖主义炸弹袭击的行为而予以鄙弃。

从理性、道义和政治角度看，这样的态度是灾难性的，因为将理解等同于宽恕是极其错误的，而且也远离事实。令大多数美国人很难相信的是，在中东及阿拉伯世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种种行为——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对伊拉克进行制裁，结果却放过了萨达姆·侯赛因，而使数十万无辜的伊拉克人民遭受死亡、疾病与营养不良之害；轰炸苏丹；为以色列 1982 年入侵黎巴嫩大开美国“绿灯”（在此期间，除萨布拉及沙提拉大屠杀之外，还有将近两万平民

丧生)；将沙特阿拉伯与波斯湾当做美国私人领地予以广泛使用；支持那些镇压人民的阿拉伯及伊斯兰政权——深受痛恨，而且并非错误地被看成是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行事。美国普通百姓所了解的情况与它在国外实施的常常是既不公平又冷酷无情的政策之间——无论百姓对此是否知情——存在着巨大差距。美国对安理会谴责以色列定居、轰炸平民等行为的决议的每一次否决，可能会被诸如爱荷华或内布拉斯加州的居民当做是无关紧要而且或许是正确的事情而不予理睬。但是对于一位埃及、巴勒斯坦或黎巴嫩市民来说，此举将给他带来极大伤害，并且牢记不忘。

换句话说，美国的具体行动与随之而来的对美国的态度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其实与嫉妒或憎恨美国的繁荣、自由以及它在世界上全方位的成功并没有什么瓜葛。相反，曾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阿拉伯人或穆斯林都感到困惑：为什么像美国这样一个如此富有、如此令人仰慕的国家（以及如此可爱的一群群美国个人），在国际上却表现出对于弱小民族如此冷漠无情的忽视遗忘。当然，许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也意识到了亲以色列游说团和可怕的种族主义对美国政策的掌控，以及像《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和《评论》(*Commentary*)这样一些亲以刊物的激增，更不用说那些嗜血的专栏作家，如查尔斯·克劳萨默、威廉·萨菲尔、乔治·威尔、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A. M. 罗森塔尔等人，在专栏文章中经常表达对阿拉伯人及穆斯林的仇视与敌意。这些文章通常发表在人人都能读到的主流媒体上(如《华盛顿邮报》社论版)，而不是被埋在边缘刊物的末页里。

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狂躁情绪与深度恐慌，并且预示着会有更多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来主宰人们意识的时期，尤其是在纽约和华盛顿，那里“9·11”恐怖暴行在公众心中至今记忆犹新。我确实

在在地感觉到了它，我周围的每个人也深有同感。

然而，尽管媒体的普遍表现是骇人听闻的，但仍然令人鼓舞的是，慢慢出现了异议、对和平方案与行动的呼吁，以及虽是零星且规模有限、但正在逐渐扩大的敦促用其他措施来取代进一步轰炸与破坏的主张。在我看来，这种深思熟虑是很值得关注的。首先，人们表达了对于侵害公民自由与个人隐私的行为的广泛关注，因为政府要求并且似乎正在被授权窃听电话、以恐怖主义嫌疑逮捕和扣留中东人，普遍进入一种草木皆兵、疑神疑鬼和大肆动员的状态，其偏执狂特性堪与麦卡锡主义相提并论。美国人让国旗到处飘扬的习惯，自然似可看做爱国之举，但是爱国主义也能导致狭隘偏执、仇视罪以及各种可恶的集体激情，这取决于如何解读。众多评论家都警告过这一点，并且，如前所述，甚至总统也在演讲中表示“我们”不是在同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民族交战。但是危险依然存在，而且，我颇为高兴地说，它已由另一些评论家适时指出。

其次，已有许多关于军事行动的整个事项的呼吁和会议，而根据最近一次民意调查，92%的美国人似乎倾向于采取军事行动。然而，由于政府至今既未具体指明这一战争的目标（“根除恐怖主义”是抽象的而非现实的），也未确定其手段或计划，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将走向何方，还很不确定。但一般而言，战争修辞已经变得不那么具有末日启示式的和宗教式的性质——十字军圣战的想法已彻底消失——而更侧重于在“牺牲”以及“一场独一无二的持久战争”这类泛泛之论以外的必要方面。在大学、学院、教堂和集会场所，有大量关于这个国家该如何做出回应的辩论；我甚至听到无辜受害者家属公开表明他们不认为军事报复合适的回应。重要的是，大体而言，针对美国应该如何行事，已有不少反应。但是，我要遗憾地说，批判性地审视美国对中东及伊斯兰国家的政策的时刻尚未到来。

我希望这一天将会来临。

只要有更多的美国人及其他国家的人民能够领悟到，这个世界最主要的长远希望在于这样一个良知与理解的共同体，那么，无论是在保护宪法赋予的权利方面，还是在走近、接触美国霸权的无辜受害者（比如在伊拉克）方面，或是在依靠理解和理性分析来行事方面，“我们”都能远远超越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当然，这不会直接导致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改变，或是更为均衡的国防预算，或是更加明智的环境与能源方针：但是除了这样堂堂正正地迷途知返以外，哪里还有希望可言？也许这样的选民可以生长在美国，但是我作为巴勒斯坦人发表看法，必定也希望在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里同样出现这样的选民。我们必须开始考虑，我们自己对逐渐支配“我们的”社会的贫穷、无知、文盲及压迫等现象负有责任，也对那些我们容许其滋生的邪恶负有责任——尽管我们也在抱怨犹太复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比如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公开地、真诚地维护过“世俗”政治，并且像我们抨击以色列和西方对犹太教与基督教进行操纵那样，直率而真挚地谴责伊斯兰世界里对于宗教的挪用？我们有多少人曾谴责过所有自杀性行动计划的不道德与错误，尽管我们遭受过殖民定居者的蹂躏和非人道的集体惩罚？我们再也不能躲藏在背后，听任对我们的不公待遇，正如我们不能消极地悲叹美国支持不受我们欢迎的领袖。现在必须让人了解一个“世俗的”阿拉伯新政治，它从来不曾姑息或支持那些不择对象的杀戮者（丧失理智）的黩武行为。再也不能对此模棱两可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说，阿拉伯人今天的主要武器不是军事武器而是道德武器，而且，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压迫、争取民族自主权的斗争之所以没有像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那样唤起世界人民的想象，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似乎未能弄清自己的目标和实现途径，而且我



们也没有足够清楚地阐明：我们的目的是共存与包容，而不是排外主义以及回到田园牧歌般的、神话般的过去。时辰已到，我们必须坦陈直言，必须马上开始审视、回顾和反思，正如许多欧美人士正在进行的那样。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不应比对别人的期望更少。愿所有人都能从容不迫地了解一下我们的领导人会将我们带向何处，基于何种理由。怀疑精神与重新评估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

《金字塔报》，2001年9月27日—10月6日

《生活报》，2001年10月10日

《伦敦书评》，2001年10月4日

## 19. 在相似性中随波逐流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春季号上一经发表，就立刻引起了数量惊人的关注与反响。这篇文章旨在就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新阶段”为美国人提供一个原创性的理论，因此，亨廷顿的论证用语似乎极其夸张、大胆，甚至故弄玄虚。他非常明确地针对政治决策阶层的竞争对手们，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样的理论家及其“历史终结”论，以及那些颂扬全球主义、部落制度及国家消亡的大批论者。但他认为他们只理解了这个新时期的某些方面。而他则要宣布“未来数年里可能形成的全球政治”的“至关重要的、而且是最核心的方面”。他毫不犹豫地进而论述道：

“我的假设是，在这个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人类之间最大的区分及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上的。民族国家将继续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但是全球政治的首要冲突将在拥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及群体之间发生。文明的冲突将支配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22）

随后几页的大部分论证基于一个被亨廷顿称之为“文明身

份 (civilization identity)”的含糊概念，以及所谓“七个或八个（原文如此）主要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两者之间的冲突引起他的最大关注。他的这种好战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深东方主义者伯纳德·刘易斯 (Bernard Lewis) 1990 年发表的《穆斯林愤怒的根源》(The Roots of Muslim Rage) 一文，而刘易斯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此文标题中暴露无遗。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都是不计后果地加强对于被称做“西方”和“伊斯兰”的庞大实体的拟人化，仿佛像“身份 (identity)”和“文化 (culture)”这样极为复杂的事物存在于一个卡通般的世界里，其中大力水手波沛和海盗布鲁托打得不可开交，而且结果总是善良的一方战胜对手。当然，亨廷顿和刘易斯都无暇去考虑以下方面：每个文明的内在动力和多元性；大多数现代文化的主要竞争都涉及对各个文化的定义与诠释这一事实；以及一种不大引人注意的可能性，即大量的蛊惑人心和愚不可及的行为，都与擅自为整个宗教或文明代言有关。不，西方就是西方，伊斯兰就是伊斯兰。亨廷顿认为，西方决策者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确保西方文明日趋强大，足以抵御世界其他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的进攻。

亨廷顿的如下假定更令人不安，他以为自己是从一个完全超越于任何寻常喜好和内在忠诚之上的视角来纵览世界的，因而是唯一正确的观点，仿佛其他每个人还在匆匆忙忙地四处寻找他早已发现的答案。事实上，亨廷顿是个空想家，试图将“文明”和“身份”弄得面目全非，成为隔绝封闭的实体，完全脱离那些驱动人类历史的万股潮流与逆流，而正是这些潮流和逆流使得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不仅只有宗教战争与帝国征服，而且还有彼此交流、互利互惠以及分担共享。《文明的冲突?》一文因为急于强调被它视为现实的、遭到荒谬地压缩简化的战争，而忽视了远为隐秘的这部分历史。亨廷顿在

1996年出版同名著作时，尽量使他的论证显得更为细腻精妙，并增加了许多注释，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只会使他陷入混乱，同时也表明他是一个多么笨拙的作家和粗劣的思想家。西方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立的这一基本范式（即受到重新表述的冷战敌对模式）并未改变，并且这是自“9·11”恐怖事件以来的讨论中一直挥之不去（通常是秘而不宣）的论调。

由一小撮疯狂的好战分子精心策划的大屠杀与可怕的、动机极其病态的自杀性爆炸袭击，已被转化成亨廷顿理论的佐证。这一事件的本质是，一小群狂热分子基于犯罪目的而抓住一些宏大理念（在此我较为宽泛地使用这个词）；而一些著名的国际人物，从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到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却没有认清这一本质，都自命不凡地大谈伊斯兰教的麻烦，并且后者还用亨廷顿的观点来大肆宣扬西方的优越性，声称“我们”有莫扎特和米开朗琪罗而他们却没有。（随后他就因自己侮辱“伊斯兰”一事做过心不在焉的道歉。）

诚然其破坏性不可相提并论，但人们为何看不到奥萨玛·本·拉登及其追随者在宗教狂热方面与下列现象的平行相似关系呢？如：大卫教派（Davidians）的信徒或圭亚那（Guyana）的吉姆·琼斯（Jim Jones）神甫的信徒或是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就连向来稳健的英国周刊《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也忍不住在9月22—28日的一期上进行漫无边际的笼统概括，大肆吹捧亨廷顿对伊斯兰世界进行的“严酷无情、横扫一切却又一针见血”的评论。这份杂志以不相称的严肃口吻说：亨廷顿写道，“今天，全世界十亿左右的穆斯林对其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同时又对其力量上的劣势无法释怀。”他是否探访考察过100名印度尼西亚人、200名摩洛哥人、500名埃及人及50名波斯尼亚人？即使他这样做过，选取的又是什

么样本呢？

美国及欧洲的每家著名报纸与杂志的不计其数的社论中，都增添了大而无当和末日启示式的词汇，每次使用的目的显然不是要启迪读者，而是要激起读者作为“西方”一员的愤慨之情，并教导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丘吉尔式的修辞被那些自封的斗士滥用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与它的仇视者、劫掠者及破坏者之间的战争之中，却忽视了那些不可简化的复杂历史。这些历史在跨越将你我分隔为不同武装阵营的假想疆界的过程中，早已从一块领土渗透到另一块领土。

这就是“伊斯兰”与“西方”之类毫无教益的标签的问题之所在：它们误导和迷惑了正试图从混乱的、难以归类梳理的现实中理清头绪的心智。记得1992年我在约旦河西岸的一所大学做完演讲后，从听众席上站起一人，开始攻击我的思想是“西方的”思想，与他信奉的严格的伊斯兰教义相左。我打断他：“你为什么穿西服、打领带？”这是我首先想到的直截了当的反驳。“这些也是西方的。”他尴尬地一笑，坐下了。但是，当“9·11”恐怖袭击的消息传来时，当得知恐怖分子是如何掌握对世贸中心、五角大楼以及所劫持的飞机实施杀人犯罪所需的全部技术细节时，我又回想起这件事。在“西方”科技与贝卢斯科尼所宣称的“伊斯兰世界”无法融入“现代性”的情形之间，又怎能划清界限呢？

我们当然不能轻易做到，而这些标签、归纳和文化断言终究是颇有欠缺的。例如，在某个层面上，原始激情与精密技术交汇在一起，打破了许多受到人为强化的界限，不仅在“西方”和“伊斯兰”之间，还包括过去和现在之间、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限，更不用说像“身份”与“民族特性”这些实际上永远分歧不断、争论不休的概念。单边决定要在沙里划线、要发动圣战、要以己善对彼

恶、要根除恐怖主义，以及，用保罗·沃尔福威茨的虚无主义说法，要彻底消灭一些国家，所有这些行为都不会使人们更容易看清假定的存在；相反，它说明，发表以煽动群体激情为目的的好战言论，较之反思、审视并厘清我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无数生命之间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要简单得多。

1999年1月到3月期间，已故作家伊克巴·艾哈迈德在巴基斯坦最有声望的周刊《黎明报》(Dawn)上先后发表了三篇值得注意的系列文章。他以伊斯兰读者为对象，分析被他称之为宗教权利之根源的现象，严厉谴责了绝对论者和狂热暴君们对伊斯兰教的肢解毁损：这些人执迷于对个人行为进行限制，将“伊斯兰教律令降格为刑事法典，去除了其中的人道主义、美学、知性追求和精神奉献”等因素，而这“必然导致对宗教的某一方面的绝对肯定（通常是脱离背景的），而全然不顾另一方面。这种现象无论在哪里出现，都会歪曲宗教、贬低传统、扭曲政治进程”。关于这种贬低行为，艾哈迈德举了一个及时中肯的例子。他首先提出了“圣战”一词的丰富、复杂、多元的含义，然后又揭示出：这个词当前的含义仅限于不择对象地对假想敌发动的战争，在这种状态中，已无法“辨认……穆斯林代代亲历的伊斯兰宗教、社会、文化、历史或政治”。艾哈迈德总结道，现代伊斯兰分子“关心的是权力，而非灵魂；关心的是为了政治目的去动员民众，而非分担与缓解他们的痛苦与焦渴。他们的政治规划非常狭隘，毫无远见”。使得事态更糟的是，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话语世界也出现了类似的曲解和狂热。

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比19世纪末期的读者所能想象的更加有力地认识到，在极端状况下，开化文明之都伦敦与“黑暗之心(the heart of darkness)”的差异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而且，欧洲文明

盛世也无须准备或者过渡，就能在瞬息之间颠倒倾覆，产生最野蛮的行径。同样是康拉德，在小说《间谍》（1907）中描述了恐怖主义对“纯科学”（也可以扩展到“伊斯兰教”或“西方”）之类抽象概念的青睐，以及恐怖分子道德上的终极堕落。

在这些貌似敌对的文明之间，存在着我们多数人不愿相信的密切关系。就像弗洛伊德与尼采所揭示的，穿越那些精心维持甚至严密把守的边界的交往，仍在轻而易举地进行。但是由于这些灵活变通的思想充满着对我们固守之见的模棱两可与怀疑主义的态度，很少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提供现实可行的指导。于是，从亨廷顿的伊斯兰与西方两大文明对峙的理论中衍生出来的战争秩序（一场宗教之间、善恶之间、自由与恐惧等等之间的较量）总体上似乎显得更为可靠；而“9·11”恐怖袭击后最初几天的官方言论就是据此而来的。这种话语后来已明显减少，但是从仇恨言行的稳定数量，以及全国范围内针对阿拉伯人、穆斯林及印第安人的法律措施的相关报道来看，这种模式依然存在。

它之所以挥之不去，另一个原因是，穆斯林人数在欧洲和美国日渐增加。看看目前在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英国、美国甚至瑞典居住的穆斯林人口，你不得不承认，伊斯兰世界已经不再处于西方世界边缘，而是处于其中心。但是，伊斯兰教的存在有什么威胁性呢？深藏在西方集体文化中的，是关于阿拉伯—伊斯兰首次伟大征服的记忆。这场征服始于七世纪，并且，正如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Mohammed and Charlemagne*）（1939）中所描写的，这场征服一劳永逸地粉碎了地中海地区古老的统一，摧毁了基督教—罗马综合体，从而导致一个由北方强国（德国与卡洛林王朝的法国）统治的新文明的兴起。皮雷纳似乎在说，新文明的使命就是

要恢复“西方”对其历史—文化之敌的防御。可惜的是，皮雷纳忽略了一点，即在创建新防线的过程中，西方吸收了伊斯兰的人文、科学、哲学、社会学与历史编撰学，而这些伊斯兰文化早已深入到查理曼大帝的世界与古典世界之间。伊斯兰文明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西方世界的内部，就连穆罕默德的伟大敌人但丁，在将这位先知置于其地狱的中心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然后还有一神教自身的持久传统，刘易斯·马西尼翁（Louis Massignon）贴切地称之为亚伯拉罕教（Abrahamic religions）。从犹太教与基督教开始，两者都继承了更早的传统：对穆斯林而言，伊斯兰教实现并终结了所有先知预言传统。目前仍然没有适当的历史来记录或阐明众神之中嫉妒心最强之神的这三类信徒彼此之间多方面的纷争较量——它们中任何一个无论如何都不是铁板一块的统一阵营——尽管三者巴勒斯坦问题上发生的血淋淋的现代汇合提供了丰富的世俗例证来表明它们之间是什么东西悲剧性地不可调和。因而，毫不奇怪，穆斯林与基督徒欣然谈论各自的圣战，却常常带着庄严的漠然态度忽略犹太教的存在。如伊克巴·艾哈迈德所言，这样的行为事宜，“对于搁浅在传统与现代性的深水之间的……人们而言，是颇有安慰性的。”

然而，我们现在都在这样的水中浮游，西方人、穆斯林、所有其他人皆然。既然这些水域是历史汪洋的一部分，那么，企图将它们强行犁开或用障碍物隔开终将是徒劳的。虽然时局紧张，但是，从强势与弱势群体、理性与无知的世俗政治、正义与非正义的普遍原则等方面进行思考，远胜于漫无边际地寻找大而无当的抽象概念，后者或许可以带来瞬间满足，却无法提供自知或明智的分析。“文明冲突”论是个花招，就像《世界之战》（*The War of the Worlds*）一样，更适于用来增强那种防御性的自豪，而无助于批判性地理解我们时代



令人困惑的相互依存关系。

《金字塔报》，2001年10月11—17日

《生活报》，2001年10月12日

《国家》杂志 (*The Nation*)，2001年10月22日

## 20. 振奋精神的见识

随着美国代号为“持久自由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的高空打击的炸弹和导弹落在阿富汗领土之上，与总体上更为紧迫的中亚事件相比，谈论巴勒斯坦问题似乎显得有些偏离正题。但是，如果这样想就错了，这不仅因为奥萨玛·本·拉登与他的追随者（无人知道他们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究竟有多少人）已经企图将巴勒斯坦掌握在手中，作为他们肆无忌惮地开展的恐怖战役的一个具有修辞表达意味的组成部分，而且，以色列基于自身目的，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10月17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刺杀了内阁部长雷哈瓦姆·泽维（Rehavam Ze'evi），作为对以色列去年8月暗杀其领导人的报复，随之而来的是，沙龙将军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为以色列眼中的本·拉登而对巴方展开的持久战已升级到一个新的、半歇斯底里的程度。在过去的7个月里，以色列一直在暗杀巴勒斯坦领导人及武装人员（迄今已杀死了六十多人），毫不奇怪，这种非法手段迟早会导致巴勒斯坦以牙还牙的报复。但是，为什么有些杀人事件是可接受的，而其他的就不可以？这是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暴力仍然存在，以色列的占领变得更加致命、更具破坏力，给平民造成了巨大痛苦：10月18—21日期间，巴勒斯坦的六座城镇再次被以军占领；又有五名巴勒斯坦活跃分子被暗杀，此外，还有

21 位平民被杀，160 人受伤；到处都被强制宵禁，而且，以色列却厚颜无耻地把这一切跟美国打击阿富汗和恐怖主义的战争相提并论。

于是，一个被驱逐长达 53 年、被军事占领长达 34 年的民族的权利要求遭受的挫折以及由此带来的僵局，显然已超出斗争的主竞技场，并且被不由分说地以各种方式与全球反恐战争捆绑在一起。以色列及其拥护者们担心美国会出卖他们，始终反驳式地声明说以色列不是这场新战争的焦点问题。公众领域里施加于其身的联想，使得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及穆斯林普遍地感到不安或逐渐产生负罪感，尽管政治领袖们一直在努力划清伊斯兰及阿拉伯世界与本·拉登之间的界限：但是，他们，也同样一直把巴勒斯坦当做表达其不满的主要象征物。

在华盛顿当局，乔治·W. 布什与科林·鲍威尔不止一次明确表示，巴勒斯坦自主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问题。战争骚乱及其未知层面和复杂性（它在沙特阿拉伯及埃及这些地方所产生的后果可能会是戏剧性的，虽然至今尚不知晓）已经引人瞩目地搅动了整个中东，因此，对于真正积极改变 700 万没有国家的巴勒斯坦人状况的需求确实变得日趋重要，尽管关于目前的僵局显然存在着大量令人沮丧之事。主要问题在于，美国及各方是否准备仅只诉诸那些曾给我们带来灾难性的奥斯陆协议的权宜措施。

阿克萨武装暴动的直接经历，已将阿拉伯和穆斯林的无力与恼怒普及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西方媒体从未像半岛电视台卫星频道所作的每晚播放，或者像以色列记者阿米拉·哈斯以及同她一样的评论家在《国土报》上进行的令人钦佩的每日报道那样，向外传达以色列通过集体惩罚、破坏房屋、入侵巴勒斯坦地区、空中轰炸和血腥杀戮给巴勒斯坦民族造成极度痛苦和屈辱的信息。同时，我想，阿拉伯世界普遍认为，巴勒斯坦人（以及，再扩展一步，其他

阿拉伯人)已经被他们的领导层诋毁中伤并且无可救药地误导。一道深渊明显地将穿着整齐、在奢侈豪华的环境中发表声明的谈判人员与纳布卢斯、杰宁、希伯伦及其他地区的那些布满灰尘的地狱般的街道隔离开来。学校教育不足;失业率与贫困率已上升到令人担忧的高度;由于政府既无力也不愿阻止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最高领导层的臭名昭著的腐败继续升级到无以复加的顶点,因此,到处充满了焦虑与不安全的气氛。最重要的是,那些抗议践踏人权、反对神权专制,并试图代表现代民主的阿拉伯新秩序而发表言论、采取行动的勇敢的世俗论者,却在孤军奋战,无人问津。他们得不到官方文化的协助,他们的书籍与事业有时不过被抛出来用于哄慰、缓解日益高涨的伊斯兰愤怒。平庸和无能的巨大潮湿的阴霾笼罩在每个人的头顶,而这种状况反过来引发了魔幻思维,以及(或者)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对死亡的神秘崇拜。

我知道人们常常认为自杀式爆炸要么是由于挫折绝望,要么是出于丧心病狂的宗教极端分子的犯罪病理。但这些解释并不充分。纽约及华盛顿的自杀式恐怖分子都是中产阶级,绝非目不识丁之人,完全能够对于那些胆大妄为而又极其缜密的破坏行动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策划。那些被哈马斯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派出去的年轻人则抱定一个信念,按照指令行事,其信念表明,他们对于目的了然于心,尽管别的方面所知甚少。真正的罪犯是这样一个初级教育体系,它包括从可兰经上摘取的只鳞片爪的、被胡拼乱凑在一起内容,已使用50年之久的过时教科书上的死记硬背的练习,规模大得无望的班级,配备不佳的教师,以及近乎彻底丧失的批判性思维。这一陈旧的教育机构,连同过于庞大的阿拉伯军队——所有军队都负担着无法使用的军事硬件设施,却没有任何积极战果——已经导致在逻辑与道德推理方面的古怪失败,以及对人类生命的漠视,这些状况要么会造成最

为恶劣的宗教狂热的跃进，要么会引起对权力的奴性崇拜。

在见识眼光与逻辑推理方面的类似失败也发生在以色列一方。以色列是如何做到维持和防守其长达 34 年之久的占领，并使之显得在道德上既是可能的甚至又是正当合理的，这一点实在令人费解。但是就连以色列的“和平”知识分子也把目光集中于一点，即巴勒斯坦缺乏一个所谓的和平营，却忘记了一个被占领的民族不会具有像占领者那样的奢侈，能够确定是否存在一个对话者。在此过程中，军事占领被当做一个可以接受的给定事物而几乎未被提及；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成为暴力的原因而非结果，尽管一方拥有一个（由美国无条件提供的）现代化的武器库，而另一方却没有国家，其实也没有防御能力，随意遭受野蛮迫害，像畜群一样被驱赶到在 160 个小行政区内，学校关闭，生活无法维持。最糟糕的是，伴随着巴勒斯坦人的每日伤亡，以色列定居点仍在增加，40 万定居者正无休无止地点缀着巴勒斯坦的风景。

以色列非官方组织“立即和平”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表述如下：

1. 2001 年 6 月底，在定居点中有 6593 个住房单元正处于不同阶段的积极建设之中。

2. 在巴拉克执政期间，定居点开始兴建的住房单元有 6045 个。事实上，定居点建设在 2000 年达到了自 1992 年以来的最高峰，有 4499 个开始动工。

3. 签署奥斯陆协议时，定居点的住房单元有 32750 个。自奥斯陆协议签署以来，兴建的住房单元有 20371 个，表明定居点住房单元增加了 62%。

以色列的立场与这个犹太国家想要得到的东西——即和平与安全，尽管它所做的每件事都既不保证和平也不保证安全——实质上是完全势不两立的。

美国已经答应为以色列的顽固与野蛮行为付账：不会有第二种可能——920亿美元的援助与持续不断的政治支持，这一切全世界都有目共睹。颇为讽刺的是，这一点在奥斯陆和平进程期间，而不是之前或之后，表现得更为真实。这件事的真相显而易见：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的反美主义与美国的行为紧密相关，这种行为便是，一边满世界宣讲民主与正义，一边公开支持其对立面。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无疑也存在着对于美国的无知，而且过分倾向于长篇大论地发表修饰性的抨击，横扫一切地泛泛谴责，而不是对美国进行理智分析和批判性的理解。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态度也不例外。

在这件事情上，阿拉伯的政府与知识分子两者在一些重大方面都很失败。政府没有投入任何时间与物力来制定一个积极进取的文化政策，以充分表现阿拉伯及穆斯林的文化、传统以及当代社会，结果西方对这些一无所知，听任那种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描绘为嗜好暴力、性欲过剩的狂热分子的形象画面肆意流传。知识分子的失败绝不比政府的更小。一味重复那些暗示着既无法实现、又不心向神往的军事行动计划的有关战斗与抵抗的陈词滥调，这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对不公政策的抵制是在道德上的抵制，我们必须首先占领道德制高点，然后在以色列和美国促进人们对这一立场的理解，这是我们从来不曾做过的事。我们过去曾拒绝互动与论辩，只是轻蔑地称之为“正常化”和通敌。毫不妥协地提出我们的正当立场（这是我要提倡的），这不能被看做是向敌人让步，尤其是当它直接、有力地面对占领者，或者面对占领与报复等不公政策的制定者之时。我们为什么要怯于直接地、人道地、劝导性地面对我们的压迫者？我们为什么偏要不

停地相信暴力救赎这个含糊的意识形态承诺？它无异于本·拉登和那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嘴里喷出的毒液。我们需要的是：对军事占领与非法定居的有原则的抵制、有组织的和平抗议，以及促进共存、公民权与人类生命价值的教育计划。

但是，我们目前陷入到一个无法忍受的僵局，比以往更加强烈地要求真正回到 1991 年于马德里宣布的几乎被完全抛弃的和平基础上来，回到联合国安理会第 242 和第 338 号决议上来，回到用土地换和平的政策上来。如果不迫使以色列从被占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撤军，同时——正如米契尔报告中所断言的——拆除它的定居点，就不可能有和平。这件事显然可以在对毫无防御能力的巴勒斯坦人立即提供某种紧急保护的情况下，分阶段逐步完成，但是，必须首先纠正奥斯陆谈判铸成的大错：要明确表示结束占领，要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真正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通过相互承认来实现和平。要把这些目标作为谈判目的加以陈述，仿佛隧道尽头那盏闪亮的信号灯。巴勒斯坦的谈判人员必须坚定这一点，而不是把重新开始对话（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族进行无情战争的状况下，如果目前还有任何事情应该启动的话）作为返回奥斯陆谈判的借口。最后，尽管只有美国才能凭借欧洲、伊斯兰、阿拉伯及非洲的支持来恢复谈判，但是，谈判必须通过联合国来进行，它必须成为这项努力的主要承办者。

既然巴以之间的斗争已使人道精神变得枯竭，我建议，有关承认对方和担负责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表示（它或许可以在一位曼德拉式的人物或者一组无可挑剔地深受信赖的和平人士主持之下进行），应该在其进程中努力将正义与同情树立成关键要素。很不幸，事实上无论是阿拉法特还是沙龙恐怕都未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巴勒斯坦的政治景观必须彻底改造，使它能不折不扣地代表每个巴勒斯坦人的渴望——赢得富有尊严与正义的和平，更重要的是，与以色列犹

太人一道，堂堂正正、平平等等地彼此共存。我们需要摆脱一名领导人的有损尊严的欺骗伎俩，以及他那可耻的来回折腾，而这位领袖很久以来从未走近半步去体验长期受苦的人民做出的牺牲。对处于沙龙将军之流无可救药的领导之下的以色列人来说，也同样如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超越肮脏污秽的当前现实、振奋饱受蹂躏的精神的见识，某种一旦作为人民必须渴求的目标被毫不动摇地提出，就不会功败垂成的见识。

《金字塔报》，2001年10月25—31日

《生活报》，2001年11月10日



## 21. 自杀式的无知

目前，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的军事战役已经进入第二个月的中期，此间产生的异乎寻常的动荡，已经凝结成一些值得在此澄清的主题及相反的主题。我将会不予过多评论和限制地把它们列举出来，以此开始探讨在美国与巴勒斯坦之间漫长的、令人极不满意的关系史中现阶段的发展状况。

我们或许应由重申这一明显事实开始，即：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美国人（必须承认也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坚信“9·11”恐怖事件开创了世界历史的全新阶段。尽管众多美国人理智地认识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其他暴行和灾难，但仍有某种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东西存在于对世贸中心及五角大楼的袭击之中。因此，从那天起，似乎涌现出一个新的现实，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美国本身，侧重于它的悲伤、愤怒、精神压力以及对于它自身的观念。我甚至要说，今天，在美国公众领域里几乎最不可能被听取的意见便是：美国作为世界主角，其所作所为引起如此仇恨，是有历史原因的；这种意见被简单地理解为企图为本·拉登的存在及行动辩护，而本·拉登已经成了美国所憎恨与恐惧的一切事物的巨大的、不可动摇的象征：无论如何，这种言论暂时未被、也将不会被主流话语所容忍，尤其不会在主流媒体或政府言论中出现。人们的假设似乎便是，美国的盛德美誉

以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方式受到一种绝对邪恶的恐怖主义的伤害，任何企图淡化此事或解释其原因的想法都是不可容忍的，更不用说进行理智的考察了。这种局面正是本·拉登似乎一直在丧心病狂地期盼的世界景象——将世界分成他的势力范围和基督教及犹太人的势力范围——而这一点似乎显得无关紧要。

因此，作为结果，政府及媒体——媒体通常是不会脱离政府而独立行事的，尽管它提出了某些问题并发出了明确的批评，但主要涉及战争行为本身，而不涉及战争是否明智、是否有效——希望设计出的政治形象是美国的“整齐划一”。媒体和政府实实在在地虚构出一种感觉，即存在着某个集体的“我们”，而且“我们”都共同行动、共同感受，这种感觉可由一些或许并不重要的现象予以佐证，例如，飘扬国旗，以及记者描述美国在全世界参与的事件时都冠以集合名词“我们”。“我们轰炸”、“我们说”、“我们决定”、“我们行动”、“我们感到”、“我们相信”，等等，等等。当然这与现实只沾了个边，而现实本身则远为复杂，远为令人不安。事实上，在美国存在大量未被记载、未被统计的怀疑态度，甚至是直言不讳的异议，但它们却似乎被那些公开张扬的爱国主义所遮蔽。因此，美国的整齐划一正凭借某种不容对美国政策有丝毫怀疑的力量而设计出来，它在许多方面正朝着在阿富汗等地发生一系列意外事件的方向推进，许多人是等到为时已晚才了解其含义。同时，美国的整齐划一需要向世界表明美国正在做的和已经做的事情不能容忍严肃的分歧或讨论。布什像本·拉登一样地告诉世界，你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一边，从此与我们为敌。因此，一方面，美国不是在向伊斯兰世界而只是在向恐怖主义宣战，另一方面，却与之全然相反，既然只有美国可以判定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是谁或者是什么，那么只要“我们”如此定义他们，我们就是在打击穆斯林恐怖主义及伊斯兰的狂

暴。迄今为止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对美国指责真主党及哈马斯是恐怖组织的有力抗议，并不能保证这场标榜以色列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的运动会停止不前。

与此同时，乔治·W. 布什和托尼·布莱尔已经意识到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确需要有所作为，尽管我认为美国不会真正为了适应即将采取的行动而改变它的外交政策。为了促成这一作为，美国必须正视自身历史，正如声名狼藉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和福阿德·阿扎米之流媒体喉舌一直对阿拉伯及穆斯林社会说教的那样，那是他们必须做的，但自然从不考虑那是每个人，包括美国人在内，也需履行之事。不，我们一再被告知，美国的历史是自由与民主的历史，而且只有自由和民主：他们从不承认错误，或者宣布彻底进行重新思考。其他任何人都必须改变方式；然而，美国却一如既往保持不变。于是，布什宣布美国赞成建立一个拥有毗邻以色列的公认边界的巴勒斯坦国，并补充说这必须依照联合国决议来进行，但却没有限定是其中哪些决议，而且还拒绝亲自会见亚西尔·阿拉法特。

这也许显得像是矛盾的一步，但其实并非如此。在过去六星期里，美国境内一直在进行一项紧锣密鼓、组织缜密的媒体运动，或多或少地把以色列的世界观强加给美国的读者及观众，几乎无物与之抗衡。它的主旋律是，伊斯兰教及阿拉伯世界是恐怖主义的真实根源，以色列有史以来一直面临着这样的恐怖主义，阿拉法特和本·拉登基本上是等同的，而美国在阿拉伯的多数盟国（尤其是埃及与沙特阿拉伯）在赞助反美主义、支持恐怖主义、维持腐败及不民主社会等方面毫不含糊地扮演负面角色。这场运动的潜台词一直是一个（充其量也是）可疑的论点，即：反犹主义情绪正在高涨。所有这一切共同形成了一个近乎承诺的判断：与巴勒斯坦人（或黎巴嫩人）对以色列行径——当今最残忍、最无人性、最违法的行径——的反抗

相关的任何事物，在消灭塔利班及本·拉登之后（或许在此期间）都必须加以摧毁。这恰巧意味着，正如五角大楼的鹰派及其右翼媒体机器一直不懈地提醒美国人的那样，伊拉克必定成为下一个被打击的对象，甚至以色列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敌人也必须连同伊拉克一起被打垮，这一点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9·11”事件之后的几星期里，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机器干着如此厚颜无耻的勾当，而这些观点却很少遭到反对。在这种充满谎言、嗜血的仇恨以及傲慢的必胜信念的大杂烩之中，遗失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美国并不是以色列，本·拉登也不是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

布什和他的人民几乎没有对这场全力支持以色列的运动给予真正的政治控制，而这场运动则阻碍了美国政府对于自己的巴以政策进行一次实实在在的重新评估。甚至在美国发起针对穆斯林及阿拉伯国家的首轮反宣传活动时，也已然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不愿将阿拉伯民族与所有其他民族同样严肃对待的倾向。不妨以一星期之前半岛电视台的讨论节目为例，在这个节目中全程播放了本·拉登最近的录像。它可谓集指控、声明于一体的大杂烩。它指控美国无休止地利用以色列来打击巴勒斯坦人；本·拉登当然会疯狂地将这一点归因于基督教及犹太教对伊斯兰教的十字军征伐，但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人都相信——因为这显然就是事实——美国只不过是听任以色列凭借美国武器和美国在联合国及其地方提供的无条件的政治支持，肆意杀害巴勒斯坦人。位于多哈的节目主持人随后邀请了华盛顿的美国官员克里斯多夫·罗斯（Christopher Ross）就此事做出回应，接着，这位虽正派体面但绝非出色，甚至连阿拉伯语也谈不上流利的罗斯，宣读了一份长篇声明，其主旨是，美国绝不是在反对伊斯兰及阿拉伯国家，实际上，美国是他们的支持者（例如，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问题上），而且，较之任何其他国家，美国给阿富汗提供过更多的食物，

并且促进了它的自由与民主，以及诸如此类。

总而言之，这是标准的美国政府发布的言论。接着，鉴于罗斯谈到的有关美国支持正义与民主的每件事，主持人要求罗斯解释美国为什么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军事占领的野蛮行径。罗斯没有站在尊重听众的诚实立场上承认以色列是美国的盟友以及“我们”选择支持它是出于内在的政治原因，相反，他选择了侮辱听众基本智力的做法，并辩护说美国是能将巴以双方拉到谈判桌上的唯一力量。当主持人坚持就美国敌视阿拉伯人的愿望这一点进行提问时，罗斯也坚持他的路线，或多或少地声称只有美国关心阿拉伯人的利益。作为宣传职责的一次履行，罗斯的表现自然十分拙劣；但是作为对美国政策将发生任何重大改变的可能性的暗示，罗斯（不经意地）至少向阿拉伯人表明了一点，即：如果有谁相信会有任何这样的改变发生的话，那就是白痴。

无论它做出什么其他表述，布什领导下的美国仍是个单边主义强国，在全世界，在阿富汗，在中东，在任何地方，莫不如此。没有迹象显示它已理解巴勒斯坦的抵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明白为什么阿拉伯人憎恨它无视以色列对整个巴勒斯坦民族之罪恶虐待的、极为不公的政策。它依然拒绝签署京都协定、战争犯罪法庭协议（War Crimes Court agreement）、反地雷协定，也拒不支付联合国会费。布什依然能挺直腰板对全世界说教，好像他是一位校长，在告诫一群不守规矩的小流浪儿他们为什么必须依照美国观念行事。

简言之，亚西尔·阿拉法特及其长期伙伴根本没有理由匍匐在美国脚下。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唯一希望就是要让巴勒斯坦人向世界表明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我们在道德上占据优势，同时我们必须继续机智地、有组织地抵抗以色列的罪恶占领（似乎已无人再提及这一点）。我的建议是，阿拉法特应该停止周游世界，回到本国人民身

边（他们一直在提醒他，他们不再真正支持他的做法：只有17%的人说他们支持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并像一位真正的领袖必须做的那样，对他们的需求做出回应。以色列一直在破坏巴勒斯坦基础设施、摧毁城镇与学校、杀害无辜者并肆意侵略，阿拉法特对此却没有给予足够认真的重视。他必须领导如果不是每小时一次也是每天一次的非暴力抗议游行，而不是让一群外国志愿者来庖代本该由我们自己完成的工作。

阿拉法特的领导层如此致命地缺乏的，正是人类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与本国人民在道德上的休戚与共。这一严重缺失，现在恐怕几乎已将他和他那注定倒霉的、无效的权力机构完全边缘化。沙龙的野蛮残忍在对它的破坏方面确实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必须记住，在武装暴动开始之前，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已经失去了信心，而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阿拉法特似乎从未明白，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进行的是一场代表着、象征着正义与解放的运动，一场因正义和解放而获得支持并且体现其原则的运动。单凭这一点就可以使我们摆脱以色列的占领，而不是在西方列强的大厅里偷偷摸摸地运作。在那些地方，阿拉法特和他的人民直至今日还在受到蔑视。任何时候，比如在约旦、黎巴嫩以及奥斯陆进程期间，只要他表现得仿佛他自己和他的运动属于另外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时候，他总是被击败；只有当他最终明白巴勒斯坦民族要求的是解放与正义，而不是一个警察机构与腐败官僚时，他才会开始领导他们。否则他将只会耻辱地挣扎，并给我们带来灾难与不幸。

另一方面，我现在要就此做个总结，而把这些话题留到我下一篇文章中详细展开：作为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我们不能陷入一种轻松随意的修辞上的反美主义。坐在贝鲁特或开罗的会议大厅里谴责美帝国主义（或犹太复国殖民主义）而根本不了解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社会、并非真的永远由其政府愚蠢或残忍的政策来代表，这样做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我们从未应对以色列和美国当前出现的潮流趋势，而应对它们并最终与之达成一致，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的确至关重要。就这方面而言，我们需要让人们尊重并理解我们的抵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于自杀式的无知与不分青红皂白的交战，使人们憎恨并害怕我们的抵抗。

还有一点。让一小群清一色的移居美国的阿拉伯学究在这里的媒体反复露面来谴责伊斯兰教及阿拉伯人，这也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而这些人却没有勇气或脸面使用阿拉伯语，面对那些他们在华盛顿和纽约如此轻易地攻击的阿拉伯社会及其人民，来说出这些话。阿拉伯与穆斯林政府不该在联合国及西方国家那里笼统地装做捍卫本民族利益，而回到家来却几乎不为人民做任何事情。现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陷入腐败、不民主的统治带来的恐怖，以及一个至今不敢面对俗世现实的、有着致命缺陷的教育体系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但所有这一切，我将留待下文分解。

《金字塔报》，2001年11月15—21日

《生活报》，2001年11月22日

## 22. 以色列的穷途末路

“世界的大门正向我们关闭，迫使我们穿过最后一个通道，而为了能够从中通过，我们去掉了四肢。”这是穆罕默德·达维什（Mahmoud Darwish）在巴解组织于1982年9月从贝鲁特撤出后余波未平之时所写的。“在通过最后的边界之后，我们该走向何处？在穿过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该飞向何方？”19年后，当初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身上发生的一幕，目前正在巴勒斯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身上重演。自去年9月阿克萨暴动开始以来，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隔离在数量绝不少于220个的断断续续的小型难民窟内，并且受到间歇性的、通常持续数星期的宵禁。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生病的还是健康的、快要死的还是快要生的、学子还是医生，没有人可以在由粗鲁的、故意羞辱人的以色列大兵把守的路障处不花上数小时就离开的。在我撰写此文之际，有200名巴勒斯坦人，由于以军基于“安全原因”不允许他们到医疗中心就医，而无法接受肾脏透析治疗。对冲突进行报道的无数外国媒体中，有谁提及过这些残酷无情的年轻以色列应征兵被训练得将惩罚巴勒斯坦平民作为其主要军事职责？我想是没有的。

亚西尔·阿拉法特未被获准离开他在拉马拉的办公室去参加12月10日在卡塔尔举行的伊斯兰国家外长紧急会议；他的讲稿是由一



名助手宣读的。15 英里之外、位于加沙的机场和阿拉法特那两架老掉牙的直升飞机已于上周被以色列飞机和推土机摧毁，无人也无力去督察，更不用说阻止这种由大胆军事行为的特殊壮举所构成的每天每日的侵犯。加沙机场是进入巴勒斯坦领土唯一的直接口岸，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唯一被肆意摧毁的民用机场。自去年 5 月以来，（由美国慷慨提供的）以色列 F-16 战斗机就经常轰炸扫射巴勒斯坦的城镇村庄，那完全是格尔尼卡式（Guernica-style）的轰炸，毁坏财产，杀害平民及治安官员（巴勒斯坦却没有陆军、海军或空军来保护人民）；阿帕奇攻击型直升机（又是美国提供的）已经用导弹谋杀了 77 名巴勒斯坦领导人，所谓的目的是打击过去或未来的恐怖主义进犯。一群不为人知的以色列谍报人员拥有这些暗杀的决定权，并且大概每次都得到以色列内阁批准，更广义地讲，得到美国的首肯。直升飞机也有效地执行了轰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设施、警察及平民的任务。12 月 5 日晚，以色列军队进入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位于拉马拉的五层办公楼，搬走了电脑，连同大部分文件和报告，从而几乎抹去整个巴勒斯坦生活的全部记录。1982 年，同一指挥官率领的同一支军队进入西贝鲁特，运走巴勒斯坦研究中心的档案和文件，然后将建筑夷为平地。几天之后就发生了萨布拉和沙提拉的大屠杀。

哈马斯及伊斯兰圣战组织（Jihad）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自然已在行动，而当沙龙在 11 月底那场战斗平息 10 天之后却突然命令谋杀哈马斯领袖穆罕默德·阿布·哈诺德（Mahmoud Abu Hanoud）时，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卷土重来：这次谋杀行动就是为了激怒哈马斯进行报复，从而可以容许以色列军队重开杀戒，屠戮巴勒斯坦人。经历了八年毫无成效的和平讨论之后，有 50% 的巴勒斯坦人失业，70% 的人过着每天不足两美元的贫困生活。每天都伴随着无法反抗的土地掠夺与房屋破坏。在过去几个月里，虽然每一名以色列人的

死亡都会以五到六个巴勒斯坦人的被杀为代价，但是这位老战争贩子却斗胆继续反复说：以色列是跟本·拉登所实施的相同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一直进行非法的军事占领，这是历史上最长的，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非法占领：它就是所有巴勒斯坦暴力行为所针对的最本源的、仍在持续的暴力。例如12月10日，在希伯伦，两个年龄分别为3岁和13岁的孩子被以军炸弹炸死，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欧盟代表团正在要求巴勒斯坦人减少他们的暴力与恐怖主义活动。12月11日，又有五名巴勒斯坦人被杀，他们全都是平民，是被轰炸加沙难民营的直升机炸死的。更糟的是，作为“9·11”恐怖袭击的结果，“恐怖主义”一词正被用来诋毁玷污反抗军事占领的合法行为，而将对于平民的恐怖杀戮（这是我一直反对的）与三十多年来的集体惩罚进行因果关联、甚至是叙事关联的做法，也遭到了禁止。

每个自以为是地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说三道四的西方学者或官员有必要问一问，对占领事实的遗忘如何指望能够阻止恐怖主义。阿拉法特的重大错误——那是挫折与拙劣劝告所导致的结果——在于，当他授权1992年在坎布里奇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举行巴勒斯坦两大家族后裔与摩萨德组织之间的“和平”谈判时，他在试图与占领做交易。这些谈判只讨论以色列的安全问题；却只字未提巴勒斯坦的安全事宜，的确是只字未提，而他的民族实现国家独立的奋斗也被搁置一旁。无疑，以色列的绝对安全得到了公认的国际优先权，它允许安东尼·津尼（Anthony Zinni）将军和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一边对占领保持完全沉默，一边还要对巴解组织进行谆谆教导。然而以色列从这些讨论中并不比巴勒斯坦人得到的更多。以色列的错误一直都在于，幻想通过诱导阿拉法特及其伙伴陷入漫长的讨论并做

出小小的让步，使得巴勒斯坦彻底偃旗息鼓。迄今为止，以色列官方的每个政策都使局势对以色列更糟，而不是更好。你不妨自问一下：以色列在今天比 10 年前更安全、更受欢迎了吗？

12 月 1 日那个周末对海法与耶路撒冷的平民进行的可怕的、而在我看来也是愚蠢的自杀式袭击，当然应该受到谴责，但为了使这些谴责更为合理，必须将此次袭击与本周早先对阿布·哈诺德的暗杀事件，以及以色列设在加沙的一个诱雷炸死五名儿童的事件联系在一起予以考虑——更不用说整个加沙及约旦河西岸被毁坏的房屋、被杀的巴勒斯坦人，还有持续不断的坦克入侵，以及在过去 35 年来巴勒斯坦的渴望每分每秒的消磨损耗。最终，绝望只会造成不良后果，但也绝不比乔治·W. 布什和科林·鲍威尔似乎在沙龙 12 月 2 日访问华盛顿时为他大开的绿灯更为糟糕（这使人太容易回想起艾尔·黑格于 1982 年 5 月为沙龙开的绿灯）。在他们的支持下，到来的是一如既往的响亮声明。这些声明将被占领土上的人民及其倒霉而又无能的领袖变成了世界范围的侵略者，要求他们必须将自己的罪犯们“绳之以法”，即使以色列士兵正在系统破坏被指望前来逮捕罪犯的整个巴勒斯坦警察机构！

阿拉法特已经四面楚歌，这是对他企图讨好每一个人（无论是巴勒斯坦的敌人还是朋友）的奢望的一个讽刺。他立刻成为一个悲剧式的英勇人物和笨拙自大的家伙。今天，没有巴勒斯坦人会否认他的领导，理由很简单，尽管他说过不少无聊的话，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之所以受到惩罚与羞辱，正因为他是巴勒斯坦的领袖，也因为单凭他的存在就会冒犯沙龙和他的美国支持者们这样一些纯化论者（purists）（如果这个词没用错的话）。除了卫生部和教育部之外——这两个部门工作做得不错——阿拉法特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直没有取得什么卓越的成就。政府的腐败与残忍行径来源于

阿拉法特看似源于心血来潮、实则出自精心算计的方式——使得每个人都依赖于他的慷慨施与；他独自控制预算，独自决定五家日报的头版内容。最重要的是，他操纵并挑动 12 家或 14 家——有人说是 19 家或 20 家——独立的安全部门之间彼此对峙，每个部门在组织结构上都忠实于自己的领导，同时也忠实于阿拉法特，它们能对人民做的事情，不过是按照阿拉法特、以色列或美国的吩咐逮捕他们。1996 年的选举为他设定了一个三年任期，但阿拉法特却对是否要求再连任几届而犹豫不决，假若那样做的话，几乎肯定会对他的权威和声望带来严重挑战。

自哈马斯 6 月份的爆炸行动以来，他与哈马斯之间已经达成一个公开谅解：如果阿拉法特不干预伊斯兰的各党派，那么哈马斯也不会去对付以色列平民。沙龙对阿布·哈诺德的暗杀摧毁了这一谅解：哈马斯报复了，而沙龙凭借美国的支持，可以畅通无阻地向阿拉法特追魂索命。在摧毁阿拉法特的安全系统、监狱和办公楼并且禁锢他本人躯体之后，沙龙提出了一些明知无法满足的要求（尽管阿拉法特凭着一些秘而不宣的谋划，居然令人吃惊地设法照办了一部分）。沙龙愚蠢地相信，废弃了阿拉法特，他就可以与地方军阀达成一系列彼此独立的协议，并把约旦河西岸 40% 及加沙的大部分土地分割成由以军控制其边界的几个互不相连的行政区。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这怎么能够让以色列更安全，但可惜的是，掌权者一意孤行。

这里还漏掉了三个参与者，或者说是三个参与群体，其中两个是沙龙的种族主义作风不予重视的。首先，是巴勒斯坦人自己。他们中许多人过于不妥协，政治性过强，以至于不肯接受无条件撤军以外的任何条件。以色列的政策，诸如所有这些侵略政策，产生了适得其反的作用：镇压就会激起抵抗。要是阿拉法特消失了，巴勒斯坦法律规定由议会的议长 [ 阿布·阿拉 (Abu Ala) ]，一个平淡无

奇、不受欢迎的阿拉法特的追随者，因其“灵活性”颇受以色列赏识]代职 60 天。此后，一场继位斗争旋即会在阿拉法特的其他亲信 [如阿布·马赞 (Abu Mazen)] 与两三个最主要 (并且颇为能干的) 安全部门首脑 [特别是约旦河西岸的贾布里勒·拉朱 (Jibril Rajoub) 和加沙地带的穆罕默德·达赫兰 (Mohammed Dahlan)] 之间爆发。这些人中没有人的成就和声望能及得上阿拉法特 (或许他现在已经失去了他的声望)。结果可能是一场暂时的混乱：我们必须面对它。阿拉法特的存在一直是巴勒斯坦政治的凝聚点，其他数百万阿拉伯人与穆斯林与此都利害攸关。

阿拉法特一直在容忍，实际上是在支持，一个由他以各种方式操纵的多个组织并存的局面。让这些组织彼此保持均衡，这样除了法塔赫以外没有其他组织能占优势。然而，新的团体正在出现，它们是一些世俗的、勤勉的、尽责的、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民主政体的组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根本不能控制这些团体。但是，还应指出的是，虽然公众头脑中很难分清自杀性冒险主义与对占领的真正抵制之间的界限，但只要以色列继续对全体巴勒斯坦人 (无论老少) 进行轰炸与镇压，巴勒斯坦就无人愿意向以一美提出的结束“恐怖主义”的要求让步。

第二个群体是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尽管他们对阿拉法特表现出明显的恼怒，但却可以从他那里获取既得利益。阿拉法特比他们更聪明、更执著，他知道他在他们国家民众心中的影响地位，而且他在这些国家中已培养出两种彼此独立的阿拉伯拥护者，即伊斯兰教徒和世俗的民族主义者。两者都感到正在遭受攻击，尽管后者几乎没有受到大量西方专家和东方主义者的注意，而这些专家学者们把本·拉登——而不是数量庞大得多的厌恶本·拉登的目标与行为的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的世俗阿拉伯人——看做是典型的穆斯

林。例如，在巴勒斯坦，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目前阿拉法特与哈马斯的声望大致相当（两者都在 20% 到 25% 之间徘徊），而大多数公民两者都不支持。（但是，恰恰是在阿拉法特被逼入绝境时，他的声望却迅速飙升。）在阿拉伯诸国存在着相同的分布比例，同样是认为两派都不得好报的人占大多数。在这些国家，大多数人既厌恶政权的腐败与残忍，又反感宗教组织的简化论（*reductiveness*）与极端主义——其中大部分宗教组织对限制个人行为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全球化或发电、提供就业之类事情的关注。

假如阿拉法特被认为是在以色列暴力及阿拉伯国家的冷漠之下窒息而亡的话，那么阿拉伯人与穆斯林很可能就会转而对抗本国统治者。因此就眼前的形势而言他的存在是必需的。只有当新的领导集体在更年轻一代巴勒斯坦人中出现的时候，他的离去似乎才是自然的。无法预知这件事何时发生，怎样发生，但我十分确信它会发生。

第三组参与者包括欧洲人、美国人以及其他一些人，而且坦白地说，我认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大部分人都会乐意摆脱巴勒斯坦这个问题，同时，照布什与鲍威尔看来，实现一个巴勒斯坦国的设想也并非令人不快，只要是由其他人来完成就行。此外，他们发现，假如没有一个阿拉法特作为他们责备、冷落、羞辱、刺激、强迫或者资助的对象，他们就很难在中东地区发挥作用。欧盟与津尼将军的使命似乎并没有意义，对沙龙和他的人民也将毫无影响。以色列政客们总结得对，总的来说，西方各国政府是支持他们的，他们可以不顾阿拉法特及其人民徒劳的商议请求，而继续我行我素。在巴勒斯坦境内及散居海外的巴勒斯坦人当中慢慢出现了一群巴勒斯坦人，他们正开始学习并使用策略，来对西方及以色列充分施加道德压力，使之谈论巴勒斯坦的权利问题，而不仅仅是巴勒斯坦的存在问题。例如，在以色列，一名大胆勇为的以色列国会成员，巴勒

斯坦裔的阿兹米·毕夏拉 (Azmi Bishara) 被剥夺了议会赦免权，并且将以煽动暴力的罪名受审。为什么？因为他长期以来支持巴勒斯坦抵抗占领的权利，主张以色列应该像世上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是所有公民的国家，而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以色列内部（不是在约旦河西岸），一场巴勒斯坦人就巴勒斯坦权利问题发出的大挑战拉开了序幕，人们极为关注事态发展。同时，比利时首席检察官办事处已经证实，沙龙涉嫌战争罪一案可以在该国法院受理。对世俗巴勒斯坦舆论的辛勤动员正在进行，而且会渐渐超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随着占领成为关注的焦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识到不能无限期地继续这场已有 35 年的占领，道德制高点很快就会从以色列手中失而复得。此外，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蔓延，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局面；美国的强权可能会以或许令人无法忍受的方式把局势搅乱，而非平息事态。因为美国与欧洲之间需要维持反塔利班联盟，故而会引起对巴勒斯坦的重新关注，这一现象绝非低劣的讽刺。

《金字塔报》，2001 年 12 月 20—26 日

《生活报》，2001 年 12 月 20 日

《伦敦书评》，2002 年 1 月 3 日

## 23. 巴勒斯坦正在出现的其他选择

自 15 个月前爆发至今，巴勒斯坦暴动本身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启示，尽管它体现出—一个受到军事占领、手无寸铁、领导不力并且仍被驱逐的民族反抗以色列战争机器施加的无情浩劫的非凡勇气。在美国，政府与“独立”媒体（除了少数例外）彼此呼应，对巴勒斯坦暴力及恐怖喋喋不休，却根本不去注意以色列 35 年来的军事占领，即现代史上历时最长的占领；结果，“9·11”事件后美国官方关于亚西尔·阿拉法特庇护甚至资助恐怖主义的指责无情地支持了沙龙政府的谬论。这一谬论声称，在以色列军队毫不留情和不分青红皂白地针对平民、财产和机构发动的那场为时 40 年的战争中，以色列才是受害者，而巴勒斯坦人是侵略者。今天的结果是，巴勒斯坦人被封锁在 220 个由武力控制的难民窟里；美国人提供的阿帕奇直升机、梅卡瓦主战坦克和 F-16 战斗机每天每日向人群、房屋、橄榄树林及田野扫射；中小学、大学以及商业与民事机构完全被扰乱；数百无辜平民被杀，数万人受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暗杀还在继续；失业与贫穷人口高达 50% 左右——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安东尼·津尼将军对可怜的阿拉法特喋喋不休、大谈巴勒斯坦“暴力”的同时。此时的阿拉法特甚至不能离开他位于拉马拉的办事处，因为他被以色列坦克禁锢在那里，而他的几支衣衫褴褛的安全部队正东奔



西跑，试图从他们的办事处及兵营的毁灭之中逃生。

更糟的是，由于有以下行为，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做了对以色列无情的宣传机器及随时待命的军队颇为有利的事情：他们偶尔采取荒唐野蛮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最终迫使阿拉法特于12月中旬用他那残缺不全的安全部队来对付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拘捕武装人员、封锁办事处，还间或开枪射击并杀害示威者。沙龙提出的每个要求，阿拉法特都赶紧去满足，即使是在沙龙提出另一个要求，挑起一个事端，或者——在美国的支持下——干脆直接声称他不满意，声称阿拉法特仍然是个以杀戮犹太人为主要生活目标的“不合时宜”的恐怖分子（一个被他施虐般地禁止参加伯利恒圣诞仪式的恐怖分子）的时候，阿拉法特也是如此。违背逻辑的野蛮攻击汇聚在一起，包括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对一个好歹还是他们的领导人的攻击，以及对他们已经饱受羞辱的国家实体的攻击，对此，阿拉法特做出的是令人困惑的反应，即继续要求回到谈判，仿佛沙龙不加掩饰地抵制哪怕是商谈的可能性的战役根本未曾发生，仿佛奥斯陆和平进程的整个想法还不曾破灭。令我吃惊的是，除了少数以色列人〔如最近的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以外，没有人站出来公开说：巴勒斯坦人，作为以色列的本土居民，正在受到以色列的迫害。

更为仔细地审视一下巴勒斯坦的现实，就会发现某种更令人鼓舞之事。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阿拉法特和他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反对派（他们不正当地称自己为“抵抗组织”）得到的支持率在40%到45%之间的某处。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中沉默的大多数既不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对于奥斯陆的误信（以及它充满腐败与镇压的无法无天的政权），也不支持哈马斯的暴力。阿拉法特作为一贯老谋深算的战术家，已经进行了反击：他委派萨里·努赛贝（Sari Nusseibeh）博

士，一位耶路撒冷的知名人士，国立阿拉伯巴勒斯坦大学（Al-Quds University）校长，法塔赫中坚分子，发表测试舆论的演讲，建议只要以色列稍微友好一点，巴勒斯坦就会放弃他们重返家园的权利。此外，许多亲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巴勒斯坦名流（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他们的活动从来没有脱离当局而独立开展）与那些不是在野的、就是无能和不足信的以色列和平积极分子联合签署声明，并同他们一起巡回宣传。这些令人沮丧的做法是想向世界表明，巴勒斯坦人愿意不惜代价地讲和，甚至愿意接受军事占领。就阿拉法特无情地渴望继续当权的迫切心理而言，他仍然未被击败。

然而，在所有这一切附近的某处，一股新的世俗民族主义潮流正在慢慢出现。称之为一个党派或一个集团还为时尚早，但目前它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有声望的可见群体。其中包括海德尔·阿卜杜勒·沙非（Haidar Abdel Shafi）医生和穆斯塔法·巴尔古提（Mustafa Barghuti）医生〔不要把他同他的远亲，坦兹姆组织（Tanzim）积极分子马尔万·巴尔古提（Marwan Barghuti）混淆起来〕，还有易卜拉欣·达卡克（Ibrahim Dakkak）、齐亚德·阿布·阿姆鲁（Ziad Abu Amr）教授、艾哈迈德·哈尔卜（Ahmad Harb）、阿里·扎巴维（Ali Jarbawi）、福阿德·蒙格拉比（Fouad Moughrabi）、立法委员会成员拉维亚·阿勒·沙瓦（Rawia al Shawa）与卡迈勒·沙拉夫（Kamal Shirafi）、作家哈桑·卡哈德（Hassan Khadr）与穆罕默德·达维什、拉贾·舍哈德（Raja Shehadeh）、莉玛·塔拉齐（Rima Tarazi）、加萨尼·卡迪布、那瑟·阿拉里（Naseer Aruri）、伊莱娅·祖里克（Elia Zureik）以及我本人。2001年，发表了一份被阿拉伯及欧洲媒体广为报道（而在美国未被提及）的集体声明，在有意对重返奥斯陆保持沉默的同时，呼吁巴勒斯坦统一、抵抗以及无条件地结束以色列军事占领。我们认为在占领的情况下协商如何改进就等

于在延长占领。只有在占领结束后，和平才会到来。声明最大胆的部分集中在改善巴勒斯坦国内现状的必要性，首要之处在于加强民主政治；“纠正”（完全控制在阿拉法特这伙人手里的）决策程序；恢复法律主权和独立司法；避免进一步滥用公共基金；强化公共机构的作用，以便让那些明确为民众服务的机构赢得每个市民的信任。最后，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要求新的议会选举。

无论这份声明会以别的什么方式解读，如此之多的大都来自卫生界、教育界、职业部门、劳工组织的著名无党派人士发表了这些言论，这一事实既不会被其他巴勒斯坦人（他们把它视为迄今对阿拉法特政权最尖锐的批评），也不会被以色列军方错过。此外，正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慌忙不迭地执行沙龙和布什的命令，围捕普通的伊斯兰主义嫌疑人时，由巴尔古提医生发起了一场非暴力的国际团结运动（**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其中包括大约 550 名欧洲观察家（其中有几位是欧洲议会委员），而且他们是自费飞往巴勒斯坦的。与他们在一起的是一群纪律严明的巴勒斯坦青年，他们一边同欧洲人一道打乱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挺进的步伐，一边阻止巴勒斯坦方投掷石块或者举枪开火。这一做法有效地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伊斯兰极端分子逐出运动，并确立了使以色列的占领本身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行动计划。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否决安理会一项决议的时候，该决议要求委派一个由非武装观察员组成的国际团体介入到以色列军队与毫无防御能力的巴勒斯坦平民之间。

第一个结果是，元月 3 日，巴尔古提与大约二十名欧洲人在东耶路撒冷举行完记者招待会之后，以色列人拘捕、扣留并审问了他两次，用步枪托打碎了他的膝盖，并且打伤了他的头部，其借口是他在扰乱和平并且非法进入耶路撒冷（尽管他是在那里出生的，并持有进入那里的医生许可证）。当然，这一切都未能阻止他或他的支持者

们继续从事非暴力斗争，我想，这场斗争必定会控制住已经过于军事化的暴动，使全国上下以结束占领和定居为中心，引导巴勒斯坦人朝着争取国家地位与和平的方向前进。以色列更害怕像巴尔古提这样镇静、理性并受人尊敬的巴勒斯坦人，而不是那些被沙龙歪曲为对以色列构成典型的恐怖主义威胁的、蓄着胡须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他们采取的对策就是逮捕他，这是沙龙典型的黔驴技穷之策。

那么，那些迅速声讨“暴力”反应，却对可耻的、罪恶的占领本身只字不提的以色列及美国左派人士现在何处？我要严肃地建议他们加入到奋战在（实际的和象征性的）路障旁的杰夫·哈尔波和路易莎·莫尔甘蒂尼（Luisa Morgantini）这些勇敢的积极分子行列，与这个主要的、崭新的世俗巴勒斯坦自发组织并肩战斗，开始抗议那些由纳税人资助以及由他们代价昂贵的沉默予以支持的以色列军事措施。一年来，所谓和平分子一直在一齐扼腕叹息，抱怨巴勒斯坦没有和平运动（从什么时候起，遭到军事占领的人们要负起和平运动的责任？），现在，这些能够真正影响以色列军队的所谓和平人士有一个明确的政治职责，即马上无条件地组织起来抵制占领，而不要对已经饱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提出不适当的要求。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这样做了。几百名以色列后备役军人已经拒绝在被占领土上履行军事职责，同时，新闻记者、活动家、学者以及作家等各界人士〔其中包括阿米拉·哈斯、吉登·列维、大卫·格罗斯曼、依兰·拉佩（Ilan Pappé）、丹尼·雷宾诺维兹及乌里·亚弗纳瑞（Uri Avnery）〕已在坚持不懈地抨击沙龙对巴勒斯坦民族发动的徒劳无益的罪恶战役。理想状态下，美国也应该发出类似的合奏共鸣，但是在那里，除了极少数几个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公开表示愤怒之外，太多的是同谋与擂鼓助威。以色列的游说团暂时已经成功地将对抗本·拉登的战争与沙龙一意孤行地对阿拉法特及

其人民实施的集体攻击混为一谈。不幸的是，阿拉伯裔美国人社群在试图抵御这里日益扩张的阿希克罗夫特搜捕网（Ashcroft dragnet）、种族脸谱化，以及公民自由的缩减趋势时，不仅规模太小，而且备受围攻。

因此，更为迫切需要的是让支持巴勒斯坦的各种世俗团体之间步调一致，而巴勒斯坦民族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地理上的分散（甚至超过了以色列的劫掠）。结束占领及其伴随着的一切，是一项十分明确的使命。让我们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阿拉伯的知识分子们不必羞于亲自加入其间。

《金字塔报》，2002年1月10日—16日

《生活报》，2002年1月18日

## 24. 螺旋再次转动

历史是无情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抵制苦难和残忍的法则，没有使一个受到严重冒犯的民族恢复合法地位的内在平衡。因此，在我看来，历史循环论似乎总是出现缺陷，仿佛螺旋式转动就意味着现在的罪恶将来有可能被转换成善行。一派胡言。转动苦难的螺旋意味着更多的苦难，而不是拯救之路。然而，历史最令人沮丧的是，整个历史中有太多的内容躲过了语言，躲过了注意和记忆。因此，历史学家便诉诸隐喻和诗意形象来填补空白，这就是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也被当做谎言之父的原因：他的著作中有如此之多的内容经过了修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真相，以至于是他的想象力，而非他所铺陈的大量事实，使他成为如此伟大的作家。

此刻住在美国是一种可怕的经历。主要媒体与政府一唱一和地谈论中东问题，同时，又有各种其他观点可以通过因特网、电话、卫星频道和当地的阿拉伯以及犹太媒体获得。然而，就美国普通百姓容易获得的信息而言——他们被湮没在大量的、在外交事务方面几乎被完全净化而只剩下政府发布的遵循爱国路线的照片和报道之中——情况令人相当震惊。美国正在与恐怖主义之恶作斗争。美国是善的，任何反对者都是恶的，都是反美的。抵制美国，抵制它

的政治、它的武器以及它的思想，则无异于恐怖分子。我还发现同样令人震惊的事，一些颇具影响、而且以各自方式老于世故的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家们一直在说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整个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不愿接受美国的思想，为什么世界其他部分——包括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坚持批评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对阿富汗发动战争、单方面否弃六项国际条约、全面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实施顽固不化的战俘政策。美国人与世界其他地区人民所获知的事实之间的差距之大及其不可调和的程度，简直难以形容。

单凭语言不足以解释一位（大概已掌握所有事实的）美国国务卿是如何能够不带一丝讽刺地指责巴勒斯坦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反恐方面做得不够，指责他购买 50 吨武器来保护他的人民，而以色列得到的每一件武器却都是美国兵工厂制造出来的、被无偿提供给它的最精良的致命武器。[同时需要指出，巴解组织在处理“卡里纳 - A (Karine A)”号军火船事件上表现出的无能与笨拙，甚至超出其自身的低劣常态。]与此同时，以色列将阿拉法特封锁在他的拉马拉总部，让他的整个民族受到监禁，领导人遭到暗杀，无辜者饥馑致死，病者濒临危亡，生活彻底瘫痪，可是，巴勒斯坦人却仍被指控为恐怖主义。关于 35 年军事占领的想法，更不要说事实，已经完全从媒体及美国政府那儿溜走了。如果将来有一天阿拉法特和他的民族被指控围攻以色列、封锁它的市民及城镇的话，请不要感到惊讶。不，那些轰炸突卡门（Tul Karm）和杰宁（Jenin）的不是以色列飞机，那是一些长翅膀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而那些被轰炸的则是以色列的城镇。

至于美国媒体上的以色列，它的众多发言人已经变得非常精于说谎，他们以灌肠商灌制香肠的方式创造谎言，真是无与伦比。昨

天我听到以色列国防部（就连“国防”这个名字都让人哽在喉中难以启齿）的一位官员就拉法的房屋毁坏问题回答提问：那是些空房子，他毫不犹豫地，他们是恐怖分子用来杀害以色列公民的巢穴；我们必须保护以色列公民不受巴勒斯坦恐怖威胁。这名记者甚至都没提及占领，也没提及所谓“公民”其实是定居者这一事实。至于在（美国制造的）推土机破坏房屋后迅速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的那几百名可怜的、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则从人们的记忆和意识中彻底消失了。

至于阿拉伯人的漠然反应，已经超出了过去 50 年来我们政府设定的低得可怜的羞耻标准。如此无情的沉默，面对美国及以色列时的如此卑躬屈膝与软弱无能的态度，以其自身方式让布什和沙龙都感到吃惊和无法接受。阿拉伯领导人是否如此害怕得罪美国，以至于不仅愿意接受巴勒斯坦的屈辱，而且还愿意让自己受辱？这究竟为了什么？只不过是为了得以将腐败、平庸和压迫继续下去。在谋求自己的狭隘利益与美国的宽容之间，他们进行了多么廉价的交易！难怪对于当今几乎所有活着的阿拉伯人来说，政权一词不过意味着可笑可鄙、纯粹的痛苦以及愤怒的疏远（除非是对于那群参谋顾问和阿谀之徒而言）。至少由于沙特阿拉伯的高级官员在最近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批评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于是才有了一次受欢迎的打破沉默之举，尽管涉及即将召开的阿拉伯峰会而产生的混乱与失常，使本已堆积如山的处理不善的事件继续增加，而这些事件体现的则是毫无必要的步调不一与装腔作势。

我确实认为，在这里用“邪恶的（shar）”这个形容词来描述沙龙对整个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民族集体造成痛苦经历的事实，是十分恰当的。它不能得到充分的描绘或叙述，阿拉伯人没有为支持这场斗争说过或做过什么，美国充满了如此可怕的敌意，欧



洲人如此无用（除了他们最近发表的不含任何可行措施的声明之外），据我所知，所有这一切令我们许多人深感绝望，还令我们沮丧到极点，而这正是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们追求的结果之一。要让民众渺小到微不足道、无人问津的程度，让生活悲惨到似乎需要放弃生活的地步，包含着一种显然是沙龙期盼的绝望状态。这正是他被选举出来要做的事，而如果他的政策失败的话，也将是导致他下台的原因。于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将粉墨登场，完成同样可怕、野蛮（但最终是自取灭亡）的任务。

我确实相信，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消极被动与无助的愤怒——甚至某种痛苦的宿命论——是知识界与政治界的不恰当反应。当然也有大量反面例子。巴勒斯坦人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被劝降，那是伟大意志与远大目标的体现。从这一点上来看，以色列实施的所有集体措施和持续性的羞辱都被证明是无效的。正如他们的一位将军所说，通过围攻巴勒斯坦来阻止他们抵抗，就像小勺舀水企图饮尽大海。这种办法根本行不通。但在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我还坚信，我们必须超越顽固抵抗之路，而寻求创造性抵抗之途，努力摆脱那种只反抗以色列人却并未充分提高巴勒斯坦人利益的陈旧方式。不妨以做决策为简例：对于阿拉法特来说，被禁錮在拉马拉枯坐苦挨，并且无休止地重复唠叨着他要谈判，这就万事大吉了，但那既不是一项政治计划，其个人作风也不足以动员本国人民和盟友。注意到欧洲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声明当然很好，但是谈及拒绝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服役的以色列后备役士兵肯定更为重要。由于没有认同也没有试图与以色列人肩协作来抵制以色列的压迫，我们仍在出发点徘徊。

当然，重点在于，残忍的集体惩罚每转动一次螺旋，都辩证地创造了一个新型抵抗的崭新空间，而自杀性爆炸绝对不在其列，与阿

拉法特式的个人反抗作风（所有一切都太容易让人联想起他二三十年前在安曼、贝鲁特和突尼斯所说的话）一样缺乏新意。这些抵制与反抗形式都不是新的，并不比目前在巴勒斯坦及以色列两国反对军事占领的人们所采用的方法更为新颖。为什么不着重甄别出那些反对破坏房屋、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反对暗杀或反对以色列任何恃强凌弱的非法行为的以色列群体？只有通过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共同努力，以具体、务实的方法结束占领，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这就意味着巴勒斯坦各团体（不管有无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指导）必须采取他们一直羞于采取的主动措施（因为他们对“正常化”存在着可以理解的恐惧），积极号召并吸纳以色列及欧洲、阿拉伯与美国的抵抗行动。换句话说，随着奥斯陆协议的消逝，巴勒斯坦的公民社会已经从那个欺骗性的和平进程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而这一新的授权意味着摆脱信誉扫地的工党及其逢迎者之类的传统对话人，朝着更勇敢、更有创意的反抗占领的方向挺进。如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想要继续呼吁以色列回到谈判桌上来，假如还能找到任何会坐在那里谈判的以色列人的话，那当然很好。但那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必须重复相同的调子，或继续为“正常化”担忧。人们担忧的所有正常化都是与以色列这个国家之间的，而不是与以色列公民社会里积极支持真正的巴勒斯坦自主以及结束占领、定居和集体惩罚的进步潮流与团体之间的正常化。

是的，螺旋在转动，但它不只带来更多的以色列镇压，而且也辩证地为巴勒斯坦人的机智与独创提供了新的机会。巴勒斯坦公民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进步迹象（我在上一篇专栏中已经指出）：必须把重点集中在他们身上，尤其是当以色列社会内部的分歧暴露出那些受到惊吓、封锁并严重缺乏安全感的急需唤醒的平民大众的时候。总是由受害者，而不是压迫者来指出反抗的新道路。在这方面，有

迹象表明巴勒斯坦的公民社会正在开始采取主动。在一个失望与本能地倒退的年代，这是一个极好的征兆。

《金字塔报》，2002年1月31日—2月6日

《生活报》，2002年3月7日

## 25. 关于美国的思考

我不知道有哪个阿拉伯裔或穆斯林美国人现在没有感到他或她正属于敌人的阵营，而且此刻身处美国让我们体验到一种特别令人不快的疏离感和针对性十分明确的普遍敌意。因为尽管偶有官方声明认为伊斯兰教、穆斯林以及阿拉伯人并非美国之敌，但关于目前局势的其他任何方面却都证明情况完全相反。数百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及穆斯林被提去审问，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警察或美国联邦调查局拘留。在机场安检时，任何一个拥有阿拉伯或穆斯林名字的人，通常要站在一旁受到特别注意。有许多关于对阿拉伯人的歧视行为的报道，以至于在公开场合说阿拉伯语，甚或读一份阿拉伯文的文件，都可能引起不受欢迎的注意。当然，媒体请来过多的“专家”和“评论员”大谈恐怖主义、伊斯兰教及阿拉伯人，他们那不断重复与简化的路线是如此充满敌意，如此歪曲我们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以至于媒体本身只不过变成了在阿富汗和其他地区的反恐战争的武器，例如目前策划的“终结”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就是这种情形。在菲律宾和索马里这样几个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里已经驻扎着美国军队，反对伊拉克的宣传造势还在继续，而且，以色列正在延长对巴勒斯坦人的施虐狂式的集体惩罚，这一切似乎都得到了美国公众的巨大支持。

虽然在某些方面是真实的，但这一图景相当误导人。美国并非

仅如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等人所言。我对有一种观念深恶痛绝，即：我必须接受这样的描绘，认为美国被卷入了一场“正义战争”，对抗的是被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单方面冠以恐怖主义称号的某种东西，而在这场战争中他分配给我们的角色是，要么充当沉默的见证人，要么作为还应感谢美国恩准其入境居住的处处辩解、时时防备的移民。历史的真相是截然不同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共和国，并且向来如此。这个国家的法律不是上帝批准的，而是由它的公民通过的。除了大部分被灭绝的本土美国人，即最初的印第安人之外，现在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位美国公民都是作为移民从其他地方来此靠岸的，即使是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也不例外。美国宪法没有规定不同水平的美国特质，也没有规定被认可或不被认可的“美国的”行为方式，包括那些被通称为“非美的”或“反美的”言论及态度。这是美国塔利班们的发明，他们企图用来控制人们言行的方法，使人诡异地联想起那些无人惋惜的前阿富汗统治者。而且即使布什先生坚持宗教在美国的重要性，他也未被授权强迫公民接受这样的观点，或者代表所有美国人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发表关于上帝、美国以及他自己的宣言。宪法明确地将教会与国家划分开来。

还有更糟之事。凭借去年 11 月份通过“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布什与他那百依百顺的国会已经压制、废除或删节宪法第一、第四、第五和第八修正案中的完整部分，制定了针对个人的法律程序，使这些人既无法求助适当辩护也得不到公正审判；允许秘密搜查、窃听以及无限期拘留；而且，由对关塔那摩海湾战俘的处理可以得知，它还允许美国行政机构绑架囚犯，对他们进行无限期拘留，单方面决定他们是不是战俘，以及日内瓦协定是否适用于他们，而这可不是单个国家可以做出的决定。而且，正如国会议员丹尼斯·库奇尼克（Dennis Kucinich）（俄亥俄州的民主党议员）在 2

月17日发表的一场杰出演讲中所说，总统和他那帮人无权不加限制或者毫无理由地向世界宣战（“持久自由行动”），无权将每年的军费开支增加到四千多亿美元，无权撤销《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而且，他首次以一位公众选举出来的著名官员的身份补充道：“我们并没有要求用阿富汗无辜村民的鲜血来偿还‘9·11’事件中丧生的无辜者的鲜血。”我强烈推荐将国会议员库奇尼克的这篇体现美国原则与价值之精华的演讲用阿拉伯语全文发表，以便我们这部分世界的人们能够了解到美国并非铁板一块，任凭乔治·布什和迪克·切尼调遣。事实上，它包含着多种声音与思潮，而这个政府正企图使之保持沉默或变得无关紧要。

当今世界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美国这个空前强大、无可匹敌的力量。事实上，美国已公开表示，在追逐布什周围那一小撮男女眼中利益的过程之中，它不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协作或者认可。就中东问题而言，自“9·11”以来美国政策几乎已被以色列化：事实上沙龙及其同伙已经无所顾忌地利用了乔治·布什对“恐怖主义”的全神贯注，为继续实施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失败政策作掩护。这里的关键在于，以色列不是美国，而幸运的是，美国也不是以色列：所以即使以色列暂时得到布什的支持，它也只是个弹丸小国；作为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的国家，它要想在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形成的汪洋大海中继续生存下去，不能仅凭对美国的要么无限、要么权宜的依赖，而且要靠适应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沙龙政策在大量以色列人面前最终暴露出自我毁灭性质，以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把预备役军官们反对给军事占领服役的立场作为他们采取对策、进行抵制的榜样。这是自暴动以来出现的最为美妙之事。它证明巴勒斯坦人在抵制占领时体现出的勇气和反抗行动终于结出了果实。

然而，美国立场却没有改变，它已经逐步升级到一个越来越形

而上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里，布什和他那班人马将自己（正如“持久自由行动”这个军事战役的名称所显示的那样）等同于正义、纯洁、善良和昭昭天命，并将这个国家的外部敌人与同样绝对的邪恶视为一物。读过近几周世界新闻的人都能断定，美国以外的人们对美国政策感到既迷惑又惊骇：美国声称自己有权在世界范围内想象和创造出敌人，然后向他们发动战争，而不太考虑其定义是否精准，目的是否明确，目标是否具体，或者，最糟糕的是，不考虑这些行动是否合法。在我们这样一个世界里，击败“邪恶的恐怖主义”是什么意思？它不可能意味着根除任何反对美国的人（这是一个不可穷尽的、不着边际的任务），也不可能意味为了适应美国而改变世界版图，用我们眼中的“好人”来取代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恶徒。这一切想法，以其极度的简易性吸引着华盛顿的官僚们；他们所从事的领域是纯理论的，因为他们端坐在五角大楼的办公桌后面，并试图将世界看成是真实存在的、几乎无可阻挡的美国强权的一个远距离目标。因为假如你居住在距离任何一个已知的邪恶国家一万英里以外的地方，有占地数英亩的成片的作战飞机任你支配，拥有 19 艘航空母舰和几十艘潜艇，外加 150 万现役军人——而他们都怀抱理想主义，愿意为国效劳，有志于驱逐被布什和康多莉扎·赖斯无休止地提及的邪恶——那么，你很可能愿意在某时、某地使用所有这些武力，尤其是在行政部门不停要求（并得到）对已经膨胀了的国防预算再追加数十亿美元开支的情况下。

在我看来，最令人震惊的是，除寥寥几人之外，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著名知识分子和评论家都容忍了布什的计划，容忍并在某些恶性事件中企图超出简单的容忍，而代之以更自以为是的诡辩、更不加批判的自我吹捧和更似是而非的论证。他们不愿接受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这个由众多国家与民族组成的处于历史进程之中的世界，

是由政治推动的，并且可以从政治角度加以理解，而不是由诸如善与恶（以及美国总在善的一边，而它的敌人总在恶的一边）之类大而无当的笼统而绝对事物来驱动和阐释的。当托马斯·弗里德曼令人生厌地告诫阿拉伯人他们必须加强自我批评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切之中所缺少的正是那么一点自我批评的语气。不知何故，他认为“9·11”暴行赋予了他向别人布道的权利，好像只有美国遭受了如此可怕的损失，好像世界其他地区的生命损失就不值得受到同样的哀悼或者从中得出同样重大的道德结论。

人们可以注意到，在以色列知识分子那里存在着同样的矛盾与盲目：他们只专注于自身的悲剧，而从不考虑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陆军或空军、没有得到正确领导的被驱逐的民族——即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魔爪之下遭受的、分分秒秒都在继续的远为强烈的苦难。这种道德上的盲目，这种在评判、衡量犯罪者与受害者（用一种我通常回避和厌恶的道德说教式语言来说）的相对证据方面的无能，正是当今的现实秩序，而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必须是避免落入圈套，并且积极主动地投身战斗，抵制落入圈套。仅限于温和地指出所有的人类痛苦都是同等的，然后主要只是继续悲叹自己的不幸，这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去看看最强大的一方在做什么，然后对它提出质疑，而非为它辩护。知识分子的声音是站在强权的对立面并对其进行批判的声音，它始终需要一个发挥约束、澄清作用的良知和一种纵横比较的视角，这样，受害者就不会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反而受到谴责，而真正的强权就不会受到鼓励去为所欲为了。

一周前，当一位欧洲朋友问及我对60名美国知识分子联名发表的声明有何看法时，我被惊呆了。这份声明发表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所有主流报纸上，却根本没有在美国出现，只在因特网上有所刊登，但很少有人注意。这份声明采用华而



不实的布道形式，大谈美国对抗邪恶与恐怖主义的战争如何“正义”，如何与这些自封的我们国家的解说员们所定义的美国价值观一致。这份声明由一个叫做“美国价值协会”（**Institute for American Values**）的组织资助和发起——这个协会的（得到充足财政资助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一些家庭理念，诸如“为父之道”、“为母之道”和上帝之类。声明由萨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及其他众人署名，但基本上是由一名保守的女性主义学者简·贝思克·爱尔施坦（**Jean Bethke Elshtain**）撰写的，而其中关于“正义”战争的主要论点则从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那里得到灵感。沃尔泽是一名与这个国家的亲以色列游说团结盟的所谓社会主义者，而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借助含糊的左翼原则来证明以色列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正当的。在签署这份声明时，沃尔泽去掉了所有的左派伪装，像沙龙一样，认同那种将美国视为打击恐怖与邪恶的正义勇士的（值得怀疑的）解释，使得以色列和美国显得更像是追求相似目标的相似国家。

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事实，因为以色列不是由它的公民而是由所有犹太人组成的国家，而美国则确定无疑地只是由其公民组成的国家。而且，沃尔泽从来不敢斗胆说出，当他支持以色列时他是在支持一个按照种族宗教原则建构起来的国家，而假如在美国国内宣布美国是白人和基督教的国家，这一做法定会遭到他（带着典型伪善）的反对。

撇开沃尔泽的矛盾与伪善不论，这份声明确实是写给“我们的穆斯林兄弟”的，他们被指望懂得美国的战争不是针对伊斯兰教的，而是针对那些反对各种很难不予认同的普遍原则的人。谁会反对人人平等、以上帝的名义杀人是件坏事、良知的自由是绝佳的以

及“社会的主体是人，而政府的合法作用就是保护和帮助培育人类繁衍兴盛的环境”等原则呢？然而，接下来，美国就变成了受害方，而尽管它的一些政策错误被简略地（并且未提及任何具体细节地）承认，它仍被描述成是在坚守美国特有的原则，例如，所有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道德尊严与道德地位，存在着普遍的道德真理且每个人都可以企及，在出现分歧时礼仪十分重要，良知与宗教的自由是人类尊严的基本反映并且得到普遍认可。很好。虽然这份布道词的作者坦陈这样一些伟大原则常常受到违背，但她却不想继续指出这些违背在何时何地实际发生（因为它们每时每刻一直都在发生），或是否违背比遵循更多，或任何类似的具体情况。然而，在一个长注脚中，沃尔泽和他的同事列出一个清单，标明有多少起“谋杀”美国人的事件发生在穆斯林与阿拉伯人手里，包括1983年贝鲁特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及有武装战斗人员被谋杀的其他事件。某种意义上是值得为这些美国战斗卫士列出那样一份清单，然而对阿拉伯人及穆斯林的谋杀——包括被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用美国武器杀死的数十万人，或美国针对伊拉克无辜平民实施的制裁所杀死的数十万人——既不需要提及也无须被列出。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凭借与美国的共谋甚至合作）屈辱时，哪有什么尊严？当巴勒斯坦儿童被杀害，数百万人口被围困，还有数百万人被变成没有国家的难民的时候，或者还有，当数百万人在美国的支持和默许下在越南、哥伦比亚、土耳其及印尼被杀的时候，他们的高贵品质与道德良心何在？

总而言之，这份由美国知识分子写给他们穆斯林兄弟的有关原则及抱怨的声明，似乎既不是真正良知的表达，也不是对蛮横使用武力的真正的知性批判，而是在替美国拉开新一轮冷战序幕而鸣放的礼炮，并且仿佛是在与那些主张“我们的”战争是同西方和美国之间的战争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在进行具有绝妙讽刺意味的合作。作为在美

国和阿拉伯国家都享有权利的人，我发现这种盗用的修辞话语特别令人反感。它假装阐明原则，宣布价值标准，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它是将爱国修辞用于无知，用来蒙蔽读者，而当这种爱国修辞主宰了真实政治、真实历史以及真实道德问题时，就会鼓励无知。尽管它打着伟大“原则与价值”的幌子干卑劣勾当，但它只不过是想用恃强凌弱的方式四处招摇，以恐吓外国读者，使之屈服。我有种感觉，这份文件之所以没有在美国发表，是因为它会遭到美国读者如此严厉的批评，以至将贻笑大方。

无论怎样，《何为美国价值?》(*What Are American Values?*)一文的发表预示着知识分子话语生产进入一个退化堕落的新时代。因为，当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大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此明目张胆地与那个强权结盟、竭力推进那个强权的政策，而不是敦促其克制、反省、诚恳地沟通和理解的时候，我们就退回到过去那个反共的知性大战的不堪回首的往昔。如今我们知道，那个时代让本该扮演不同角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过多地妥协退让、勾结同谋和捏造作伪。有了政府的资助与担保[尤其是中央情报局，它甚至给像《邂逅》(*Encounter*)这样的杂志提供津贴，承诺支付相关学术研究、旅行、音乐会以及艺术展览的费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毫无反思及批判精神的好战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给知性上的诚实坦荡与为虎作伥的整个范畴，开辟了一个灾难性的新层面。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在国内掀起的一场压制辩论、恐吓批评家及限制思想的运动。对于许多像我一样的美国人来说，这是我们历史上的一段可耻插曲。我们必须严加防范，抵制它再度发生。

《金字塔报》，2002年2月28日—3月6日

《生活报》，2002年3月7日

## 26. 奥斯陆代价几何？

半岛电视台的电视画面一直十分醒目耀眼。那儿显然有一种巴勒斯坦式的英雄主义作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上演。经历了与以色列及美国长达 10 年的谈判之后，提供给巴勒斯坦人居住的约旦河西岸 18% 的土地及加沙地区 60% 的土地，一直遭到由美国无条件地慷慨提供支持的以色列整个陆海空三军的肆意破坏。巴勒斯坦的医院、学校、难民营、平民住宅区受到了挤在武装直升机、F-16 战斗机和“梅卡瓦”主战坦克里的以色列军队的残忍、罪恶的攻击，装备极差的抵抗战士们仍在与这力量悬殊的强大军队展开英勇不屈的较量。在美国，令有线新闻网及诸如《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蒙羞的是，它们都未曾提及“这场暴力”的实力悬殊，以及牵涉的不是双方，而是一个国家用强大力量来对付一个没有国家、一再流亡、遭受驱逐的民族，一个已经丧失了武装和真正领导的民族，而其目的就是要摧毁这个民族，正如领导以色列的这位战争罪犯的无耻之言，要“给他们沉痛打击”。为了表明沙龙有多么疯狂，我可以在此引用他于 2002 年 3 月 5 日对《国土报》所说的话：“巴勒斯坦武装在幕后支持恐怖，它里里外外都是恐怖。阿拉法特是恐怖行动的幕后指挥。我们施压的目的在于结束恐怖。别指望阿拉法特会抵制恐怖。我们必须给他们造成严重伤亡，这样他们就会懂得不能一直使用恐

怖，并取得政治上的成功。”

沙龙的这番话除了表明他完全执迷于毁灭破坏与十足仇恨的思想症状之外，还显示出自去年9月以来业已松懈了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理性批判精神的彻底失败。不错，确曾发生过一场恐怖主义暴行，但对这个世界来说不仅只有恐怖。有政治、有斗争、有历史、有不公、有抵抗，而且，是的，还有国家恐怖。美国的教授们或知识阶层几乎一声不吭，全然屈从于语言的滥用和视听的混淆，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就变成了恐怖行动，而凡是我们喜欢的，则都是十足的善，是反恐斗争，无论花费多大财力、失去多少生命、造成多大破坏都无妨。我们试图用来教育学生 and 公民同胞的所有启蒙原则已被扫荡一空，取而代之的是极不相称的复仇狂欢和以正义自居的愤怒，而这些似乎是只有豪强富贵才有权使用和实施的。既然在地球上最伟大的民主制度之下，法律、宪法赋予的权利、人身保护令和理性本身都在追击恐怖行动和恐怖主义的过程中被通通扔进废墟，无怪乎沙龙这样的四流暴徒会感到有权（通过效法和引申而）为其所为。作为教育者和公民，我们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听任自己这样被迷惑，甚至没有就以下问题组织公开讨论，即：国防预算已暴涨到四千亿美元而仍有四千万人得不到医疗保险。

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及美国人都被告知，爱国需要这样的开销和这样的破坏，因为一个善的事业正处于成败攸关之际。纯属一派胡言。成败攸关的不过是物质利益，它可继续让统治者掌权、使企业牟利，继续将人民置于人为虚造的默许状态，只要他们不会于某日早晨起床后开始思索：在这场技术化的轰炸与杀戮的狂潮之中，我们究竟在走向何方。

以色列目前正发动一场纯属针对平民的战争，尽管你在美国绝不会听到有人那样表述。这是一场种族主义战争，而且，在战略和

战术上，同时也是一场殖民战争。人们正在被杀戮，正在遭受莫大的痛苦，就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这是何等的讽刺！然而美国有线新闻网却从不提及“被占”领土（却总是说“在以色列的暴力”，仿佛主战场是在特拉维夫的音乐厅和咖啡店，而不是那些其实已被以色列不少于 150 个非法定居点所包围的巴勒斯坦聚居地和被围困的难民营）。过去 10 年来，美国将奥斯陆协定这个大骗局硬塞给世界，却几乎不知道被放弃的只有约旦河西岸 18% 的土地和加沙地区 60% 的土地。无人了解地理，而且最好不要去了解，因为，鉴于那些大吹大擂和自鸣得意，事实真相的确太令人惊讶。

而且，那个冒牌的评论家——自负得让人无法忍受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竟胆敢说“阿拉伯电视”上反映的只是单边的片面情形，好像“阿拉伯电视”应该像 CNN 那样站在以色列的立场来表现事物，并以“中东暴力”这个包罗万象的词来笼统称呼以色列对聚居地和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种族清洗似的。弗里德曼（或 CNN，就此事而言）是否曾尝试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其一是一支攻击性军队向被它占领了长达 35 年的领土发动殖民战争，其二是这个民族奋起反抗这场屠杀？当然没有。因为说实在的，弗里德曼何必劳神费心地坦诚指出：不存在巴勒斯坦人的占领，巴勒斯坦人没有 F-16 战斗机，没有“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没有炮艇，没有“梅卡瓦”主战坦克，简言之，不存在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占领。弗里德曼作为一位诚实的评论家和记者的资格就此终结。他完全没有如实地解释美国观点、了解阿拉伯人及巴勒斯坦人的理想。难道他看不出，他本人及其文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难道他看不出，他的文章充满了喋喋不休的自我辩解和不诚实，没有任何表明他始终要求于人的自我批评的迹象，而他如此行事其实是在加剧而不是减少无知和错觉？拙劣的记者和教育家，非此人莫属。

你在美国获悉的描述是，以色列在为他们的生命而战，不是为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和军事基地而战。几个月来美国的媒体从未播放任何地图。3月8日，这是历时18个月的巴勒斯坦暴动中迄今为止最为血腥的日子，CNN的主要晚间新闻确认有40个“人”死亡，甚至没提及几名红新月会的工作人员之死，他们是在以色列阻止他们的救护车接近伤员时被打死的。只称之为“人”，而且也没有提供他们在35年军事占领期间一直居住的地狱的照片。在突卡门，那里正经历着屡次围攻中的一次，伴随着24小时宵禁，断水断电；800名年轻男子被系统地合围并消灭；难民的房屋被肆意摧毁，财产遭到巨大破坏（我指的并非夜总会或运动设施，而是作为被两次移置的难民们唯一赖以生存栖身的棚屋和披屋）；手无寸铁、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正受到没完没了的、史无前例的残酷虐待，被推搡、殴打并被丢弃在那里流血致死；妇女在以色列路障前毫无必要地长久等待，被迫生下胎死腹中的婴儿；一名嘴里嚼着口香糖、挥舞着用我缴纳的税款购买的M-16式突击步枪的18岁男孩，强迫老人脱掉鞋子光脚走路。在伯利恒，市中心及大学被毁，它们是以色列勇敢的轰炸飞行员驾着一流的F-16战斗机（这个，也是我支付的费用）从5000英尺高空嗖的一声将它夷为平地的。巴拉塔（Balata）难民营，埃达（Aida）、戴黑舍（Deheisheh）及阿扎（Azza）难民营，卡哈德（Khadr）和胡萨姆（Husam）的小村庄，全部被击得粉碎，而美国新闻界甚至从未提及此事，很明显，除了某处偶尔出现的少许例外，纽约的编辑们这样做却心安理得。不计其数的死者和伤者、得不到埋葬和救助的人，更不用说数十万被致残、扭曲以及被肆意导致的痛苦打上灾难性烙印的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是由躲在安全距离之外的树叶茂盛、平静幽远的西耶路撒冷的人安排的。在这些安排者看来，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乃是穴居着昆虫和啮齿动物的

遥远的鼠洞，他们必须被“征服”、被逐出，并且，用以色列精锐部队的流行语来说，必须被教训。今天，在这场规模最大的攻击之中，140辆以色列坦克已经入侵和毁坏拉马拉，从而完成以色列对业已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再次征服。

巴勒斯坦人正在为奥斯陆协定付出极其沉重且不合理的代价。经过10年谈判之后，奥斯陆协定留给他们的是：少许几块支离破碎、零零散散的土地，用来保障以色列利益的安全机构，以及为了这个犹太国家繁荣兴旺而令他们受穷遭困的生活。在那10年期间，我们中的一些人曾徒劳地警告过：美—以的和平言论与骇人听闻的现实之间的差距从未缩小过，甚至也从未打算要缩小。像“和平进程”和“恐怖主义”这样的词语没有任何真正所指地落地生根。没收土地的行为要么被全然忽视，要么被归因于正在进行的“双边谈判”，其中一边是一个不惜代价地加强控制其所觊觎领土的国家，另一边是一群平庸、愚昧的谈判人员，这些人花四年时间才得到一份关于被商榷之地的可靠地图，却没有多大用处。而最恶劣的歪曲是，在自1948年以来的54年里，从未允许任何关于巴勒斯坦英勇事迹和苦难的描述出现。我们基本上都被刻画成狂暴的极端分子，与乔治·W. 布什及其党徒所谓的恐怖分子无异。布什一伙在整个评论员及媒体明星大军——布利策（Blitzers）、赞恩（Zahns）、雷若（Lehrers）、拉泽斯（Rathers）、布罗考（Brokaws）、拉瑟特（Russerts）及其同类——的协助与不带任何批评的煽动唆使之下，将恐怖分子的概念灌输到那些受到惊吓、受到系统蒙蔽的人们的意识之中。以色列游说团有这些忠实信徒的队伍兴高采烈地追随其后，几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但是，既然沙特阿拉伯的和平提议已经成为讨论和希望的焦点，那么，我认为有必要把它放在真实的、而非虚设的背景中加以



理解。首先，这是对 1982 年的里根计划（Reagan plan）、1983 年的法赫德计划（Fahd plan）及 1991 的马德里计划（Madrid plan）等计划的重新回收：换言之，它依循着此前一系列计划的路线，这些计划曾被多次提出，但最终结果是，以色列和美国不仅拒绝执行，而且还积极破坏。在我看来，唯一值得参与的谈判应该是在以色列完全撤军的阶段进行，而不是像奥斯陆和谈那样，在以色列究竟勉强同意放弃其中哪块土地的问题上讨价还价。巴勒斯坦人流了太多的血，以色列施与了太多的蔑视与种族主义暴力，以至不可能真正重返由美国这个有心调停而偏见最大的中间人安排的奥斯陆式的谈判。然而，每个人都清楚，老一代巴勒斯坦谈判人员没有放弃他们的梦想与幻觉，而且在袭击与轰炸的整个过程中，谈判仍在进行。但我要说，在谈判将任何不应有的地位赋予这个以毁坏我房屋、杀害我人民同样的方式来践踏巴勒斯坦权利的以色列政府之前，要对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以色列的毁灭政策造成的真实生命损失给予应有的强调。任何不包含历史因素的阿以谈判都是不值得进行的——要完成谈判任务，需要一组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及地理学家参加——同样，巴勒斯坦人现在必须选出一套新的谈判班子和代表，才有望从目前的灾难中挽救出一点什么。

简言之，在目前巴以代表之间举行的任何会晤中，都要重视以色列对我们民族进行的掠夺的严重性，而不应将它仅仅当做过去的诸多历史而予以忽视。实际上，奥斯陆谈判宽恕了占领行为，原谅了它在前 25 年的占领期间对建筑的破坏和对生命的摧残。在进一步遭受如此之多的苦难之后，不能就这样原谅以色列，不能连让它在言辞上对所作所为进行谢罪的要求都不提一下，就允许它离开谈判桌。

有人会对我说：政治关注什么是可能的，而非什么是向往的，而且我们应该感激以色列的甚至一个小小的撤退。我实在不敢苟同。

谈判只能是关于何时全部撤退，而不是关于以色列愿意退让百分之几。征服者与破坏者是不可能退让任何东西的：他必须彻底归还他所占领的土地，并为他该负责的虐待行为做出赔偿，正如萨达姆·侯赛因对于占领科威特的行为应该做出、并且业已做出的赔偿一样。我们距离那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尽管与此同时，加沙地区及约旦河西岸所有巴勒斯坦人不屈不挠的勇敢行为已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有效地击败了沙龙，他会在不久的将来丢掉宝座。但是，20年来，当他的军队得以任意入侵阿拉伯城市，肆意屠杀破坏，而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一声不吭的时候，他却在替阿拉伯世界的伟大领袖们大量代言！

最后，我无从知道，在电视上目睹巴勒斯坦遭受蹂躏而现在却依然如此慎重地保持沉默的各位阿拉伯国家领袖们认为他们正在做什么，但是我能想象，在他们内心深处一定会感到莫大的羞愧和耻辱。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尤其是在道德上的软弱无力，使他们没有多少可信度，也没有真正的地位，只不过是美国和以色列棋盘上驯服的小卒而已。也许他们感觉自己正在玩一场等待的游戏。也许如此。但是，他们（像阿拉法特和他的随从们一样）甚至不懂得系统传播信息的力量，不懂得以此来保护本国人民免受那些认为所有阿拉伯人都是好战者、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狂热分子的人们的攻击。好消息是，那种不负责任的可鄙行为并不长久。新的一代会做得更好吗？

我们是否会再次集体坠入混乱、腐败与平庸，或者我们是否会最终成为一个国家，这将由对世俗教育的全新态度来予以回答。

《金字塔报》，2002年3月14—20日

《生活报》，2002年3月31日

## 27. 思考未来

今天，任何与巴勒斯坦有丝毫关系的人都处于极度愤怒和震惊的状态。虽然几乎是 1982 年事件的重演，但现在以色列（在乔治·W. 布什无知荒谬得惊人的支持下）对巴勒斯坦民族发动的殖民主义的全线出击，的确要比沙龙 1971 年和 1982 年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前两次大规模袭击要严重得多。今天的政治与道德气候比以往更加恶劣和退化，媒体的破坏作用（它几乎不遗余力地将巴勒斯坦自杀性攻击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长达 35 年的非法占领背景脱离开来，单独挑出前者来说事儿）更有利于以色列的观点立场，美国的力量更加不可挑战，反恐战争更加彻底地占据了全球议程，而就阿拉伯环境而言，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乏凝聚力、更加分崩离析的局面。

基于上述所有情况，沙龙的杀人本能有增无减（如果那是个恰当字眼的话），而且还受到了赞美。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不受惩罚地变本加厉大肆破坏，尽管他的一意孤行的否定与憎恨（这最终既不能加速他的政治胜利，也不能促进他的军事成功）所导致的失败也使其全部努力与整个生涯前所未有地受损。像这样的民族间冲突所包含的因素远非单凭坦克和飞机就可以消除的。而一场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战争——不管沙龙曾多少次笨拙无知地鼓吹关于恐怖的愚蠢论

调——也绝不能带来他梦想得到的真正持久的政治结果。巴勒斯坦人不会离开。此外，几乎可以肯定，沙龙最终将不得民心并遭到唾弃。除了破坏与巴勒斯坦及巴勒斯坦人有关的一切之外，他没有任何计划。甚至在他恼羞成怒地盯住阿拉法特和恐怖不放时，他也只不过是提升阿拉法特的声望，并且实质上将世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自身立场的盲目偏执特性上来。

归根结底，他是以色列要处理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现在考虑的重点是在道义上尽我们所能来保证：尽管一场罪恶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破坏，我们必须继续向前。当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广受尊敬的退休政治家在国家电视上明确表示，以色列一直干着种族隔离状态下的南非白人至上主义政权所干的勾当时，人们可以肯定，不只他一个人持有这种观点，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其他人不仅在慢慢醒悟过来，而且开始厌恶以色列这个消耗美国巨大开支的监护对象。它费用过于高昂，它使美国越来越孤立，它严重损坏了美国在盟友和本国公民中的声誉。问题在于，在这最为艰难的时刻，我们从需要纳入我们未来计划的当前危机之中，能理性地学到什么？

我现在要说的这些非常具有选择性，但它是一个同时来自阿拉伯与西方世界的人为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经过多年的劳动得出的微薄成果。我既非无所不知，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这是我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所能提供给大家的一些为数不多的想法。下面的四点之间是彼此互相关联的。

1. 无论好坏，巴勒斯坦并不只是阿拉伯或伊斯兰世界的事业；它对于许多互不相同的、矛盾对立的，同时又是彼此交叉的世界来说都很重要。要致力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有必要了解这些方方面面，并坚持不懈地从中教育自己。为此，我们需要一个由受过高等教育

的、警觉的、成熟老练的人士组成的领导班子以及民主支持。最重要的，要像纳尔逊·曼德拉不厌其烦地谈论他的斗争一样，我们必须意识到巴勒斯坦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道德事业之一。因此我们也需要这样来对待它。这不是商业贸易之事，也不是交换货物式的谈判，更不是在成就个人职业生涯。这是应该允许巴勒斯坦人夺取道德制高点并守住它的正当理由。

2. 存在着不同种类的力量，武装力量当然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以色列之所以能在过去 54 年来一直对巴勒斯坦人民做出那样的勾当，是得益于一场周密地、科学地计划的战役，其目的是在保证以色列行动有效的同时，贬低并抹杀巴勒斯坦的行动。这不只是关于维持一支强大军队的问题，而且是关于组织舆论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和西欧。这股力量源于缓慢的、讲究方法的努力，在这种努力下，以色列的立场被看做是很容易认同的立场，而巴勒斯坦人则被当做以色列的敌人，因此他们便是令人反感的、危险的、反对“我们”的。自冷战结束以来，就舆论、形象及思想的组织而言，欧洲已经逐渐变得几乎微不足道了。而美国（在巴勒斯坦本身以外的范围内）成了主战场。我们完全未能了解在这个国家里大规模地、系统地组织我们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而政治工作要达到的效果是，比如，当听到“巴勒斯坦人”一词时，美国普通百姓不会马上联想到“恐怖主义”。这样的工作才会真正保护我们在战场上抵抗以色列占领可能取得的任何成果。

使得以色列不受惩罚地对付我们的原因一直是，我们没有受到任何舆论体系的保护，没有靠它来阻止沙龙一边进行战争犯罪一边自诩是在反恐。鉴于美国有线新闻网播放的图像具有扩散面极广、持续不断、重复不止的巨大威力，例如，它将“自杀性炸弹”一词以每小时一百次的频率令人麻木地向美国消费者及纳税人播放，所以，我

们缺少像让汉娜·阿希拉维、莱拉·沙希德（Leila Shahid）、加萨尼·卡迪布和阿菲夫·萨非赫（Afif Safieh）——这里我只略举几人——这样一队人马长期驻守华盛顿，随时准备上美国有线新闻网或任何其他频道讲述巴勒斯坦的故事，提供背景和理解，为我们展示一个具有正面价值而不仅仅是负面价值的道德存在与叙事存在，这一缺失是个重大疏忽。我们未来领导层需要把这一点当做电子信息时代现代政治的基本教训来理解。未能懂得这一点是今天这场悲剧的一部分。

3. 在由一个超级大国支配的世界里，如果不是极其熟悉、深刻理解这个超级大国——美国，不了解它的历史、它的制度、它的正反潮流、它的政治与文化，要想在政治上负责地发挥作用，简直是徒劳。最重要的是，要精湛而有效地掌握它的语言。听到我们的诸位发言人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发言人荒谬地谈论美国之事，一心博取它的同情，一会儿诅咒它，另一会儿又乞求它帮助，而所有这些都是用残缺不全的拙劣英语表达的，这一切显示出如此原始的无能状态，实在令人欲哭无泪。美国不是铁板一块。我们有朋友，而且还有潜在的朋友。我们能培养、动员并利用我们在这里的社群及其分社群，作为我们解放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像南非人所做的那样，或者像阿尔及利亚人在争取解放斗争期间在法国所做的那样。谋划、训导与协作。我们完全不曾懂得非暴力政治。而且，我们也从未懂得：尝试直接面向以色列人发表言说，并以此作为包容与相互尊重的政治的一部分，将具有何种威力，而这正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面向南非白人发表言说的方式。共存是我们对以色列的排外主义与黩武政策的回答。这不是退让：这是在创造团结，从而孤立排外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以及原教旨主义者。

4. 我们需要理解的有关我们自身的最为重要的教训，非常清楚地

呈现于以色列目前在被占领土上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可怕悲剧之中。事实是，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尽管以色列猛烈攻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但我们的社会仍在发挥作用。我们是一个民族，因为有一个发挥作用的社会仍在继续运转——而且在过去 54 年来一直继续着——尽管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受到了种种虐待，经历了每个残酷的历史转折，遭受了所有不幸，体尝了每一次悲剧。我们对于以色列的最大优胜之处在于沙龙之流无法理解这一点，而这是他们注定失败的原因，尽管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和可怕的、野蛮的残忍。我们已经战胜了过去的悲剧与记忆，而沙龙这样的以色列人却没有。他将只能作为一个屠杀阿拉伯人的刽子手和一个给他的人民带来更多动荡不安的失败政客而走向坟墓。一个领袖当然必须留下些东西作为遗产供后人继承发扬。沙龙、沙乌勒·莫法兹（**Shaul Mofaz**）及其他所有与这场恃强凌弱、残忍成性的死亡与屠杀战役有关的人，除了墓碑之外将不会留下任何东西。否定滋生否定。

身为巴勒斯坦人，我认为我们可以说，我们留下了一个设想和一个社会。在经历了一次次毁灭它的企图之后，它依然存活下来。那并非无关紧要之事。未来将由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从那里出发，批评地、理性地、充满希望和克制地继续走下去。

《金字塔报》，2002 年 4 月 4—10 日

《生活报》，2002 年 4 月 7 日

《世界报》(*Le Monde*)，2002 年 4 月 11 日

## 28. 以色列干了些什么？

尽管以色列竭力限制有关它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镇及难民营进行极具毁灭性的入侵的报道，信息及图像还是被透露出去。因特网上提供了数百份目击者的语言与图像的报告，阿拉伯及欧洲电视也进行了采访报道，但大多数报道在美国主流媒体中要么无法得到，要么被封锁，要么被处理掉。这一证据强劲有力地证明了以色列的战役其实是（并且向来都是）为了什么，那就是对巴勒斯坦土地及社会的不可逆转的征服。官方腔调（它基本上得到美国支持，连同几乎每位美国媒体评论员的支持）是，以色列一直在通过报复自杀性炸弹袭击来进行自卫，而这种自杀性袭击破坏了它的安全，甚至威胁它的存在。这一论断进而获得了一个绝对真理的地位，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和它的实际遭遇都不能减缓这一趋势。

“拔除恐怖分子网络”、“捣毁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攻打恐怖分子老巢”这样一些短语被如此频繁地重复（注意这些短语中每个都包含彻底灭绝人性的要素），如此不经过大脑，以至赋予以色列为所欲为的权利，而其所欲为之事实上就是破坏巴勒斯坦平民生活，同时伴随着尽可能多的损害，尽可能多的肆意破坏、杀戮、羞辱、捣毁以及虽无目的却难以抵抗的技术暴力。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会得到像美国给予以色列那样多的认可与支持，而干出以色列那样的勾



当。没有哪个国家比以色列更顽固，更具破坏性，更脱离现实。

然而，有迹象表明，这些主张（如以色列“为生存而战”）的即使不说荒唐怪诞也是令人惊讶的性质，慢慢地被这个犹太国家及其嗜杀成性的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所实施的严酷无情的、几乎难以想象的破坏给侵蚀掉了。且看《纽约时报》记者瑟奇·施梅曼（Serge Schmemann）（他绝非巴勒斯坦的宣传员）于4月11日写的这篇题为《攻击将巴勒斯坦计划变成弯曲的金属与堆堆尘土》（*Attacks Turn Palestinian Plans into Bent Metal and Piles of Dust*）的头版报道：“无法评估对拉马拉、伯利恒、突卡门、卡尔齐亚（Qalqilya）、纳布卢斯（Nablus）以及杰宁等城镇造成的总体破坏的程度，此时它们依旧处在密集的围攻之下，巡逻队和狙击手还在街道中开火。但是可以肯定，生活本身和未来巴勒斯坦国的任何基础设施——道路、学校、高压电架、水管、电话线——都已遭到毁坏。”以色列军队一天动用了50辆坦克，发射了250枚导弹，出动了数十架F-16战斗机，围攻杰宁难民营长达一个多星期，而被围攻的不过是方圆一平方公里的一片棚屋，里面容纳着15000名难民和几十名手持自动步枪的男人，他们毫无防御，没有首领，没有导弹，没有坦克，什么都没有。以色列凭着什么样的野蛮逻辑，干出上述暴行并且还称之为对于恐怖主义暴力及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做出的回应？据报道，数百人被埋在瓦砾之中，而以色列推土机现在正试图将这些瓦砾堆到难民营的废墟之上。难道巴勒斯坦普通的男女老幼只是老鼠和蟑螂，可以被成千上万地杀死或袭击，而不用说一句同情他们或者为他们辩护的话吗？还有俘获的数千巴勒斯坦男人，他们被以军士兵带走后就杳无音信；众多贫穷和无家可归的普通百姓正试图在以色列推土机制造的、遍布约旦河西岸的废墟中挣扎求生；现在围攻已经持续了数月接着数月；巴勒斯坦所有城镇的水电都被切断；全面宵禁长达数日；食品及药物短

缺；受伤的人流血而死；救护车及援救人员受到系统袭击，就连性情温和的科菲·安南也对这种野蛮暴行进行了公开谴责。这一切又该怎么解释？这些行为不会被轻易遗忘。以色列的朋友可以问问它，它那自取灭亡的政策如何能给它带来和平、认同与安全。

世界上最强大、最可怕的宣传机器怪诞地将某一民族整个变成了“武装分子”和“恐怖分子”，这不仅让以色列军队，而且也使以色列的作家和辩护者队伍得以抹去巴勒斯坦民族这段受难与受虐的可怕历史，从而不受惩罚地消灭巴勒斯坦人作为公民的存在。从公众记忆中被抹去的有：1948年对巴勒斯坦社会的捣毁以及一个被放逐的民族的产生；1967年以来对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的征服和军事占领；造成17500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死亡以及萨布拉及沙提拉大屠杀的1982年的入侵；还有对巴勒斯坦学校、难民营、医院、各类民用设备的持续攻击。什么样的反恐目的要通过摧毁建筑，然后消除教育部、拉马拉市政当局、中央统计局、负责民权、健康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机构、医院以及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的所有档案记录来实现？沙龙决心不仅要“打垮”巴勒斯坦人，而且企图消灭他们作为一个拥有国家机构的民族的存在，难道这不是很明显吗？

在这样一个双方力量悬殊的背景下，不断要求巴勒斯坦人——他们既没有陆军，也没有空军、坦克或任何防御设施，也没有发挥作用的领导——“放弃”暴力，而对以色列的行为却没有作任何相应限制，这样做似乎十分疯狂。即使是我一贯反对的自杀性炸弹袭击一事，也不能站在这样的角度进行分析，即允许一个隐秘的种族主义标准来衡量生命价值，认为以色列人的生命价值要远胜过那些数量更多的巴勒斯坦人，而后者在以色列的长期军事占领中，在沙龙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的生涯直到现在对巴勒斯坦人公开实施的系统的野蛮行为中，有的死去，有的致残，有的受到歪曲，有的提前

夭折。

在我看来，不解决真正的问题就无法赢得可以想象的和平。真正的问题在于以色列全然拒绝接受巴勒斯坦民族的主权存在。巴勒斯坦人对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享有主权，而沙龙与他的大多数支持者却认为它完全属于大以色列的领土。《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 2002 年 4 月 6—7 日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沙龙小传，其中摘录了他自传中的一段非常生动的話作为总结。《金融时报》先说“他带着对父母信仰的自豪写道，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可以并肩生存”，接下来是摘自沙龙书中的相关引文：“但是，毫无疑问，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拥有对这块土地的权利。无人可以强迫他们离开，不管采取恐怖或任何其他手段。当这块土地从物质上属于你的时候……那就是你拥有力量的时候，不只是物质力量，而且还有精神力量。”

1988 年，巴解组织做出让步，接受了将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划分成两个国家的方案。这在很多场合都被一再重申，当然也在奥斯陆文件中被再次重申。但是只有巴勒斯坦人明确承认了国家分割的观念。以色列却从未承认过。这就说明为什么现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有超过 170 个定居点，为什么一个绵延三百英里的道路网把它们彼此连接起来并完全阻止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 [ 据以色列反房屋破坏委员会 ( *Israeli Committee Against House Demolition* ) 的杰夫·哈尔波提供的信息，这个道路网耗资 30 亿美元，是由美国提供资助的 ]，为什么自拉宾以来没有哪位以色列总理曾向巴勒斯坦人承认过任何真正的巴勒斯坦主权，当然也说明了为什么定居点每年都在增加。对一张最近的领土地图只需投上一瞥，就能明白以色列在整个和平进程中一直在干些什么，以及随之而来的巴勒斯坦生活中出现了哪些地理上的隔裂与收缩。于是，事实上，以色列认为它自己及犹太人完全拥有以色列这块土地：在以色列有确保这一点的土地所有法，但在约旦河

西岸及加沙地区，以色列定居点与道路交织成的网络以及在领土权利方面不向巴勒斯坦做出任何让步的态度，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官员——无论是美国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的、联合国的、欧洲的，还是其他部分的——向以色列提出过挑战，而且这一现象贯穿整个奥斯陆的文件、程序和协议。这当然就是为什么在将近十年的“和平谈判”之后以色列仍旧控制着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今天，这些土地更直接地被控制在一千多辆以色列坦克及数千名士兵手中，但潜在的原则却是相同的。没有哪位以色列领袖（当然不会是沙龙和他的“以色列领土”的支持者们，那些人是他政府里的多数派）正式承认那些“被占领土”是被占领土，或进而承认巴勒斯坦人可以或可能在理论上拥有主权，也就是说，以色列不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公认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控制其边界、水、领空与安全。所以，谈论关于一个巴勒斯坦国的“设想”——这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可惜仅仅是个设想，除非土地所有权和主权问题得到以色列政府的公开正式承认。没人这么做过，而且如果我说得不错，在不久的将来也无人会这么做。不要忘记，以色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从未在国际上宣布边界的国家；唯一不是为公民所有而是为全部犹太人所拥有的国家；唯一的90%以上土地只可供犹太人使用的国家。它也是世界上唯一从未承认过国际法的任何主要条款的国家[正如理查德·福尔克最近论证的]，这表明巴勒斯坦人不得不面对的那种全盘拒斥的态度究竟达到何种深度，在结构上又是多么的纠缠难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对有关和平的讨论及会议深表怀疑的原因。和平是个可爱的字眼，但在目前背景下，它只不过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将不得不停止抵抗，听任以色列控制他们的土地。阿拉法特的拙劣领导（更不必说那些总体上表现得更为可悲的阿拉伯领导人了）

的缺陷之一是，他既没有让长达 10 年之久的奥斯陆谈判集中在土地所有权这个问题上，因而从未责成以色列宣布它自愿从根本上放弃巴勒斯坦土地，也没有要求以色列为它给他的民族造成的苦难承担任何责任。现在我担心他可能只是在设法再一次拯救他自己，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国际监督员，以及可以确保巴勒斯坦民族拥有一个真正的政治未来的新选举。

以色列和它的民族所面对的深刻问题是：它愿意像其他任何国家那样在法律上承担起一个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同时断然放弃沙龙及其父辈及其士兵从一开始就一直为之奋斗的那些不可能实现的土地所有权主张吗？1948 年，巴勒斯坦人失去了 78% 的巴勒斯坦领土。1967 年，他们又失去了最后的 22% 领土。两次都是被以色列所得。现在国际社会必须责成以色列接受现实的而非虚构的领土划分准则，接受制约性原则，来限制以色列那站不住脚的境外领土要求、那些极其荒谬的以圣经为依据的权利要求，以及迄今为止使它完全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法律。为什么要不加质疑地容忍那种原教旨主义？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全都是巴勒斯坦人必须放弃暴力的呼声和对恐怖行动的谴责。对以色列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要求吗？它就能继续不计后果、一如既往地干下去吗？那就是它的存在的真正问题：它究竟是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还是必须永远凌驾于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接受的限制与责任之上。它的履历无法令人放心。

《金字塔报》，2002 年 4 月 18—24 日

《生活报》，2002 年 4 月 21 日

## 29. 美国犹太人的危机

几星期前，差不多在杰宁被围攻的同一时刻，华盛顿爆发了一场大张旗鼓的支持以色列的游行示威。所有演讲者都是著名公众人物，其中包括几位参议员、主要犹太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其他一些名流，他们每个人都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政府方面的代表是保罗·沃尔福威茨。他是国防部的二号人物，一位极端右翼的鹰派，自去年9月以来就一直大谈“终结”伊拉克这样的一些国家。同时作为一名众所周知的以色列的铁杆支持者，他在演讲中像其他每个人一样——赞美以色列并表达对它完全无条件的支持——但他却也出乎意料地顺便提及“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就因为这个措辞，结果嘘声鹊起，经久哗然，以至他无法继续演讲，而面带着愧地离开演讲台。

这事件的寓意在于，今天，公开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简直不能容忍人们对一个真实存在的巴勒斯坦民族给予任何考虑，除非是放在恐怖主义、暴力、邪恶及宗教狂热的背景中。而且，这种不愿见到、更不愿听到任何有关“另一方”的存在态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以色列人反阿拉伯情绪的狂热，而后者在巴勒斯坦当然是站在斗争的前线。最近在特拉维夫举行了六万人的反战示威，拒绝到被占领土服役的后备役军人数量在不断增加，一些知识分子及团体（不可否

认只有少数几个)在持续抗议,一些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以色列人愿意以撤离换取与巴勒斯坦人的和平相处。根据上述事实判断,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当中至少存在着很活跃的政治活动。但是在美国却并非如此。

两个星期前,发行量大约为一百万份的《纽约》(*New York*)周刊上刊登了一份题为《美国犹太人的危机》(*Crisis for American Jews*)的档案,其主题是“在纽约,就像在以色列一样,(这是)一个生存问题”。我不想概括这份特别声明的要点,只想说,依照杂志中引用的纽约一位著名人士的说法,它描绘了关于“在我生命中最珍贵的是以色列国”这样一幅痛苦焦灼的画面,以至于你会以为这个在美国所有少数民族中最繁荣、最强大的存在其实正在受到威胁。另外一个被引述的人甚至走得更远,竟暗示美国犹太人正濒临第二次大屠杀。的确,如这些文章的作者之一所述,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狂热地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行动。例如一名美国犹太人说,他的儿子正在以色列军队服役,而且他“全副武装,十分危险,而且正尽可能多杀巴勒斯坦人”。

虽然在美国身处富裕环境所感到的内疚对于产生这类虚妄思维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它的主要原因是沉溺于幻想和神话之中的那种极度自我封闭,而这些神话幻想则来自教育以及世上独一无二的毫无反思的民族主义。自大约两年前巴勒斯坦暴动发生以来,美国媒体及主要的犹太组织就一直在对阿拉伯世界、巴基斯坦甚至美国的伊斯兰教育发起各式的攻击。这些攻击指责伊斯兰国家当局以及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教育年轻人憎恨美国和以色列,推崇自杀性爆炸的美德,并且无限制地赞美圣战。然而却很少有人提到在巴勒斯坦冲突方面美国犹太人被教会了些什么:这块土地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那里原本没有人住;那里是被从英国人手里解放出来的;本

地人都逃走了，因为他们的首领让他们这么做；巴勒斯坦人其实只是最近作为恐怖分子才存在的；所有阿拉伯人都是反犹的，并且都想杀害犹太人。

在所有这些对仇恨的煽动之中，关于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存在的现实却无处可寻。更确切地说，从未有人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仇恨和敌意与以色列自 1948 年以来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一切联系起来。既然以色列是巴勒斯坦人的恼怒、敌意和无缘无故的反犹太主义的受害者，那么，仿佛整个剥夺史、对一个社会的毁灭、对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长达 35 年的占领，更不必说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轰炸、驱逐、没收土地、杀戮、围攻、羞辱、多年的集体惩罚以及行刺暗算，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大多数根本没想过，以色列是这些以犹太人民的名义实施的具体行动的实际创作者，从而将这些行动跟巴勒斯坦的愤怒和报仇的情感联系起来。

根本问题在于，作为人类，也就是说，作为跟其他民族一样拥有历史、传统、社会、苦难及抱负的人类，巴勒斯坦人是不存在的。对于大多数但绝非所有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来说，为什么会是如此，值得深究。这要回到在巴勒斯坦曾经存在本土居民这一认识上来——所有犹太复国运动领袖都曾知道这一点，而且也曾谈到这一点——但这一事实，作为一个可能妨碍殖民化的事实，永远不会被承认。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集体做法是要么否认这个事实，要么，在现实不大容易得到验证的地方，尤其是在美国，通过制造一个相反的现实来编织谎言。几十年来学童们一直被告知：当犹太复国运动的先驱们到达时，那里并没有巴勒斯坦人，因此，那些投掷石块和反抗占领的各式各样的人只不过是一群该杀的恐怖分子。总而言之，巴勒斯坦人不配拥有任何诸如民族叙事或集体现实之类的东西，



因此他们必须被改变或者解散，成为本质上的负面形象。这全然是歪曲教育的结果，它被逐渐灌输给数百万年轻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根本无从得知：巴勒斯坦人之所以被彻底地非人化，是为了达到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目的，即保持对以色列的高度支持。

令人特别惊讶的是，民族共存的观点对这种歪曲毫无作用。尽管美国犹太人想在美国被承认是犹太人及美国人，可他们却不愿意给另一个从一开始就受到以色列压迫的民族一个类似的、作为阿拉伯人及巴勒斯坦人的地位。

只有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才会上了解到，这个问题的深度远远超过了寻常政治。犹太复国运动的教育所呈现出的对巴勒斯坦人的知识上的压迫，已经制造出一种毫无反思的、被危险地歪曲的现实感，即：无论以色列做什么，它都是作为受害者在做这件事：根据我上面引述的各种不同的文章，处在被扩大化的危机之中的美国犹太人因此与以色列犹太人中的极端右翼分子同样感到他们身处危险，生死攸关。很显然，这与现实毫无联系，而是与一种带着极端缺乏思考的自恋倾向凌驾于历史和事实之上的幻觉状态有关。最近一次为沃尔福威茨演讲内容所作的辩护甚至没有提及他先前谈及的巴勒斯坦人，而只是在捍卫布什总统的中东政策。

这是大规模的非人化行为，同时不得不说，自杀性爆炸使非人化更为恶劣，如此严重地破坏了巴勒斯坦斗争的形象，也贬低了它的价值。历史上所有解放运动都强调他们的斗争关乎生而非关乎死。为什么我们的斗争就该例外？我们越早教育我们的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并且表明我们的抵抗行动所提供的是共存与和平，他们越无法随意杀害我们，无法仅将我们当做恐怖分子来谈论。我不是在说沙龙和内塔尼亚胡可以被改变。我说的是，需要在战略与战术上提醒巴勒斯坦的——不错，是巴勒斯坦的——选民，连同以色列及美国的选民：

军队、坦克、人体炸弹和推土机，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使双方产生更多的错觉和曲解。

《金字塔报》，2002年5月16—22日

《生活报》，2002年5月19日

## 30. 巴勒斯坦目前的选举

目前，关于巴勒斯坦的改革与选举有六种彼此不同的呼声：其中的五种，对于巴勒斯坦目标而言，既毫无用处又文不对题。沙龙想把改革作为使巴勒斯坦的民族生活进一步瘫痪的途径，也就是说，作为他持续干涉与破坏的失败政策的扩展延伸。他想去除阿拉法特，把约旦河西岸分割成用栅栏围住的诸多行政区，重新设置一个占领当局——最好是在巴勒斯坦人的帮助下完成——继续实施定居活动，同时用他一贯采用的方式维护以色列安全。他被自己的意识形态幻觉与痴迷过分冲昏了头脑，以至无法明白这既不会带来和平与安全，也肯定不会带来他一直喋喋不休地念叨的“平静”。在沙龙的计划中，巴勒斯坦选举是无关紧要的。

其次，美国主要想把改革作为一种打击“恐怖主义”（一个不考虑历史、背景、社会或任何其他因素的万能术语）的途径。乔治·W. 布什从内心深处厌恶阿拉法特，也完全不理解巴勒斯坦局势。说他与他那杂乱无章的政府在“企望”任何东西，都是在拔高这个政府的一系列表现（例如乍然腾跃、顿然发作、蓦然惊起，以及退缩回撤、谴责攻讦、发表矛盾声明等等）以及总体愿望（它自然并不存在）的转向。布什的政策一直都毫不连贯，除非是涉及以色列游说团的压力与议程，以及目前由他本人担当精神领袖的基督教右翼方

面。他的政策实际上包括要求阿拉法特结束恐怖主义，以及（当他想要安抚阿拉伯人时）由某人在某地以某种方式提出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并召开一个大型会议，最后要求让以色列继续得到美国完全无条件的支持，很可能其中还包括结束阿拉法特的职业生涯。除此之外，美国政策就只有坐等某人于某地以某种方式来予以明确表述了。但是，人们应该在心中永远牢记，中东问题在美国是个国内的而非国外的政策议题，而且受到难以预测的社会内部动力学的支配。

这一切都完全合乎以色列的胃口，它要的就是让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从整体上变得更悲惨、更无以为继，无论是通过军事入侵，还是通过符合沙龙那种永远根除巴勒斯坦人的狂热想法的不可能产生的政治环境。当然，也有一些以色列人想要与一个巴勒斯坦国共存，一些美国犹太人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目前这两个群体完全没有任何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沙龙及布什政府在操纵一切。

第三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要求。在我看来，他们的要求是由几个不同要素组成的，其中没有一个对巴勒斯坦人自身有直接帮助。首先是对本国人民的恐惧。本国人民一直在目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进行大规模的、而且基本上肆无忌惮的破坏，而阿拉伯却没有进行任何严肃的干预，或试图制止。贝鲁特峰会和平计划向以色列提出的恰恰是沙龙已经拒绝了的提议，即土地换和平，而且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威慑力的提案，里面连一份时间表都没有。虽然把它当做对抗以色列赤裸裸的黩武行为的砝码记录在案可能是件好事，但我们不应该对它的真正意图抱有任何幻想，就像呼吁巴勒斯坦改革一样，那只不过是做个样子给那些对其统治者的平庸无为感到彻底厌恶的阿拉伯民众看的。

其次，是大多数阿拉伯政府对整个巴勒斯坦问题的全然恼怒。他们对于以色列作为一个非法军事占领耶路撒冷、加沙地区及约旦河

西岸已长达 35 年之久、没有任何公开宣布的边界的犹太国家，或者对于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民族的行动，在意识形态上似乎感到心安理得。他们做好了友善调解那些可怕的不公正的准备，对阿拉法特及其民族的要求就是要么规规矩矩，要么安静地离开。

再次，当然就是阿拉伯领导人长期以来企图讨好美国以及争夺美国在阿拉伯的最重要盟国之衔的愿望。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是多么地蔑视，而且在美国，他们的文化及政治地位是多么不被了解与重视。

第四，是异口同声提倡改革的欧洲人，但他们也只是忙着派遣使者会见沙龙和阿拉法特，在布鲁塞尔大声发表声明，赞助几个项目——而且或多或少就只做到这一步，美国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阴影实在是太大了。

第五，是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一群共事者，他们突然发现了民主与改革（至少在理论上）的价值。我知道，我是在远离战场的地方发表见解，而且我也了解所有关于将被包围的阿拉法特视为巴勒斯坦抵抗以色列侵略的一个有力象征的看法，但是我认为这一切都不再有任何意义。阿拉法特只对保全自己感兴趣。他已有近乎十年的自由来经营一个小王国，并且基本上已成功地给他和他的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带来耻辱与蔑视。这个权力机构已经成了残忍、独裁和不可思议的腐败的代名词。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他在现阶段能够有所不同，或认为他那精简改良过的新内阁（还是由那几张失败而无能的旧面孔所主宰）将会做出实质性的变革，这简直毫无道理。他是一个长期饱受苦难的民族的领袖。在过去一年里，他使得他们遭受了无法承受的痛苦与艰辛，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缺乏一个战略计划，以及他不可原谅地依赖于以色列和美国通过奥斯陆来发慈悲。独立与解放的领袖根本不可能让手无寸铁的本国人民遭受沙龙这等战争罪犯的野蛮摧残而

不实施任何真正的防卫和事先准备。如果你既没有打赢战争的军事能力又没有结束它的外交手段，那为什么要激起一场受害者大多将是无辜百姓的战争呢？阿拉法特到目前为止已经像这样做了三次（约旦、黎巴嫩、约旦河西岸），不该再给他带来第四次灾难的机会。

他已经宣布，选举将于 2003 年初进行，但是他真正关心的是重组安全部队。在这些专栏中我一直指出，既然奥斯陆协定是在阿拉法特与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做交易的基础上签订的，那么他的安全机构主要是为了服务于他和以色列而设计的。以色列只关心它自己的安全，它让阿拉法特为此负责（顺便说一下，这是他早在 1992 年就欣然接受的职位）。与此同时，阿拉法特玩弄权术，让 15 个或 19 个或无论准确数字是多少个集团彼此争斗，这是他在法卡哈尼（Fakahani）（邻近贝鲁特，70 年代巴解组织在此设立办事处）运用得登峰造极的策略，而且就总体利益而言，那显然是愚不可及的。他从未驾驭过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这令以色列十分满意，因为这样一来它就有一个现成的借口，利用所谓殉道者的（愚蠢无知的）自杀性爆炸袭击，来进一步削弱和惩罚整个民族。如果说有什么比阿拉法特的破坏性政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更大的话，那就是杀害以色列平民这个灾难性的政策，因为它越发向世界证明了我们的确是恐怖分子，并且正在进行一场不道德的运动。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收获，无人能够说出。

因此，由于已经通过奥斯陆协议与占领做了交易，阿拉法特从未真正站到领导一场运动来结束占领的立场。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现在正在试图做另外一个交易，两者都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并向美国、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证明他应该得到另一次机会。我本人一点都不关心布什、阿拉伯领导人或沙龙说些什么：我感兴趣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该如何看待我们的领袖，而且我认为我们必须十

分明确地拒绝他关于改革、选举、重组政府及安全部队的整个计划。他的失败记录实在太可怕了，而且作为一位领袖，他的才能太薄弱，以至于无法再次尝试为他保留另一次机会。

第六，亦即最后，是巴勒斯坦人，他们现在有正当理由大声呼吁改革和选举。在我看来，这个呼声是我在此概括的六种情况中唯一合法的要求。有必要指出，阿拉法特的现任政府及立法委员会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原定任期。他们的任期早在 1999 年就该结束并进行新一轮选举。而且，1996 年选举的整个基础是奥斯陆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只允许阿拉法特和他的人民为以色列管理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的小块土地，谈不上真正的主权或安全，因为以色列保留了对边界、安全、土地（定居点的数量在此地增加了两倍，甚至三倍）、水及天空的控制。换句话说，选举和改革的旧基础是奥斯陆协定，现在已经无效。任何要在那种平台上继续前进的企图都只是白费力气，既不会带来改革，也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选举。因而就有了当前的混乱，它让每个地方的每名巴勒斯坦人都感到懊恼无比、沮丧万分。

如果巴勒斯坦合法性的旧基础确已不复存在，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当然不可能重返奥斯陆协定，就像不能回到约旦或以色列法律一样。作为一名研究重大历史变革时期的学者，我想指出，当与旧时代的重大决裂发生时（正如法国大革命导致君主政体的覆灭，或南非 1994 年选举前种族隔离政策灭亡），创造合法性之新基础的，必须是权力的唯一的、根本的来源，即人民自身。巴勒斯坦社会的主要行业，即那些维持生计的行业，除了所有的非政府组织之外，从工会到医疗工作者、教师、农民、律师和医生，现在必须成为即将建构的巴勒斯坦改革的基础——尽管存在以色列的入侵与占领。在我看来，等待阿拉法特或欧洲、美国、阿拉伯人来做这件事是毫无用处的：必须完全由巴勒斯坦人自己通过一个包括巴勒斯坦所有主要

社会阶层的立宪大会来完成。只有这样一个由人民自己创立的团体，而不是由奥斯陆体制的剩余人员，当然也不是由阿拉法特那蹩脚政府的残余分子创立的团体，才能有望成功地改组这个处于破坏性的、其实是灾难性的支离破碎状态下的社会。这样一个立法大会会有一个基本任务，即建立一个具有双重目的的治安应急系统。其一，保证巴勒斯坦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条不紊地进行。其二，选出一个紧急执行委员会，其使命是结束占领，而非与之谈判。很明显，我们在军事上绝不是以色列的对手。当力量的天平过分偏向一方的时候，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就失去了效力。我们需要做的是寻求一个创造性的斗争方法，它可以调动所有可供我们支配的人力资源来强调、孤立以色列占领的主要方面——即定居点、定居道路、路障及房屋破坏等方面——并逐渐使它们无法维持。目前阿拉法特身边的团体已无可救药，不可能想到，更不用说贯彻实行这样一个策略：它过于颓废沦丧，过于热衷腐败、自私自利，以往失败的负担过于沉重。

这样一个巴勒斯坦策略要想奏效，必须有以色列的个人和团体参与，必须与他们一起建立一个反占领斗争的共同基础。这是南非斗争的伟大经验：它提出了建立一个无论个人还是团体及领袖都不会从中受到排斥的多民族社会的构想。今天来自以色列的唯一构想，便是暴力、强制性隔离，以及继续让巴勒斯坦人服从犹太优越论的观念。当然，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相信这些东西，但是必须靠我们来提出在具有天然相互关系的这两个国家之间、在主权与平等的基础上彼此共存的理念。犹太复国主义中坚分子至今仍然不能提出这样的构想，因此它必须出自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新任领导层。在这样一个万物凋零、人人都渴望按自己的图像和自己的想法来重塑巴勒斯坦的时刻，新任领导层的新的合法性现在就必须确立。

我们从未面临过一个更为恶劣，同时又更具有创造潜力的时



刻。阿拉伯秩序一片混乱；美国政府被有效地控制在基督教右翼分子和以色列游说团手里（仅在 24 小时之内，乔治·W. 布什似已答应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每件事情都因沙龙的拜访而被逆转）；而我们的社会几乎已被拙劣的领导以及认为自杀性爆炸会直接促成一个伊斯兰巴勒斯坦国的疯狂想法摧毁殆尽。未来总是充满希望，但必须能够去寻找它，并在恰当的地方发现它。显然，我们在美国（尤其是在国会）缺乏任何真正属于巴勒斯坦或阿拉伯的信息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刻都不能自我陶醉，以为鲍威尔和布什将会为恢复巴勒斯坦而制定一个真正的议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说这项努力必须源于我们、由我们实施、为我们服务的原因。我至少在尝试提出一条不同的方法之路。除了巴勒斯坦人民以外，还有谁能建立他们用来进行自治并且凭借不滥杀无辜、不使我们失去更多支持的武器来反抗占领所需要的合法性？正义的目标可以轻易地被邪恶的、有缺陷的或腐败的手段所颠覆。我们越早将它付诸行动，就越有可能带领自己摆脱目前的僵局。

《金字塔报》，2002 年 6 月 13—19 日

《生活报》，2002 年 6 月 16 日

## 31. 单行线

即使是按照乔治·W. 布什其他演讲的低劣标准来衡量，他于2002年6月24日向世界所作的关于中东问题的演讲也是个令人吃惊的例子。其惊人之处在于，它将混乱不堪的思想、在活生生的人类现实社会里毫无实际意义的词句、反对巴勒斯坦人的那种说教式的种族主义训诫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盲目——对于以色列正在进行的、违背所有战争与和平法规而入侵占领的现实的一种妄想式的盲目——令人厌恶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切，都以一位道学的、顽固的、无知的、僭取了神圣特权、凌驾于美国外交政策之上的法官那样自以为是的腔调表达出来。并且，有必要记住，演讲者是一个实为盗取而非赢得选举之人，而他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履历包括最严重的污染、可耻的腐败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监禁率和死刑率。因此，这个除了盲目追求金钱与权力之外似乎别无才能的人，却有能力和裁定巴勒斯坦人不仅要听任沙龙这个战争罪犯宰割，而且还要承担他自己的空洞裁定带来的可怕后果。有世上三个最唯利是图的政客（鲍威尔、拉姆斯菲尔德和赖斯）侧立左右，他像个口才平平的学生一样用吞吞吐吐的口音宣读演讲，并因此允许沙龙在一场由美国埋单的非军事占领中杀死、杀伤更多的巴勒斯坦人。

布什的演讲不仅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缺乏历史认识，而且可能会

造成巨大危害的泛滥。这份演讲仿佛是由沙龙执笔的，它把美国对恐怖主义的过度失衡的着魔，与沙龙要在恐怖主义及“以色列土地”上犹太民族至高无上的红头标题之下消灭巴勒斯坦民族生活的决心，结合在一起。至于其他方面，布什对一个“临时的”巴勒斯坦国（不管它会是什么，也许类似于临时怀孕吧？）所做的敷衍式让步，以及他关于减轻巴勒斯坦人生活困难的不经意言谈，并没有给这份新声明增添任何东西。这份声明保证会在阿拉伯领导层中产生广泛回应，甚至可以滑稽地说，是积极回应。就回应的热情而言，亚西尔·阿拉法特堪称其中的领头羊。

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与美国之间五十多年来的交往最终扔进了垃圾箱，于是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就可以说服自己连同大量选民说：他们肩负着上帝赋予的铲除恐怖主义的使命，这里的恐怖主义基本上就是指以色列的所有敌人。纵览这五十年的历程即可明显看出，阿拉伯所持的反抗与顺从态度均未给美国关于其中东利益的认识带来任何改变。快捷而廉价的石油供应和保护以色列仍被当做它统治这一地区的两大主题。然而，从阿卜杜勒·纳赛尔（Abdel Nasser）时代直到今天的巴沙尔·阿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阿卜杜拉国王与胡斯尼·穆巴拉克时代，阿拉伯的政策经历了180度的逆转，其结果却或多或少都是一样。在万隆的反帝、反冷战哲学和纳赛尔主义的激励之下，独立后的阿拉伯首先形成了反抗性的阿拉伯联盟。这个联盟在1967年灾难性地结束了。

此后，在安瓦尔·萨达特为首的埃及的带领下，事态发生了变化：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开始出现合作，而这一合作是在美国掌控99%决策权这样的欺骗性原则之下进行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尚存的合作从1973年的战争及石油禁运时期的高峰逐渐衰退，直到挑起各国互相争斗的阿拉伯冷战阶段。一些弱小国家不时地变成战场（例如科

威特和黎巴嫩），然而，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阿拉伯国家体系的官方倾向变得完全将美国视做它们制定阿拉伯政策的关键因素来予以考虑。随着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不久就会爆发第二次）与冷战的结束，美国依旧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这并没有促使阿拉伯政策得到根本的重估，反而驱使各国更进一步单独地或双边地拥抱美国，而美国的反应实际上是视之为理所当然。阿拉伯峰会与其说是提出可靠立场的机遇，不如说是表达嘲弄鄙夷的场合。美国的决策者们很快意识到阿拉伯领导人仅勉强代表他们自己的国家，更不必说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此外，无须特殊天赋就能看出，阿拉伯领导人与美国之间签订的各种双边协议，对于其政权的安危要比对美国更为重要。更不用说那些琐碎无聊的嫉妒与仇恨实际上削弱了阿拉伯民族的力量，妨碍了它在现代世界中受到重视。所以，难怪今天正在遭受以色列占领之恐怖的巴勒斯坦民族有可能会像指责以色列人那样指责“阿拉伯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之前，阿拉伯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准备与以色列讲和，以此作为确保美国对他们善意相待的一种方式，例如 1982 年的非斯计划（Fez plan），确定要用与以色列和平相处来回报从所有被占领土撤离。2002 年 3 月阿拉伯峰会再次上演了同样的一幕——需要补充的是，这次犹如一场闹剧——效果同样微乎其微。而且准确地说，正是从 20 年前的那时起，美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从根本上彻底恶化了。正如美国前中央情报局资深分析家凯瑟琳·克里斯蒂森（Kathleen Christison）在美国双周刊《反击》（*Counterpunch*）（2002 年 5 月 16—31 日）上发表的一篇出色的研究成果中所指出的，旧的土地换和平公式被里根政府放弃，后来又受到克林顿政府的热情欢迎，而颇具讽刺的是，与此同时，阿拉伯的普遍政策，尤其是巴勒斯坦的政策，已经把精力集中于尽可能多方面安抚美国。到

1988年11月，巴解组织已经正式放弃了“解放”事业，并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NC）的阿尔及尔会议上（我当时也出席了会议）为两国的分割与共存进行投票表决；同年12月，亚西尔·阿拉法特公开宣布放弃恐怖主义，并在突尼斯开始了巴解组织与美国之间的对话。

海湾战争后出现的阿拉伯新秩序已将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单线流通状态制度化：阿拉伯国家给予以色列，而美国人给予以色列更多。1991年的马德里会议对巴勒斯坦来说是基于这一前提召开的，即美国承认巴勒斯坦民族并说服以色列也承认。我真切地记得，1991年夏季为了参加即将举行的马德里会议，一群巴解组织的资深人物以及包括我在内的无党派人士，应阿拉法特之邀来阐明一系列要求美国做出的保证，它将导致（尽管我们无人知道）1993年的奥斯陆进程。事实上，阿拉法特否决了我们关于美国保证的所有提议。他只想让美国保证他仍旧是巴勒斯坦方的主要谈判者；其他方面对他来说似乎都无关紧要，尽管一个由海德尔·阿卜杜勒·沙菲率领的出色的约旦河西岸及加沙代表团正在华盛顿开展工作，而其对手是一支强硬的以色列小组，在伊扎克·沙米尔指挥下，不做任何退让，并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将谈判延续10年。阿拉法特的想法是要通过提出更多的让步来砍自己人的价，这实质上就意味着只要他能继续当权，他就不会向以色列或美国提出任何更为重大的要求。

这件事连同1967年后的主要环境，已将巴美之间的动态关系凝固成奥斯陆及后奥斯陆时期这种持续至今的扭曲局面。据我所知，美国从未呼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或其他任何阿拉伯政权）建立民主程序。正相反，克林顿和戈尔在分别出访加沙和杰里科时都公开同意成立巴勒斯坦国家安全法庭，却很少强调（如果有的话）结束腐败、垄断及类似现象。我本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撰文探讨

阿拉法特统治存在的问题，但人们对我所说的话（绝大多数被证明是正确的）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公开嘲讽。我被指控为乌托邦式的不切实际。很显然，对于以色列人、美国人以及其他阿拉伯人来说，存在着一致的利益需要，使得这个权力机构保持现状，继续让它要么作为以色列的警察机关，要么，随后成为以色列人乐于憎恨的一切事物的焦点。没有哪一次对占领的严肃抵抗是由阿拉法特发起的，而且他继续允许一伙武装分子、巴解组织的其他派系以及安全部队在公民土地上肆无忌惮地蛮横驰骋。在整个人口丧失了奥斯陆协议之前50%以上生计之时，有人却大发不义之财。

暴动改变了一切，也结束了巴拉克的任期。它为沙龙再次登台亮相铺平了道路。而阿拉伯的政策仍旧是安抚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个微妙迹象是，阿拉伯国家的言论在此发生了变化。约旦的阿卜杜拉完全停止在美国电视上批评以色列，而总是提到“双方”需要停止“暴力”。从其他主要阿拉伯国家的言谈中也听到类似话语，就是说，巴勒斯坦问题已经变成了无法容忍的麻烦，而不是有待纠正的不公。

最重要的是，在他们之间，以色列的宣传，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蔑视，阿拉伯（以及巴勒斯坦）在阐明和代表本国人民利益方面的无能，导致了对于巴勒斯坦的大规模的非人化趋势，他们每天每日甚至每时每分遭受的巨大苦难，变得无足轻重。就好像巴勒斯坦人根本不存在似的，除非有人实施恐怖行动，那时整个世界媒体都会跳将起来，举起一块写着“恐怖分子”的巨毯，来窒息他们那拥有真实历史和真实社会的、能呼吸能感觉的现实存在。据我所知，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系统的非人化行动可与这次相比，尽管在某些地方不时会听到一些反对之声。

最终令我担心的是在这场非人化行动中阿拉伯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合作（用勾结一词更为贴切）。我们在媒体中的少数代表人物充

其量能胜任不带感情地谈论布什演讲或米契尔计划的是非功过，但他们中所有我见过的人都绝口不提本民族遭受的苦难、历史或现状。我经常谈到有必要在美国开展大规模的反占领运动，但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处在以色列这种可怕的、卡夫卡式的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发动一场运动的可能性很小。我认为我们的希望在于（正如我在上篇关于巴勒斯坦选举的文章中所建议的那样）尝试在草根层面建立一个立宪议会。我们作为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政策被动接受对象已经为时太久，以至于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巴勒斯坦人来说，目前要迈出自己独立的、奠基性的一步，努力建构一个自我生成的新程序，来为我们创立一个空前优越的政体的合法性和可能性，这一切是多么的重要，而且确实确实是多么的刻不容缓。到目前为止宣布的所有内阁重组与筹划的选举都是用奥斯陆协定的碎片和废墟耍弄的无聊把戏。阿拉法特和他那筹备民主政体的议会，其行为就像是企图将打碎的玻璃杯重新拼凑在一起。

然而，幸运的是，两周前一个叫做“巴勒斯坦国家创始（**Palestinian National Initiative**）”的崭新组织由它的缔造者易卜拉欣·达卡克、穆斯塔法·巴尔古提及海德尔·阿卜杜勒·沙菲宣布成立，恰好对这一需求做出了回答。它跳出了巴解组织和哈马斯之类组织在提供一条不依赖于（在我看来，这很可笑）美国及以色列发善心的道路方面的失败。这一“创始组织”为我们的民族提出了一个伴随着正义、共存以及（至关重要的）世俗社会民主的和平构想，这在巴勒斯坦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只有一群牢固植根于公民社会、未遭受通敌行为和腐败行为污染的独立人士，才有可能提出我们所需的新合法性的纲领。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宪法，而不是阿拉法特玩弄的基本法；我们需要真正的代议民主制度，而这样的民主只有由巴勒斯坦人通过奠基性的国民议会才能为自己提供。这是唯一可以扭转已经影响

到阿拉伯世界太多区域的非人化趋势的积极措施。否则我们将会沉沦于自身苦难之中，并将继续忍受以色列集体惩罚的可怕磨难，而它只能被集体政治独立所阻止，对此我们仍然大有可为。克林·鲍威尔的善意和传说中的“温和”永远不会替我们做到这些。永远不会。

《金字塔报》，2002年7月11—17日

《生活报》，2002年7月22日



## 32. 缓慢死亡：细致入微的惩罚

除了明显的身体不适之外，长期生病使在我精神上感到可怕地无助，但有时也让我获得一种条分缕析式的清晰感，这当然必须倍加珍惜。过去三个月，我一直出入医院，一连数日经历漫长而痛苦的治疗、输血、没完没了的检查，几小时接着几小时的时间徒然花费在眼望天花板、排解疲劳和消除感染，无法正常工作，此外就是不断地思考、思考、思考。但是也有些断断续续的洞察与反思的时段，让我的大脑从一个不同角度来观察日常生活（不能做得太多）。读来自巴勒斯坦的新闻，在电视上看到死亡与毁灭的可怖画面之后，我从那些细节中推断出了以色列当局的政策，尤其是阿里埃勒·沙龙脑子里一直在盘算什么，这使我彻底地感到惊骇。而且，在加沙地区近日遭到沙龙的 F-16 战斗机轰炸并导致九名儿童丧生之后，据称他还对飞行员表示祝贺并吹嘘以色列取得了伟大胜利。此情此际，我比以往更加清晰地意识到他的头脑可以达到多么病态疯狂的程度，我的根据不仅在于它策划了什么、下达了什么命令，而且还在于更为恶劣的方面，即它如何设法说服别的头脑也用同样欺骗、犯罪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进入这位以色列官员的头脑，虽令人毛骨悚然，但也是值得一试的体验。

然而，在西方，巴勒斯坦自杀性爆炸一直被给予如此重复不

变、毫无教益的关注，以至于对事实的明显歪曲已彻底掩盖更为恶劣的事实：以色列官方对巴勒斯坦民族有预谋、有计划地犯下的也许就是独一无二的沙龙式罪恶。自杀性爆炸是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它是多年的虐待、无力感与绝望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而在我看来，也是有意谋划的结果。它与所谓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暴力倾向没有多大关系，正如它与月球人无关一样。沙龙想要的是恐怖主义，不是和平，而且他尽其所能地为此创造条件。但是，尽管有其恐怖存在，巴勒斯坦暴力，一个受到极端压迫的绝望民族做出的反应，已经被从它的背景以及导致它的可怕苦难中剥离开来：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人性的失败，而人性虽不会让事情变得少一些可怕，但起码可以将它置于真实的历史与地理背景之中来予以考虑。

然而，巴勒斯坦恐怖——它当然是恐怖——究竟位于何处，却未被允许有片刻机会来予以呈现。它被如此冷酷地当做一种孤立现象，一种纯粹的、无缘无故的恶而备受关注，以至以色列据称是为了纯粹的善而一直以各种骇人听闻、比例悬殊的暴力行为对 300 万巴勒斯坦平民进行道义战争。我在此谈论的不仅是以色列对舆论的操纵，而且还包括它对美国相应的反恐战役的利用，没有这一点，以色列就无法办到它现已得逞之事。（事实上，我想象不出在这个世上还有任何其他国家，以晚间电视节目观众之目力所及，曾创造过如此奇迹：对整个社会细致入微地施虐并且可以逃避惩罚。）将这一罪恶有意识地转化成乔治·W. 布什反恐战役的一部分，并轻而易举地、非理性地放大美国的幻想与偏执，这样的策略在其盲目的毁灭性之中扮演的绝非微不足道的角色。正如那些就美帝国主义的善良目的及必要性发表了宏篇谬论的浩浩荡荡、狂热亢奋的（而在我看来完全是腐败的）美国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以色列社会也已临时征用了大量学者、智囊团里的政策知识分子以及正在从事国防工作及公关事务的退

役军人，全都用来使非人道的惩罚政策合理化并令人信服，而这些政策据称是为了满足以色列安全需要而制定的。

现在，以色列的安全就像独角兽一样，是一只虚构的动物。它总是在被猎取或搜寻，却从未找到，但还是永久性地变成了将来行动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其实已经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让它的邻居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简直不值得给予片刻关注。但是，究竟由谁来挑战主张用以色列安全来界定我们生活的道德世界的观点呢？当然不是30年来为了以色列安全而放弃一切的阿拉伯与巴勒斯坦领导层。鉴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及与之规模相差不大的其他阿拉伯国家造成的破坏比世界任何国家都要大，鉴于以色列拥有核武库、拥有美国纳税人无限供应的空军、海军和陆军，难道不应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吗？结果是，巴勒斯坦人每天每日、每分每秒都不得不经受的事件都被隐藏起来，更重要的是，被完全符合沙龙及可悲的乔治·W. 布什口味的有关自卫与打击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恐怖分子的巢穴、恐怖分子的炸弹工厂、恐怖分子嫌疑犯——清单上名目无限）的逻辑所掩盖。于是，关于恐怖主义的观念已获得独立生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合法化，却毫无证据、毫无逻辑，也毫无理性论证。

例如，一方面是阿富汗的毁灭，另一方面是对近一百名巴勒斯坦人的“定向”暗杀（更不用说被以军围捕的、至今仍被关押的数千名“嫌疑犯”）：无人去问是否所有这些被杀者其实都是恐怖分子，或被证明是恐怖分子，或——就像他们中多数人那样——即将成为恐怖分子。他们都是被一些简单的、未受质疑的断言假定成危险人物的。你只需要有一两个像粗鄙的拉南·吉辛（Ranaan Gissin）、阿维·帕斯纳（Avi Pazner）或多尔·戈尔德（Dore Gold）这样傲慢的发言人，并且在华盛顿有像阿里·弗来舍（Ari Fleischer）这样一

个不停地为无知和顾此失彼的表现进行辩护的人，那么上述靶子就必死无疑。没有怀疑，没有质问，没有异议，无须提供证据或任何这类讨厌的精确细节。恐怖主义与对它执迷不悟的追击，已经构成一种循环论证、自我实现的谋杀，还有那些既别无选择又无法辩解的敌人的缓慢死亡。

除了阿米拉·哈斯、吉登·列维、阿莫斯·艾龙（Amos Elon）、坦尼亚·赖因哈特、杰夫·哈尔波、伊斯拉埃尔·沙米尔（Israel Shamir）和其他几个无畏的记者与作家所写的报道外，以色列媒体中公共话语的质量与诚信在急剧下降。爱国心与对政府的盲目支持已经取代了质疑性的反思和道德上的严肃。伊斯拉埃尔·沙哈克（Israel Shahak）、雅各布·塔尔蒙（Jacob Talmon）及乔舒亚·莱布维奇（Yehoshua Leibowitch）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我想不出有几个以色列学者和知识分子——像泽夫·施特恩赫尔（Zeev Sternhell）、乌里·亚弗纳瑞（Uri Avnery）和依兰·帕佩（Ilan Pappé）一样——敢于摆脱关于“安全”与“恐怖主义”的愚蠢而低劣的辩论，而这种辩论似乎已主宰以色列的和平精英，甚至征服了正在迅速减少的左翼反对派。每天都有用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而这些知识分子却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策略性的撤退，也许在谈论是否将定居点合并起来，或是否继续建造巨大的隔离墙（在现代世界里有谁想过比这更疯狂的念头，即你可以把数百万人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宣称他们不存在？）。他们谈论的方式更适合一位将军或政客，而不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和特定道德标准的风格。纳迪娜·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安德烈·布林克（Andre Brink）、阿索尔·富加德（Athol Fugard）这些白人作家曾毫不含糊地坚决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罪恶，而以色列的对应人物又在何处？他们在以色列根本不存在。在这里，作家和学者发表的公开言论已经陷入模棱两可

和对官方宣传的重复，而且大多数真正的一流作品与思想甚至已从学术圈中消失。

但是，若要回过头来谈论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和过去数年来一直如此顽固地支配着该国的思想倾向，不妨考察一下沙龙的计划。它完全是要通过钳制、直接谋害和对日常生活的扼杀等逐步实施的系统手段来除掉一个完整的民族。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定居点、军事区域及被占领的乡镇，对巴勒斯坦土地进行持续不断的剥夺：通过奥斯陆进程，以色列只退让了 18% 的西岸地区及 60% 的加沙地区的土地，而这两个地区现在已被重新占领和多次再度分割。卡夫卡写过一部名为《在流放地》的了不起的短篇小说，描写一名疯狂的军官炫耀一部异常精细的酷刑机器，其用途就是在罪犯全身刺字，用一种带针的复杂仪器刻下细小的文字并最终导致囚犯流血而亡。这就是沙龙和他那群自告奋勇的刽子手们正在对巴勒斯坦人所做之事，却只遭到最为有限而且是最流于象征性的反对。每个巴勒斯坦人都已变成囚犯。加沙地区被电网的围墙三面包围；加沙人像动物一样被关押起来，不能挪动，不能工作，不能出售蔬菜水果，不能上学。在空中，他们被暴露在以色列飞机和直升机之下，在地面，他们像火鸡一样被坦克和机关枪击毙。加沙充满贫穷与饥饿，是人类的一场噩梦，它的每个小插曲——例如在伊莱兹（Erez）或在定居点附近发生的事件——都包含了数千士兵对每个巴勒斯坦人的羞辱、惩罚及无法忍受的摧残，哪管年龄、性别或是否有病。医疗供应被阻挡在边界，救护车被射击或扣留。在对平民实施系统的集体惩罚时，数百座房屋被毁，数十万树木和农田被破坏，而这些平民中大多数早在 1948 年以色列毁灭他们的社会时就已经沦为难民。希望一词已从巴勒斯坦字典里删去，所以只剩下原始的抵抗，而沙龙和他那帮残忍成性的宠臣们还在喋喋不休地大谈要通过至今已持续 35 年的不断蚕食

渗透式的占领来消除恐怖主义。这场运动本身就像所有殖民主义野蛮行径一样，是徒劳无益的，或者说，它将会招致巴勒斯坦人更多的、而非更少的反抗，但这些根本无法进入沙龙那不开窍的头脑。

一千辆以色列坦克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其唯一目的就是向平民开火并恐吓他们。宵禁被强制实施长达两个星期，从未间歇。中小学与大学要么被关闭，要么无法前往就读。无人可以旅行，不仅在九座主要城市之间，即使在市内也是如此。每个城镇如今都已变成一片废墟，遍布着摧毁了的建筑、遭受劫掠的办事处以及被故意破坏的供水、供电系统。商业已经废止。半数儿童营养不良。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于每天不到两美元的贫困水平。在杰宁地区（以色列装甲部队在该地破坏难民营的行为构成严重的战争犯罪，却从未被调查，因为科菲·安南之流胆怯的国际官僚们在受到以色列威胁时都退避三舍），坦克开火射杀儿童，但那只是以色列士兵造成的巴勒斯坦平民永无休止的死亡河流中的一滴，而这些士兵以其忠肝义胆、毫无贰心的效力，为以色列提供非法军事占领。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主义嫌疑犯”。这一占领行为的灵魂在于彻底纵容年轻的以色列士兵在检查站对巴勒斯坦人实施所有已知形式的私人折磨与卑鄙手段。其中包括在烈日下长达数小时的等候；接下来是扣留医疗供应品和农产品直至其腐烂变质；还有肆意侮辱的言辞与殴打；吉普车和士兵突然向排队等候在数不清的检查站前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横冲直撞，使得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成为令人窒息的地狱；让数十名青年人在太阳下一跪就是数小时；强迫男人脱掉衣服；当着孩子的面谩骂与羞辱他们的父母；只因一时兴起就禁止病人通过；阻止救护车并向它们开火。巴勒斯坦人的死亡数目（四倍于以色列人）每天都在稳步增加，大部分是无法统计的。虽然有了更多的“恐怖主义嫌疑犯”，外加他们的妻子与儿女，但“我们”对那些人的死亡深表遗憾。谢谢你们。

以色列时常被称为民主政体。若果真如此，那么它就是一个没有良知的民主政体，一个其灵魂已被惩罚弱者的偏执所俘获的国家，一个忠实地反映其统治者沙龙的变态心理的民主政治。沙龙的唯一想法——如果那是对它的恰当措辞的话——就是杀死、减少、摧残、驱赶巴勒斯坦人，直至“他们崩溃”。除此之外，他没有为他的运动提供更为具体的目标，现在或过去都是如此，而且就像卡夫卡小说中那个饶舌的军官一样，他最为得意于他用来虐待毫无防御能力的巴勒斯坦平民的机器。他一直在用荒诞的谎言大肆煽动虐待行为，而这些谎言的制造者有他的朝中顾问、哲学家与将军，还有那些随声附和的忠实的美国仆人。没有巴勒斯坦占领军，没有巴勒斯坦的坦克、士兵、武装直升飞机、炮兵，没有值得一提的政府，但是存在着以色列发明的“恐怖分子”和“暴力”，这样一来它自己的神经症就可以刻到巴勒斯坦人身上，而不会遭到以色列的绝大多数落后哲学家、知识分子、艺术家以及和平积极分子的有效抗议。现在，巴勒斯坦的中小学、图书馆和大学停止正常运转已长达数月：我们仍在等待着西方维护写作自由的团体和在美国的喧闹的学术自由捍卫者们来抬高他们抗议的声音。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西方，我都没有见到哪个学术组织就完全取消巴勒斯坦人获取知识、学问及上学的权利一事发表过声明。

总之，巴勒斯坦人必须缓慢地死去，这样以色列才能得到它的安全。这个安全就在不远处，但是由于以色列特殊的“不安全”而不能实现。整个世界必须深表同情，但巴勒斯坦的孤儿、生病的老妇、痛失亲人的社群以及备受折磨的囚犯们的哭喊声却根本无人听到，而且未被记录下来。无疑，我们会被告知，这些恐怖行为具有更远大的目的，绝非仅仅为了残酷虐待。毕竟，“两边”都参与了一个“暴力的循环”，必须在某时、某地中止这个循环。有时我们应该

停下来并愤怒地宣布只有一边拥有军队和国家，另一边是没有权利、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现存方法、失去了国家的民族。那些描写痛苦与日常具体生活的语言要么已被劫持，要么被歪曲到如此程度，以至在我看来毫无用处，除非是作为纯粹的虚构，来掩护更多的杀戮和煞费苦心的折磨——慢慢地、一丝不苟地、残酷无情地进行。那就是巴勒斯坦人所受苦难的真相。但无论如何，以色列的政策终将会失败。

《金字塔报》，2002年8月8—14日

《生活报》，2002年8月10日



### 33. 阿拉伯的分裂与派系斗争

在被反复引述的 2002 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的大部分调查结果背后, 是阿拉伯国家之间协调关系的极度缺乏。巨大的讽刺存在于如下事实之中: 在这份报告及其他报告里, 阿拉伯都是被作为一个团体来讨论和提及的, 尽管它们似乎很少以团体的形式发挥作用, 除非是消极作用。该报告正确地认为: 阿拉伯不存在民主政治, 阿拉伯妇女一律是被压迫的大多数, 而且在科学技术方面每个阿拉伯国家都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确, 他们之间很少有战略上的合作, 而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几乎为零。至于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 如在对待以色列、美国和巴勒斯坦的政策方面, 尽管共同表现出难堪的绝望和可耻的无能, 但首先可以感觉到一种充满惊恐的坚定决心, 即: 不去冒犯美国, 不与以色列交战, 或与以色列保持真正的和平, 甚至在影响到整个阿拉伯未来或安全的事情上, 也不曾想到要结成一个共同的阿拉伯阵线。然而一旦涉及每个政权的江山永固事宜, 阿拉伯统治阶层则在共同目的与生存技巧上联合起来。

我深信, 这种懒惰和无能的混乱状态, 对每个阿拉伯人来说都是侮辱。这也正是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埃及人、叙利亚人、约旦人、摩洛哥人及其他国家的人们走上大街, 支持正在遭受以色列占领

之噩梦的巴勒斯坦人民，而阿拉伯领导层却在一边袖手旁观，无所事事。街头示威不仅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也是对阿拉伯的分裂导致的瘫痪后果的抗议。表明人们幻想破灭的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标志是一幅频繁出现、令人心如刀绞的电视画面：一位巴勒斯坦妇女面对她那被以色列推土机铲倒的房屋废墟，对着全世界大声哀号“*Ya Arab, ya Arab*”（“啊，你们这些阿拉伯人啊，你们这些阿拉伯人啊”）。没有什么比这样的陈词更能证明阿拉伯（大多是未经选举而掌权的）领导人对本国人民的背叛，即：“为什么你们阿拉伯人不做任何事来帮助我们？”尽管有着富足的金钱与石油，在场的却只有无动于衷的旁观者那铁石般的沉默。

可叹的是，即使是在单个国家层面上，分裂与派系斗争也已使国家的努力一个接一个受挫。就拿巴勒斯坦民族这个最悲哀的例子来说吧。记得在安曼和贝鲁特的日子里我曾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有 8 到 10 个巴勒斯坦派系在某处存在？当以色列及当地民兵让我们鲜血流尽而死的时候，为什么各个派系却还在为有关意识形态与组织方面的无聊学术问题争论不休？不妨回顾一下最后以萨布拉及沙提拉的可怕结局而告终的黎巴嫩岁月：是为了达到谁的目的，让巴勒斯坦的人民阵线、法塔赫及民主阵线——在此只提三个派别——彼此之间互相争斗，在以色列出于自身目的联合黎巴嫩右翼民兵破坏巴勒斯坦存在的时候，让法塔赫内部的领袖宣布“通往特拉维夫的路要从宙尼（Jounieh）经过”这样一些毫无用处的挑衅性口号？而且是什么原因驱使亚西尔·阿拉法特使用策略，在奥斯陆进程期间制造各个派系、下属团体和安全部队彼此之间的你争我斗，让他的人民对以色列破坏基础设施及再次占领 A 区的行动毫无防御、毫无准备？

每次总是同样的原因，即派系斗争、分裂、缺乏共同目标，最终让平民百姓要在痛苦、流血与无尽的毁灭之中为此付出代价。甚至

在社会结构层面上，阿拉伯人作为一个群体也是内部相互争斗胜过谋求共同目标，这几乎是家常便饭。我们是个人主义者，这话说得理直气壮，它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种分裂与内部瓦解最终损害的正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没有什么比那些腐蚀侵害阿拉伯海外组织的争议纠纷更令人沮丧的了，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相对较小的阿拉伯社群被充满敌意的环境和好战的对手们包围，而这些人会毫无顾忌地诽谤阿拉伯的斗争。尽管如此，这些社群不是试图团结起来并肩作战，而是被一些大可不必的意识形态及派系之争弄得四分五裂。就其周边环境而言，这些争斗，既无关紧要，也毫无必要。

几天前，半岛电视台的一个讨论节目让我感到震惊。节目中有两位参与者和一位大可不必挑衅的主持人就目前危机期间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激进主义展开激烈讨论。其中一个人，某位在华盛顿被含糊地看做“政治分析家”（没有明显的所属关系或与某个机构的联系）的达尔巴哈（Dalbah）先生，将所有时间花在诋毁一个严肃的全国性阿裔美国人团体，“美国阿拉伯人反歧视委员会”（ADC），谴责这个组织毫无效率，指责它的领导人有利己主义、机会主义和个人腐败。另一位我记不得名字的先生，承认自己来美国只有几年，对正在发生之事似乎不大了解，这当然不是指他自诩的比社群其他领袖们更胜一筹的想法。虽然我只看了这个节目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但我还是彻底失望了，甚至为这场讨论感到羞耻。我不禁自问，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不仅是在一个阿拉伯人数量和组织程度都远远不及为数众多、更加强且资金极为雄厚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形势下，而且还是在这个社会本身及媒体普遍地对阿拉伯人、穆斯林及其事业如此充满敌意的国家里，去诋毁一个迄今为止表现得最为出色的组织，究竟有什么用？当然一无用处，但它却是致命的党派之争的一个例子。在党派之

争驱使下，阿拉伯人几乎条件反射般地试图相互伤害、彼此妨碍，而不愿在共同的目标之下联合起来。如果这样的行为在阿拉伯本土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话，那么显然更没有理由在国外如此行事，因为在那里阿拉伯个人和社群被当做不受欢迎的异类及恐怖分子而成为攻击的靶子，并受到威胁。

更令人憎恶的是，半岛电视台的这个节目对于将一生实实在在地奉献给 ADC 事业的已故哈拉·萨拉姆·马克苏（Hala Salam Mak-soud）和 ADC 现任主席齐亚德·阿萨利医生，一位自愿放弃行医来无偿管理这个组织的极富公德心的内科医生，给予了无缘无故偏离事实的报道和毫无必要的个人伤害。达尔巴哈一直在含沙射影，暗示这两位活动家是受个人金钱目的驱使，而且无论 ADC 做过什么，它都做得很糟。除了这些诽谤性的不实断言之外，达尔巴哈那无聊且充满恶意的流言——仅仅是流言而已——也伤害了阿拉伯的集体事业，接踵而来的将是愤怒与更多的派系纷争。而且，应该指出，鉴于美国政治环境对阿拉伯事业极不友好，作为一个能在“9·11”后在媒体上驳斥对阿拉伯人的指控、保护个人免受政府迫害、让阿裔美国人介入和参加全国辩论的组织，ADC 在华盛顿乃至全国都是非常成功的。正因为是在阿萨利领导下取得的成功，所以党派之争便感染了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突然开始发起一场以意识形态争论为幌子的个人诽谤运动。当然，每个人都有批评的权利，但是，当面对我们在美国遇到的这些威胁时，既然十分清楚唯一的受益人是亲以色列游说团，为什么我们还要如此这般分裂和削弱自己呢？ADC 这样的组织首先是美国的组织，在斗争中不能像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法卡哈尼（Fakahani）游击队那样发挥作用。

导致我们阿拉伯社会的无论哪个层次、无论国内国外到处存在的党派之争的主要原因，或许是明显缺乏理想和榜样的作用。自加麦

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去世后，无论你会怎样看待他的一些更具破坏性的政策，却没有一个人唤起过阿拉伯人的想象或起到发动一场大众解放斗争的作用。再看看巴解组织的这位灾难性人物，他已从过去的辉煌降格为一个胡子拉碴的老人，坐在拉马拉破成半截的房子里的一张垮塌桌子旁，试图不惜任何代价地活下来，不管是否背叛，是否满口蠢话，言谈是否有任何意义。（据称几星期前他表示现在愿接受克林顿 2000 年提出的计划；唯一的问题是，现在已是 2002 年，而且克林顿已不再是总统）。阿拉法特已经多年不曾代表他的人民、他们的苦难和事业。与阿拉伯其他类似领袖一样，他像个熟透的水果一样紧悬枝头不放，而没有真正的目的和立场。因此，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没有一个强劲有力的道德中心。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理性讨论已经给让位给狂热的咆哮，谋求解放的协同行动已经降格为自杀式袭击，以正直与诚实为楷模的观念（且不论行动）已经荡然无存。阿拉伯世界里散发出的空气是如此的腐败，以至于人们几乎弄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获得成功而另一些人却锒铛入狱。

埃及社会学家萨阿德丁·易卜拉欣的命运就是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例子。他在几个月前被民事法庭释放后，现在又被国家安全法庭审讯，并被判定有罪，而且正是由于早先据以将他释放的那些“罪”而做出的极不公正的判决。如此戏弄一个人的生活、事业和名誉，天理何在？大约几个月前，他还是一位受到政府信赖的顾问和几个阿拉伯学会、项目的董事会成员，现在他却被当做一名判了刑的罪犯。对他的无理惩罚是为了满足何人利益？是为了国家的统一，还是基于前后连贯的战略，抑或是出于道德的需要？其结果却只是导致更多的派系斗争，更多的瓦解，更多的漂浮不定和恐惧，以及对正义的普遍失望。

长久以来，阿拉伯人已经被他们的领导人剥夺了参与意识和公民意识，以至于我们大部分人甚至已不能理解个人投身于比我们的一己追求更为高远的事业可能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巴勒斯坦的斗争是一个集体奇迹——一个民族不得不忍受以色列如此从不间断的残忍行径却仍未放弃——但是为什么不能让这些现存的（与自杀性和虚无主义相反的）抵抗经验更加明确，而且更有可能被效法？这是真正问题之所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内外缺乏一个可与民众交流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不是通过那些对公民漠然无动于衷、几乎不屑一顾的公报来与市民交流，而是通过齐心奉献与个人表率之身体力行来与其沟通。阿拉伯的领导人未能转变美国对以色列罪行的非法支持，只是抛出一个又一个（相同的）“和平”建议，而这些建议都被以色列和美国嘲弄式地一一驳回。布什及其变态党羽拉姆斯菲尔德不停地透露出他们即将为了“政权更替”入侵伊拉克的消息，而阿拉伯人却尚未通过交换意见的方式针对美国这一新的疯狂举动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威慑作用的立场。当 ADC 这样的个人与组织试图为事业做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却遭到那些只会破坏捣乱的闹事者们的狙击。

确实到了开始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拥有共同历史、共同目标的民族而非懦弱的群氓来看待的时候了。但是，那要取决于每个人，而且，只是一味指责“阿拉伯人”而不采取任何行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毕竟阿拉伯人正是我们。

《金字塔报》，2002年8月15—21日

《生活报》，2002年8月19日

## 34. 无力的极点

60年前，欧洲犹太人处于集体生存的低谷。他们被纳粹士兵像牛羊一样成群地赶进火车，从欧洲其他地区送往死亡集中营。在那里，他们被关进毒气室，系统地予以灭绝。他们在波兰曾进行过一些抵抗，但在大多数地方，他们首先失去公民身份，接着被辞退工作，然后被指定为官方的敌人，需要被消灭，再往后，就遭到灭绝。在每一重要情形中他们都是最无力之人，却被那些自身力量远远超过他们的领袖和军队当做阴险的、潜在的强敌。其实，认为犹太人会对德、法、意诸国的力量构成威胁，就连这样的想法都是荒谬绝伦的。但这一看法却得到普遍公认，因为在他们遭受大屠杀期间，欧洲多数国家鲜有例外地转身背弃了他们。这实在是个历史的讽刺：在法西斯主义那些可憎的官方术语中，用来描述他们的最频繁的词汇之一，就是“恐怖分子”，正如阿尔及利亚人和越南人后来也被敌人称做“恐怖分子”一样。

人类的每个灾难都是彼此不同的，因此想要找寻它们彼此之间的对等关系是没有意义的。但有一点却千真万确，即：关于大屠杀的普遍真理，不仅在于它永远不该再次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还在于，作为一种惨无人道的、悲剧性的集体惩罚，它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如果说寻找对等关系毫无意义的话，那

么，从中看到一些类比关系以及或许是藏而不露的相似之处，却颇有价值，即使当我们对此留有一定分寸之际，亦不例外。与他用过失和暴政写下的真实历史相去甚远的是，亚西尔·阿拉法特正在被弄得像一名遭到这个犹太国家四处搜捕的犹太人。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他被以色列军队围困在业已毁坏的拉马拉官邸里，而这一局面的最大讽刺在于，他的痛苦经历是由一位精神变态的、声称代表犹太人民的领导人策划并付诸实施的。我不想过分强调这个类比，但是，认为今天处于以色列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跟 20 世纪 40 年代的犹太人同样地无力无助，却是事实。以色列的陆海空三军在美国重金资助下，一刻不停地蹂躏着居住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被占地区的那些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百姓。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一直是个流离失所的民族。他们中数百万人沦为难民，剩下的大部分受到长达 35 年的军事占领，任由那些系统地盗走其土地的武装定居者和成千上万地杀害他们的军队所宰割。还有成千上万人被投入监狱，成千上万人失去生计，再次或第三次沦为难民，他们全部都没有公民权或人权。

而沙龙仍在制造借口，声称以色列是为生存而战，为反抗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而战。当这个屠杀阿拉伯人的疯狂刽子手派遣 F-16 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及数百辆坦克去对付手无寸铁、毫无抵御能力的民族之时，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声明更为荒唐可笑？他说他们是恐怖分子，而他们的领袖，那个受尽屈辱地囚禁在周遭皆被以色列摧毁的残破建筑之中的人，却一直被刻画成头号恐怖分子。阿拉法特有勇气，敢于抵抗，在这一点上他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每个巴勒斯坦人都认为，故意对他进行羞辱的行为纯属野蛮残忍，除了十足地施加惩罚之外，没有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以色列有什么权利如此行事？

这种象征性的行为确实给人留下可怕印象，而且，当我们认识到沙龙及其支持者们（更不必说他那罪行累累的军队）是在刻意传达



这一象征行为如此不加掩饰地表明含义的时候，这一象征就变得更为可怕。以色列犹太人是强大有力的人群，巴勒斯坦人则是他们猎捕和蔑视的他者。沙龙很幸运，因为他有西蒙·佩雷斯这位或许是当今世界政坛上最大的胆小鬼和伪君子，到处宣扬以色列理解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还说“我们”愿意使封锁变得稍微容易承受一些。在此之后，情况不仅没有任何改善，而且宵禁、破坏和杀戮不断增加。自然，以色列的立场是呼吁大规模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从而如特杰·罗伊德·拉森（Terje Roed-Larsen）正确描述的那样，有效地骗取国际捐赠者来承担以色列其实用于占领的费用。沙龙必定觉得他可以随心所欲，不仅能够全然逃脱惩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操纵一场运动，目的在于将受害人的角色赋予以色列。

由于大众抗议发展到全世界范围，犹太复国主义者发起的有组织的反击回应是抱怨反犹主义倾向正在上升。2002年9月17日，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发表了一份声明，大意是：由教授们领导的一场放弃运动 [译注：原文为 *antidivestment campaign*（反放弃运动），与上下文意及背景事实不符，疑为 *divestment campaign*（放弃运动）之笔误。译成中文时已更正] ——一场试图迫使学校放弃美国公司向以色列销售军用设备之利润分成的运动——是反犹主义的。该国最古老、最富裕的大学的一位犹太籍校长在抱怨反犹主义！目前，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通常被等同于某种曾经导致大屠杀的反犹主义，尽管在美国谈不上有什么反犹主义存在。在美国，一群以色列人和美国学者正在组织一场麦卡锡式（McCarthy-style）的运动，来对抗那些公开谈论以色列践踏人权的教授；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要求师生告发他们当中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同事。这一运动威胁着自由言论的权利，并且严重剥夺了学术自由。

进一步的讽刺在于，针对以色列的野蛮行为——其最近行为是

侮辱性地将阿拉法特隔离在拉马拉——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在加沙地区和几个西岸城镇，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违抗宵禁令，走上街头，支持被围困的领袖。在他们看来，阿拉伯的统治者们一直都是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孱弱无能，或两者兼有。他们每个人，包括阿拉法特在内，多年来都公开表达过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意愿；两个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已经与之签署条约。然而沙龙的全部回报，便是对准他们所有人的屁股猛踢一脚。他反复地说道：阿拉伯人只懂得武力，既然我们拥有武力，我们就该给予他们应得的待遇（就像我们过去常常遭受的对待那样）。

尤里·亚弗纳瑞是对的：阿拉法特正在被谋杀。而且，根据沙龙的看法，巴勒斯坦人的渴望也将随之一同灭亡。这是一场演习，无须彻底的种族灭绝，就能从中看出以色列武力在未受阻止、未被察觉的情况下，其残忍野蛮行径究竟能走多远。沙龙今天曾说，如果与伊拉克交战——这场战争一定会来临——他将报复伊拉克，这样无疑将导致布什与拉姆斯菲尔德应得的噩梦。沙龙上一次企图变更政权是在1982年间的黎巴嫩。他将巴希尔·杰马勒耶（*Bashir Gemayel*）推上总统宝座，随后，杰马勒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黎巴嫩永远不会成为以色列的附庸，于是杰马勒耶被暗杀，于是萨布拉和沙提拉的大屠杀发生，于是，在经历了血腥与可耻的20年之后，以色列人气急败坏地撤出黎巴嫩。

从所有这一切之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那就是以色列的政策已经成为整个地区的灾难。它变得越强大，对周边国家播撒的破坏就越多（更不用说它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而它就变得更加遭人痛恨。这是用于邪恶目的的武力，绝非自卫。当以色列坦克和推土机正在周围继续肆虐，捣毁一切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者期望犹太国家成为一个与其他国家一样的正常国家的梦想，已经变成了这位

命悬一线的巴勒斯坦本土居民领袖抱有的幻想。犹太复国者牺牲数十万人的生命，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吗？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是什么样的憎恨与暴力的逻辑在发挥作用，并且，从这种软弱无力状态中产生的、现在只能见证目睹但日后肯定会得到发展的将是怎样的力量，这难道不是很清楚吗？沙龙为挑战整个世界而自豪，并非因为这个世界是反犹太主义的，而是因为他借犹太人的名义之所作所为如此地令人发指。对于那些认为沙龙的骇人行为并不代表他们自己的人们而言，难道不是到了该对其行径叫停喝止的时候吗？

《金字塔报》，2002年9月26日—10月2日

《生活报》，2002年9月30日

## **第三部分 以色列、伊拉克与美国**



## 35. 以色列、伊拉克与美国

1982年6月4日，黎巴嫩许多地区遭受以色列军用飞机猛烈轰炸。两天之后，以色列军队穿过该国南部边界进驻黎巴嫩。梅纳赫姆·贝京时任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则担任国防部长。这次入侵的直接理由，是发生在伦敦的一次对以色列大使的未遂暗杀，但是，当时如同今天一样，贝京和沙龙将暗杀事件归咎于巴解“恐怖组织”，而事实上该组织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军队在以军入侵之前已遵守停火协议整整一年。几天后的6月13日，贝鲁特遭受以色列的军事围攻，尽管行动伊始，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就曾提及边界以北35公里的阿瓦利河（Awali River）乃是其目标。后来，事态毫不含糊地表明，沙龙企图通过轰炸阿拉法特周围所有的一切来杀死这位桀骜不驯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围攻的同时，他们封锁了人道主义援助，切断了水电供应，用持续不断的空中轰炸摧毁数百座贝鲁特建筑物。到8月下旬围攻结束之时，以色列已杀害18000名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自1975年春天以来，黎巴嫩一直饱受可怕的内战之苦。尽管以色列在1982年之前只有一次曾派兵进入黎巴嫩，但在较早的时候它就被基督教右翼民兵选做盟友。这些民兵占据东贝鲁特一处要塞，在整个围攻过程中他们都与沙龙军队密切合作。在经历了8月12日

一整天恐怖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狂轰滥炸以及萨布拉和沙提拉的大屠杀之后，围攻方才结束。沙龙的主要盟友、法兰奇党（*Phalange Party*）领袖巴希尔·杰马勒耶于8月23日被国会选为黎巴嫩总统。杰马勒耶憎恨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曾不明智地加入到那场内战之中，支持“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组织，该组织是一个由左翼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诸党构成的松散联盟，其中包括当今真主党什叶派运动的先驱阿迈勒（*Amal*），而这场运动在2000年5月发生的、将以色列人逐出黎巴嫩的行动中发挥过主要作用。在沙龙军队有效地促成他当选之后，面对即将成为以色列的直接附属国的前景，杰马勒耶似乎已在犹豫。他于9月14日被暗杀。两天之后，在一个由以色列军队设立的安全警戒线内，一场集中营大屠杀拉开序幕，于是，巴希尔的那些嗜血复仇的基督教极端主义伙伴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心无旁骛地干下骇人勾当。

在联合国（当然也包括美国）的监督之下，法国军队于8月21日开进贝鲁特。不久以后，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加入进来，尽管巴解组织的战士们于8月21日就已开始撤离黎巴嫩。到9月1日为止，撤离已经结束，阿拉法特及其一小群顾问和士兵栖身突尼斯。与此同时，黎巴嫩内战之火继续燃烧，一直持续到1990年左右，那时，才在塔伊夫（*Taif*）形成了一个共同协定，或多或少恢复了旧有的“忏悔制（*confessional system*）”，至今犹存。1994年中期，作为所谓奥斯陆协议的一部分，阿拉法特——仍然担任巴解组织领袖——以及当时同他在一起的顾问和士兵中的一些人得以进入加沙地区。该年度早些时候，据称沙龙表示因未能在贝鲁特击毙阿拉法特而深感遗憾。尽管如此，他之所以感到遗憾，并不是由于未曾如此尝试过，因为阿拉法特的几十个藏身之处以及总部都被炸得粉碎，伴随着生命的大量损失。我认为，1982年发生的一切坚定了阿拉伯人

的这一认识，即：不仅以色列会使用先进技术（飞机、导弹、坦克和直升机）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平民，而且美国和阿拉伯其他国家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一暴行，即使袭击目标是领袖和首都。[要了解这一事件的更多信息，参见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的《遭受围攻》（*Under Siege*）（纽约，1986年）、罗勃特·菲斯克的《同情这个国家》（*Pity the Nation*）（伦敦，1990年）；更具体地描述黎巴嫩内战的则有乔纳森·兰德尔（Jonathan Randal）的《一路走来》（*Going All the Way*）（纽约，1983年）]。

当代中东地区由一个主权国家向另一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政变的首次全面尝试就此结束，我将它作为目前正在发生之事的—个肮脏背景提出来。沙龙现在成了以色列总理；他的军队与宣传机器正再次将阿拉法特及巴勒斯坦人作为“恐怖分子”包围起来并对其进行妖魔化。值得回顾的是，“恐怖分子”—词开始是被以色列人系统地用于描述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任何巴勒斯坦抵抗行为的。从此以后这就变成了惯例，尤其是在1987—1993年间的第—次武装暴动期间。它抹杀了奋起抵抗与纯粹恐怖行动之间的区别，并且有效地去除了武装斗争起因的政治色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阿里埃勒·沙龙作为声名狼藉的101部队首领，可谓风光无限。这支部队在本—古里安的首肯之下大肆屠杀阿拉伯平民，并将其住宅夷为平地。1970至1971年间他负责平定加沙地区。其中没有任何—次，包括1982的战役，凭借确保以色列彻底胜利的军事手段而达到了清除巴勒斯坦人、改变地理版图或变更政权的目的。

1982年与2002年的这两场战争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巴勒斯坦人如今是在1967年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受到残害和围攻，而且尽管他们受到以军占领的蹂躏，尽管国民经济和公民社会生活的整个基础设施都遭到破坏，但他们仍然驻留此地。两者的主要相似之处自



然是力量对比悬殊的手段，比如，数百辆坦克和推土机开进杰宁这样的城镇、村庄或诸如在杰宁及戴黑舍的那些难民营，然后大肆杀戮、破坏、阻止救护车和急救人员前来救助、切断水源电源等等。而这一切都是在美国支持下发生的。事实上，甚至在沙龙于2000年3月和4月无以复加地狂暴行动期间，美国总统仍称之为和平人士。关键在于，沙龙的意图远远超出了“根除恐怖行动”的界限。在中央统计局、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文化中心，他的士兵捣毁了所有电脑，将文件和硬盘驱动器洗劫一空，并肆意破坏办公楼和图书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巴勒斯坦集体生活降低到近代以前的水平。

我不打算对阿拉法特在奥斯陆谈判期间及后来阶段的战术或者他那可悲政权的失败一再提出批评。我在此处或别处已有详细阐述。而且，如我所述，此人生命的确岌岌可危：他在拉马拉的已变成断垣颓壁的住所仍被围困着，与此同时，除了没有让他毙命之外，沙龙尽一切可能地伤害他。使我忧心的是那些在力量上不成比例地远胜于对手的个人、意识形态和机构将政权变革视为诱人前景的整个想法。是什么样的思维，使人相对轻松地设想用强大武力给规模空前的政治与社会变更大开绿灯，而且在如此行事之时，却毫不担心这样的变更必会造成大规模的破坏？同时，那种不会招致己方太多伤亡的前景，是如何激发越来越多的关于手术式精确打击、洁净战争、高科技战场、改变版图结构、创建民主及其他类似幻想的？这一切使人产生万能的思想，主张一切推倒重来，并企图获得对与“我方”利害攸关之物的终极掌控。

目前，在美国为实现伊拉克政权变更而发动战役期间，正是那些大部分由于长达十年的制裁而饱受穷愁潦倒、营养不良和病痛缠身之苦、付出惨重代价的伊拉克人民，却悄然退出了人们的视线。这

完全符合美国的中东政策，它依靠两根强大支柱予以支撑：一是以色列安全，二是廉价石油的大量供应。美国及以色列的战略策划者们，对于构成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伊拉克——尽管这些民族国家存在暴虐无道的统治者——的那些繁复多样的传统、宗教、文化、种族和历史，却视而不见。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伊拉克目前被普遍看做要么是对邻国的“威胁”（在它目前被削弱和被包围的状况下，这简直是胡扯），要么是对美国的自由与安全的“威胁”（更是一派胡言）。在此，我甚至不拟费神去指责萨达姆·侯赛因是个可怕的恶徒：我认为几乎用任何标准衡量，他都理所当然应受罢黜与惩罚。他最恶劣之处在于对本国人民构成了威胁。

然而，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的那段时间以来，伊拉克作为一个事实上幅员辽阔、繁荣富庶、社会多元的阿拉伯国家的形象业已消失。在媒体及政策言论中流传的形象是，伊拉克乃是一个由萨达姆率领一伙伙野蛮匪徒居住的沙漠之国。鉴于伊拉克为阿拉伯世界提供了最大数量的读者，对伊拉克形象的贬低目前几乎已摧毁阿拉伯的出版业；它是少数几个拥有大量受教育的、有能力的、精通专业的中产阶级的国家之一；它拥有石油、水和肥沃的土地；它历来都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拥有伟大的文学、哲学、建筑、自然科学和医学的阿巴斯帝国是伊拉克的一大贡献，至今仍是阿拉伯文化的基石）；伊拉克流血受伤的苦难，如同巴勒斯坦的耶稣受难地卡瓦利（Calvary）一样，已经成为阿拉伯人及穆斯林持续悲伤的来源——事实上所有这一切从未被谈论。然而，它的巨大石油储量却被提及，进而被论及，如果“我们”将其从萨达姆手里夺过来，我们就不再如此依赖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在拷问美国国会及媒体的各种辩论中，这一点也很少作为一个要素被引述。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伊拉克拥有地球上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最大石油储量，而且，伊拉克那价值约1.1万

亿美元的可开采石油——其中有大量已被萨达姆许诺给俄国、法国及其他几个国家——是美国战略的关键目标，是伊拉克国会在美国以外的石油消费国进行谈判时的一张王牌。[要了解所有这方面的更多详情，可参见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 Klare）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10月7日号发表的《为战争车轮加油》（*Oiling the Wheels of War*）。]普金和布什之间的大量商谈，议题是美国公司愿意许诺给俄罗斯多大的石油份额。这不禁使人联想起老布什提供给俄罗斯的30亿美元。毕竟两代布什都是石油商，而且他们对那一类算计的倾心，胜于其对中东政治敏感问题的注意力，例如关于重新破坏伊拉克民用基础设施的问题。

于是，对可恨的他者实施非人化的第一步骤，便是将其存在归结为几个一再重复的简单短语、形象和概念，这可以使毫无愧疚、心安理得地轰炸敌人变得更加轻而易举。“9·11”事件之后，以色列和美国便不费吹灰之力地分别轰炸了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人民。有件事值得注意，即美国和以色列凭借其压倒优势，提出了一模一样的政策以及同样的步骤严密、有条不紊的计划。在美国，如杰森·威斯特（Jason Vest）于《国家》杂志（9月2/9期）中撰文所述，来自极右翼的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JINSA）及安全政策中心（CSP）的人在五角大楼及国务院诸委员会里占有一席之地，包括由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受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任命）管理的那个委员会。以色列安全被等同于美国安全，而且，JINSA花费了“大部分预算，将美国陆、海部队的一群退役将军们送到以色列”。当他们返回时，便撰写专栏文章，并在电视上亮相，来推销利库德集团的路线。《时代》周刊在8月23日的一期上以《秘密战争委员会内幕》（*Inside the Secret War Council*）为题刊登了一篇有关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文章，该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

来自 JINSA 和 CSP。

在沙龙这方面，他令人麻痹地一再重复这一论调，即：打击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战役与美国总体上的反恐战争，尤其是打击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战争，是完全等同的。他还声称，拉登他们属于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及北美洲的许多穆斯林在内的同一个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尽管连布什所谓的“邪恶轴心”如今也仅只集中于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三国。目前美国在 132 个国家或多或少地部署了军力，它们全都与反恐战争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反恐战争仍被置于未做界定、漂浮不明的状态，以便在国内战线上激起更多的爱国狂潮、恐惧以及对军事行动的支持，那里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西岸及加沙的每个主要地区都被以色列军队占领。他们以恐怖分子和武装人员“之嫌”为由，习以为常地杀害和/或拘捕巴勒斯坦人；同样，房屋店铺经常被以庇护窝藏炸弹工厂、恐怖主义基层组织和武装人员集会等为借口而遭到拆毁，从未提供任何证据，而那些毫无怨言地接受以色列单方面指派的记者们，也从未要求提供任何证据。

于是，系统地予以非人化的努力，导致整个阿拉伯世界被蒙上一张神秘化与抽象化的巨毯。耳闻目睹的都是恐怖、狂热、暴力、对自由的憎恨、危险，最后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拟在我们已然知其所藏却从未前往搜寻之处（即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显然还包括美国等国）找到，却只一味觅之于假想虚拟之地，即恐怖分子队伍、萨达姆手下、狂热主义团伙等所在处。蒙在巨毯之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形象便是：阿拉伯人憎恨以色列及犹太人，不为别的原因，只因为他们也同样憎恨美国。鉴于伊拉克的经济资源与人力资源，它很可能是以色列最可怕的敌人；巴勒斯坦人之所以阴森可怕是因为他们妨碍了以色列实现彻底的霸权与土地占领。沙龙之流以色列右翼分子代表着扩张以色列国的意识形

态，声称历史上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都是犹太人的故土，他们尤其成功地促使关于此地的一己之见在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当中取得支配地位。今年夏天，以色列国内安全部长（及利库德成员）乌齐·兰多（Uzi Landau）在美国电视上放言：一切有关“占领”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我们是一个返回故土的民族。他的这一惊人概念，甚至没有受到莫特·朱克曼（Mort Zuckerman）这位节目主持人兼《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 & World Report*）老板以及“主要犹太组织联席理事会（Council of Presidents of Major Jewish Organizations）”主席的盘问。然而，以色列新闻记者亚历克斯·菲斯曼（Alex Fishman）在9月6日的《新消息报》上，将康多莉扎·赖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他现在也谈及“所谓被占领土”）、迪克·切尼、保罗·沃尔福威茨、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和理查德·珀尔〔他委托声名狼藉的兰德（Rand）研究机构将沙特阿拉伯指定为敌人，并将埃及指定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战利品〕等人的“革命见解”描绘为可怕的鹰派思想，因为他们鼓吹在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发动政变。菲斯曼引述沙龙的话说，这群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 JINSA 和 CSP 的成员，而且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分支机构华盛顿近东事务学会过从甚密——支配着布什的思想（如果这一措辞恰当的话）；他说：“站在我们的美国朋友旁边的埃菲·埃坦（Effi Eitam）（以色列内阁中死不悔改的强硬派之一）是个十足的鸽派。”

这一观念的更为可怕的另一面，是个未受挑战的主张，即：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地对付恐怖主义（或其他任何潜在敌人），我们就会有灭顶之灾。现在这个前提成为赖斯、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布什本人在采访与谈话节目中经常鼓吹的美国安全策略的核心。对这一观点的正式表述，不久前出现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里。这是一份旨在对这个政府冷战后的新外交政策发表全面声明的官方文件。正在发挥作用的假定是，我们生活于一个异常危险的世界，这里真实存在的敌人编织成网，它拥有工厂、办公室和不计其数的成员，而且它的整个存在就是为了消灭“我们”，除非我们先发制人。这正是造就反恐战争和对伊战争并为之提供合法性的假设，而这场战争目前正在要求国会和联合国予以批准。

狂热的个人与团体当然确实存在，并且他们中有许多人总体上支持以某种方式损害以色列或美国。但另一方面，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斯兰教及阿拉伯世界里被广泛视为具有两大作为：其一，创造了所谓圣战极端分子，以本·拉登最为出名；其二，为了在那些地区推行敌对性与破坏性的政策，肆意践踏国际法与联合国决议。大卫·赫斯特在发自开罗的《卫报》专栏文章中写道，就连那些反对本国专制政权的阿拉伯人都“会将它（美国攻打伊拉克）看做一种侵略行为，其目标不只是针对伊拉克，而且针对整个阿拉伯世界；令人最不可忍受的是，这样做竟然是从以色列的利益出发的。以色列拥有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似乎就是被允许的，而它们拥有这些武器则是可憎可恶的”（9月6日）。

我还要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巴勒斯坦叙事，并且，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还存在着一种同以色列和平相处的正式意愿。它与基地组织所代表的更为晚近的恐怖主义威胁，或者所谓由萨达姆·侯赛因所体现的似是而非的威胁，都截然相反。萨达姆当然是个糟糕透顶之人，但却不大可能发动洲际战争；美国政府只是偶尔承认它可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但那似乎成了他的滔天罪行之一。他的邻国没有一个觉得他是威胁。巴勒斯坦人被以这种难以察觉的方式同伊拉克混淆起来，目的是要构造出一种被媒体一再强化的威胁。

在《纽约客》和《纽约时报》之类发行量巨大、影响深远的上流刊物登载的有关巴勒斯坦人的多数报道，都将巴勒斯坦人当做炸弹制造者、同谋犯、自杀式爆炸袭击者而予以呈现，并且概莫能外。自“9·11”事件以来，这两家刊物从未发表过任何一篇站在阿拉伯立场上的文章。一篇也没有。

因此，当丹尼斯·罗斯这样一位政府喉舌（此人在奥斯陆谈判中代表克林顿一方，但在接受这一任务之前和之后都是以色列游说团成员）喋喋不休地谈论巴勒斯坦人在戴维营上拒绝了以色列的慷慨提议时，他是在严重地歪曲事实。正如一些权威信息来源所示，事实是以色列退还了一些全部由以色列安全哨所及定居点所包围的、彼此互不相连的巴勒斯坦地区，而且在巴勒斯坦与任何阿拉伯国家（例如，南面的埃及、东面的约旦）之间都没有共同边界。无人会费心劳神去发问，为什么像“慷慨”和“提议”这样的词，被用来谈论一个入侵的强国在违反国际法与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非法占有的领土。但是，鉴于媒体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和强调那些简单声明的威力，加上以色列游说团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同样思想的努力——丹尼斯·罗斯本人就异常顽固地坚持错误，执迷不悟——当前舆论被锁定在巴勒斯坦人选择了“恐怖而非和平”。哈马斯与伊斯兰圣战没有被当成为了摆脱以色列军事占领而展开的（或许是被误导了的）巴勒斯坦斗争之一，而被视为巴勒斯坦人实施恐怖、威吓的普遍欲望的一部分，因而构成威胁。正如伊拉克一样。

无论如何，由于美国政府发表的最新的并且不大可能正确的声明认为世俗的伊拉克一直在为极端神权性质的基地组织提供避难所与训练所，因此，针对萨达姆的诉讼似已结案。占据上风的（但绝非毫无异议的）官方舆论是，既然联合国核查人员无法确定他有什么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究竟隐藏了什么，以及他还可能做些什

么，那么，他就应该受到攻击并被铲除。从美国立场来看，寻求联合国授权的全部关键，就在于得到一个如此严厉、如此具有惩罚性的决议，以至于不管萨达姆·侯赛因是否顺从，他都将控违反“国际法”，因此单凭其存在，就能确保用武力来变更其政权的合理性。另一方面，9月下旬，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美国弃权），要求以色列结束对阿拉法特在拉马拉驻地的包围，并从自3月份以来（以色列以“自卫”为借口）非法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撤离。以色列拒绝遵守决议，而美国对于它甚至未能坚持自己声明的立场的潜在解释是：“我们”理解以色列必须保护本国公民。美国为何在某件事上上诉于联合国，而在另一件事上却忽视联合国，这不过是它一贯热衷的矛盾行为之一。

像“先发制人”（anticipatory preemption）和“预防性自卫”（preventive self-defense）这样一组未经审视、自我发明的短语，被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同事到处传播，用以说服公众。而向伊拉克或任何需要“政权变更”（或者用另一种较少使用的委婉说法，称做“建设性破坏”）的国家开战的准备，都要靠自卫这一概念予以支撑。公众被反复出现的红色警报和橙色警报弄得坐立不安，人们被鼓励向执法权力机构告发“可疑”行为。数千名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南亚人已遭到拘留，有些因涉嫌而被捕。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总统吩咐之下，作为爱国主义和忠于美国的表现之一而贯彻执行的。我仍然不能理解爱一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意思（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爱以色列也是个流行语），但它似乎意味着对于强权的不加质疑的盲目效忠。其秘而不宣、鬼鬼祟祟，以及故意拒绝同敏锐的公众直接交锋，而这些公众暂时似乎不会幡然觉醒而做出连贯或者系统的反应，这一切都掩盖了布什政府整个伊拉克及中东政策的丑陋性与破坏性。

与大多数其他主要国家联合起来的实力相比，美国的力量是如



此之强，以至于不能真正受到制约或者被强制服从任何国际行为制度，即使其国务卿希望那样做也无济于事。伴随着“我们”是否应该远赴七千英里以外的伊拉克去打仗这一抽象概念，关于对外政策的讨论从其他民族身上剥夺了任何厚重、真实的人类特征；透过全自动导弹瞄准器或电视屏幕所看到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不过是“我们”可以随意决定进入、破坏、重建或不予重建的棋盘。“恐怖主义”一词，连同反恐战争，是为了更好地强化这种感情，因为与许多欧洲人相比，绝大多数美国人与这块穆斯林土地及其人民没有任何接触，毫无亲身体验，因此对（诸如在阿富汗的）持续轰炸会将其撕成碎片的生活结构麻木不仁。而且正如人们所见，仿佛是根据憎恨我们的自由、妒忌我们的民主之人的某个“决定”而建立起来的资金雄厚的穆斯林学校而非其他地方的产物一样，恐怖主义雇用辩论家参与那些即使没有定位、属于非政治性的、却也是最放肆的辩论。历史与政治已失去踪影，就因为记忆、真相与人的真实存在已被有效地打入冷宫。你不能谈论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和阿拉伯人的挫折，因为以色列在美国的存在会阻止这一行为。在5月举行的一个狂热支持以色列的游行集会上，保罗·沃尔福威茨捎带提及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却被大喝倒彩，并且永远不可能再提此事。

而且，与被人反复强调、在世人心目中不可或缺地由我们所代表着的人权、民主及自由经济诸特质始终结合在一起的周密的人权政策或自由贸易方针，很可能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此处仅略举一二，如有目共睹的种族游说团、钢铁与国防工业、石油垄断集团、耕作业、退休人员和枪支游说团的影响）从内部瓦解。例如，在华盛顿被代表的435个选区中的每一选区之内，都有一个国防工业或与国防相关的工业；因此，正如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所说，对伊战争的真正议题是解决“就业”问题。在谈到外交

事务时，值得记住的是，（与如今已达 15% 的曾游历国外的美国人相比）国会议员中持有护照者仅只达到 25% 或 30%。他们的所言所思很少涉及历史、哲学或理想，而更多的是谁在影响这位议员的竞选活动、谁赞助金钱，以及诸如此类。最近，两位支持巴勒斯坦自决权并对以色列提出批评的众议院在职议员，即阿拉巴马州的厄尔·希利亚德（Earl Hilliard）与佐治亚州的辛西娅·麦金尼（Cynthia McKinney），被相比之下不太出名的候选人击败，后者得到了据公开声称是来自本州以外的纽约（亦即犹太人的）资金的丰厚资助。被击败的二人被新闻媒体指责为极端分子、不热爱祖国。

就影响美国中东政策方面而言，以色列游说团可谓举世无双，并且已将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机构变成了前参议员吉姆·阿布雷兹克（Jim Abourezk）说的“以色列所占领土”。可与之相提并论的阿拉伯游说团甚至根本不存在，更不用说有效发挥作用。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参议院会定期主动发布决议给总统，来敦促、强调和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2002 年 5 月就有这样一份决议，当时正值以色列军队占领并且有效地摧毁约旦河西岸所有主要城镇。这种对以色列极端政策的全面支持，其缺点之一在于，它最终完全不利于以色列作为中东国家的未来。托尼·贾特已充分论证这一点。他指出，以色列想要留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这种想法乃是死路一条，不会有任何结果，只不过是拖延其不可避免的撤退而已。

反恐战争的整个主旋律，准许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们对西岸及加沙的所有 340 万巴勒斯坦人犯下战争罪，使他们变成（时下流行说法所谓）非战斗人员的附带损失。联合国被占领土特别行政官员泰耶·勒厄德·拉森（Terje Roed Larsen）适才发布一项报告，指控以色列引起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失业率已达 65%，50% 的人口靠每天不足两美元维持生计，经济已遭到彻底破坏，更不必说人们的生活。

与此相比，以色列人的痛苦和不安全感却要少得多：从未有巴勒斯坦的坦克占领以色列的任何地区，甚至从未妨碍过以色列建立定居点。在过去两周里，以色列屠杀了 75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许多是儿童；以色列捣毁房屋、驱逐百姓、破坏宝贵农田，在长达 80 小时的宵禁中将所有人困在屋内，既不准平民通过路障，也不给救护车及医疗援助放行，并且像往常一样断水断电。中小学和大学全然无法运转。虽然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事件，如同占领本身以及数十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一样，早已存在了至少 35 年，但是在美国媒体中它只是偶尔被提及，并且是作为有关以色列政府辩论或业已发生的灾难性的自杀式爆炸的长篇文章之尾注。“涉嫌恐怖主义”这个小小的短语，既是杀戮行为的辩护词，也是沙龙为那些被杀者选择的墓志铭。美国对此并不反对，只是采用最温和的措辞——比如它会说，“这样做没有助益”——但这根本无法阻止下一轮屠杀。

现在我们更加接近问题的实质。由于以色列在这个国家的利益关系，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以以色列为中心的。“9·11”事件之后，已经出现了一场冷危机，其中基督教右翼、以色列游说团及布什政府的半宗教式的好战黩武态度被新保守主义鹰派人物在理论上予以合理化。这些鹰派们对中东的看法旨在毁灭以色列之敌，而这一目标时常被贴上一个委婉的标签：通过向那些对以色列构成最大威胁的阿拉伯国家引进政权变更和“民主制度”，来重绘中东地图。[参见易卜拉欣·瓦尔德（Ibrahim Warde）在《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2002 年 9 月号上发表的《世界混乱之动态：哪个上帝在偏袒谁？》（*The Dynamics of World Disorder: Which God Is on Whose Side?*）及肯·希尔弗斯坦（Ken Silverstein）与迈克尔·谢勒（Michael Scherer）在《琼斯妈妈》（*Mother Jones*）2002 年 10 月号上发表的《再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Born-Again Zionists*）。] 沙

龙所谓巴勒斯坦改革运动不过是他意欲在政治上消灭巴勒斯坦人的企图的另一面，这是他的毕生野心。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甚至约旦都受到各种不同的威胁，尽管有如下事实存在，即：它们虽然或为可怕的政权，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受到美国保护和支  
持，正如伊拉克确曾得到过的待遇一样。

事实上，任何对阿拉伯世界有所了解的人都很清楚，一旦美国向伊拉克开战，阿拉伯的整个危险局势可能会严重恶化。支持政府方针政策的人有时会说些诸如“当我们把民主带入伊拉克及其他阿拉伯国家时，那将是多么激动人心”之类含糊其辞的话，却不大考虑，就生存体验而言，这对于那些真正生活于此地的人们，尤其是在B-52轰炸机无情地撕裂摧毁他们的土地和房屋之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能想象会有任何阿拉伯人或伊拉克人不愿看到萨达姆·侯赛因倒台。所有迹象表明，美一以军事行动已使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每况愈下，但是，与强加给他们社会的那些可怕的焦虑、心理扭曲和政治畸形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今天，无论是间歇性地受到美国至少两届政府青睐的海外伊拉克反对派，还是像汤米·富兰克斯（Tommy Franks）这样的各色美国将军，前来充当战后伊拉克统治者都没有多大的可信度。人们似乎也没有充分考虑，一旦政权发生变更，一旦国内的活动家们再度蠢蠢而动，一旦连阿拉伯社会复兴党（Ba'ath）也被排毒去害、脱胎换骨，那时伊拉克究竟需要些什么。实情或许是，甚至连伊拉克军队都懒得在战斗中为萨达姆动一根手指。但有趣的是，在最近的国会听证会上，三名美国中央司令部前任将军对正在谋划之中的整个军事冒险行动的危害性发表了严肃的、并且在我看来也是跛足的保留意见。然而，即使是这些疑惑，也并未充分涉及这个国家激烈的内部派系斗争和种族宗教上的动能，尤其是在它经历了由复兴党执政、联合国制

裁以及两场大战（如果美国再发动攻击就是第三次）造成的30年衰微之后。在美国，没有人，没有任何人，真正考虑过一旦发生大型军事干涉，在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或埃及会发生什么。只要得知是由福阿德·阿贾米和伯纳德·刘易斯两位担任政府的主要专业顾问就足够了，接下来便是不寒而栗。此二人都是充满恶意地从意识形态上反阿拉伯的，而且不被该领域大多数同事所信任。刘易斯从未在阿拉伯世界生活过，而他对此的解释则是反动透顶的语言垃圾；阿贾米来自黎巴嫩南部，曾是巴勒斯坦斗争的进步支持者，但现在已变节成为极右派，毫无保留地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

“9·11”这场肆无忌惮的暴行，本可在震惊之余为人们提供一段时间进行民族反思，并对美国外交政策做出考量。像这样的恐怖主义无疑需要反抗并且强劲有力地对付，但是，在我看来，必须首先考虑的永远应该是如果做出强烈回应会导致什么后果，而不只是即刻的、反射性的、暴力的回应。今天，甚至在塔利班溃败之后，站在仍旧受苦受难的阿富汗平民立场上看，无人会认为阿富汗现在是个更好、更安全的地方。国家建设显然不是美国优先考虑的问题，因为别处的其他战争已将美国的注意力从上一个战场上牵引开来。此外，让美国人来建构一个像伊拉克这样的拥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的国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阿拉伯世界与美国这两个地方极为复杂、充满动荡，远非那些关于战争的陈词滥调和关于重建的响亮口号所能概括。这一点在美国攻打阿富汗之后表现得颇为明显。

令事态愈为复杂的是，今天，阿拉伯文化中持异议的声音也十分强劲，而且在大范围内改革运动层出不穷。美国也同样如此，据我最近在各大校园进行演讲的经历判断，大多数公民对这场战争忧心忡忡，极其焦虑地想了解更多，最重要的是，迫切希望不要怀抱以救世主自居的好战心理和茫然目的而奔向战争。同时，如上期《国

家》杂志所述，这个国家仿佛在迷狂状态下向战争大步迈进。然而，伴随着例外人数的不断增加，国会已经完全放弃其代表人民利益的角色。作为一个终生都生活在这两种文化之内的人，我感到惊骇的是，“文明的冲突”这个当今如此流行的简化、庸俗的概念，已经接管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我们需要杀一杀普遍主义思维的威风，藉以理解和对待萨达姆·侯赛因和沙龙，还有缅甸、叙利亚、土耳其以及所有那些没有足够反抗地忍受掠夺的国家的统治者。毁坏房屋、严刑拷打、剥夺教育权，这些行为无论发生在哪里，都应当遭到反对。只有通过教育、鼓励公开讨论、交流，以及与秘而不宣的诡辩术或者宗教极端主义、先发制人的“防卫”等战争术语无关的智识上的诚实，才能重建或修复这个框架，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但是，可叹的是，它颇费时日，而且，根据美国政府及其小搭档英国政府的态度来判断，它也不可能得到支持。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促成讨论，并提出使之尴尬的问题，从而减缓并最终阻止目前已经变成一种理论而不仅仅是实践的战争诉求。

《金字塔报》，2002年10月10—16日

《生活报》，2002年10月14—15日

《伦敦书评》，2002年10月17日

## 36. 欧美对峙

虽曾数十次造访英格兰，我每回逗留的时间从未超过一两周。今年，我平生第一次在剑桥大学居住了将近两个月，在它的的一个学院做客，并就人文主义这一论题在该校作系列演讲。

首先要说的是，这里的生活远不如在我执教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那么紧张、兴奋。也许这种略微松弛的步调部分源于英国不再是世界强国这一事实，但也归因于一种健康有益的观念，即认为这里的古老大学是进行思考和从事研究的地方，而不是生产能为公司和国家效力的专家和技术官僚的经济中心。所以这种后帝国背景是我喜欢的环境，尤其是因为美国目前正处于令人深恶痛绝而又压倒一切战争狂热之中。如果你坐在华盛顿，并与该国的权力精英们保持联系，那么全世界的其余部分就如同一张地图在你面前铺开，随时随地邀你前往干涉。欧洲的调子不仅更加温和，而且深思熟虑：它也不那么抽象，而是更加人性化，更为复杂精细。当然，在欧洲广大地区，特别是在英国，有着庞大的、从人口统计上来看更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他们的观点构成了关于中东战争及反恐斗争的辩论的一部分。因此，（在这里）讨论即将来临的伊拉克战争，比在美国更容易反映他们的意见与疑惑。而在美国，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已被看成是“另一边的”，不管它意味着什么。“成为另一边”至少是指支持萨达姆·

侯赛因以及“非美国的”。这两种想法为阿拉伯人和美国穆斯林所憎厌，但尽管如此，下述观念却十分顽固：成为一名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就意味着盲目支持萨达姆与基地组织。（顺便提一下，我从不知道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会把形容词“非”与国籍连用，来当做一种指认公敌的方法。没有人说“非西班牙的”或“非中国的”；这是独一无二的美国特产，声称要以此证明我们都是“爱”国的。但事实上，一个人如何能够“爱”像国家这样抽象而又无法衡量的事物呢？）

我所注意到的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第二个主要差别是，宗教与意识形态在美国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欧洲。最近美国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86%的美国人相信上帝爱他们。一直存在着许多对狂热的伊斯兰教及暴力圣战者的谴责与抱怨，把这些人看成是万恶之源。他们当然是，就像所有自称是按照上帝的旨义行事并以上帝的名义开战的狂热分子一样。但最奇怪的是，美国有数量庞大的基督教狂热分子，形成支持乔治·W. 布什的核心，并且以多达六千万的人数代表着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投票集团。然而在英国，去教堂的人数在急剧下降，而它在美国却达到空前之高。在我看来，美国的奇怪的原教旨主义基督教派构成了对世界的一大威胁，它为布什政府提供了一个以惩处邪恶为由，从而正义地将所有人判入屈从与贫困境地的理论基础。

正是美国基督教右派与所谓的新保守派之间的邂逅，为驱动单边主义、以强凌弱以及神圣的使命感添柴助燃。新保守派运动作为一个反共组织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的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与美国最高权力怀有永久的憎恨。现在动辄拿出来吓唬世人的短语“美国价值”，是当初由像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诺曼·博德霍雷兹、弥芝·德克特（Midge Decter），以及其他一些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完全（且在宗教上）转向另一阵营的人发明的。对于



他们所有人来说，无条件地保卫以色列，使之成为西方民主与文明对抗伊斯兰教与共产主义的壁垒，乃是信仰的主旨。虽非全部，但有不少“新保派”（neocons）（人们这样称呼他们）是犹太人，然而在布什总统任期内，他们已经欢迎基督教右派的额外支持了。这些基督教右派虽然疯狂地支持以色列，但也深深地反犹[也就是说，这些基督徒——他们之中的许多南方浸信会教徒（Southern Baptists）——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必须在以色列聚集，这样弥赛亚才能再次回来；那些改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将会被解救，其余的将注定永久灭亡]。正是新保守派的下一代，如理查德·珀尔、迪克·切尼、保罗·沃尔福威茨、康多莉扎·赖斯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推动对伊拉克开战。由于这个原因，我非常怀疑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布什这么做。科林·鲍威尔是个过于谨慎的人，太在乎保住头上乌纱，太缺乏原则性，故而对这群人构不成多大威胁。这个群体受到《华盛顿邮报》社论、美国有线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及国家周刊的数十名专栏作家和媒体评论家的支持，他们重复着相同的陈词滥调，即这是传播美国的民主政治、为正义而战的需要，哪管全世界为此战火弥漫。

在欧洲，我没有发现这类事情的迹象。也不存在通过金钱与权力之间大规模的致命结合来恣意控制选举与国家政策之事。别忘了，乔治·W. 布什在两年前耗费超过两亿美元让自己当选，甚至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也为他的竞选花了六千万美元：这似乎不像是其他国家会渴望得到的民主，更不用说去效法了。而它却不加批评地被几乎绝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将这一切等同于自由民主，尽管其缺陷显而易见。与当今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的执政更加远离大多数公民，各大公司及游说团体凭借“人民”的主权达到他们的意愿，没有为真正的异议或政治变革留下多少机

会。比如，民主党和共和党以极大的狂热和绝对的忠诚来投票，为布什发动战争开出空白支票，令人不禁怀疑他们做决定时是否经过思索。在这个体系中，几乎每个人都采取同样的意识形态立场：认为美国最好，它的理想完美无缺，它的历史纯洁无瑕，它的行为及社会是人类成就的极致，伟大的巅峰。与之相争辩——如果这一切可能的话——就是“非美国的”，就是犯了反美主义的弥天大罪，它并非源于诚实的批判，而是出自对美好与单纯的憎恨。

所以，无怪乎美国从未像欧洲任何国家那样产生一个有组织的左翼或是一个真正的反对党。美国言论的实质，就是把事物分成黑与白、恶与善、我们的与他们的。我们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改变那种似乎永远凝固在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摩尼教二元论。对于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一直把美国当做救星，而今又看成保护神，然而美国的拥抱既是拖累，又令人懊恼。因此，托尼·布莱尔全心全意支持美国的这一姿态，似乎更令我这样的局外人感到迷惑不解。使我欣慰的是，甚至在国民眼里，他也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迷途失察者，一个决定抹去自己的身份，欣然接受由可悲的布什先生所代表的另一身份的欧洲人。我还有时间去获悉欧洲何时会醒悟过来，并承担起它的规模与历史所赋予它的同美国抗衡的作用。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战争会无情地逼向我们。

《金字塔报》，2002年11月14—20日

《生活报》，2002年11月11日

## 37. 关于伊拉克的虚假信息

有关美国即将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独裁政府发动战争的疾风骤雨般的新闻报道、消息披露和谣言讹传，目前仍在继续，并且愈演愈烈。然而，无法得知其中有多少属于运筹帷幄的反伊心理战术，有多少是这个政府由于对下一步举棋不定而公开表现出的踉跄蹒跚。无论如何，我发现，关于是否会爆发一场战争，正反两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当然，普通市民层面的恶语相向、口舌相争可谓空前凶猛，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完全确定究竟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无人能够独自确认每日报道中诸兵种及海军之调兵遣将，而且，鉴于乔治·W. 布什思维摇摆不定、捉摸不透的特性，很难看出其真实动机。但是，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的确都在深深忧虑——针对伊拉克人民实施的另一场阿富汗式的空中军事战役之后将会接踵而至的灾祸骚乱。对此，人们深信不疑。

但是，如潮水般涌来的意见和事实的一个最令人不安的方面是（这里仅就事情本身而言，无关乎背后的真正动机），出现了大量关注后萨达姆时代之伊拉克的文章。我特别愿意论及的，显然是一位移居海外的伊拉克人卡纳安·马基亚（Kanan Makiya）的持续努力之一：将自己提升为他所谓“非阿拉伯的”、分权而治的、后复兴党的伊拉克之国父。现在，任何对这个富有的、曾经繁华一时的国家的

苦难稍有关心的人都很清楚，复兴党执政的年代是灾难性的，尽管这个政权曾制定过发展与建设的初期规划。所以，对于那些竭力设想一旦萨达姆被美国干涉或国内政变推翻之后伊拉克将变得怎样的举动，人们不会有什么异议。马基亚对此的奔走效力是持之以恒的，无论在电视广播还是在高档刊物上皆不例外。这些媒体为他提供了一个发表观点的平台，关于这一点我稍后还会谈及。然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此公究竟何许人，来自何种背景。我以为，若要判断其贡献有何价值，并且更加精确地理解其思想观念的特殊性质，了解其身世背景乃至至关重要。

马基亚通常被认为与哈佛大学保持研究上的关系，而且是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教授（两者都在波士顿地区）。我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与他初识，那时他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民主阵线（Popular Democrat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关系甚密。记得他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学生，但在我见到他的几个场合里，几乎一言不发。后来他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我的视野中消失。1990年，他又作为萨米尔·哈利勒（Samir Khalil），即一本受到追捧的、用充满恐惧与戏剧性的笔调描写萨达姆统治的《恐怖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Fear*）一书作者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作为一部令媒体振奋的描写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著作，《恐怖共和国》一书——根据《纽约客》上刊登的一篇奉承马基亚的访谈——似乎是马基亚在担任他父亲在伊拉克的建筑公司合伙人期间，请假抽空完成的。他在访谈中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讲，萨达姆间接资助了这部书的写作，尽管无人指控马基亚与一个他显然深恶痛绝的政权相互勾结。

在他的下一本书《残酷与沉默》（*Cruelty and Silence*）中，马基亚抨击了阿拉伯知识分子，谴责他们机会主义、不道德，因为他们

要么赞美阿拉伯各国政权，要么对于诸政府之鱼肉百姓保持沉默。马基亚自然绝口不提自己作为伊拉克政权慷慨资助的受益者而保持沉默及同流合污的历史，尽管他当然有权替任何他喜欢的人工作。但是他却卑鄙地指责穆罕默德·达维什和我本人是民族主义者，即所谓极端主义的信奉者，并且指责达维什写诗赞美萨达姆。在我看来，马基亚在此书中所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令人反感的，都是基于胆怯的暗示和错误的解释，但它确曾轰动一时，因为它巩固了西方人认为阿拉伯人是邪恶低贱的卑躬屈膝者的观点。马基亚本人曾为萨达姆工作过，或者在他完成《恐怖共和国》之前，亦即在他离开伊拉克并且不再受雇于这方国土之前，从未写过任何有关阿拉伯政权的文章，这一点似乎无关紧要。他在美国到处受到赞扬，被当做一个有良知的勇士，并且公然挑战阿拉伯知识分子自我审查的行为，但是，那些将赞美之词堆砌在他身上的人，通常是对如下事实一无所知之人：马基亚本人从未在阿拉伯国家境内写过任何文章，并且，他所炮制的无论多么贫乏的作品，都是躲在没有危险的西方生活之后，化名写成的。

除了他写的两本书和一篇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占领巴格达的文章以外，此后人们再没有听到多少马基亚的消息。然后，他在去年炮制了一部不堪卒读的小说，试图证明圣岩圆顶寺（Dome of the Rock，圣岩圆顶寺是耶路撒冷市中心耸立的一座宏伟建筑，被认为是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伊斯兰第三大圣地。——译者注）其实是由一名犹太人建造的。出版商将该书送给我，于是我碰巧在它正式面世之前匆匆浏览了一下，但我还是感到震惊不已：这部小说写得如此拙劣，而且，由于按捺不住炫耀其作者曾博览群书的冲动，它还添加了许多脚注，对于一部所谓虚构作品而言，这的确非同寻常。然而，这本书却以安乐死告终，而马基亚也逐渐回归

沉寂。

直到数月前美国政府鼓动的反伊拉克运动爆发为止，马基亚很少谈及反恐战争、“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不错，他曾替美国一家著名的半月刊就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的所谓伊斯兰恐怖主义手册撰写评论，但即使按照他本人的标准，那也是那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举动。然而，我还清楚地记得，去年夏末，我碰巧偶然听到对他的一次电台采访。在访谈中他首次被认为正在领导着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团体对战后的、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进行规划。他的名字没有作为美国资助的伊拉克反对派组织成员而被提及；他也没有在一般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任何有关巴以冲突或其他中东问题的文章，尽管我听说他曾多次造访以色列。

他的关于美国入侵之后伊拉克规划蓝图的最完整版本，是他最近作为美国国务院常驻雇员的劳动结晶，发表在《展望》杂志（*Prospect*）2002年11月号上。这是一份我个人订阅了的、办得不错的英国自由主义月刊。马基亚列举一些惊人假定来支持其论点，并通过这一方式开始他的“提议”。其中两条假定几乎单凭其定义就可以断定是匪夷所思的。第一条假定萨达姆的“罢黜”将不会发生在一场轰炸战役之后。马基亚想必一直生活在火星上，才会设想万一爆发战争将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轰炸袭击，尽管流传发布的每一项伊拉克政权变更计划都已清楚地表明伊拉克将会受到无情轰炸。第二条假定同样异想天开，因为马基亚似乎不顾所有证据地相信美国以伊拉克的民主和国家建设为己任。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坚信伊拉克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样（两国都因为冷战而被重建）；此外，他也从未提及如下事实，即美国决意推翻伊拉克政权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石油储量，同时也由于伊拉克是以色列之敌。因此他着手制造悍然违背所有证据的荒谬假设。

他没有被这些无关紧要的考虑吓倒而裹足不前。他说，伊拉克人致力于实现联邦制，而非中央集权政府。他提供的证据颇不足道。正如他在表明观点时为了让读者信服而做的所有其他努力一样，此处的逻辑软弱无力，因为它同样基于虚构的假定以及他本人做出的极不可靠的个人断言。他致力于联邦制，并且他声称库尔德人亦如此。至于（除了源自他在国务院办公厅桌前的纸上谈兵之外）联邦体制究竟应从何而来，他却未置一词。显然，他计划从外部强加，尽管他发表的大体上无根无据的声明断言最终结果将是“人人”赞成在伊拉克实行联邦制度。这“意味着将权力由巴格达移交到各省”，大概是凭着汤米·兰克斯将军大笔一挥而实现。人们或许会以为南斯拉夫的后铁托时代从未存在过，并且以为那个悲剧性国家的联邦制度曾大获全胜。但是马基亚如此执迷于他作为一名堂堂的政府理论家的观点，以至全然不顾后果，不顾历史，不顾黎民苍生，不顾社会，也不顾现实，为的是编造他那荒唐可笑的理由。当然，这正是美国政府所喜欢的，也就是说，让那些无须对选民负责的形形色色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去敦促美国军队发动战争，同时佯装给这个地方带来“民主”，而事实上与美国的真实目标及其真实的历史实践完全背道而驰。马基亚似乎从未听说过美国对印度支那、阿富汗、中美洲、索马里、苏丹、黎巴嫩及菲律宾等国进行的破坏性干涉，而且目前已卷入约八十个国家的军事事务。

马基亚为美国入侵伊拉克进行辩护的盛大高潮，是他关于新伊拉克应该是非阿拉伯性质之国的建议。（同时，他轻蔑地谈论阿拉伯人的意见，认为这些意见无足轻重。这显然为他既对未来、也对过去做出不切实际的推测做好了铺垫。）至于这个不可思议的“去阿拉伯化”方案将如何实现，对此马基亚并未说明，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将解除伊拉克的伊斯兰身份及其军事能力。他提到一种被他称

为“区域性（territoriality）”的炼金术般的神秘特性，进而建造另一座流沙城堡于其上，作为未来伊拉克的立国基础。然而，最后他主动提出，所有这一切都将得到美国“来自外部”的保证。此类事情以前究竟曾在何处发生过，这并非困扰马基亚的问题，而对于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和造成的不必要的破坏，他似乎也同样毫不担心。

马基亚的装模作样真令人啼笑皆非。显然此人既没有记录在案的政府工作经历，甚至也没有公民身份。他游弋于各个国家与文化之间，（除了个人飞黄腾达之外）对任何人均无明显承诺，如今，他已在美国政府的纵深地带找到一个空港，藉此为他那惊人地异想天开的航班加油添燃。作为一个对同行们宣讲过知识分子使命与独立判断精神之人，他既不是前者的榜样，也不是后者的楷模。恰恰相反，他高踞于一个使他免除任何责任的布道坛上，似乎正在为一个主子效劳。这位主子——像过去雇用他的萨达姆一样——支付了高额报酬来犒赏他的奔走效力和他那八面玲珑的良知。我实在难以置信，马基亚竟然听任自己如此伪善虚荣，但另一方面，他为什么就不该是这号人呢？他从来没有和他的任何伊拉克同胞进行过公开辩论，从来没有为任何阿拉伯听众写过文章，从来没有自告奋勇地担任过任何需要个人勇气和使命感的公职或政治角色。他要么写匿名文章，要么攻击那些没有机会对他的诽谤予以还击之人。

可悲的是，马基亚隐晦地暗示他代表着未来伊拉克的声音与典范。不妨想一想，数千条生命已在他的赞助人的残酷制裁之下陨落红尘，而且会有更多的生命和生活即将被乔治·W. 布什政府为报复马基亚的祖国而发动的电子战争所毁灭。但是此人根本不为任何这类事情烦恼。他要么缺乏同情心，要么缺乏真正的理解力，不顾英国在对阿拉伯世界的帝国主义瓜分之中扮演过什么角色，也不管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并对阿拉伯实行集体专政给阿拉伯人造成了怎样的损害。



他对着英美听众一味地胡言乱语，而这些听众似乎颇为满意，因为这里终于有一位阿拉伯人对他们的力量和文明表现出适当的尊重。

就其本身而言，马基亚是个转瞬即逝的现象。然而他却同时成为许多事情的征兆。他代表了无条件服从权力的知识分子；权力越大，质疑就越少。他是个毫无同情心、对人类苦难缺乏明显关注的虚荣之人。他没有固定的原则或价值观，是个典型的玩世不恭的反阿拉伯的鹰派人物（与理查德·珀尔、保罗·沃尔福威茨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相类），像苍蝇一样叮在布什政府这块蛋糕上。英帝国主义、以色列的野蛮占领政策或者美国的妄自尊大，都没有令他踟蹰片刻。最糟糕的是，他自负而又肤浅，即使在将本民族推向更多痛苦和混乱之时，还自诩为通情达理。悲哉，伊拉克！

《金字塔报》，2002年11月28日—12月4日

《生活报》，2002年12月3日

## 38. 当务之急

巴勒斯坦生命财产的损耗每日剧增，无休无止。阿拉伯及西方媒体都在令人毛骨悚然地报道耸人听闻的自杀性爆炸袭击，包括受害人的照片、姓名以及令人揪心的悲惨细节。在此我毫不犹豫地重申，无论基于何种理由，这些爆炸行动在道德上都是令人反感的，在政治上都是灾难性的。但我发现一个同样可怕的事实，即以色列杀害了数目远为巨大的人，其中大部分是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这里是一位90岁的老人，那里是整个家庭，今天是一名智障青年，昨天是一位护士，等等——而且拒绝阻止或以任何方式限制近几个月来从未间断地给太多巴勒斯坦人造成灾难浩劫的军队。然而在大多数时候，这些可怕的屠杀只刊登在报纸背页，而在电视上却从未被提及。至于以色列那些持续不断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暗杀行为，则受到媒体姑息，逃脱记者报道，而这些记者用一些“据称”或“官方称”之类的词语来搪塞自己身为记者的失职行为。尤其是《纽约时报》，目前它在报道中东（包括伊拉克）局势时，这类短语用得如此之多，以致最好是将其重新更名为《官方言论报》（*Officials Said*）。

换言之，以色列继续针对巴勒斯坦平民故意制造流血事件的这些非法行为，其事实真相却被模糊、掩盖，藏匿于人们视线之外，

尽管它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发生。65%的失业率，50%的贫困人口（即那些每天依靠不足两美元糊口的人们），中小学、医院、大学、生意都受到持久的军事强制：这些还仅只是以色列反人类罪行的外部表现。40%以上的巴勒斯坦人营养不良，而且饥荒目前正在对整个社会构成真正威胁。无休止的宵禁令、无穷尽的土地征用、定居点兴建（现在几乎已达两百个）以及对庄稼、树木和房屋的破坏，已使巴勒斯坦黎民百姓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许多人正在背井离乡，或者像堰南村（Yanun village）的居民那样，由于定居者对他们实施的恐怖行为，由于房屋被焚毁，生命受到威胁而无法继续驻留此地，不得不远走他乡。这一切行径，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清洗，尽管沙龙的恶魔计划是每日循序渐进，避免被彻底曝光，并且永远不会被累积在一起当做某个总体模式的组成部分。有了布什政府对其政策的无条件支持，无怪乎沙龙底气十足地放言：“我们不会对我方行动加以限制。以色列没有承受压力。没有人在批评我们，或者有权利批评。我们在此谈论的是以色列保护本国公民的权利”（路透社，2002年11月15日）。为什么这种蛮横无礼的态度没有得到回应，为什么没有人立刻将它与导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目前正在海牙受审的罪行联系起来，这表明国际社会已变得多么虚伪。凭借美国的庇护，沙龙在打击恐怖主义的伪装之下，随心所欲地杀害巴勒斯坦人。

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接下来更有巴勒斯坦及阿拉伯政治的可悲状态，许多领袖和精英分子变得腐败至极，给本国人民造成前所未有的伤害。针对美国宣布的在入侵伊拉克之后要重绘中东地图的计划，这些人既没有集体地、也没有单独地提出任何系统策略，更不用说提出系统抗议。这些政权目前能做的一切，似乎就是要么将自己作为美国不可缺少的伙伴进行兜售，要么弹压他们当中任何不服从的迹象。或两者并行。伊拉克反对派们在伦敦的不体面的争吵和混乱局

面——这一切尽在美国的扎勒米·哈利扎德（Zalmay Khalilzad）的严密注视之下，他是贝鲁特美国大学毕业生，曾经是我在纽约的邻居，现在已成为切尼和沃尔福威茨的新保守派门徒——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处境。只代表本人利益的代表们，为了夺取某国资源而几乎将其毁灭的国际强权居高临下地赏赐的帝国主义保护，依靠恐怖统治维持的不受信赖的地方暴政（其中萨达姆政权最为恶劣），以及此类政权里里外外民主迹象荡然无存的状况——所有这一切，绝非令人欣慰的未来前景。整个局势中特别醒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无助与沉默，这些人被整体的冷漠、压抑所笼罩，受尽屈辱。阿拉伯世界里的每件事，要么是由那些基本上未经选举而当权的统治者自上而下完成的，要么是由那些虽然老谋深算但未被指派任命的中间人幕后操纵。资源被不负责任地交换或出售；政治上的未来是为了强权及其在当地的承包代理人之便利而规划出来的；人类同情心以及对公民幸福的关怀意识，却很少得到机构的培育呵护。

巴勒斯坦局势以惊人的戏剧性体现了所有这一切。作为 35 年军事占领的顶点，以色列军队在过去九个月里破坏了西岸及加沙地区平民生活的基础设施：事实上，那里的人们生活在囚笼里，由混凝土制成的带电围墙隔开，或者被以色列军队把守警戒，禁止自由活动。亚西尔·阿拉法特及其手下，由于在奥斯陆签署了协议，也由于将合法性赋予以色列的占领行为，至少应对目前这种瘫痪与荒废的局面负责，但他们似乎千方百计赖着不肯下台，尽管有关其腐败行为与非法敛财的惊人报道在整个以色列、阿拉伯和国际媒体上流淌。令人深感不安的是，这些人中的许多，最近凭借他们以前作为阿拉法特代理人和随从的信誉，参与同欧盟、中央情报局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之间的秘密谈判。同时，“巴勒斯坦先生”本人则继续发布各种命令

和荒谬可笑的谴责声明，它们要么毫无效果，要么陈年老套。他最近对奥萨玛·本·拉登的抨击便是一例，正如他反过头来重新接受克林顿 2000 年提出的计划之举。尽管如此，他和他的追随者，例如冒险的穆罕默德·拉希德（Mohammed Rashid，又称做哈立德·萨拉姆），继续花费大笔金钱去腐蚀、行贿，为的是不正当地苟延其统治。似乎无人注意到声名狼藉的四方集团（Quartet）（由美国、联合国、欧盟和俄国组成）于某一天异口同声地宣布举行和平会议并进行改革，接着第二天就撤回了这一计划，而第三天则鼓励以色列实施镇压行动。

还有什么比呼吁处在以色列牢牢钳制禁锢之下的全民领袖阿拉法特先生反复宣布、撤销、延迟、再宣布的巴勒斯坦选举更为荒谬的呢？人人都在谈论改革，除了那些其未来与改革息息相关之人——即那些尽管其贫困与苦难每时每刻都在加剧，却仍在咬牙忍受并做出牺牲的巴勒斯坦公民。到处都在以长期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名义在酝酿、拟订治国方案，而这些方案唯独不是出自那些人民本身，这难道不是天大的讽刺吗？简直可以说荒谬绝伦。无疑，瑞典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美国人，甚至连以色列人都非常清楚象征着中东未来的关键是巴勒斯坦，而这正是他们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将巴勒斯坦人民尽可能排除在对未来的决策之外的原因。而且这一切发生在愈演愈烈的鼓吹对伊战争的运动期间，为此，众多美国人、欧洲人和以色列人公开表明，重绘中东地图并引进“民主”的时辰已到。

现在是这位自称穿着被他叫做民主的新装的皇帝在骗子面前暴露真身的时候了。民主不能被从外部输入或者强加：它是那些可以创造它并渴望在其中生活的公民的特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阿拉伯国家一直生活在各种“紧急”状态下，这种状态已成为其统治者以安全的名义为所欲为的许可证。甚至在奥斯陆协定下的巴勒斯坦

人也曾有一个强加于其身的政权，它的存在首先是为了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其次是为了服务（并且帮助）自身。

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巴勒斯坦的事业（正如种族隔离之于南非的解放事业一样）总是被当做阿拉伯人及世界各地所有正直的理想主义者的典范〕，如今的当务之急便是巴勒斯坦人要采取措施，重新亲手掌握自己的命运。目前，巴勒斯坦政治舞台分野对峙，摆开两个既无吸引力又行不通的选择。一方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阿拉法特之剩余力量尚存。另一方面，又有伊斯兰诸党派。双方都不可能为巴勒斯坦公民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太不可信赖，连最基本的机制都无法建立，其腐败和玩世不恭的历史在各方面都满目疮痍，因此不能将未来托付给它。只有无赖才会假装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就像它的一些安全长官和显赫的谈判代表目前装腔作势的表现一样。至于伊斯兰诸派别方面，它们将绝望的个体领进一个充满无休止的宗教冲突和反现代的衰亡倒退的负面空间。如果我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已经失败，那么我们又怎能消极被动地求助于另一个宗教，并在那里寻求现世拯救呢？绝无可能。是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不是诸神，也不是魔术或者奇迹。将有“异类”生存的土地予以净化，无论这块土地上的人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犹太人，都是对拥有不同种族、历史、民族身份、宗教或国籍的数十亿之众的人类生活施加的污辱。

但是，我认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些。而且幸运的是，除了哈马斯和阿拉法特的权力机构以外，还有另一个政治选择。这里我指的是由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成立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组织。他们今年6月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巴勒斯坦国家创始”组织，其领袖人物有穆斯塔法·巴尔古提医生和海德尔·阿卜杜勒·沙菲医生、拉维娅·阿沙瓦，还有许多无党派人士。他们知道处于衰

弱状态的巴勒斯坦社会正在被各党派作为“改革”的对象，而这些党派真正感兴趣的是要将巴勒斯坦作为未来岁月里的一股政治和道德力量加以清除。阿拉法特和他的副手们对选举的闲谈，意在宽慰局外人，使其相信巴勒斯坦民主正在行进。事实远非如此，因为这些人用尽一切手段，包括使用彻头彻尾的欺骗手段，一心只求继续维持其腐败和破产的道路。人们应该不会忘记，1996年的选举是在奥斯陆进程的基础上实施的，而奥斯陆的主要目的则是以不同的名目维系以色列的占领。立法委员会（al-majlis al-tashriei）不论是在阿拉法特的命令还是在以色列的否决权面前，其实都是无能为力的。现在沙龙及四方集团提出的建议是将同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权进行拓展。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创始”组织已经成为各地巴勒斯坦人无法回避的选择的原因。首先，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同的是，它主张摆脱以色列占领，而不是与之合作。其次，它代表平民社会中的广大底层人民，因此不包括军事或安全人员以及阿拉法特朝廷的依附者。第三，它赞成解放，而不是对占领进行重新调整以迎合那些精英和达官贵宾。

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创始组织——我满腔热忱地支持它——提出了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权力机构的设想，选出这个机构是为了服务于人民，并且满足人民对于解放、民主自由、公开辩论和社会责任的需求。这些事情已经被拖延得太久。法塔赫、人民阵线、哈马斯及其他所有党派之间的陈旧划分，如今已失去意义。我们负担不起如此荒谬的装模作样，因为作为一个被占领的民族，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领导层，其主要目的便是让我们摆脱以色列的掠夺与占领，并且给我们提供一个秩序，以满足我们对诚实无欺、放眼全国、清正透明以及直率言论的需求。阿拉法特有说话表里不一的历史前科。而另一方面，巴尔古提——这里我以他为例——无论是对巴勒斯坦、以色列还是对其他国家的媒体发表言论，都恪守原则。他由于在乡村的

医疗服务而受到人民的尊敬，而他的诚实与领导能力激励了同他接触过的每个人。我还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现在应该由那些现代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领导，而公民价值在这些领导人眼中居于核心地位。目前我们的统治者从来没有担任过公民，从来没有排队买过面包，从来没有自己掏钱付过医药费或者学费，从来没有忍受过恣意逮捕、种族欺凌和阴谋夺权带来的变化无常与野蛮残酷。巴尔古提和阿卜杜勒·沙菲这些范例，诚如“国家创始”组织中的其他主要人物一样，表达的是我们寻求思想独立、担当负责任的现代公民的需要。旧的时代已经终结，应该尽快将它埋葬。

作为总结，我想说：真正的变化只有在人们主动寻求发生这一变化，由他们自己把它变得可能的时候，才会到来。伊拉克反对派将自己的命运扔到美国手里，是正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并且这样做是没有足够重视伊拉克人民的真正需求，而伊拉克人民正在遭受独裁政治的残酷迫害，并将遭受同样可怕的美军轰炸。现在可以在巴勒斯坦进行选举，不是要重组阿拉法特的烂摊子，而是要为一个合乎宪法、真正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机构选出代表。可悲的现实是，阿拉法特在他长达10年的暴政期间极力阻挠立宪，尽管他就“巴勒斯坦民主”做过许多毫无意义的荒谬之事。他留下的遗产既不是一部宪法，甚至也不是一部基本法，而只是一个老朽的黑手党。尽管如此，尽管沙龙丧心病狂地妄图结束巴勒斯坦的国计民生，我们的大众机构和民事机构仍在极度艰难困苦与威逼胁迫之下发挥功能。无论如何，教师仍在教学，护士仍在护理，医生仍在医治，等等，等等。这些日常活动从未停止，即使仅仅是由于需求主宰着无尽的努力。现在，那些机构和曾经真正服务于社会的人们必须挺身而出，通过和平手段，出于真实的民族动机，为我们的解放和民主提供一个道德和理智的框架。在这种努力之下，被占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和流散在外的巴



勒斯坦人同样有义务做出努力。或许这个国家创始组织还可以为其他阿拉伯人提供一个民主的典范。

《金字塔报》，2002年12月19—25日

《生活报》，2002年12月31日

## 39. 难以接受的软弱无助

打开每天的《纽约时报》，任何人都会读到最近有关美国正在进行的战争准备的文章。又有一个营的军队、又有一组航空母舰和巡洋舰、数量仍在不断增加的飞机和一批新的军官正赶赴波斯湾地区。上周末，又有 62000 名士兵被遣往波斯湾。美国正在海外集结一支庞大的、故意显示威慑力的军队，而在国内，有关经济与社会的坏消息同步地、无情地成倍增加。这架巨大的资本主义机器，即使是在它碾碎绝大多数公民的时候，也似乎显得步履蹒跚。然而，乔治·布什却提议再次为占人口 1% 的那部分相对富有的阶层大额减税。公众教育系统存在着巨大危机，而且五千万美国人根本没有医疗保险。以色列要求 150 亿美元的附加贷款保证和军事援助。而美国失业率却在无情地攀升，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失去工作。

然而，为这场代价昂贵得超乎想象的战争所做的准备仍在继续，在既没有公众赞成、也没有非常明显的不予赞成的状况下继续进行着。一种普遍的冷漠（其中可能隐藏着全面的、巨大的恐惧、无知和忧虑）已然接纳政府的好战行为以及它对朝鲜最近的挑衅做出的不可思议的无效反应。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在没有找到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下策划了一场战争；而在朝鲜问题上，它却为这个国家提供经济与能源帮助。同样是严厉而残酷的专制统治，在对阿拉伯

人的藐视与对朝鲜人的尊重之间存在着何等令人屈辱的差异。

在阿拉伯及穆斯林世界里，局势更加不同寻常。将近一年来美国的政客、地方专家、行政官员和新闻记者都重复着已成家常便饭的有关伊斯兰和阿拉伯的指控。正如我在《东方学》和《报道伊斯兰》两部书中所示，这一论调大多数先于“9·11”事件。如今在几乎众口一词的合唱之中，还加进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对阿拉伯世界的权威看法，该报告认定阿拉伯国家在民主、知识及女权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每个人都在说（当然，也有一些在论证）伊斯兰教需要改革，而且阿拉伯的教育体系是个灾难，其实是一所培养宗教狂热分子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学校，而它不仅由疯狂的伊玛姆们（*imam*，译注：伊玛姆为伊斯兰教领袖的称号）及其富有的信徒（如奥萨玛·本·拉登）资助，还得到那些被看成美国盟友的政府的资助。阿拉伯唯一的“好人”是那些在媒体上毫无保留地谴责现代阿拉伯文化与社会的人。我记得他们的语调极为呆板，毫无生气，因为他们没有说过一句对他们本人、本民族及母语的肯定之言，而只是一味反刍那些在电台和报纸上泛滥成灾的乏味透顶的美国套话。他们说，我们缺乏民主，我们对伊斯兰教挑战不力，我们需要进一步驱逐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幽灵以及关于阿拉伯统一的信条，那都是不足信的意识形态垃圾。只有我们和我们的美国导师所说的有关阿拉伯各国和伊斯兰教的说法——一些被伯纳德·刘易斯等不知疲倦的平庸之辈回收利用的含糊不清的东方主义陈词滥调——才是真的，其余的都不够现实或不够实用。“我们”需要加入现代性的行列，而这个现代性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的和民主的——不管那些词汇可能被用来指称什么。[如果有时间，我会写一篇随笔来讨论福阿德·阿贾米、法瓦兹·格尔格斯、卡南·马基亚、哈达·塔尔哈米（*Ghada Talhami*）、玛玛姆·范迪（*Mamom*

Fandy) 等人的文风。这些学界人士的语言散发着卑躬屈膝、虚假不实以及人为强加的僵硬模仿的臭气。]

乔治·W. 布什及其宠臣们为了掩盖其先发制人的对伊石油战与争霸战而试图捏造出来的文明冲突，被指望会导致民主式的建国、政权变更和强制的美式现代化的胜利。不必介意那些未被提及的炸弹轰炸和制裁造成的破坏。这将是一场净化战争，其目标在于铲除萨达姆及其同党，并代之以对整个地区重新绘制的地图。新的“赛克斯—皮克特协定”(Sykes-Picot)。新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新的“威尔逊十四点计划”(Wilsonian Fourteen Points)。总之是个崭新的世界。我们被伊拉克持不同政见者告知：伊拉克人将会欢迎他们的解放，或许还会彻底忘记过去的苦难。或许。

与此同时，摧残灵肉身心的在巴勒斯坦的局势一直在不断恶化。沙龙和沙乌勒·莫法兹咆哮着向整个世界发出挑衅，似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们。我们禁止，我们惩罚，我们取缔，我们违规，我们破坏。针对整个民族的持续不断的暴行如滚滚洪流继续奔腾。就在我写作这几行文字时，有人送来一份公告，说约旦河西岸的卡尔齐亚地区的整个阿尔达巴村(Al-Daba')即将被美国制造的60吨级以色列推土机铲平：250名巴勒斯坦人将失去他们的42所住宅、700德南农用土地、一座清真寺和一所供132个孩子上学的小学。联合国袖手旁观，在它的决议每时每刻都受到藐视的情况下，在一旁漠然观望。可悲可叹，乔治·W. 布什的典型反应是认同沙龙，而没有站在那个被以色列士兵当做人肉盾牌的16岁巴勒斯坦少年一边。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议要重建和平，很可能指的是回到奥斯陆协议上来。经历了10年煎熬，阿拉法特似乎第一次令人费解地想要再一次尝试实现它。他忠实的副手们发布宣言，在媒体上

发表意见，或多或少暗示他们愿意接受任何条件。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这些英勇的人民大多数似乎都情愿一如既往，没有和平，没有喘息，流血不止，挨饿不断，生命垂危，就这样日复一日。他们有太多尊严，对自身事业的正义性抱有太多的信心，所以不会像他们的领袖们那样可耻地屈从以色列。对于那些坚持不懈地抵抗以色列占领的加沙百姓来说，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领袖在美国人面前下跪乞怜更令人沮丧的呢？

在这满目凄凉景象之中，引人瞩目的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彻底的消极被动与软弱无助。美国政府及其官员们发表了一个又一个意图声明，他们调动军队和物资，输送坦克和驱逐舰，但阿拉伯人无论是单个还是集体却连一句温和的拒绝都没有勇气说出（他们最多只是说，不，你不能在我们的领土上使用军事基地），而仅仅在几天之后便倒戈转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沉默和如此惊人的无助？

历史上最大的强国即将对一个暴政统治之下的阿拉伯主权国家发动一场战争，并且正在不断重申其开战意图；这场战争的明显目的不仅是要摧毁一个复兴党政权，而且是要对整个地区重新规划。五角大楼毫不避讳地说，它的计划是重绘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地图，在此过程中或许还会变更其他政权或者许多边境。一旦战争来临（如果来临的话，还不能完全肯定），无人能够逃过此劫。可是，作为回应，只有长时间的沉默，接着是含含糊糊地嘀咕几声彬彬有礼的异议。毕竟有数百万人民将会受其影响。美国没有同他们商议一下，就轻蔑地规划他们的未来。难道我们就该受到这样的种族主义嘲弄吗？

这不只是令人无法接受：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拥有近乎三亿阿拉伯人的地区，怎能不发出任何反抗的集体怒吼，怎能不大声宣布一个截然不同的抉择，就消极无为地等待打击的到来？阿拉伯的

意志已被彻底瓦解了吗？就连即将被处决的犯人通常也有临终话语要说。现在，为什么一个历史时期，一个即将被完全毁灭和改造的文明，一个尽管有着缺陷和不足但却在继续运行的社会，却没有留下任何最后的凭据证言？每时每刻都有阿拉伯婴儿呱呱坠地，都有儿童上学受教，都有男女缔结婚姻、养家糊口、生儿育女，他们嬉戏、欢笑、饮食，他们黯然伤怀，他们罹患疾病，他们撒手人寰。他们之中有爱，有陪伴，有友情，有快意。不错，阿拉伯人受到压迫，受到暴政蹂躏，受到骇人听闻的暴政蹂躏，但尽管如此，他们仍在设法继续生存下去。对于这一事实，无论是阿拉伯领袖还是美国人，在朝着那些平庸的东方学者发明的所谓“阿拉伯街”挥舞空洞的手势时，却都视而不见。

但是，现在由谁来提出关于我们民族未来生存的问题？这个任务不能留给发出刺耳聒噪的宗教狂热分子和毕恭毕敬、听天由命的羔羊们来完成。然而，实际情况似乎就是如此。阿拉伯诸政府——不，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是全国上下——在美国拉开架势、集结完毕、威慑恫吓并且增兵派员、运送 F-16 战斗机发起猛攻的时候，只是坐以等待，不采取任何行动。这种沉默是震耳欲聋的。

多年来的牺牲和斗争，从大西洋到波斯湾数百所监狱和刑讯室里的骨折身残，家破人亡，无尽的贫穷与苦难。庞大的武力，昂贵的军费。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

这不是关乎政党的问题，也不是关乎意识形态或派系的问题：这是关于被伟大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称为“终极严肃（ultimate seriousness）”的问题。科学技术、现代化、当然还有全球化，都不是目前威胁我们民族的东西。在我们的传统中存在着关于如何对待始与终、生与死、爱与忿、社会与历史的一整套世俗话语和宗教话语。它就在那里，但现在似乎没有任何声音，没有拥有远

见卓识与道德权威的个体，能够切入其中并唤起人们对它的注意。我们正处在大灾难的前夜，而我们的政治领袖、道德领袖及宗教领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在一番交头接耳、眉来眼去和闭门商议之后，才对临近的灾难稍做谴责，他们制订的是以某种方式安然度过风暴的计划。他们考虑生存，或许还考虑到来世天堂。但是有谁来对当下负责，对现世、土地、水、空气以及相互依存的生命负起责任？似乎无人担此责任。英语中有一句绝妙的俗语，可以非常精确并颇具讽刺意味地刻画目前我们在最需要拿出力量的时候表现出的令人难以接受的软弱无助、消极无为和自救无门。这句话就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请把灯熄灭，好吗？我们非常接近于某种剧变，而它几乎不会留下什么持续存在的东西，更致命的是甚至没有什么会被记录下来，遗留下来的唯有乞求灭绝的最后命令。

面对即将席卷我们世界的浩劫，难道不该是我们群策群力、严正要求，并且努力设计出一个真正属于阿拉伯人的另一种选择方案的时候了吗？这不只是政权变更之类微不足道的小事，尽管天知道我们是否有那么一点需要它。当然不可能返回奥斯陆协定，否则岂不是在向以色列提出另一个请求接受我们的存在、让我们和平相处的提议，另一个战战兢兢、卑躬屈膝、无声无息的告饶乞怜吗？就没有人能挺身而出，光明正大地表达对于我们未来的看法，而不是拿着象征空洞强权与傲慢自负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两人炮制的手稿照本宣科？我希望有人正在倾听。

《金字塔报》，2003年1月16—22日

《生活报》，2003年1月23日

《卫报》，2003年1月25日

## 40. 伪善纪念碑

耳闻目睹这个国家的新闻，最终已使人忍无可忍。我曾一再告诉自己，一个人应该每晚翻阅报纸并打开电视来获取国家新闻，以便了解“这个国家”正在想些什么、正在筹划什么，但人的耐性和受虐能力是有限的。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的讲话，其目的显然在于激怒美国人并胁迫联合国开战，这在我看来，似乎在道德伪善和政治操控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极致。然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上周末在慕尼黑所作的演讲，其虚情假意的说教和恃强凌弱的嘲弄比语无伦次的鲍威尔走得更远。此刻我要将乔治·W. 布什及其顾问团、精神导师和政治经纪人大打折扣，例如像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富兰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和卡尔·罗夫（**Karl Rove**）：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正在充当权力的奴仆，这一点在他们这个群体的发言人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那一再重复的单一论调中得到完美体现。他曾说布什在与上帝直接交流，或者，如果不是上帝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天意。或许只有以色列定居者才能够与他交谈。但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却似乎来自饮食男女所在之俗世凡尘，因此，在他们的言行上多逗留片刻，或许更为合适。

首先，是一些初步行动。无疑，美国发动战争之意已决：对此似乎别无选择。然而战争是否会真正爆发（鉴于已经开始的那些行



动，它们并非由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似乎一贯都是既优柔寡断又瘫痪疲软——而是由法国、俄国和德国发起的）那就另当别论了。然而尽管如此，将约旦、土耳其和以色列的较小军事部署搁置一旁，而向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输送 20 万大军，这只能意味一件事情。

其次，这场战争的策划者，正如拉尔夫·纳德曾有力地描述的那样，不过是些鹰雏——也就是说，是些胆小畏缩、不敢一试身手搏击长空的鹰。沃尔福威茨、珀尔、布什、切尼以及那个纯粹文官集团的其他成员，都曾无一例外地强烈支持越南战争，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有缓役的特权，因此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甚至根本没有在军队里服过役。因此他们的好战态度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而又是实实在在地极端反民主的。这个毫无代表性的阴谋集团在对伊战争中所极力寻求的，与真正军事上的考虑无关。伊拉克这个国家，无论它那可悲的政权多么令人憎恶，却完全不会对其邻国如土耳其、以色列甚至约旦（它们每个国家都能军事上轻而易举地应付它）构成迫在眉睫的和毋庸置疑的威胁，当然肯定不会威胁到美国。任何相反论点都是荒谬绝伦、全然轻率的主张。伊拉克只有几枚旧式飞毛腿导弹和少量生化原料，而且大部分是由美国早年提供的（正如纳德所言，我们知道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们握有美国公司给伊拉克的售货收据），因此，伊拉克是能够被遏制的，并且已被不费吹灰之力地遏制住了，尽管有违道德良知地让长期受苦的平民付出了代价。基于这一可怕事态，说伊拉克政权与西方制裁者一直在串通一气，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

第三，一旦列强们开始梦想着政权变更——一个已被这个国家的珀尔们和沃尔福威茨们启动的进程——那么就根本看不到它结束。这等才能资质大可怀疑之人，竟然喋喋不休地嚷嚷着将民主、

现代化和自由化带到中东，这难道不令人气愤吗？正如许多阿拉伯及穆斯林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曾再三说过的那样，天晓得哪个地区需要它。但无论如何，有谁曾指派过这些人来充当进步的代理？而且，在他们本国还有那么多不公与弊端需要纠正的时候，是什么授权他们如此恬不知耻、自命不凡？尤其令人感到屈辱的是，珀尔这位或许是能够想象得出的最不适合触及民主与正义主题之人，竟然曾是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极端右翼政府在 1996—1999 年间的选举顾问，而在此期间，他曾劝告这位背信弃义的以色列人废止一切和平努力，吞并西岸及加沙地区，设法尽可能多地去除巴勒斯坦人。此人目前竟在谈论将民主引进中东，而他的这番作为并没有引起那些在全国电视节目上礼貌（而卑鄙）地向他提问的媒体大腕们的丝毫异议。

第四，尽管科林·鲍威尔的讲话存在许多缺点，如抄袭和捏造的证据、拼凑的录音磁带、假造的相片，但它有一点却没说错。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大量违反了人权和联合国决议。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没有任何借口可寻。但是，美国官方立场极其伪善的一面在于，鲍威尔对复兴党之所作所为的每项指控，实际上都是以色列 1948 年以来历届政府的惯常行为，尤以 1967 年占领以来最为明显。刑讯逼供、非法拘留、行刺暗杀，用导弹、直升机和战斗机袭击平民，霸占领土，将平民运往异地囚禁，进行大屠杀（喀纳、杰宁、萨布拉及沙提拉的大屠杀只是其中最明显的几例），剥夺平民的自由通行权、自由迁徙权、教育权和医疗救助权，拿平民做人肉盾牌，羞辱、惩罚其家人，大规模地破坏房屋，毁坏农田，征用水源，非法定居，制造经济贫困，袭击医院、医护人员和救护车，杀害联合国人员，这还只是其中最为暴虐的恶行：应该着重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美国全方位、无条件的支持下实施的。美国不仅为以色列的上述行径提供武器以及各种军事援助和情报援助，而且还向这个国家提

供高达 135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按人均计算，其水平已使美国政府用在本国公民身上的金额相形见绌。

这种违背良知行为的记录，使我们对美国、特别是作为其象征的鲍威尔先生不会有很好的看法。作为负责美国外交政策之人，他的特殊职责就是维护这个国家的法律并确保始终如一、毫无例外、不带任何条件地执行人权和促进自由——这是经过公开声明了的、至少是自 1976 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令人无法相信的是，他与上司和同事如何能够站在世人面前义正词严地训诫伊拉克，而与此同时，又能完全无视美国正与以色列沆瀣一气、践踏人权。然而，自从鲍威尔著名的联合国演讲发表以来，在所有对美国立场的合理批评中，没有一个侧重于这一点，即使是如此正直的法德两国也不例外。目前，巴勒斯坦领土正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饥荒；健康危机达到灾难性的比例；平民死亡人数统计至少每周达 12 至 20 人；经济已经崩溃；由于宵禁令和至少三百个路障妨碍着他们的生活，数十万无辜平民不能工作、学习或走动；而且房屋被大面积炸毁或夷为平地（仅在昨天就有 60 所）。而所有这些都是凭借美国设备、美国的政治支持和美国提供的经费来完成的。布什宣布沙龙这个依据任何标准都是战犯之人是一位和平人士，这仿佛是往被沙龙及其犯罪军队剥夺和蹂躏的无辜巴勒斯坦生命之上吐唾沫。而且，他竟胆敢说，他是以上帝的名义采取行动，并且他（和他的政府）如此行事乃是在为“一个公正而可信赖的上帝”服务。更令人震惊的是，他面对世人而谴责萨达姆违反联合国决议，恰恰是在他支持以色列这个每天至少违反 64 项联合国决议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国家的时候。

但是，今天的阿拉伯政权是如此地怯懦与失效，以至不敢对任何这类事情发表公开声明。它们当中有许多需要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有许多害怕本国人民，需要美国的支持来维持政权。许多可以被指控

同样犯有反人类罪。因此他们保持沉默，只一心盼望、祈祷这场战争会过去，允许他们能像现在一样继续留任其位。

但是，也有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事实，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在战争之前，而不是在战争期间，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战抗议。这是没有先例的，而且应该成为由美国及其超级大国地位将我们的世界强行推入其中的这个全球化新时代里的核心政治事实。这一事实表明，尽管像萨达姆及其美国对手这样的独裁者和暴君掌握着令人恐惧的权力，尽管大众媒体的同谋行为（不管是否愿意）已经加速了冲向战争的进程，尽管很多人对此漠不关心、茫然无知，但是，基于人类共同体以及可持续性的大规模群众行动和群众抗议，仍是人类抵抗的强大工具，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称之为弱者的武器。但是他们至少已经打乱了华盛顿的那些雏鹰及其支持团体的计划，也打乱了几百万信奉宗教战争的一神论宗教极端分子（包括基督教的、犹太教的和穆斯林的）的计划，这是我们时代的希望之灯。我无论到何处演讲或者直言抨击这些不公，从未发现任何支持这场战争的人。作为阿拉伯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反对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与在伊拉克、巴勒斯坦、以色列、库尔德斯坦（**Kurdistan**）以及阿拉伯世界任何地方支持人权的行动结合起来——并且也号召其他同人，促使每个人加入这样的结合，包括阿拉伯人、美国人、非洲人、欧洲人、澳洲人和亚洲人。这是关乎世界的问题，关乎人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与美国或其他主要强国的战略相关的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对这样的战争政策保持沉默：白宫已经公开宣布，这场战争中每天将有 300 到 500 颗（而在战争爆发的头 48 小时将有 800 颗）巡航导弹暴雨般地降落到巴格达平民百姓头上，目的在于产生“震慑与恐惧”的效果，甚至造成一场人类浩劫，正如其中某个叫做哈伦·厄尔曼（**Harlan Ullman**）先生（或者博士？）的

自负的策划者所说，它将对伊拉克人民产生一个广岛式的效应。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在对伊拉克长达41天的轰炸之后，甚至也没有接近这种规模的人类毁灭。而美国有6000枚“精密制导”的飞弹随时待命完成此任。是什么样的上帝想要为他的子民制定和宣布这样的政策？而且，是什么样的上帝会声称这将不仅给伊拉克，也将给中东其他国家带去民主和自由？

这些是我甚至不想尝试回答的问题。但我确实知道，如果任何类似事件光顾地球上任何人口的话，那将是犯罪行为，而且，根据美国自身对其制定起过重要作用的纽伦堡法律，它的实施者与策划者都将成为战争罪犯。沙龙将军和沙乌勒·莫法兹是不会无缘无故地欢迎战争并赞美乔治·W. 布什的。谁知道在善的名义下还会做出何种更为邪恶之事？我们每个人必须现在就行动，而且要不断行动，再三行动，提高声音，挺身抗议，勇往直前。我们需要创造性的思维和大胆的行动，来避开由华盛顿、特拉维夫及巴格达的一群驯服的、职业化的雇员设计出来的噩梦。因为，如果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他们所说的“更大安全”的话，那么词语就已完全失去了它的通常意义。显然，布什和沙龙蔑视这个世界上的非白人民族。问题是，他们这样逃避追究还能持续多久？

《金字塔报》，2003年2月13—19日

《生活报》，2003年2月25日

## 41. 谁在当政？

有很多理由让我们对布什政府无情地单方面向战争迈进深感不安，然而，就美国公民而言，这整个荒唐表演可谓民主的一场巨大失败。一个极其富裕而强大的共和国已被一小撮阴谋家劫持，这些人全都未经选举而就职，故而对公众压力毫无反应，而只是随意行事。如果认为这场战争是现代史上世界范围内最不受欢迎的战争，将一点也不夸张。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在这个国家，抗议战争的人数就比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间反越战示威的高潮时期更多。还要指出的是，那次集会游行是在战争已持续数年之后才发生的：而这一次却发生在战争尚未开始之时，尽管美国 and 它那只忠实的小狗（即那位行为日益荒谬的托尼·布莱尔执政之下的英国政府）当然已经采取了大量公开的侵略进犯、黩武好战的措施。

由于持反战立场，我最近遭到一些胸无点墨之人的批评，他们声称我的言论是对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可怕政权的一种含蓄的辩护。对于那些批评我的科威特人，我是否需要提醒他们下述事实呢？1985 年，在对科威特进行的唯一一次访问期间，我就曾公开反对阿拉伯社会复兴党领导的伊拉克，在与当时的教育部长哈森·阿尔—易卜拉欣（Hassan el-Ibrahim）进行公开会谈时，我谴责他和他的政权通过给予萨达姆·侯赛因财政支持来援助和煽动阿拉伯的法西斯主义。

接下来我被告知：科威特为能向萨达姆提供将近数十亿美元来同“波斯人”（the Persians）（人们当时这样轻蔑地称呼）交战而感到自豪，并且这场斗争的重要性远非像我这样的人所能理解。我清楚地记得，我曾就萨达姆本人及其对科威特的邪恶意图警告过那些在科威特的萨达姆追随者，却全然无效。自 20 世纪 70 年代伊拉克政权上台以来，我一直是它的公开反对者：我从未造访此地，从未受其关于世俗主义与现代化的声明所愚弄（即使当我的同时代人中有许多要么为伊拉克工作，要么盛赞伊拉克是阿拉伯武库中瞄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力炮时，在我看来，那也是愚笨的想法），从不隐瞒我对其统治手段与可怕的法西斯行为的蔑视。而现在，当我直言不讳地谈论某些伊拉克反对派成员搔首弄姿地充当美帝国主义的不幸而自负的傀儡的时候，我被告知，我对缺乏民主的生活一无所知（关于这一点随后再谈），故而我不能欣赏他们高贵的灵魂！人们很少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在盛赞布什总统对民主的承诺之后，仅仅事隔一周，卡南·马基亚就公开指责美国及其拟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后萨达姆时代的复兴党军政府（post-Saddam military-Ba'ath government）的计划。当个人习惯于更换其政治上顶礼膜拜的神明时，在他们以遭受彻底的耻辱和应得的遗忘而告终之前，会无休止地变换偶像。

但还是回到美国及其目前的行动上来。在所有的会晤与旅行中，我还没有遇到一个支持战争的人。甚至更糟的是，大部分美国人现在感到这场动员已经走得太远以至无法停止，并且我们正处于一场国难的边缘。首先不妨考虑一下，除了少许例外，民主党在虚伪爱国主义的怯懦表演中，已经完全投靠到总统一边，尽管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国会里，一眼望去，到处流露出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基督教右翼分子或军工复合体的迹象。这三个极具影响力的少数群体，在对阿拉伯世界的敌意中，在肆无忌惮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极端

分子的行为中，以及在愚蠢地认为他们站在天使一边的信念中，享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国家的 435 个选区中，每一区都拥有一个国防工业，所以战争已经不是关乎安全，而是关乎就业。但是人们或许会问，发动一场代价昂贵得难以置信的战争，如何能补偿诸如经济衰退、社会保障体系几成定局的破产、不断上升的国家赤字以及该国公共教育系统的巨大失败？当然不能，任何一个都不能，但战争一方却一意孤行，无可阻挡。示威被当做不过是有失尊严的聚众滋事行为，而最虚伪的谎言被看成绝对真理，既未受到批评，也未遭到反对。

媒体已经成为谋求战争的一个分支机构。任何与通常的异议之声稍有相似的内容，都从电视上彻底消失。现在每个主要频道都请来退休将军、前中情局密探、恐怖主义专家和被视为“顾问”的新保守主义者，说着那些刻意而为的、听起来貌似权威的令人反感的行话术语，但事实上却在支持美国所做的每一件事，从它在联合国之所为，到在阿拉伯半岛沙漠里的行径，概莫能外。只有一家主要日报（在巴尔的摩）发表了些许报道，揭示美国对六个作为安理会成员而尚未决定是否投票支持战争决议的小国从事窃听、电话录音和信号截取的勾当。在这个国家的主要媒体中读不到也听不到反战的声音，没有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出现（他们已被全体归属于这个世界的狂热分子与恐怖分子行列），没有对以色列的批评，在公众广播中没有，在《纽约时报》、《纽约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 & World Report*）、美国有线新闻网及其他媒体中也没有。当这些机构作为一个战争借口而提及伊拉克违反联合国的 17 项决议时，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违反 64 项决议案的行为却从未提及，在过去 12 年间伊拉克人民遭受的巨大的苦难也只字未提。无论可怖的萨达姆做过什么，以色列及沙龙在美国支持下也同样干过，然而



人们在强烈指控前者之时，却绝口不提后者。布什等人使得联合国必须遵守自身通过的决议变成了十足的笑话。

因此，美国人民一直受到蓄意的欺骗，他们的利益被可笑地错误传达和歪曲报道，小布什及其幕僚集团发动这场私人战争的真正目的和企图被傲慢十足地隐瞒起来。不必介意沃尔福威茨、费斯和珀尔这些替五角大楼里未经选举而上台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当差效力的未经选举的官员的行径，例如他们作为他的私人顾问，曾一度公开鼓吹以色列吞并西岸及加沙地区、停止奥斯陆进程；呼吁对伊拉克（以及随后的伊朗）开战，（在1996年内塔尼亚胡成功竞选总理期间）尽可能建立更多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并且这些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国策。

不必介意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邪恶政策——当众多种类不同的平民死亡时，这些政策也只在文章结尾处予以报道（一旦被报道的时候）——从来没有拿来同萨达姆的罪行进行比较，而两者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甚或在有些情形中，以色列的罪恶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归根结底它们全都是由美国纳税人所支付的，既未与之商量，也未经其批准。在过去两年里，四万多名巴勒斯坦人受到严重伤害，将近2500人被以色列军人肆意屠杀。这些以色列军人在现代史上历时最长的军事占领之中，被授意对整个民族进行羞辱和惩罚。

不必介意自备战进入最后阶段以来美国主要媒体上——无论是自由主义的、温和的还是反动的——看不到也听不见任何稍微常见一点的来自阿拉伯或穆斯林的批评之声。不妨也考虑一下，这场战争的主要计划者中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对伊拉克的这场大规模战争会给真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像伯纳德·刘易斯和福阿德·阿贾米之流的所谓专家自不待言，几十年来他们二人几乎没有在阿拉伯世界生活，甚至没怎么接近过；像鲍威尔、赖斯、切尼和

伟大神灵布什本人之类的军政人物也不例外。他们除了通过以色列、石油公司或军事考虑的透镜来窥视之外，对穆斯林或阿拉伯世界几乎一无所知。

而且，不妨还考虑一下，沃尔福威茨及其助手全然不加掩饰的傲慢无礼，使得他们在被要求向大体上昏昏欲睡的国会证明战争后果与费用时，甚至未对相关问题做出丝毫具体回答就侥幸过关——他们通过这种方式驳回或嘲弄般地打发了陆军参谋长提出的有关40万军队10年军事占领费用几乎高达1万亿美元的证据，因而进一步误导了本来并未要求他们前来回答的公众。

民主遭到了诋毁与背叛，民主得到了盛赞但事实上却被少数一群人肆意羞辱与践踏。这一小撮人掌管着这个共和国，就好像它只不过是一个什么？阿拉伯国家？谁正在当家做主，这是个十分中肯的问题，因为政府对一个饱受不幸、贫穷之苦以致无法继续忍受的世界即将发动的这场战争，显然完全不能代表美国人民。而且美国人民受到了实质上由一小群人控制的媒体的恶劣对待，这群人将任何可能引起政府略微操心与忧虑之事尽行删除。至于那些谈论仿佛源自其隐秘幻想世界深处的战争的煽动家和奴性十足的知识分子们，谁赋予他们权力纵容对数百万人造成悲剧的行径，而这数百万人的主要罪责似乎仅仅在于他们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人？除了这毫无代表性的一小撮人之外，还有哪个美国人真的会兴致勃勃地助长这个世界上业已声势浩大的反美主义？我想，几乎没有。

乔纳森·斯威夫特，汝当生于此世。

《金字塔报》，2003年3月6—12日

《生活报》，2003年3月10日

## 42. 一场愚蠢的战争

媒体上关于对伊战争（虽然这场战争据称是由所谓“多国部队”发动，其实却是一场在英国协助之下的美国战争）的大量报道和评论，充满了自相矛盾，遍布着不折不扣的谎言和毫无根据的断语，掩盖了它的军事专家和政策专家的计划、宣传和辩护性言论已经愚蠢到犯罪地步的事实。过去两周以来，我一直在埃及和黎巴嫩旅行，试图跟上来自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的源源不断的信息和误传，其中有许多是令人误解的乐观信息，但也有一些信息，在其重要性、当然还有紧迫性方面，表现出骇人的戏剧色彩。迄今为止以半岛电视台最声名远扬、最为高效的阿拉伯卫星诸频道，则对这场战争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体上全然对立与那些“嵌入军中”的记者们端出的标准内容——包括一些推测，如伊拉克人会因为不打仗而被杀，巴士拉（Basra）会发生群众暴动，乌姆盖斯尔（Um Kasr）和法奥（Fao）会“陷落”四五次——这些“嵌入军中”的记者提供的灰头土脸的照片显示，他们自身同与之朝夕相伴的说英语的军人一样困惑迷惘。半岛电视台在摩苏尔（Mosul）、巴格达、巴士拉和纳西利亚（Nasiriya）都有记者——其中一位是多情善感的泰西尔·阿洛尼（Taysir Aloni），阿富汗战争年代一位口齿流利的资深记者——并且他们对于摧毁巴格达和巴士

拉的狂轰滥炸的令人震撼的事实以及伊拉克人极度的反抗和愤怒进行了远为具体的现场报道，而据某些人认为，伊拉克人本应只是一群等候着被解放，并向一些长相貌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人投去鲜花的闷闷不乐的人。

且不论这场战争的非法性质以及它普遍不受欢迎的情形，也不谈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战争一直在笨拙地推进、有违人道以及造成彻底破坏的状况，且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谈谈这场战争多么不明智、多么低劣。首先，从未有人令人满意地证明过伊拉克拥有对美国构成即刻威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未有人。伊拉克是个已被大大削弱了的、各项指标都低于标准水平的、由可憎的专制政权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任何国家对此都没有异议，尤其是在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但是，认为它在目前这种被围攻状态下会对任何人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却是个可笑的想法，是那些蜂拥在五角大楼、国务院和白宫周围的被付以过高报酬的记者当中无人愿意费心深究的看法。

从理论上讲，伊拉克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对以色列构成挑战，因为它是唯一拥有充分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的阿拉伯国家，以至于虽与美国行径尚有差距，但却足以与以色列的蛮横残忍行径一争高下。这正是梅纳赫姆·贝京的空军于1981年先发制人地轰炸伊拉克的原因。所以应当注意：美国在策划和实施当前的后“9·11”战役或先发制人的战争之时，越来越多地复制以色列提出的假设及战术（正如我将要说明的，它们全都破绽显著）。媒体竟然胆怯到如此地步，以至不敢对利库德集团正在慢慢接管美国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军事思维和政治思维的趋势展开调查，这实在令人遗憾。人人都如此惧怕被指控为反犹太主义——这种指控肆无忌惮、甚嚣尘上，就连哈佛大学校长发出的声音也汇入其中——以至那些新保守派兼基督教右翼即五角大楼的鹰派文官们对美国政策的扼制掌控已

经变成了某种现实，而这一现实又将彻头彻尾的好战态度和随心所欲的仇视倾向强加于整个国家。有人或许不禁以为：倘若没有美国在支配全球，我们会陷入另一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其次，按照任何常人标准来看，伊拉克人不可能在经历一番可怕的空中轰炸之后还会欢迎美国军队进入他们的国家。但是，这个荒谬的概念已变成美国政策的关键要旨，而这一现象构成了一些纯粹垃圾观点的证据。这些垃圾观点是由伊拉克反对派（他们中许多人跟自己的祖国断绝了接触，并热衷于通过说服美国人相信一场入侵会是多么容易来提升他们在战后的事业生涯）以及伯纳德·刘易斯和福阿德·阿贾米这两位很早以前就被公认为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最具影响力的东方学专家提供的。

年近九十岁的刘易斯大约三十五年前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在那里，他怀有强烈的反共思想，对有关现代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一切（除现代土耳其之外）都提出过尖刻的反对，这使他在20世纪后期被推到亲以色列斗争的前沿。作为一名落伍过时的东方学者，他很快便被铸就新一代学者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进步所超越。这些新学者将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看成是活生生的对象，而不是落后的土著。在刘易斯看来，对伊斯兰全体及“阿拉伯”文明之落后状态的笼统概括，乃是通往真理的必由之路，而只有像他这样的专家方可抵达。人类经验的常识被抛诸脑后，而关于文明冲突的响亮声明却被吸纳进来。[亨廷顿在刘易斯的一篇题为《伊斯兰的回归》(*Return of Islam*)的更加尖锐的文章中发现了对他有利的概念。]作为一名借助语源学来阐述关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的观点的多面手和理论家，刘易斯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游说者中找到了新的听众。在诸如《评论》以及后来在《纽约书评》等杂志中，他对这些新听众发表了充满偏见的训诫，基本上是在强化盛行一时的对阿拉伯人及穆斯

林的刻板的负面印象。

使得刘易斯的文章产生如此骇人后果的是以下事实：无人提出任何其他观点来对他予以反驳，美国的决策者们尤其为他的观点所倾倒。上述事实，再加上他冷冰冰地与人保持距离的态度和傲慢自大的做派，使刘易斯俨然成为一名“权威”，尽管他在过去几十年里从未进入过阿拉伯世界，更不用说生活于其中。他最近的一部著作《问题何在？》（*What Went Wrong?*）成了后“9·11”时代的畅销书，并且，我听说它被指定为美国军队的必读之物，尽管它的陈述既空洞又无证据支持，事实错误屡屡出现，而且论述的是阿拉伯人过去五百年间的事情。阅读此书，你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阿拉伯人是一群无用的、落后的原始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攻击和消灭。

刘易斯还明确表述了同样具有欺骗性的如下论点：中东存在着三个同心圆——支持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国家（约旦、埃及和摩洛哥）、支持美国人民但反对美国政府的国家（伊拉克和伊朗）以及反对美国政府及美国人民的国家（叙利亚和利比亚）。这一论点的所有内容都逐渐溜进了五角大楼的计划之中，尤其是当刘易斯在电视上以及在为右翼新闻界撰写的文章中不断推出他过于简单化的公式之时。于是便有了结论：阿拉伯人不会抵抗，他们不知如何抵抗，他们会欢迎我们，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完全容易受到美国可能施加的任何力量的影响。

阿贾米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黎巴嫩人。他最早以一位亲巴勒斯坦的评论家身份出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摇身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和一名狂热的反对阿拉伯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很快被右翼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目前他在为马丁·佩雷茨和莫特·朱克曼等人工作）和“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之类团体接纳。他喜欢把自己描述为从事非小说类作品写作的V. S. 奈保

尔，并引述约瑟夫·康拉德的话语，而实际上听起来却像赫利勒·纪伯伦一样矫揉造作。此外，阿贾米喜欢说些动人的俏皮话，非常适合电视节目而不适合反思性的思维。作为两三部孤陋寡闻并且充满偏见的书籍的作者，他变得很有影响，因为身为一名“本土消息线人”，他可以在把阿拉伯人降格为其世界及现状对任何人都无关紧要的类人动物的同时，向电视机前的观众大肆宣泄他的怨恨。10年前，他开始把“我们”看做是公平正义的帝国全体，认为“我们”连同以色列一道，从来不做任何错事。而阿拉伯人却动辄得咎，并因此应当遭受“我们”的蔑视与敌意。

伊拉克引发了他的特殊恨意。他是1991年那场战争的早期提倡者，而且我认为，他故意误导了那些大体上无知无识的美国人战略思想，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力量能将事态纠正过来。迪克·切尼在去年8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曾引用他的话说，伊拉克会在“巴士拉街道”上欢迎“我们”这些解放者，但是，正值我撰写此文之时，巴士拉的战斗却仍在继续。像刘易斯一样，阿贾米已经多年不在阿拉伯世界居住，尽管谣传他接近沙特阿拉伯人并且明智地认为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世界未来统治的楷模。

如果说阿贾米与刘易斯是美国中东计划的领衔知识分子形象的话，那么，当得知五角大楼与白宫那些参与决策的更加平庸、更加低能的雇用文人是如何将这些“思想”编织成一个关于在友好的伊拉克轻易获胜的脚本时，你就只能退避三舍了。美国国务院在一场长期的、打击所谓“阿拉伯主义者（Arabists）”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后，清除了所有的对抗观点，而我们不应忘记，科林·鲍威尔只不过是权力的忠实奴仆而已。这样一来，由于具有潜在的、反以色列的滋事可能，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就成为从军事上和政治上予以终结废止的对象，全然不顾它的历史、它的复杂社会、它的内在动力以

及它的矛盾。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在做本雅明·内塔尼亚胡1996年的竞选顾问时正是这样说的。萨达姆·侯赛因当然是个可怕的暴君，这点没错，但有些事情则似乎不然，比如，认为大多数伊拉克人并没有因美国的制裁而遭受可怕痛苦，而是抱着即将被“解放”的侥幸心理心甘情愿地接受更多的惩罚。在这样的解放之后，是怎样的宽恕？毕竟，看看针对阿富汗的战争吧，那也是以轰炸加花生酱三明治为特点的。不错，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正在以一种很不确定的方式当权，但是，塔利班、巴基斯坦的秘密特工和罂粟地，所有这一切都在卷土重来，军阀们也不例外。无论如何，在伊拉克很难出现一个不同于阿富汗的美丽蓝图。

流亡的伊拉克反对派们始终是一群五花八门的人。它的领导者，艾哈迈德·查拉比（Ahmad Chalabi），是个由于在约旦盗用公款而正在受到通缉的人才，而且在保罗·沃尔福威茨的五角大楼办公室以外没有真正的支持者。他和他的助手（例如，卑鄙十足的卡南·马基亚，此人曾说过：美国对其故土的残忍的高空轰炸是“悦耳的音乐”）外加一些前复兴党成员、什叶派牧师以及其他等人等，也曾向美国政府兜售过一份关于速战速决、军人开小差以及群众夹道欢迎的货物账单，这份账单同样没有任何证据或实际经验的支撑。当然，不能因为这些人想要摆脱萨达姆·侯赛因的世界而指责他们：没有萨达姆，我们都会过得更好。问题一直在于，那些大体上无知而又无拘无束的美国策划者们，会有违民主地向一位原教旨主义的总统以及被灌输大量错误信息的公众强加伪造的事实，硬塞一些意识形态的或者形而上的虚构情节。总之，这个伊拉克最好是被比做月亮，而五角大楼和白宫则如同斯威夫特笔下的拉格多科学院。

在背后支持向伊拉克开战的其他种族主义前提，是诸如重绘中东地图和启动“多米诺骨牌效应”将民主引进此地等废止思考的主



张，以及这样的假设：伊拉克人民构成某种白板，用来铭刻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其他深谋远虑的极右思想家之思想。如我前面一篇文章所述，这些思想曾被阿里埃勒·沙龙于1982年入侵黎巴嫩时初试锋芒，随后，自他两年前就职以来又在巴勒斯坦身上再试锋芒。结果表明，造成了大量破坏，却罕有安全、和平以及臣属式的驯服。不必担心：训练有素的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同杰宁的以色列士兵一道圆满地实施了对平民家园的猛烈突袭。很难相信随着构思拙劣的伊拉克战争的推进情况会与那段血腥的插曲有所不同，但是，随着叙利亚和伊朗等其他国家的介入，摇摇欲坠的政权变得更加不稳，普通阿拉伯人的愤怒情绪沸腾到极限，无法想象伊拉克的胜利会类似于布什及其小圈子所假设的任何一个愚蠢的神话。

然而，真正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占支配地位的美国意识形态仍旧以这样的观点为基础，即认为美国这个强国从根本上是温和的、利他的。这无疑可以解释美国专家和官员在发现伊拉克人竟然胆敢抵抗，或美军士兵一旦被俘便会被置于伊拉克电视屏幕示众时，所表达出的愤怒。这一行为比（a）轰炸市场和整座城市以及（b）展示成排的伊拉克囚犯双膝跪地或脸部朝下、架开四肢躺在沙地上的行径，还要恶劣得多。突然之间，陷入日内瓦协定制裁范围的不是X射线营地（Camp X-Ray，译注：X射线营地是美军在古巴关塔那摩羁押阿富汗恐怖主义嫌疑犯的监狱名称）而是萨达姆，而且，当他的军队隐藏于都市之中时，那就是诡诈欺骗，而来自三万英尺高空的地毯式轰炸则为光明正大之举。

这是现代最愚蠢的、行事最为鲁莽的战争。它全然宣示着帝国的霸道，这种霸道未受教化、俗不可耐，不受能力或经验的约束，不受历史或人类复杂性的阻遏，不因使用野蛮暴力或残酷的电子设备

而悔恨。称之为“基于信仰”就是给信仰一个比它已有的更为恶劣的名声。拉得太长的、易受攻击的补给线，从文墨不通的油腔滑调到盲目的猛攻猛打的转换，谋划不利导致的后勤不足，以及华而不实的自我解释，伴随着上述这一切，美国对伊战争几乎可以从下列场景中得到完美体现：可怜的乔治·W. 布什摸索着继续停留在别人的提示和背熟他们为他准备好的（而他却几乎读不懂的）演讲稿之上，还有拉米·拉姆斯菲尔德用不耐烦的急躁言辞，派遣许多年轻军人要么去送死，要么尽可能多地杀人。这样一场战争最终会带来怎样的胜利，或就此而言，怎样的失败，几乎完全无法想象。但是，可怜的伊拉克平民在被最终“解放”之前还须经受更多的苦难。

《生活报》，2003年4月14日

《伦敦书评》，2003年4月17日

## 43. 美国正在发生什么？

2003年3月19日，即发动对伊战争的这一天，在参议院的议席上，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亦即这个议事厅里最具雄辩力的演说家，发表了一次后来鲜有报道的演讲。他诘问道：“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曾几何时，我们变成了一个对友邦置之不理又横加指责的国家？曾几何时，我们决定采取激进而教条的方式，动用可怕的武力，来破坏国际秩序？当世界的混乱局势迫切需要外交斡旋的时候，我们怎能断然抛弃外交手段？”无人费心劳神来回答他的问题，然而，当目前进驻伊拉克的庞大的美国军事机器开始以美国人的名义，以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及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的名义，不停地朝着其他方向激起事端的时候，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的民主的失败——如果不是民主的腐败的话——而言，这些都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自从乔治·W. 布什于近三年前的选举中最终由最高法院裁决而非通过直接票选上台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究竟产生了什么结果。即使是在“9·11”暴行发生之前，布什政府就已在纵容阿里埃勒·沙龙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殖民化，肆意杀害、扣留和驱逐那里的人民，拆毁他们的住宅，征用他们的土地，通过宵禁和数百项军事封锁将他们监禁起来，并使其生活总体上

变得举步维艰；“9·11”事件之后，沙龙搭上了“反恐战争”的便车，尽管确凿无疑地有几十个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以色列撤离或停止战争犯罪和践踏人权的行为，但它却变本加厉，对毫无抵御能力、至今仍处于长达36年占领之下的平民进行单边劫掠。布什去年6月曾经称沙龙为和平人士，而且继续提供50亿美元津贴，甚至没有做出哪怕丝毫的暗示：由于以色列无法无天的野蛮行径，这笔钱有可能得不到保障。

2001年10月7日，布什发动对阿富汗的入侵。这次入侵以密集的高空轰炸开场（逐渐地，一个“反恐的”军事战术，在其效果和结构上变得与普通寻常的恐怖主义极为相似），而到了12月，就已在被毁坏的国家设置安插了一个委托政权。这个政权除了掌管喀布尔市内的几个街道之外，并无有效权力。美国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重建努力，而这个国家似乎也已回到从前的落魄状态，尽管塔利班特征已十分明显地卷土重来，而与之相伴的是日趋繁荣的以毒品为基础的经济。

自2002年夏季以来，布什政府已向伊拉克专制政府发起全线进攻。由于试图迫使安理会驯服未果，它便与英国一道对该国开战。我要说，从去年11月起，在那些充斥着过多的退役将军、前情报人员、偶尔也有一些最近来自华盛顿右翼智囊团的恐怖主义及安全问题专家的主流媒体之上，已见不到异议。任何大声疾呼、反对开战以及实际上显得已在反战的人，都被那些失败的学界人士贴上了反美的标签，他们在网上列出那些不听命令的“敌对”学者的名单。那些努力想说些什么的少数令人瞩目的公众人物的电子邮件遭到湮没，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的思想遭到那些自封为这场美国战争的哨兵的过分投入的新闻读者的废弃和嘲弄。

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大量资料，既有未经加工的，也有

精心制作的，将萨达姆·侯赛因的暴政不仅等同于邪恶，而且还等同于任何已知的罪行：其中有不少在一定程度上确是事实，但是，它却避而不谈美国和欧洲在助长此人发迹、为其毁灭性战争添油助燃以及维护其权力等方面所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位身份不低于恶名昭彰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显要人物曾于 80 年代初拜访萨达姆，以此向他保证美国赞成他对伊朗发动灾难性的战争。那些向伊拉克提供我们所能想象的作战武器所需之核原料、化学原料和生物原料的美国各大公司名单，完全从公开记录中一笔勾销了。

但所有这一切，乃至更多事实，都被政府及媒体在编造进一步摧毁伊拉克的理由的过程中故意遮掩过去，这件事在过去一个月以来一直在发生。对这个国家及其趾高气扬的领导人的妖魔化，已将其变成一个令人生畏的近乎形而上威胁的幻象，然而——需要重申的是——它那士气低落、基本上毫无用处的武装力量，根本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伊拉克真正难以对付的，是它那丰富多彩的文化、复杂多样的社会、长期受难的人民：而这些都被隐藏起来，以便将这个国家捣个粉碎，仿佛它不过是个盗贼和凶犯的巢穴。萨达姆被指控为窝藏着对七千英里以外的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指控不是没有证据，就是凭借欺骗性的信息。他被等同于整个伊拉克，一片“位于遥远的某处”的不毛之地（直到今天，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伊拉克在哪里，它包含哪些历史，以及除了萨达姆以外那里还有别的什么）。他注定成为美国非法宣泄武力的对象，而美国凭借这一方式，在如同《白鲸》中的艾哈伯船长般地寻求重塑现实、寻求向每个人传授民主的过程中，来逼迫整个世界俯首就范。在国内，“爱国者及反恐法案（Patriot and Anti-Terrorism Acts）”赋予美国政府不体面地控制公民生活的权力。沉默得令人灰心的人们大多数将那些关于即将到来的威胁的废话与欺骗当做事实接受，导致的结

果是，防范性的羁押扣留、非法窃听以及警戒森严的公众空间造成的威胁感，使得甚至连大学这样的地方，对于任何试图独立思考和言说的人来说，也已变成冷酷无情的场所。

美英干涉伊拉克所产生的骇人后果，不过是初露端倪。首先，对其现代基础设施进行冷酷无情的蓄意破坏，接着，对世界上最丰富灿烂的文明之一进行劫掠，予以焚毁，最后到来的是那些全然玩世不恭的美国企图，即：让一伙五花八门的“流亡者”，外加各大公司，来参与所谓国家重建，不仅将其石油据为己有，而且还要掌握其现代命运。在面对终将由占领国负责的掠夺与焚烧的可怕场景时，拉姆斯菲尔德做出的回应是，设法将自己归类到甚至超过旭烈兀（Hulagu）这位曾洗劫巴格达、摧毁其图书馆、将馆内藏书扔进底格里斯河的十三世纪蒙古统治者的行列。“自由就是杂乱无章的”，他曾在某一场合这样说，而在另一场合他又说“不必大惊小怪”，毫无悔恨或悲伤的痕迹。

为了完成该项工作而被挑选出来的杰伊·加纳将军（Jay Garner），仿佛是从电视连续剧《达拉斯》（*Dallas*）里直接走出来的人物。备受五角大楼青睐的流亡者，例如艾哈迈德·查拉比，已公开暗示打算与以色列签署一份和平条约，而这很难说是伊拉克人的想法。贝克特尔公司（Bechtel）已得到一份庞大的承包契约，这也是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完成的。整个交易不大具有以色列1982年入侵黎巴嫩时的风格。

这几乎是民主政治的彻底失败——是我们美国人的失败，而非伊拉克的失败。据称有70%的美国人支持所有这一切，但是没有什么比随意找一些美国人询问他们是否“在战争期间支持我们的总统和军队”这样的民意调查更具操纵性和欺骗性。正如参议员伯德（Byrd）在演讲中所言，“匆促冒进、不计风险的意识普遍存在，而且有太多

疑问尚待回答……一块幕布便已笼罩在参议大厅之上。我们回避了站在全体美国人立场上对某一主题进行辩论的神圣职责，甚至是正值我们的许多儿女在伊拉克忠实虔诚地尽职尽责的时候。”既然汤米·富兰克斯将军这位中西部农场伙计及其扈从耀武扬威地团坐在巴格达的萨达姆总统府的一张桌子边，那么还有谁会前来发问？

我深信，几乎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一场非法操纵的，既没有必要也不受欢迎的战争。孵化出沃尔福威茨、珀尔、阿布拉姆斯（Abrams）、费斯以及其他人的那些极其反动的华盛顿“研究”机构，提供了一个很不健康的知性环境与道德氛围。政策论文不经过真正的同行专家评阅就发行出去，并被一个似乎有必要为其可疑的、基本上不合法的全球称霸政策寻求理性（甚至道德）辩护的政府所采纳。军事上先发制人的教义便由此而来，既没有经过这个国家的人民、也没有经过他们处于半醒半睡状态的代表们投票表决。公民们怎能抵抗得了像哈里伯顿（Halliburton）、波音（Boeing）和洛克希德（Lockheed）这样一些大公司对政府的哄骗诱惑？至于替有史以来获得最为慷慨的资金捐赠的军事机构来策划和制定战略方针，亦即一个完全可能把我们拖入无休止冲突之中的方针，这一任务则留给各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施压团体来完成，例如像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这样一些与其圣经一道被派送到困穷潦倒的伊拉克人身上的原教旨主义基督教领袖、财力雄厚的私人基金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之类的游说团以及与之相关的智囊团和研究中心。

罪大恶极之事似乎便是，诸如“民主”与“自由”这样一些美好而有用的词汇已遭到劫持，被强行征用，成为掠夺、侵占领土和清算夙怨的面具。美国关于阿拉伯世界的规划与以色列的一模一样。伊拉克，连同叙利亚一道，在理论上代表着对以色列的唯一严重的长期军事威胁，因此必须使它长达几十年都不能运转。不请自到地去解

放一个国家，对其推行民主化，而且在此过程中进行军事占领，同时又非常不幸地未能维护其公共治安，这意味着什么？对于萨达姆懦弱无能的消失，大多数伊拉克人持有一种怨恨与释然参半的混合感情，这并未博得美国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多少理解或同情。在巴格达燃烧期间，这些阿拉伯国家不过是袖手旁观，无谓地争执些程序方面的次要问题。在你轰炸和隔离“当地人民”长达13年之后，竟然设想他们还会夹道欢迎你的到来，这是何等滑稽的战略计划。那种相信美国仁慈的荒谬绝伦的心态，连同美国居高临下地裁定是非的清教主义，已渗透到媒体报道的最细微层面。在一篇叙述一位利用自家住宅经营一所文化中心——该中心在美军袭击时遭到毁坏——的巴格达七旬寡妇现今如何心怀怨愤的报道中，《纽约时报》记者德克斯特·菲尔金斯（Dexter Filkins）含蓄地谴责她“在萨达姆统治下过着舒适的生活”，然后又十分虔诚地驳斥她对美国人的声讨，并说道，“而且这样的声讨竟然出自一名伦敦大学毕业生之口”。

本不存在的武器、并未出现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未发射的威慑敌胆的防御炮火，除了上述欺诈之外，如果有一天萨达姆突然消失，原因是在莫斯科已达成一笔交易，允许他带着家人和金钱离开，并以此作为他抛弃这个国家的交换条件的话，我将不会感到惊讶。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在南方的形势颇为严峻，而且布什也不可能再在巴格达再做同样的冒险。4月6日，一支俄国护航队离开巴格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于4月7日出现在俄罗斯。两天后，即4月9日，巴格达沦陷。你可以独自得出结论，然而，难道没有这样的可能，即作为与拉姆斯菲尔德所提及的共和国卫队协商的结果，萨达姆已向美国人及其英国盟友拱手让出一切，以此为代价赎回他自己，那样美英两国就可以宣布自己已取得辉煌胜利呢？

美国人受到了欺骗，伊拉克人经历了无法想象的苦难，而布什



俨然像个道义上的牛仔警长，刚刚率领他那正义之师胜利地向一个邪恶的敌人摊牌。在对数百万人民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上，宪法原则遭到践踏，选民受到肆无忌惮的欺骗。我们责无旁贷，务必要使民主回到身边。人们已经受够了那些摆弄空谈、魔法和花言巧语的说客。

《金字塔报》，2003年4月24—30日

《生活报》，2003年4月28日

《观察家报》，2003年4月20日

## 44. 阿拉伯状况

我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今天许多阿拉伯人感到伊拉克过去两个月以来一直在发生的事情不啻为一场灾难。不错，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可鄙的，应予推翻。许多人对该政权如此出格的残暴与专横以及伊拉克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如此可怕而感到无比愤怒，这也是事实。似乎确凿无疑的是，有太多的政府和个人都曾纵容萨达姆·侯赛因当权，装做没看见而一切如常。然而，许可美国轰炸这个国家并摧毁其政府的唯一因素，既不是道德权利也不是理性论据，而是纯粹的武力。在对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统治下的伊拉克及萨达姆本人给予多年支持之后，美英两国妄自否认曾是萨达姆专政之同谋，然后表示他们正在将伊拉克从其可恨的暴政之中解救出来。今天，在英美对于作为伊拉克之根本要素的该国人民与该国文明发动非法战争期间以及战后阶段，这个国家似乎正在出现的状况表明，阿拉伯人从整体上正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应该记起，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与争议，阿拉伯人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而不是随意聚拢起来的一些被动接受外界干涉和统治的国家。从16世纪土耳其帝国对阿拉伯人的统治开始，直至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帝国延续谱系。继土耳其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来了英国人和法国人，此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又来了美国和以色列。最近，在美国及以色列的东方学中存在一股最具潜在影响的思潮，它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的美国和以色列政策中都表现得颇为明显，那就是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怀有一种恶毒的、极其根深蒂固的敌意，以及尽一切可能对其予以反对和抵制的政治意志。广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尽管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着多样性与多元性，那些在语言与文化方面属于阿拉伯或穆斯林的人们〔即艾伯特·胡拉尼（Albert Hourani）在近作中之所谓“说阿拉伯语的民族（the Arab-speaking peoples）”〕构成了一个民族，而不只是散布在北非与伊朗西部边界之间的一些国家的集合。任何对此前提的独立表述都受到公开抨击，例如在1956年苏伊士战争、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以色列的占领与驱逐战争以及对抗伊拉克的战争——一场对外宣称以推翻某个特定政权为目的，而其真正意图在于毁灭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之中，都概莫能外。而且，当初法国人、英国人、以色列人和美国人发动对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战役，其初衷是为了推翻一个雄心勃勃地公开表示要将阿拉伯国家统一成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势力，与此相似，当今美国的目标是要重绘阿拉伯世界的地图，以适应美国人而非阿拉伯人的利益需要。基于阿拉伯的分裂、集体的无为以及军事与经济上的软弱，美国政策逐渐壮大起来。

有人倘若认为单个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及教条式的分割孤立状态（无论这个国家是埃及、叙利亚、科威特还是约旦）较之阿拉伯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的某种合作方案乃是更为可取之事和更加有用的政治现实，那必定是愚不可及的。我当然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彻底整合，但任何形式的有益合作与规划，都远胜于那些损害我们民族生活形象的可耻的首脑会议，例如，在伊拉克危机时期的峰

会。每个阿拉伯人与每个外国人都在发问：何以阿拉伯人从来不凝聚他们的资源，为那些他们至少正式宣布要予以支持的事业而战？以及就巴勒斯坦人而言，为他们的民族积极热忱地信仰的事业而战？

我不会浪费时间去证明为促进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做的每件事都能替它的滥用、它的眼光短浅、它的浪费、镇压和愚蠢行为开脱。它们确实履历不佳。但是我要无条件地阐明，自 20 世纪初以来，阿拉伯各国从未能够取得整体的或部分的集体独立，正是由于外部势力对这些国家在战略上与文化上的重要性所作的设计策划使然。今天，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自由处置它的资源，或坚持代表本国利益的立场，尤其是当那些利益似乎威胁到美国政策之时。美国在其主宰世界的五十多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一直基于两个原则来实施其中东政策，而且仅限于这两个原则：以色列的防卫和阿拉伯石油的自由流动，两者都包含着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直接反对。在所有重要方面，罕有例外，美国政策一直都对阿拉伯人民的热望表现出轻蔑与公开的敌意，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自纳赛尔逝世以来，阿拉伯统治者凡事有求必应，其中反抗者凤毛麟角。

在他们中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极大压力期间（例如，1982 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针对伊拉克的意在削弱其民族及整个国家的制裁、对利比亚和苏丹的轰炸、对叙利亚的威胁、对沙特阿拉伯的施压等），阿拉伯国家的集体软弱简直令人震惊。无论是它们巨大的集体经济力量，还是人民的意志，都从未激起阿拉伯国家做出丝毫的反抗表示。分而治之的帝国政策已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每个政府似乎都害怕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遭到破坏的可能性。对此的考虑先于对任何突发事件的考虑，无论这个事件多么紧急。一些国家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另一些则仰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然而，他们全都决定对彼此的信赖不能超过对本国人民福利的关心（也就是说，他们几乎毫

不关心)，宁愿接受美国人的傲慢与蔑视，而随着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狂妄自大与日俱增，它对阿拉伯国家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糟。的确，与抵抗来自外部的真正侵略者相比，阿拉伯国家显然更乐于互相争斗。

在伊拉克遭到入侵之后，如今的结果是：一个意志极为消沉的、被压垮和击倒了的阿拉伯民族，只能默许美国为了满足美国的、显然也是以色列的利益而公开宣布的表示要尽一切努力来重绘中东地图的计划，除此之外他们完全无所作为。甚至对于这个格外宏伟的计划，阿拉伯各国也至今尚未做出哪怕最含糊的集体反响。随着布什、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等人从威胁到策划、造访、侮辱、轰炸及发出单边声明的急剧变化，他们似乎一直在徘徊观望，等待着某种新的情况来临。令整件事情尤其难堪的是，尽管阿拉伯人已经完全接受了美国（或四方集团）提出的、似乎是从乔治·W. 布什的白日梦中出现的路线图，以色列人却仍旧冷淡地予以拒绝。看到阿布·马赞这样的二号领导人——他一直是阿拉法特的忠实属下——拥抱鲍威尔和美国人，而此时就连黄口小儿都很清楚，该路线图的用意不过是，其一，激起一场巴勒斯坦内战，其二，在得不到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向巴勒斯坦人提供符合以色列及美国要求的“改革”，此情此际，巴勒斯坦人的感受又将如何？我们还要陷入多深？

至于美国在伊拉克的计划，现在十分清楚，将要发生的完全是旧式的殖民占领，颇似以色列 1967 以来的占领。将美国式民主带给伊拉克，从根本上意味着使这个国家与美国政策保持一致，也就是说，与以色列签订一份和平条约，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的石油市场，保持最低限度的国内秩序，从而既不会出现真正的反对派，也没有真正的制度建设。也许它甚至想把伊拉克变成内战的黎巴嫩。对此我不大确定。但是，不妨举一个正在进行之中的类似计划的小例

子。美国媒体最近公布，纽约大学一位 32 岁的法学助理教授诺亚·费尔德曼（Noah Feldman）将负责制定一部新的伊拉克宪法。所有关于这项重大任命的媒体报道都提及费尔德曼是伊斯兰法律方面出类拔萃的专家，自 15 岁起就开始学习阿拉伯语，而且长大后成为一名正统犹太教徒。但是他从来没有在阿拉伯世界有过任何法律实践，从未到过伊拉克，而且对战后伊拉克问题似乎并无真正的实践背景。好一个不加掩饰的傲慢，不只是对伊拉克本身的傲慢，而且也是对众多的阿拉伯及穆斯林法律界人士的蔑视，而这些法律人士本可圆满完成服务于伊拉克未来的工作。然而非也，美国要让一名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来做此事，以便能够夸口说，“我们已经赋予伊拉克新的民主”。这种蔑视是如此之厚，经得住刀砍斧劈。

阿拉伯人面对这一切所表现出的无能实在令人沮丧，而且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努力构思出一个集体对策。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从外部对局势进行反思的人而言，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危机时刻，在一场需要被视为对民族集体的威胁面前，没有任何统治者呼吁本国民众给予支持。美国的军事策划者们毫不掩饰这一事实，即他们策划的是对阿拉伯世界的根本改变，一种他们可以通过武力强行实施的变化，因为很少有什么力量反对他们。此外，这一企图背后的念头，似乎不亚于一劳永逸地摧毁阿拉伯人潜在的统一，并且不可挽回地从根基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和愿望。

针对如此宣示武力的行为，我本可认为阿拉伯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空前的联盟将成为唯一可能的威慑手段。但是，很显然，那需要每一阿拉伯政府承诺向本国人民开放社会，也就是说，要把他们吸纳进来，取缔所有镇压性的安全措施，以便有组织地抵抗新的帝国主义。一个被迫陷入战争的民族，或一个被迫缄口和受到镇压的民族，将永远无法赢得这样的机会。我们必须拥有的，是一个最终从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自我施加的围困状态之中解放出来的阿拉伯社会。为什么不在捍卫自由及独立自主的行动中迎接民主呢？为什么不我们在对抗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之中，需要每个愿意被动员起来的公民参与呢？我们需要每一位知识分子和每一股政治力量与我们团结起来，共同抵制未经我们同意就重新设计我们生活的帝国方案。为什么抵抗一定要留给极端主义和孤注一掷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来完成呢？

作为题外话，我应该在这里提一下，当我读到2002年《联合国关于阿拉伯世界的人类发展报告》（**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n the Arab world**）时，其中对于帝国主义干涉阿拉伯世界的认识之少，以及这份报告的影响之深、之久，令我感到惊讶。当然，我既不认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外部，也不想说它们都由我们自己造成。历史背景和政治分裂问题都起着重要作用，却几乎没有受到这份报告的关注。缺乏民主，部分地是由一边的西方强权与另一边的少数统治政权或政党之间的结盟所致，并非因为阿拉伯人对民主不感兴趣，而是由于民主被政治舞台上的少数演员视为威胁。此外，为什么把采用美国的民主公式（通常是关于自由市场的委婉说法，而很少关注人权和公共设施）作为唯一选择？这个论题需要诉诸更多辩论，在此由于时间所限，请让我重返主题。

不妨想想，今天，在美以的进攻之下，要想使巴勒斯坦立场变得更为有效，就应该展示出同舟共济的团结，而不是为了在访问科林·鲍威尔的代表团中求得一席职位而有失体面地你争我抢。多年以来，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巴勒斯坦领导人不能形成一个共同的统一战略来反对占领，来避免被引向一个又一个的米契尔计划、特内特（**Tenet**）计划或四方集团计划等歧途。为什么不对所有巴勒斯坦人说，我们共同面临着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对我们的土地和生命的企

图是众所周知的，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与之并肩战斗？到处存在而非仅限于巴勒斯坦一地的根源性的问题，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基本分裂。它是一个受到曲解的帝国主义派生物，即对民主参政的根本恐惧，仿佛太多的自由就可能会使得那些殖民统治的精英失去帝国当局的青睐。其结果自然是，不仅在共同斗争中缺乏对每个人进行真正的动员，而且四分五裂的状况和琐碎无聊的派系斗争还会永存不变。根据目前情况，当今世界有太多置身局外、袖手旁观的阿拉伯公民。

不管是否愿意，今天的阿拉伯人正面临一个帝国强权（即美国）对其未来前途发起的大举进攻，而这一攻势与以色列遥相呼应，以便平定、征服、并且最终使我们成为一群互相敌对交战的册封领地，其效忠对象首先不是自己的人民，而是那个超级大国（及其地方代理）。若不理解这将是主宰我们地区未来几十年的冲突，那就是甘愿自欺。现在需要的是打破束缚阿拉伯社会的枷锁，而这道枷锁目前已将阿拉伯社会里愤愤不平的民众、缺乏安全感的领导人和疏离异化的知识分子纠葛成结，难分难解。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危机，因此就要求用史无前例的方法与之对抗。那么，首先要了解问题的范围，继而克服那些令我们陷入绝望无助地怒火中烧和做出无关紧要的边缘反应的因素，亦即一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心甘情愿接受的情况。取代这种令人厌恶的状况的另一种选择，定会带来更多希望。

《金字塔报》，2003年5月22—28日

《生活报》，2003年5月26日



## 45. 路线图考古

5月初，在出访以色列及被占领土期间，科林·鲍威尔与巴勒斯坦新任总理穆罕默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举行了会晤，随后又分别会见一些民间社会活动家，包括汉娜·阿希拉维和穆斯塔法·巴尔古提。据巴尔古提描述，鲍威尔看到电脑图谱显示的致使巴勒斯坦人民生活陷入巨大困境、前途一片黯淡的定居点、八米高的围墙和数十个以军检查站时，流露出意外与轻微的惊愕。鲍威尔对巴勒斯坦现实的看法，至少可以说是有缺陷的，尽管他身居赫赫高位，但是，他的确索要了一些材料带回去，更重要的是，他再次向巴勒斯坦人保证，布什目前在伊拉克同样正在努力实施路线图计划。5月底，布什在接受阿拉伯媒体采访期间也表达了几乎相同的观点，虽然像往常一样，他只做泛泛强调，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在约旦，他会晤了巴勒斯坦及以色列的领导人，在此之前，他还会见了阿拉伯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当然，其中不包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尔-阿萨德。如今，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被归功于美国的从中斡旋。阿里埃勒·沙龙已经接受了路线图（他做了相当大的保留，使这种接受大打折扣），这仿佛预示着前途一片光明，一个切实可行的巴勒斯坦国可谓建国在望。

布什的设想（这个词给原本实际的、决定性的、分三阶段实施

的和平计划打上了一个怪异的、梦幻般的烙印)被指望通过重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消除一切针对以色列的暴力与煽动,扶植一个符合以色列以及制订这项计划的所谓四方集团的要求的政府,来予以实现。以色列在这项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改善人道主义状况、减轻限制、解除宵禁,虽未规定具体的时间、地点。截至2003年6月前完成的第一阶段计划,被指望做到拆除最后60个山顶定居点[即2001年3月以来建立的所谓“非法前哨站”(illegal outposts)],却只字未提清除其他定居点,而后者导致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有20万定居者,更不用说在被并吞的东耶路撒冷地区的另外20万定居者了。第二阶段被描述为从2003年6月到12月间的过渡阶段,怪异的是,其重点在于“创立一个拥有临时边境和主权属性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选择”——对此,没有任何具体说明——最终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来予以批准,然后再“创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仍然是拥有“临时边境”。第三阶段将彻底结束冲突,仍是通过国际会议而实现,其任务是解决那些最为棘手的问题:难民、定居点、耶路撒冷以及边境问题。在整个过程中,以色列担任的角色只是合作而已;真正的重担都落在巴勒斯坦人身上,他们必须源源不断地迅速供应商品,而与此同时军事占领仍然或多或少地继续存在,尽管2002年春季对主要被入侵区域的军事占领有所缓和。没有设想任何监督机制,而且该计划的具有误导性的对称结构使得一旦发生状况,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将掌控未来局势。至于巴勒斯坦的人权,在目前,与其说是被忽略,不如说是被压制,而且没有任何具体的纠正措施被写入计划:显然,一切全凭以色列来决定是否一如既往地继续践踏人权。

所有的一般时事评论员都一致认为:仅此一次,布什在为中东问题的解决提供真正的希望。白宫蓄意透露的信息暗示,如果沙龙的态度过于强硬,美国将考虑对以色列进行一系列制裁。但这种暗示很

快就遭到否认，接着便销声匿迹。一个正在呈现的媒体舆论，传达出政府文件的内容——其中许多内容出自较早的和平计划——而这个文件是布什在取得伊拉克胜利后又重拾信心的结果。在大多数关于巴以冲突的讨论中，构成话语交流的是一些受到操控的陈腔滥调和牵强附会的推测，而非对于强权及活生生的历史的真实反映。怀疑者和批评者被扣上反美的帽子而弃置一旁饱受冷落，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有组织的犹太领导人却公开指责这一路线图要求以色列做出太多让步。但是权威媒体不断提醒我们说，沙龙已经谈及“占领”问题（事实上他至今从未承认这一点），还说他其实已宣布即将结束以色列对三百五十多万巴勒斯坦人之统治的意图。然而，他甚至是否意识到他究竟打算结束什么？《国土报》评论员吉登·列维于2003年6月1日写道：同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沙龙对“被围困长达数年之久的社区的宵禁生活”一无所知。他对检查站的侮辱了解多少？对被迫行走于砾石与泥土路上的人们，以及冒生命危险争取把临产妇女送到医院的人们，究竟了解多少？对处于饿死边缘的生活了解多少？对被毁的家园了解多少？对在深更半夜亲眼目睹父母遭到殴打和羞辱的那些孩子又了解多少？

路线图中另一个令人心寒齿冷的忽略对象，是以色列正在西岸兴建的巨大“隔离墙”：这道由北至南延绵347公里的混凝土墙，已经竖起了120公里。墙体高25英尺，厚10英尺；每公里耗资160万美元。这座墙并没有简单地基于1967年的边境协议把以色列同一般认定的巴勒斯坦国分开：事实上，它又将大片新的巴勒斯坦土地据为己有，有时连续延伸长达五六公里。隔离墙周围设有壕沟、电网及护城河；每隔一定距离就设一个警戒哨塔。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近十年之后，这座可怕的种族主义隔离墙正在悄然兴建，而大多数以色列人以及无论喜欢与否都将为此支付大部分费用的美国盟友们，

却并未目睹。卡尔齐亚小镇上的四万巴勒斯坦居民住在隔离墙的一侧，而他们进行耕种并且实际上赖以生存的土地却位于隔离墙另一侧。据估计，当隔离墙建成时——很可能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程序问题要连续争论好几个月——几乎三十万名巴勒斯坦人将与他们的土地彼此分开。路线图对所有这一切保持沉默，如同它对沙龙最近批准在西岸地区的东边建造一座隔离墙所持的态度一样，而这座隔离墙一旦建成，将把符合布什梦想的巴勒斯坦国领土的面积缩小到40%。这正是沙龙一直以来的如意算盘。

使得以色列在对其做过重大改动之后接受路线图计划，同时使美国为此做出明显承诺的，是一个未阐明的前提：巴勒斯坦的抵抗取得了相对的成功。这是确凿事实，无论人们是否悲叹它所采取的某些方式，它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它所导致的面对以色列——美国压倒性的力量优势却并未彻底放弃的下一代巴勒斯坦人将来还要做出的重大牺牲。人们已经为路线图计划的产生给出了的各种各样的理由：有56%的以色列人支持它，沙龙最终屈服于国际现实，布什需要一个阿以和解来掩护他在其他地区的军事冒险，巴勒斯坦人最终醒悟并推出了阿布·马赞（这可以说是阿巴斯更为人们熟知的化名）这样的人物，凡此种种。虽然其中有些是真实的，但我仍认为，如果没有顽强的巴勒斯坦人拒不接受他们是“一个被挫败的民族”（如同以色列参谋长最近评价他们那样）的结论，就绝不会有和平计划。然而，倘若有人认为路线图真的能提供任何解决方案或认为它能解决基本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像大多数盛行的和平言论一样，它将克制、放弃、牺牲等要求毫不含糊地强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从而否定了复杂厚重并且极其严峻的巴勒斯坦历史。通读这份路线图，有如面对一份全然遗忘时间地点的无法定位的文件。

换言之，与其说路线图是个和平计划，不如说它是个平定计

划：意在将巴勒斯坦作为一个问题来予以了结。因此，该文件在其刻板文体中频繁出现“行为表现”这一术语——换言之，即要求巴勒斯坦人应该如何循规蹈矩，并且几乎是在社交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计划中提出的没有暴力、没有抗议、更多民主、更出色的领袖与机构，所有这一切要求都基于一个概念：背后潜在的问题是巴勒斯坦抵抗行为的残暴，而不是导致这些暴行的军事占领。对于以色列，却不存在类似的要求，而仅只要求我早先提到的那一小部分定居点，亦即以“非法前哨站”（这是一个全新的分类，暗示以色列向巴勒斯坦土地的有些移民行为是合法的）而闻名的那部分，必须被放弃。而且，无疑，大部分定居点只是被“冻结”，但肯定不被迁移或拆除。只字不提自1948年以及后来的1967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及美国的支配下忍受的种种屈辱。绝口不谈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倒退，正如美国研究员莎拉·罗伊在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中所述。<sup>[1]</sup>房屋的破坏、树木的连根砍伐、五千名甚至更多的囚犯、定点暗杀政策、1993年以来的封锁、基础设施的大肆毁坏、令人难以置信的死亡与伤残数字——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问题，都予以省略，只字不提。

美国和以色列小组的凶猛进攻与顽固的单边主义是众所周知的。巴勒斯坦小组则几乎无法激起任何信心，其实它不过是由正在老化的阿拉法特的同侪们经过回收重组构成的。的确，尽管鲍威尔及其助理曾故意设法避免拜访亚西尔·阿拉法特，但路线图似乎令阿拉法特重获生机。尽管以色列采取愚蠢的政策，试图凭借将他囚禁在炸得稀烂的住所里来对他进行羞辱，但他仍控制着全局。他依旧是巴勒斯

---

[1] 《学术与政治：以色列的占领、巴勒斯坦民族及和平的失败》（*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The Israeli Occupation, the Palestinians, and the Failure of Peace*），《莎拉·罗伊选集》[*Selected Works of Sara Roy* (London: Pluto Press)]，即出。

坦选举出来的总统，他依旧掌握着巴勒斯坦的钱袋子（虽然这个钱袋子一点也不饱满）。至于他的地位，在目前的“改革”小组（无外乎对旧有小组成员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并增加两三名新的主要成员而成）中，就个人魅力和权力而言，无人可与这位老人媲美。

先从阿布·马赞说起。1977年3月，我头一回参加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于开罗举行的会议时初次见到他。他以在卡塔尔担任中学教师时锤炼出来的说教风格，发表了迄今为止最长的演讲，向到会的巴勒斯坦国会议员们解释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不同政见之间有何差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介入行动，因为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当时没有真正的概念，不知道以色列人不仅包括令每个阿拉伯人憎恶的原教旨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且还包括各种各样反战人士与积极分子。回想起来，阿布·马赞的演讲发动了巴解组织在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开展的集会运动，其中大部分是秘密进行的。双方在欧洲就和平问题展开了长期对话，在他们各自的社会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拥有了一批使奥斯陆协议成为可能的固定支持者。

然而，无人怀疑是阿拉法特授权阿布·马赞进行演讲并由此推动后来的运动，而这场运动使得像伊萨姆·塞尔塔维（Issam Sartawi）和萨义德·哈马米（Said Hammami）这样的勇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当巴勒斯坦方面的参与者从巴勒斯坦的政治中心（亦即法塔赫）前往现身时，以色列一方却不过是一小群被边缘化的、受到责骂的和平支持者，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勇气可嘉。巴解组织于1971—1982年间在贝鲁特开展活动时，阿布·马赞被安排在大马士革工作，但后来的十年左右里，他加入到在突尼斯流亡的阿拉法特及其人员行列。在那里我见过他几次，他那井井有条的办公室，他那从容安详的官僚举止，以及他对于欧洲和美国作为巴勒斯坦人用来促进与以色列之间和平的大有可为的舞台而表现出的明显兴趣，都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91年马德里会议之后，据说他把欧洲的巴解组织成员及无党派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分成若干小组，在1992年和1993年即将召开的奥斯陆秘密会议到来之前，就水源、难民、人口统计及边境等方面预先准备谈判材料，尽管据我所知这些材料一份也没用上，这些巴勒斯坦专家一个也没有直接参与谈判，而且这些研究结果中没有一项对最终形成的文件产生影响。

在奥斯陆，以色列人派出大批专家，这些专家装备着地图、文件、统计数据以及至少17份事先拟定的巴勒斯坦人最终可能会签署的草案，而巴勒斯坦人则很不幸地将其谈判人员限定于三位截然不同的巴解组织成员，其中无人懂得英语或具有任何国际谈判（或任何其他性质谈判）的背景。阿拉法特的想法，似乎是要派出一支主要由他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小组，尤其是当他离开贝鲁特并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做出支持伊拉克这一灾难性的决定之后。如果他还心存其他目的，那么他并未有效地做好准备，正如他的一贯风格。在阿布·马赞的回忆录<sup>[1]</sup>及其他有关奥斯陆会谈的轶事报道中，阿拉法特的属下被誉为这一协定的“设计师”，尽管他并未离开突尼斯半步；阿布·马赞甚至说，在华盛顿典礼（他当时站在阿拉法特、拉宾、佩雷斯和克林顿身旁）之后，他用了一年时间才让阿拉法特相信他并没有从奥斯陆谈判中赢得一个国家！然而大多数有关和谈的报道都强调了阿拉法特一直在进行所有的幕后操纵这一事实。因此，奥斯陆谈判使巴勒斯坦的整个局面变得越发糟糕，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一位前以

---

[1] 《透过秘密渠道：通往奥斯陆之路：巴解组织高级领导人阿布·马赞关于与以色列谈判的内情报道》（*Through Secret Channels: The Road to Oslo: Senior PLO Leader Abu Mazen's Revealing Story of the Negotiations with Israel*）（Reading, England: Garnet, 1995）。另见阿萨德·阿布—哈利尔（As'ad Abu-Khalil）在《巴勒斯坦研究杂志》（*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上发表的书评（1996年夏），103—104页。

色列游说团成员丹尼斯·罗斯率领的美国谈判小组——如今他又重返游说团老本行——照例支持以色列立场，即经过整整10年谈判之后，以色列也只是在对巴方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同意将18%的被占领土归还给巴勒斯坦，仍由以色列防国防军留下来负责安全、边境和水源。这样一来，定居点数量翻倍以上地增长，就再自然不过了。

自巴解组织于1994年回到被占领土以来，阿布·马赞一直是二号人物，通常以他对以色列的“弹性政策”、辅佐阿拉法特以及全然缺乏任何有组织的政治营垒而广为人知，尽管他是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资深成员和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据我所知，他从未在选举中胜出过，当然也没被选进过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解组织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绝非透明，根本无从了解其决策方式，或者钱是怎么花的，花在何处，以及除阿拉法特之外谁还拥有发言权。然而，大家都一致承认，阿拉法特，一个事无巨细无所不揽的魔鬼式管理者和控制狂，仍旧是决定每项重大路线方针的核心人物。这可以解释阿布·马赞被拔高到改革总理的地位这件令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如此欣喜之事，何以在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看来却是个笑话，无异于这位老朽耍弄新伎俩以控制权力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阿布·马赞枯燥乏味、轻度腐败，而且除了试图取悦白人之外，没有任何属于他自己的明确思想。

像阿拉法特一样，阿布·马赞除了海湾地区、叙利亚、黎巴嫩、突尼斯以及当前所在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之外，从未在其他地方生活过；除了阿拉伯语之外，他不会讲任何其他语言，而且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演说家或公众人物。相形之下，另一位被以色列——美国寄予厚望、隆重推出的人物穆罕默德·达赫兰，一位来自加沙的新任安全部队首脑，则更年轻、更聪明，而且颇为冷酷无情。在他管理阿拉法特的十四五五个安全组织之一的八年期间，加沙地区被人们



称为达赫兰尼斯坦（Dahlanistan）。他于去年辞职，不过是为了被欧洲人、美国人和以色列人重新招募，担当“联合安全部队首脑”一职，尽管他理所当然一直是阿拉法特的手下。现在，他被指望前去镇压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这是以色列反复重申的一个要求，而在这个要求的背后，以色列军方隐约有希望发生类似一场巴勒斯坦内战那样的事件。

无论如何，有一点似乎都是一目了然的，即不管阿布·马赞的“行为表现”多么殷勤，多么有弹性，他都将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第一，当然是阿拉法特本人，他仍然控制着法塔赫，从理论上讲，该组织也是阿布·马赞的权力基地。第二，是沙龙（他大概自始至终都会有美国在背后撑腰）。在《国土报》5月27日刊登的沙龙关于路线图的一连14条“意见”表明，他对任何可能被解释为以方弹性之事，都限制得非常狭窄。第三，是布什及其扈从；根据他们对战后阿富汗及伊拉克的处理方式来判断，他们既无愿望也无能力着手进行国家建设。布什在南部的右翼基督教营垒已在大肆叫嚷，抗议对以色列施压，而且，颇具影响力的美国亲以色列游说团，凭借其温顺的附属物（即被以色列人占领的美国国会），已经采取行动来反对一切对以色列实行强制措施暗示，尽管既然最后阶段已经开始，这种强制将变得至关重要。

我这样说似乎有些堂吉珂德式的，然而，即使从巴勒斯坦角度来看当下前景严酷黯淡，也不能说前途一片漆黑。让我回到前文曾提及的坚韧顽强和如下事实：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遭受破坏、近乎毁灭、满目荒凉的巴勒斯坦社会，如同哈代笔下那羽毛被狂风吹乱的鹁鸟，仍然能将自身的灵魂投向越来越浓的黑暗。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阿拉伯社会如此桀骜不驯，如此健康有益地狂放不羁，也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充满着平民阶层的首创精神，遍布着功能不衰的社会机

构（包括一个奇迹般生机勃勃的音乐学院）。即使他们大多缺乏组织，而且在某些情形下过着受到放逐、没有国家的悲惨生活，流散四方的巴勒斯坦人仍然精力充沛地投身于解决集体命运攸关的问题，而且我所认识的每个人一直都在设法推进这一事业。这一力量之中，只有极小一部分得以进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这个政府里除了阿拉法特这位高度模棱暧昧的人物以外，其他人依然奇怪地置身于共同命运的边缘地带。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法塔赫与哈马斯拥有大约45%的巴勒斯坦选民支持，其余55%的选民则在拥戴、扶植那些迥然不同的、看起来希望大得多的政治组织。

其中一个组织以其举足轻重的意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我已加入其中），因为它是目前唯一真正的草根组织，不仅避开了宗教党派及其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政治，而且也避开了由阿拉法特那些老一辈（而非年轻的）法塔赫活动家提供的传统的民族主义。这个组织被称做“巴勒斯坦国家创始”（PNI），其主要领导人是穆斯塔法·巴尔古提，一名曾在莫斯科深造过的医生，他的主要工作是担任乡村医疗救助委员会主席。这个给人印象极深的医疗组织已为十万多名乡村巴勒斯坦人提供医疗保健。曾为共产党中坚分子的巴尔古提，如今已是一位说话语气沉稳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突破了数百个阻止巴勒斯坦人出行或出境的物质障碍，将几乎每一著名的无党派个人和组织集合起来，共同推进一项预示着社会改革和从各种教义路线的禁锢之中解放出来的政治计划。巴尔古提不同凡响地抛弃了传统的宣传修辞，而与以色列人、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亚洲人及阿拉伯人携手并肩，发起一个进展顺利得令人羡慕的团结运动，来实践它所倡导的多元主义及和平共存的理念。PNI并没有因群众暴动那迷失方向的军事行动而撒手不管、放弃努力。它为失业人员提供培训计划，向贫困人员提供社会服务，以此应对当前形势和以色列的压力。最重

要的是，即将成为一个公认政党的 PNI，正在寻求动员驻留国内和放逐在外的巴勒斯坦社会进行自由选举——那将是代表巴勒斯坦利益而非以色列和美国利益的真正选举。这种求真务实的意识，似乎是阿布·马赞的既定道路上十分缺乏的东西。

这个组织的理想不是要制造出一个拥有 40% 国土、对难民弃之不顾、将耶路撒冷拱手让给以色列的临时国家，而是要通过无论何处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参加的群众行动，来建立一个从军事占领之下解放出来的主权国家。因为 PNI 是一场真正的巴勒斯坦人的运动，所以，改革和民主已经成为它日常实践的组成部分。数百名巴勒斯坦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无党派人士已签约加盟，一些组织举办的会议已在进行，还有更多会议正在巴勒斯坦境外和境内筹划，尽管应付以色列对自由走动的限制十分困难。当正式谈判与讨论仍在继续之时，还存在着许多非正式的、未被拉拢同化的其他选项，而 PNI 和一个日益壮大的国际团结运动正成为其中的主流。想到这一点，会令人稍感欣慰。

《金字塔报》，2003 年 6 月 12—18 日

《生活报》，2003 年 6 月 15 日

《伦敦书评》，2003 年 6 月 19 日

## 46. 尊严与团结

5月初，我在西雅图演讲数日。在此期间，我曾与蕾切尔·科里（Rachel Corrie）的父母和姐姐共进晚餐，他们尚未从对蕾切尔3月16日在加沙被以色列推土机杀害的震惊之中恢复平静。科里先生告诉我，他本人也曾驾驶过推土机，然而，由于他女儿试图勇敢地保护拉法的一栋巴勒斯坦房屋不被铲平而故意将她杀害的那辆推土机，却是个重达60吨的庞然大物，是由卡特彼勒（Caterpillar）公司特别设计用来摧毁房屋的机型，远远大于他见过的或驾驶过的任何推土机。在我对科里一家进行的短暂拜访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颇深。一件是他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将女儿遗体带回美国的事。他们马上找到他们的美国参议员[即帕蒂·默里（Patty Murray）与玛丽·坎特韦尔（Mary Cantwell），两者均属于民主党]，并将亲身经历告诉她们。如其所料，对方表示无比震惊、义愤填膺、满腔怒火，并许诺对此事展开调查。然而，当这两位女士返回华盛顿后，科里一家就再也没有收到她们的任何消息，而此前所答应调查行动也根本没有付诸实施。不出所料，以色列游说团已向她们解释了现实，而两位议员也因此借故推辞。一位美国公民被美国的附庸国的士兵蓄意谋杀，而美国官方不仅不屑一顾，就连曾经答应过她家人的礼节性的调查都没有。

但是，对我来说，有关蕾切尔·科里事件的第二个方面，亦即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这名年轻女性既英勇无畏又充满尊严的行为本身。蕾切尔出生于西雅图以南 60 英里的一个叫奥林匹亚的小城，并在那里长大。她加入了国际团结运动组织（**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并前往加沙去帮助那些素昧平生的受苦民众。她寄回的家书就是她平凡人性的最好见证，让人读了既难过又感动，尤其读到描述她所遇到的巴勒斯坦人对她既友善又关心，把她当成他们中的一分子而欢迎时更是如此，因为她与他们休戚与共，分担他们的生活与烦恼。此外，她还描述了以色列占领之下的恐怖，即使是最年幼的孩子也深受其可怕影响。她理解难民的命运，深知以色列政府是要通过将这群人逼到无法生存的绝路而实现它所说的种族灭绝的阴险企图。令人感动的是，她的团结精神鼓舞了一名叫丹尼的拒绝服兵役的以色列预备役士兵，使他写信告诉她：“你做了件好事，我为此感谢你。”

蕾切尔的家书在她死后不久刊登在英国《卫报》上，而闪耀在所有这些信件字里行间的，则是巴勒斯坦人民那令人惊奇的抵抗行为，而他们不过是平凡百姓，深陷最为恐怖的处境，忍受痛苦与绝望，却依然如故地继续生存着。我们最近听到太多有关路线图与和平计划的消息，以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即使在美国及以色列共同施加的集体惩罚之下，巴勒斯坦人仍然拒绝俯首称臣、屈膝投降。也正因为这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才有今天的路线图以及在此之前的其他无数所谓的和平计划，而绝不是因为美国、以色列以及国际社会出于人道，认为这种杀戮和暴力行为必须停止。尽管巴勒斯坦人的抵抗有过失败与错误，但倘若我们未能正视这些抵抗的威力之真实存在（我所说的抵抗绝不是指自杀式炸弹袭击，它不过是有害无益的），那么我们就错过了一切。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来说，巴勒

斯坦人永远是个问题，而所谓的解决办法永远只是想淡化问题，不是要解决问题。无论沙龙是否使用“占领”这个字眼，或是否拆毁一两座锈蚀和废弃的哨塔，以色列的官方政策一直都是拒不接受巴勒斯坦人与他们平等存在的事实，也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一直受到以色列的可耻侵犯。尽管这些年来有少数勇敢的以色列人一直试图直面这段被隐瞒的历史，但大部分以色列人、似乎还有大部分美国犹太人却竭力否认、回避、拒不接受巴勒斯坦的现实。这就是和平遥遥无期的原因。

此外，路线图根本没有涉及正义公理或者不知多少个十年以来施加给巴勒斯坦民族的历史性惩罚。然而，蕾切尔·科里在加沙的工作揭示出巴勒斯坦民族恰是一个具有庄严而复杂的生活史的民族共同体，而非一群一无所有的难民。这就是她的团结对象。而且我们应该记住，这种团结已不再局限于某个地方的少数几个勇敢者，而是遍布全世界。在过去六个月里，我曾游历四大洲，对数千人发表演讲。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正是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民族的斗争，现在这已经成为解放和启蒙的代名词，不管他们的敌人如何处心积虑地诽谤他们。

一旦这些事实为世人所知，人们就会立即认可并且表达出与巴勒斯坦正义事业及巴勒斯坦人民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勇敢抗争的紧密团结。有件事情颇为特别：无论是在今年的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反全球化会议还是在达沃斯（Davos）及安曼（Amman）会议之中，无论是就世界政治图谱上的任何一极而言，巴勒斯坦问题都已成为中心议题。在美国，我们的公民同胞们被媒体极具偏见地灌输了充满无知与歪曲的信息——媒体在过分渲染自杀式袭击时却从不提及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正在建造的 25 英尺高、5 英尺厚、350 公里长的种族隔离墙甚至从来没有出现在美国有线新闻网或广播电视网

上（或者只是在谈到死气沉沉的路线图时才随口顺带提及），而施加在巴勒斯坦平民身上的战争犯罪、无缘无故的破坏和羞辱、肢体伤害、房屋损毁、农作物破坏以及死亡，这些日复一日、如同家常便饭的痛苦在媒体上根本无法见到——正因如此，难怪大部分美国人都瞧不起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请别忘记，毕竟所有的官方主要媒体，从左派自由主义者直至极端右派，都无一例外地反阿拉伯人、反穆斯林、反巴勒斯坦人。不妨看看在美国酝酿对伊拉克发动这场非法且不正义的战争期间媒体表现出何等的怯懦，不妨看看它们对于制裁曾给伊拉克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的报道有多么罕见，对世界范围内汹涌澎湃的反战浪潮的报道又有多么稀少。除海伦·托马斯（Helen Thomas）之外，几乎没有一个记者就政府战前编造关于伊拉克对美国构成即刻军事威胁的粗暴谎言与虚假“事实”而批评政府。如今，那些政府喉舌们曾肆无忌惮地捏造和操纵的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实”，已或多或少遭到遗忘，或被当做毫不相干之事而不屑一顾，而目前正当媒体热烈讨论美国给伊拉克人民不负责任地一手造成的完全不可原谅的恶劣局势时，这些喉舌们却被媒体放过而不予追究。尽管人们指责萨达姆·侯赛因是个邪恶的暴君，他也确实是个暴君，但他在位时却曾给伊拉克人民提供过水、电、医疗卫生、教育等阿拉伯国家中最优质的基础服务设施。如今这些都已不复存在。

于是，毫不奇怪——由于特别害怕因批评以色列日复一日地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无辜平民犯下的战争罪行而被扣上反犹的帽子，或因批评美国政府的非法战争及可怕的军事占领而被视为“反美”——由伯纳德·刘易斯和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等极端守旧的政论家和东方主义者领导的反对阿拉伯社会、文化、历史和思想的恶意的媒体及政府运动，已使我们太多人相信阿拉伯人真的是一个未开化的、无能的并且注定失败的民族，而且，由于民主与发

展的失败，世上只有阿拉伯人迟钝、落后、缺乏现代化且极端守旧。正是在此处，我们必须调动尊严和批评性的历史思维，去伪存真，将真相与宣传甄别开来。

无人会否认，现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仍由不受欢迎的政权统治，而且大量贫穷、弱勢的阿拉伯青年易受残酷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影响。然而，正如《纽约时报》通常之所为，声称阿拉伯社会受到彻底管制、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民用机构、没有为了人民和由人民发起的正在发挥作用的社会运动，则纯属一派谎言。尽管有新闻法存在，今天你仍可以在安曼市中心买到共产党报，也可以买到伊斯兰教的报纸；埃及和黎巴嫩遍布着各种报刊杂志，它们提出的争辩讨论数量之多，远胜于我们对他们的评价；卫星频道里各种不同观点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在诸多方面与社会服务、人权、企业团体、研究所等密切相关的民用机构，在阿拉伯世界都十分活跃。尽管在到达一个适当的民主水平之前，我们还任重道远，但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单是在巴勒斯坦就有超过一千个非政府组织，而正是这样的活力与行动使得社会继续前进，尽管美国和以色列每天都在处心积虑地对其进行诽谤、阻挠和破坏。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巴勒斯坦社会从未被彻底击败或摧毁。儿童照常上学，医生和护士照常看护病人，男人和妇女照常上班，组织机构照常开会，人们继续生活。这些事实，对于沙龙和其他一些一心只想彻底监禁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极端分子来说，似乎构成一种冒犯。军事打击没起作用，将来也永远不会起作用。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看清这个事实就那么困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明白这一点，不是通过自杀式炸弹，而是通过理性论证、大规模的非暴力反抗以及有组织的示威抗议，既在此处实施，也在各地进行。



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采用更具比较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方式来看待整个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而不应像刘易斯的《问题何在？》（*What Went Wrong?*）之类充满鄙夷之情的肤浅书籍和保罗·沃尔福威茨关于将民主带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无知声明企图主张的那样。不管对阿拉伯的另一番描述是多么正确，这里仍然活跃着一股积极的动力，因为他们作为一个真实的民族，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潮流与逆流的真实社会里，绝不能轻易地被歪曲成一个为汹涌的暴力狂热驱使的大众。巴勒斯坦捍卫正义的斗争，尤其需要展现团结，而非无休止的批评、充满恼怒的灰心气馁以及破坏性的分裂。不要忘记，在此处及世界各地，在拉丁美洲、非洲、欧洲、亚洲和澳洲体现出的团结，也不要忘记，尽管会遇到重重困难和可怕的障碍，许多人都在投身一项事业。何以如此？因为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一个高贵的理想，一种对于平等和人权的道德追求。

现在我想谈谈尊严。当然，在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文学家所了解的每一个文化中，尊严都有特殊的地位。首先我要说的是，认为阿拉伯人不像欧洲人和美国人那样具有个体意识，认为他们不尊重个人生活，没有体现爱、亲密及理解的价值观念，而据说这些都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欧美文化独有的财产，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的东方主义论调，是十足的种族主义主张。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庸俗乏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到处散布这种垃圾，而可悲的是，有些同样无知和自欺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又拾其牙慧——这里我不必指名道姓——他们从“9·11”暴行中看出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任何文化更病态、更失调，并认为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世界比其他任何文化更加扭曲的象征。

我们姑且将这样的事实搁在一边，即：在20世纪，是欧洲和美国制造了最多的暴力死亡，与之相比，伊斯兰世界造成的伤亡简直微

不足道。而那些关于所谓错误文明与正确文明的似是而非的伪科学谬论，都是受到萨缪尔·亨廷顿这位伟大的假先知的荒谬理论的影响。他引导许多人相信，世界可以分成彼此永远交战不休的不同文明。正相反，亨廷顿的每一个观点都大错而特错。没有哪种文化或者文明是独自存在的；没有哪个文明是由完全属己排他的个体性与启蒙思想所构成的；而且没有哪个文明可以在不具备社群、爱、生命价值及其他所有人类基本特征的情况下存在。然而，亨廷顿却不这么认为，就像有些人认为非洲人天生智力低下、亚洲人生来具有奴性、欧洲人先天就是优秀种族一样，他的思想是最纯粹的令人反感的种族主义，这等于如法炮制希特勒的理论，独具一格地用来对付当今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我们必须坚定立场，甚至不必拉开与之争辩的架势。他纯属胡说八道。另一方面，有一项更为可信、更加严肃的约定：与所有人类成员一样，阿拉伯及穆斯林的生活拥有内在的价值与尊严，它们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以其独特的文化样式表现出来的，而这些表达方式无须模仿某种受到普遍认可、适合人人效法的模式，它本身也不必成为这样的模式。

人类的多元性，归根结底，就是不同风格样式的个体与经验之间深刻的彼此共存，而不能被简单化为某一优越形式。这种优越论是那些哀叹阿拉伯世界发展滞后、知识欠缺的学者专家们强加给我们的似是而非之论。我们只需看看从摩洛哥到波斯湾范围内由阿拉伯人创造、并且为阿拉伯人创造的种类繁多的文学、电影、戏剧、绘画、音乐及大众文化，便一目了然。我们应当把这些作为评价阿拉伯人发展与否的一项指标，而不是只看罢某一天的工业生产统计表就断言阿拉伯世界是否达到某种发展水平。

但我要强调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与统治这个社会的少数人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鸿沟。历史上很少像今天

那样，权力如此集中在统治阿拉伯国家的各类国王、将军、苏丹和总统这样的少数人手中。而且，作为一个群体，几乎毫无例外，最糟糕之事就在于他们都没有尽心尽力地代表本国人民。这不仅仅是缺乏民主的问题。他们将自己与人民大众隔绝开来，使自己无法忍受改变，深恐发生变革，怯于将他们的社会向人民敞开，最害怕的是得罪美国老大哥，藉此，他们完全低估了自己和本国人民。他们没有把本国公民看做国家的潜在财富，而是将他们视为觊觎统治者权力的犯罪同谋。

在攻打伊拉克人民的这场恐怖战争中，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能充满自尊与自信地站出来，就这样一场对一个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的劫掠和军事占领发表评论，而这才是真正的失败。很好，萨达姆·侯赛因的恐怖政权已不复存在，这是件莫大的好事。但是，谁指派美国来担任阿拉伯的导师？是谁要求美国来接管阿拉伯世界，并自称代表其公民利益，带来所谓“民主”，尤其是当美国自身的教育体系、医疗保健体系和整个经济都已经恶化到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之时？为什么阿拉伯国家没有齐声反对美国给整个阿拉伯民族带来莫大伤害与屈辱的穷凶极恶的非法干预？这是在勇气、尊严及自我团结方面的巨大失败。

尽管布什政府大谈他们是受全能的神引导，难道就没有一位阿拉伯领导人有勇气说，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是由自己的目标、传统和宗教指引的吗？但是，当可怜的伊拉克平民遭受最可怕的煎熬之时，当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全都吓得一齐瑟瑟发抖，个个心惊胆战，生怕下一次遭殃就会轮到自己的时候，却没有任何领导人出来说话，大家都一言不发。上个星期，阿拉伯一些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还一起拥抱了无缘无故发动战争、摧毁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乔治·W. 布什，这是何等的不幸。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有胆量提醒乔治·W. 布

什，他的行径给阿拉伯人民带来的屈辱、造成的痛苦超过以往任何人？难道一定要向他致以拥抱、微笑、亲吻和深鞠躬吗？理应提供给西岸及加沙地区的反占领运动的外交、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在哪里？不仅没有，相反，我们听到的是外交部长们对巴勒斯坦人的说教，要他们注意方式、避免暴力并维持和谈，尽管明摆着沙龙对和谈的兴趣几近为零。对于隔离墙、暗杀或集体惩罚，阿拉伯国家没有做出一致的反应，我们听到的只是一连串不断重复的、经过美国国务院核准的陈词滥调。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最近的状态让我意识到，阿拉伯国家无力捍卫巴勒斯坦事业之尊严的程度已达极致。阿布·马赞这位在本国民众中几乎得不到什么政治支持的次要人物，之所以被阿拉法特、以色列和美国选中，正是因为他没有选民支持，因为他既不是雄辩家也不是伟大的组织家，或者因为他除了对阿拉法特唯命是从以外几乎一无所是，而且，我甚至担心，还因为他们看出他将是一个按照以色列吩咐办事的人。但是，在亚喀巴（Aqaba），阿布·马赞怎能像一个口技表演的传声傀儡似的，站在那里宣读美国国务院官员为他准备好的讲稿？在演讲中他值得称道地谈到了犹太人的苦难，但接下来却令人吃惊地几乎绝口不谈本民族在以色列控制下所遭受的痛苦。他怎能接受这样一个毫无尊严、被人操纵的角色？他怎能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百年多以来一直在为争取权利而英勇战斗的民族的代表所应有的自尊，就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告诉他必须如此？而且，当以色列一方只说将来会有一个“临时的”巴勒斯坦国，而对于它曾经造成的巨大破坏、犯下的无数战争罪行以及它施加给巴勒斯坦男女老幼的纯粹的虐待和系统的羞辱，却没有表示任何悔恨时，老实说，我完全不明白，作为一个长期受苦受难的民族的领导人或代表，他为什么对此竟然毫不在意？他已经全然丧失尊严感了吗？

难道他忘了在这个尤为关键的时刻他不仅代表个人，更承载着民族的命运？他完全未能应对裕如，昂然挺立，充满尊严——那是一种代表民族的经历与事业的尊严——并且骄傲地、毫不妥协、毫不含糊地证明它，不带有半点巴勒斯坦领导人在向某位完全不值得膜拜的白人父亲乞求一点小恩小惠时惯常表现的半是尴尬、半是抱歉的语气。这些他都没有做到，对此，还有谁能不感到痛惜失望呢？

但是，这是自奥斯陆协议和哈伊·阿敏（Haj Amin）以来巴勒斯坦统治者惯有的举止——集错位的幼稚挑衅和哀怨的乞求于一身。为什么他们总认为绝对有必要奉读敌人为他们撰写的讲稿？作为身处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及美国的阿拉伯人，我们最基本的生活尊严在于我们属于自己的民族，我们拥有文化遗产、历史、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足以表达我们真实渴望的语言。因为这些渴望源自1948年以来强加于每个巴勒斯坦人身上的遭受驱逐、饱受苦难的经历。我们没有一位政治发言人——阿拉伯世界自阿卜杜勒·纳赛尔以来也同样如此——曾充满自尊与尊严地说出我们是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做了什么，以及我们向何处去。

然而，形势正在慢慢发生转变，由阿布·马赞和阿布·阿马斯（Abu Ammars，阿拉法特）等人组成的旧政权行将结束，逐渐将由整个阿拉伯世界出现的一批新领导人所取代。其中最具有前途的领导层由“巴勒斯坦国家创始”组织成员构成。他们是草根活动家，其主要行动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在银行账户上玩弄伎俩，也不是刻意吸引记者们的注意。他们来自职业阶层和工人阶级，有青年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教师、医生和律师——这些人是劳动人民，他们一面维系社会运转，一面抵挡以色列的每日袭击。其次，这些人致力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从未梦想过的民主与大众参与，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民主理念，不过是确保自身的稳定与安全。最后，他们还还为失业者

提供社会服务，向缺乏社会保险者及穷人提供医疗保健，给必须了解现代世界之现实的下一代巴勒斯坦人提供适当的世俗教育，而不仅仅是昔日璀璨的文化遗产。为了实施这些计划，PNI 规定，结束占领是唯一的途径，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自由选举出具有代表性的统一的国家领导层，取代上个世纪里一直任人唯亲、陈旧过时并且缺乏效率的巴勒斯坦领导人。

作为阿拉伯人和美国人，只有当我们尊重自己并且懂得我们斗争的真正尊严与正义时，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为什么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世界上会有那么多人，包括蕾切尔·科里和两位同她一起受伤的国际团结运动组织成员汤姆·赫恩德尔（Tom Hurndall）和布莱恩·埃弗利（Brian Avery），愿意跟我们团结在一起。

最后，让我用一个反讽来结束本文。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观察到世界人民表示广泛团结的种种迹象，而我们自己却没有表现出与之相称的团结与尊严。别人比我们自身更加景仰和尊重我们，这不是很令人惊讶吗？这难道不该是我们跟进赶上我们自身地位的时刻吗？我们能够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一定要让无论身处何方的代表们明白，他们在为一个正义、高贵的事业而战，无须为任何事情表示歉意或感到不安。恰恰相反，他们应该为本民族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并为能够代表他们而无比自豪。

《金字塔报》，2003 年 6 月 26 日—7 月 2 日

《生活报》，2003 年 7 月 2 日

## 后 记

重读父亲最后的这部政治随笔录，我被他留下的精神启示所体现的满腔热忱与奉献精神深深打动。这种精神启示牢固地植根于他坚持不懈地奉行的世俗人道主义。他的分析令读者深深感到，他/她所面对的是一股巨大的道德力量，而这种力量根本不可能离开我们——正是这种感受。令我惊讶的是，父亲会就本书中每篇随笔的发表面世征求我的意见，而每次都使我备感荣幸、受宠若惊。当然，他的工作，包括多方征询意见，这通常是他极其看重的。但是，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核心信念，其中之一便是本书的关键主题：巴勒斯坦人享有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权利，有史以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否定这样一个自明的立场。他所捍卫的这一平等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在那里，独裁政治、社会萧条、贪污腐败日复一日地剥夺公民的力量和权利。

这些文章堪称一份神圣的个人誓约，以此承诺他会以现代政治评论家罕与伦比的雄辩力度和文体风格，投身于记录故国同胞命运遭际的事业。父亲将其一生的渊博学识倾注于写作，评论各种各样的主题，涉及文学批评、歌剧、历史等领域，当然还包括政治。我充分感受到他的政治作品的难望项背的强大威力，因此自己不再考虑投身于记录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至少不会像他那样一丝不苟、始终如一。假若听到我的这番保留态度，他一定会感到不快，因为这些文章无处不在激励我们仗义执言，号召我们从那些歪曲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其他国家真实生活图景的庞大宣传机器手中重新夺回道德制高点。

也许是这种情绪令我迟迟没有下笔描写 2003 年 6 月以色列边防官员拒绝让我和妻子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经历。刚刚抵达边境终点站时，我们就被彼此分开，并遭到彻底搜查。我单独遭受被一名辛贝特机构的官员审问并扣留四个小时的屈辱。他依照惯例影印和检查我的钱包和护照，而这一切都是以“安全”的名义。此番行径均关门进行，还有持枪守卫在我周围徘徊。在此期间，我妻子则在边境终点站的一个隔离区等候，没有我的任何消息，不知即将到来的是福是祸。虽然我们的遭遇与许多巴勒斯坦人忍受的痛苦相比微不足道，但父亲却认为事关重大，并催促我尽可能以公开的方式记载此事。我向父亲保证将把这次经历写下来，可是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才履行对他的承诺。

在我看来，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巴勒斯坦人，正如大卫·赫斯特所述，他不相信巴勒斯坦人“由于自身的缺点和敌人的优越就会注定总是失败，并似乎在潜意识里深知这一点”。<sup>[1]</sup>他坚持努力强调，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能够做到的远远超过我们的领袖和世界其他国家所设想的，并且能够从巴勒斯坦人自身已经展现和即将继续展现的巨大勇气之中振作起来。从这些随笔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父亲 1991 年和 2001 年的两次南非之行，对于他认为未来斗争该如何进行，影响极其深远。在美国、欧洲、亚洲、非洲，尤其是在以色列，开展一场严肃的公众知情运动，同时在巴勒斯坦国内实施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计划，这是结束以色列占领并公正地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南非模式，反殖民主义运动史上一个大胆而独特的样板，为巴勒斯坦民族指

---

[1] 大卫·赫斯特：《枪与橄榄枝：中东暴力之根源》（David Hirst, *The Gun and the Olive Branch: The Roots of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3<sup>rd</sup> ed.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3, p. 201.）



明了前进道路。但领导层和精英人物都不愿听取这种看法，而宁愿从事秘密谈判，甚至将最根本、最神圣的权利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来随意摆布。因此，当父亲辞世时竟有那么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官员前来致敬，这令我感到惊愕，甚至有些无所适从。或许这些人从未听到过他评论他们的言辞，抑或不过是拒绝倾听，并且只是前来庆祝他成为“伟人”的事实。

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领导层及知识界总是感到他们注定要失败，并据此而为，但是，他们的人民却并非如此软弱。正是这样的信念驱使父亲去写，去说。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总是确信南非模式的可行性，也不认为我们真的能说服和发动以色列人民。以色列人在各个层面上似乎都是依靠受害者和优越性这两个顽固化的观念与我们打交道。“但是瓦迪厄，”他会说，“这件事以前曾做过吗？我们是否尝试过发动他们，让他们明白我们被驱逐是他们征服的结果？”由于不可能存在武力解决的办法，他的设想是两个民族生活于同一个国家。然而，在我父亲看来，这个冲突绝不可能通过完全寄希望于更强的一方（也就是以色列）发出慷慨、施放善意的秘密谈判和幕后交易来解决。因此，我才毫不犹豫地说，他会公开抨击所谓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s）、阿亚隆—努塞贝（Ayalon-Nusseibeh）计划，或者巴勒斯坦精英们在没有事先征求人民意见的情况下与以色列人签订的任何形式的秘密而草率的协议。

陶醉于成为伟大圣人，并且预测奥斯陆协定以及自封的“和平进程”的失败，这似乎不是父亲的风格。面对巴勒斯坦命运的继续恶化，他跟我们其他人一样悲痛欲绝。虽然许多人对我说，他们喜欢他的文章，但他们并没有从他的话语中看出多少有关未来的蓝图。自然，他们完全错了。父亲的确有解决冲突的办法，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愿接受一个现实，即这样的解决方案需要假以漫长时

日、付出艰巨努力，并最终要求参与的各方都能乐于承认对方的存在。我时常想要问他，为什么他不尝试亲自领导这场他构想的运动，因为他让我感到他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阶层赢得必要的支持。我之所以犹豫不决，是考虑到他的疾病。病魔最终摧垮了他的生命，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扮演一名专职政治活动家和领导人的角色。并且我知道，向他提这个问题就是在冒险要他的命，哪怕只是片刻发问。虽然他在书中只是间断地、有节制地提及他的病痛，但它所产生的紧迫感很明显地在激励和引领着他发出的精神启示。

失去父亲的音容笑貌，这份打击仍不堪承受，然而，即使是现在，他的作品依旧是被压迫民族将会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一份神圣誓约。他留给我的令人惊奇的回忆是，无论病痛多么难忍，无论身体多么虚弱，他都坚持奉行仗义执言和洞察世事的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在无数次去医院的路上，当他的身体虚弱疲惫得无法亲自读报时，他就让我读给他听，耐心地听我匆忙而主动地发表评论。父亲在神智清醒的最后一整天里，在被病魔征服之前，一直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觉得自己为巴勒斯坦人民做得还不够。一想到这里，我仍然深感痛心。所有亲历这一不寻常场面的人都惊呆了：如果爱德华·萨义德为巴勒斯坦做得还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又做了什么？这个问题将不得不留待来日，由我们这代人和未来几代人予以回答，然而，与我们难以抑制的失落感同样强烈的，是对这位筚路蓝缕的先驱楷模的无限爱戴和深深感激。

瓦迪厄·E. 萨义德 (Wadie E. Said)

2004年3月